

武大校友通讯

2019 年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主	编	邓小梅
执	行	陈东华
主	编	(按姓氏笔画排序)
编	委	
		王新才 邓小梅 叶琳娜
		刘赛男 肖艾芹 吴根友
		张发林 陈东华 金 诚
		胡庆方 徐 毅 涂上飙
		涂险峰 潘迎春



目 录

卷首语

美好未来属于奋进者

——2019 年新年献词 …… 校党委书记韩进 校长窦贤康(3)

特别报道

武汉大学 2018 年十大新闻	(9)
武汉大学 2018 年度新闻人物：刘正猷	(14)
武大 3 项成果获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16)
工程科学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	(19)
全国高校教师教学竞赛状态数据排名我校蝉联第一	(20)
移动测量系统亮相国庆 70 周年阅兵式	(22)
我校三位教授入选国家杰青	(24)
宋保亮获首届“科学探索奖” 获腾讯资助 300 万元	(28)
乔洪武教授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29)
六位校友当选两院院士	(32)
武大四位校友获国家级荣誉	(37)
校友程亦凡、陈晓红入选 2019 年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	(40)
学校纪念周鲠生先生诞辰 130 周年	(42)



1979 级校友入学 40 年返校聚会纪念专栏

我的母校情怀	陈建国 (47)
回“珈”的感觉	郭志安 (50)
我与武大的第 N 个十年	蒯玉根 (53)
梧桐雨	

——Amy 和 Alan 的故事	李学宽 (56)
我的毕业分配“传奇”	刘华新 (60)
我的老师若特夫人	刘小绿 (64)
四十年是什么	石汉平 (68)
追忆和平同学二三事	宋新郁 (71)
父亲领我上珞珈	谭 文 (74)
母校像母亲	陶树生 (77)
情到无语 事来无思	

——武汉大学 1979 级 40 年聚会之图文说	王一鸣 (80)
珞珈山赋	陈 刚 (85)
珞珈·四十年	方 鹏 (87)
八声甘州·七九级武大医学部四十周年赋	方 胜 (89)
唱水调歌头 咏珞珈情怀 ... 郭灵彦(山水) 彭新民(涵谷) (90)	
重返珞珈	黄敬东 (97)
七九级同学入校四十周年珞珈山、东湖磨山游记	李春芳 (99)
七律·潮	李任瑞 (100)
江城子·同窗再相会	李文学 (101)
珞珈赏樱四十春	李 勇 (102)
虞美人·同学聚会己亥秋	廖德仲 (103)
1979, 永远的青春记忆	刘 丽 (104)
那年	

——1979 级同学入学 40 周年返校纪念	涂长庚 (106)
回不回去	
——珞珈山求学四十年毕业三十六年思绪	王其红 (109)



七律·武汉大学入学四十年返校	许定波(110)
在深秋,我们回来了	许海云(111)
蝶恋花·同窗聚	徐学福(113)
七律·再聚首	姚传宝(114)
七律·重聚抒怀	
——纪念医学部 1979 级入学四十周年同学聚会有感	
.....	袁流海(115)
致敬 1979	赵仙泉(116)
珞珈山	邹鸣琴(118)

珞珈风采

鄂栋臣:测量地球两极的人	记者 王俊 实习生 应悦(121)
桂建芳:四十年求学与从研的人生感悟	桂建芳(127)
李德仁:“传帮带”送卫星上天	张过口述 肖珊整理(132)
林绍新:从珞珈学子到共和国将军	黎文全(136)
梁西:毕生耕耘国际法	付鑫鑫(142)
毛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在武汉大学 2019 届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毛 明(152)
周旭洲:母校,我心灵的故乡	
——出席“纪念武汉大学西迁乐山 80 周年活动”专题演讲	
.....	周旭洲(155)

珞珈记忆

争鸣道不孤 开拓永不息	
——记我国图书馆学家皮高品先生	陈 鹏(161)
师从吴于廑先生习史小记	陈 勇(167)
那一段温柔的旧时光	崔雯晴(178)
珞珈山七年求学记	邓咏秋(184)
小滢的两封家书	郭玉瑛(191)



师恩师德 山高水长

——纪念唐明邦先生	黄 钊(198)
那些年在珞珈山看电影听讲座	珈 言(202)
那年正芳华 我们在珞珈	李福信(210)
我的苏联老师亚历山德拉	李声权(214)
珞珈山的怀念	刘怀俊(217)
吾爱吾师	卢基林(232)
走访亚当斯同学的故乡	毛 芷(236)
民国造船专家武大工学院教授郭霖	牛 军(241)
风骨傲然的宪法学大师何华辉	秦前红(246)
皮公亮：珞珈山的第一代孩子	宋骥弘(256)
我的导师朱英国院士	孙 俊(269)
说说民国时期的武大法学院	涂上飙(272)
梦回珞珈	汪 洋(283)
回望珞珈山的师长们	吴令华(290)
忆中文系教授吴济时先生二三事	许先国(299)
追忆聂文杞先生	张箭飞(303)
樱花园的隐士	张天扬(308)
怀念恩师吴林伯先生	赵仙泉(311)
一个寝室的四分之一世纪	周 畅(313)
“文法理工农医”之梦	周 荣(317)

珞珈文苑

追忆珞珈年华	梅 朵(327)
2019 年珞珈春天纪事	巴 河(331)
七律·雨中赏樱	曹海钧(333)
珞叶怀想	陈 勇(334)
真想	范 江(336)
微澜中，珞珈之落叶	方书华(338)
毕业五十年 深情怀母校	冯从善(340)



永是珞珈一少年	何五元(341)
母校的秋天有一个笔名	洪 烛(343)
恩师韩德培先生驾鹤西游十年缅怀二首	黄 进(344)
七律·怀念母校	焦根基(345)
心中的珞珈	李立屏(346)
珞珈山的秋色	李少君(347)
珞珈离别感怀	李昀臻(348)
樱	梁 冰(350)
中文系 68 届同学毕业五十周年有感	马承五(351)
咏秋	陶 然(353)
教师节拜望张畹惠老师有感	陶嘉瑜(354)
寿星明·寿导师彭斐章先生九十华诞	王新才(355)
珞珈樱花协奏曲	吴根友(356)
武大 我见过你深情的模样	姚 勤(357)
武汉胜景游	叶国源(361)
重上珞珈山	曾俊伟(362)
《武大校友通讯》捐订名录	
——(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363)
征订征稿启事	(364)
关于进行校友信息系统认证的通知	(366)
袁昌英文集系列丛书编纂出版项目组征集研究资料启事 ...	(368)

卷首语





美好未来属于奋进者

——2019 年新年献词

校党委书记韩进 校长窦贤康

时光匆匆，2018 年在我们的忙碌中悄然离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代表学校，向全体师生、教职员、离退休老同志、海内外校友，以及关心支持武汉大学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新年的祝福！

2018 年是砥砺奋进的一年。学校以内涵建设为主线，在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形成了三个共识，产生了三个可喜变化：一是全校上下高度重视并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从教学建设、学习条件、生活环境、出国留学等各个方面加强了对学生的服务，广大教职员“学生为本”的意识明显增强；二是“人才强校”的理念深入人心，各个学院、科研机构和职能部门都把引才、育才、为人才服务作为首要职责，学校高层次人才队伍进一步壮大；三是学校积极回应国家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从生源质量、人才引进要求、教师职称晋升、学生毕业等多方面提高标准，形成了高水平办好武汉大学的良好导向。

2018 年也是收获满满的一年。学校在全球三大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排行榜 QS、USNews、THE 中所处的位次全面提升；高层次人才总量大幅提高，新增“国字号”人才 73 人（次），“杰青”“青千”“青拔”入选数位居全国高校前列；武大学子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在 QS 全球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行榜中位列内地高校第六；武大学者连续在世界顶级期刊 *Nature*、*Science* 发表高水平成果，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二；武大



人牵头自主研发的全球首颗专业夜光遥感卫星——“珞珈一号”成功发射，它将在太空与我们一起迎接新年的曙光。

2018年还是承前启后的一年。学校正在精心筹备并即将召开第九次党代会，会议将描绘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力量，开启新时代“双一流”建设的新征程。

未来可期，仍需脚踏实地。新的一年孕育新的希望，也将面临新的挑战，只有不畏困难、勇于拼搏的人，才能创造美好未来。

同学们、老师们、全体教职员工，忙碌了一年，大家辛苦了！春种秋收，努力付出过的人，一定会有回报。新的一年，学校将实施“三学期制”，为学子提供更多海外学习机会、更多高水平课程，希望同学们好好充实自己，成为更加优秀的人；学校将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让潜心育人的教师更有成就感，让埋头科研的专家学者更有获得感，希望老师们继续在“双一流”建设中培育桃李、追求卓越，推动教学科研再上新台阶；学校将大力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希望全体教职员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担纲责任、积极进取，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成绩！

广大校友们，一年来，你们热情回馈母校，捐赠的人才引进基金协议金额突破5亿元，你们的支持母校建设与发展的坚定力量！你们奋斗在各行各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光发热，母校永远牵挂你们，为你们加油喝彩。新的一年，希望你们勇于拼搏、奋发有为，在各自岗位书写精彩人生！

当我们展望未来，我们不应忘记历史。今年是建校125周年，也是西迁乐山80周年。80年前，武大师生冒着日军炮火西迁乐山，在艰难困苦中弦歌不辍，创造了令人惊叹的“乐山辉煌”，那个时候孕育出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武大精神的重要内涵，至今仍激励武大人奋勇向前。

当我们展望未来，我们更不应忘记时代赋予的使命。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是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按照学校党委的总体部署，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在新时代书写学校“双一流”建设的



“奋进之笔”，以新的办学成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华诞献礼！

2019 年即将到来，让我们携手并肩，开拓进取，美好未来将属于每一位奋进中的武大人！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9 年 1 月 1 日

特别报道





武汉大学 2018 年十大新闻

岁末，学校十大新闻评选委员会经过严格认真评审，评出了“武汉大学 2018 年十大新闻”和“武汉大学 2018 年度新闻人物”。分别是：“珞珈一号”科学试验卫星成功发射入轨；英国首相特雷莎·梅首次访华首站访问武大；《科学》刊发校长专访文章和武大 125 周年校庆特刊；《马克思主义大辞典》问世；《科学》《自然》分别刊登我校最新科研成果；冯天瑜先生父子两代接力珍藏艺术品赠予武大；我校再捧“创青春”国赛优胜杯；由校友倡议成立的人才引进基金完成 5 亿元目标；我校入选首批学位授权自主审核高校；首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我校 24 门入选，入选数量居全国第二。年度新闻人物：刘正猷。具体内容如下：

一、“珞珈一号”科学试验卫星成功发射入轨

6 月 2 日 12 点 13 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武汉大学“珞珈一号”科学试验卫星由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搭载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截至目前，“珞珈一号”01 卫星已开展系列低轨卫星导航增强实验，实验成功率 100%，卫星在轨运行状况良好。该卫星由武汉大学牵头联合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研制，主要用于试验验证低轨夜光遥感、导航信号增强等技术。



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首次访华首站访问武大

1月31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首站即来到武汉大学，出席湖北英国教育文化交流展。特雷莎·梅听取了校党委书记韩进介绍的学校情况，观看了武汉大学辩论队的辩论表演，并与包括武大学子在內的青少年互动交流。2018年，第八届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在我校举行，加蓬共和国总统阿里·邦戈·翁丁巴访问我校并获颁名誉博士学位，学校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三、《科学》刊发校长专访文章和武大 125 周年校庆特刊

11月29日，武汉大学建校125周年纪念日，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Science* 以 *Celebrating 125 Years of Academic Excellence: Wuhan University (1893-2018)* 为题，在线推出武大125周年校庆特刊。12月21日出版的 *Science* 期刊以 *Beautiful Campus, Beautiful Minds: Celebrating Wuhan University'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为题刊载对校长窦贤康的专访，武大125周年特刊随该期杂志一并发行。2018年，学校以“弘扬学术、凝聚力量”为主题，举办了系列学术、文化、校友和学生活动，隆重庆祝建校125周年和纪念武汉大学西迁乐山80周年。

四、《马克思主义大辞典》问世

4月19日，以整体性视角编写的大型马克思主义辞书《马克思主义大辞典》在京首发。该辞书由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编纂，集44个单位的90余位专家之力，历时5年完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成果。2018年，学校在人文社科领域亮点不断，聘任首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院研究员和首批文科“杰出



青年学者”“优秀青年学者”，张昌平教授为习近平主席和印度莫迪总理讲解荆楚文化，面向国家战略组建大数据研究院、“一带一路”建设研究院等跨学科研究平台，获批国家重大类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教育部一般项目总数创历史新高。

五、《科学》《自然》分别刊登我校最新科研成果

6月7日，《Science》以研究长文形式发表了生命科学学院宋保亮教授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该研究为降胆固醇提供了新的药物研发靶点。宋保亮和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马依彤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8月2日，《Nature》在线发表了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刘正猷、邱春印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基于一种新型的声学人工结构材料外尔声子晶体，报道了一类全新的界面波动响应即拓扑正折射和拓扑负折射。2018年，学校在自然科学领域成果显著，4项成果获2017年度国家科技奖励，首个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启动，获批7项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吴晓群教授获评“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徐红星教授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等。

六、冯天瑜先生父子两代接力珍藏艺术品赠予武大

12月3日，“冯氏捐藏馆”正式开馆。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与其兄长冯天琪、冯天瑾将400多件冯氏父子两代接力90余年珍藏整理的文物及艺术品捐赠给武汉大学。“冯氏捐藏馆”设于我校图书馆，90多件对外展出的珍贵藏品主要为名人书画、名士往来信札与古钱币，均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七、我校再捧“创青春”国赛优胜杯

11月1日至3日，在2018年“创青春”浙大双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上，我校推荐的6个项目全部进入终审决赛，摘得3金3银，以总分排名全国第四、湖北省第一的优异成绩捧得优胜杯。



2018 年，武大学子在各类竞赛中表现出色，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在 QS 全球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行榜中位列内地高校第六。

八、由校友倡议成立的人才引进基金完成 5 亿元目标

11 月 23 日，世纪天润和天津路顺两家公司分别向武汉大学人才引进基金捐赠一千万元。至此，原计划 5 年筹资 5 亿元的人才引进基金，只用了不到一年半就提前完成目标，为学校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保障。近年来，广大校友和关心武大的社会人士支持武汉大学建设的热情高涨，支持力度空前加强，8 月 28 日，由卓尔集团阎志校友捐建的卓尔体育馆和当代集团艾路明等校友捐建的当代研究生楼正式启用。2018 年，学校引进各类人才 200 余人，其中超过 70% 为海外直接引进，引进数量创历史之最；新增“国字号”人才 73 人（次），“杰青”“青千”“青拔”入选数位列全国高校前列，人才竞争力显著提升。

九、我校入选首批学位授权自主审核高校

5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自主审核单位名单的通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 20 所高校成为首批学位授权的自主审核单位。我校是中南地区唯一获批高校。获批自主审核权后，我校可自主增列和调整研究生学位授权点，并可自主设置交叉学科。

十、首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我校 24 门入选， 入选数量居全国第二

1 月 15 日，教育部在京召开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推进会，宣布首批共 490 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我校 24 门课程入选，入选数量居全国第二。截至目前，我校在国家级 MOOC 平台上线



了 72 门课程，受到来自全国各地各层次学习者的广泛好评。2018 年，学校首次面向全校本科新生开设两门基础通识课程“人文社科经典导引”和“自然科学经典导引”，推行“大班授课、小班研讨”教学方式，标志着我校通识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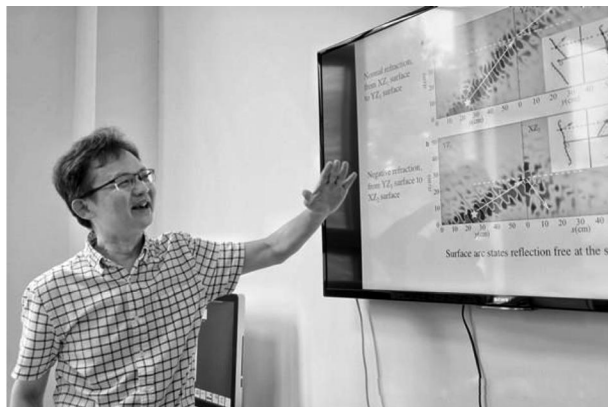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武汉大学 2018 年度新闻人物： 刘正猷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刘正猷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长期研究人工结构中的声波传播特性，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截至目前，刘正猷及其团队已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特别是近三年来，团队分别提出声波能谷自由度的概念、发现声谷态拓扑边界输运，首次观察到了声子晶体中的外尔点并研究相关的声表面波拓扑输运性质等。基于这些研究成果，在 *Nature*（《自然》，1 篇）、*Nature Physics*（《自然·物理》，2 篇）以及 *Phys. Rev. Lett.*（《物理评论快报》，4 篇）等顶级期刊上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

其中，团队于 8 月 2 日在《自然》刊发论文《外尔声子晶体中的声表面波拓扑负折射》。该项成果基于一种新型声学人工结构材料即外尔声子晶体，研究报道了一类全新的界面波动响应，即拓扑正





折射和拓扑负折射。这项研究不仅更新了对界面声学的理解，也将促进对固体“外尔半金属”的物性研究。该文第一署各单位为武汉大学，博士生何海龙为第一作者，邱春印、刘正猷为通讯作者。

目前，该团队已成为声学人工结构研究领域国际领先的几个课题组之一，其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为表彰刘正猷在声子、声波领域的贡献，2015 年，国际声子学学会曾授予他 Brillouin(布里渊)奖。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武大 3 项成果获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1 月 8 日上午，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召开。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活动。武汉大学 3 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其中主持完成的 2 项成果分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参与完成的 1 项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姜卫平(左一)、施闯(中)、朱欣焰(右一)教授合影



施闯教授主持完成的“中国高精度位置网及其在交通领域的重大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该项目瞄准北斗系统规模化应用的国家重大需求，立足自主创新，建立了精准、快速的北斗定位服务技术体系，研制了高性能、低成本的北斗核心芯片和系列装备，构建了稳健、可信的中国高精度位置服务系统，核心技术跻身国际前列。项目团队开拓了北斗精准定位在公路、水路、设施建设和大众出行等方面的规模化、产业化创新应用，并辐射军民其他领域，取得重大社会效益。

姜卫平教授主持完成的“海洋测绘和内陆水域监测的卫星大地测量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该项目突破了多源卫星数据融合处理、海洋地理信息精细反演、陆海垂直基准无缝转换等关键技术，形成了自主创新的海洋测绘卫星大地测量技术方法体系。研制了我国首个国际同期分辨率最高、精度优于 5cm 的全球平均海面高模型 WHU2000；反演了全球 $1' \times 1'$ 分辨率的海洋重力异常和海底地形模型；率先构建了中国近海大范围无缝深度基准模型，实现了与国家陆地高程基准的无缝转换；并拓展用于内陆水域，实现了对我国主要湖泊水位和长江流域水储量等的变化监测。成果广泛用于我国沿海区域数字高程基准构建等工程，也被德国、韩国等科研机构用于深度基准转换等工作，并为海洋二号卫星系统、港珠澳大桥等国家重大工程提供了基础数据。

朱欣焰教授团队参与完成的“复杂大电网时空信息服务平台关键技术与应用”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该项目创建了复杂大电网双空间一体化时空信息模型，提出了复杂大电网时空拓扑秒级实时重构方法，构建了基于北斗系统的电网资源信息可信高效更新技术体系，研发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复杂大电网时空信息服务平台，建立了基于统一时空基准 CGCS2000 的国家电网地理信息服务网络。成果已应用于国家电网总部、27 个省级电力公司及地市单位，并在“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推广。

据悉，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 278 个项目和 7 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38 项：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7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67 项：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63 项；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 173 项：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23 项（含创新团队 3 项），二等奖 148 项。刘永坦、钱七虎两位院士荣获 2018 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5 名外籍科学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9 年 1 月 2 日



工程科学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

5月9日 ESI 最新数据显示, 我校工程科学学科总发文 3732 篇, 总被引 28836 次, 在入选 ESI 工程科学的 1420 个机构中排名第 139 位, 首次进入全球前 1‰, 这是我校继化学之后第 2 个进入 ESI 全球前 1‰的学科。

从学科排名来看, 我校 17 个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 的学科中, 化学(第 84 名)、材料科学(第 89 名)、计算机科学(第 86 名)进入全球前一百名行列; 材料科学、临床医学、计算机科学、地球科学、生物与生物化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社会科学 7 个学科进入 ESI 前 5‰; 地球科学、社会科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生物与生物化学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标志着这些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在不断地提升。

从全学科(All Fields)来看, 2019 年 5 月全球共有 5864 个机构进入 ESI 前 1%, 大陆入选高校有 262 所, 我校排在第 321 位, 位列前 1‰。我校自 2015 年 1 月首次进入全球前 1‰以来, 全学科排名稳步上升。其中, 2015 年 1 月排名第 470 位, 2016 年 1 月排名第 446 位, 2017 年 1 月排名第 423 位, 2018 年 1 月排名第 385 位, 2019 年 1 月排名第 342 位, 发展态势良好。

我校 17 个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 的学科分别是: 化学、工程科学、材料科学、临床医学、计算机科学、地球科学、生物与生物化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社会科学、植物学与动物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农业科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数学、免疫学、物理、微生物学。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9 年 5 月 14 日



全国高校教师教学竞赛状态数据排名我校蝉联第一

2月22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杭州正式发布“2012—2018年全国高校教师教学竞赛状态数据”，武汉大学以奖项数量97项、总分100分的成绩蝉联第一。

本次状态数据涵盖2012—2018年度举办的39个教师竞赛项目，其中本科院校项目36个、高职类项目3个，参与排名的本科院校达900多个，数据量19060条。竞赛包括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全国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全国高校GIS青年教师讲课竞赛、全国高等学校测绘类专业青年教师讲课竞赛、全国基础医学青年教师讲课大赛等。

教师教学竞赛是高校培养教师教学能力和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途径，是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的重要手段。2015年以来，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将工作聚焦于课堂教学，采用多种措施促进教师“寓教于赛、以赛促教”，主要包括：制定“新入职教师本科课程准入制度”，采用“三段式”培训迅速强化青年教师教学技能；40岁以下青年教师全员参与两年一届的校“青教赛”；建立教师教学发展支持系统，定期举办优秀教师教学经验交流会、现代教育技术培训；设立“教师教学发展专项”教研，优先资助新教师、新开课以及课堂教育技术实践项目；实现个性化、多样化的教学咨询服务，促进教师主动提升教学质量；持续推动学院教师发展分中心建设，实现优质学院教学资源共享；开展教师心理辅导与咨询活动。



据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今后将持续发布全国高校教师教学竞赛状态数据，并将启动全国普通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研究工作。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9 年 2 月 26 日



移动测量系统亮相国庆 70 周年阅兵式

10 月 1 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其中，由武汉大学与立得空间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军用移动测量系统亮相阅兵式战略支援部队方队。



上午 11 时许，信息作战第四方队经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这个方队由战略支援部队某部抽组而成，受阅的 70 余名官兵来自一线部队，驰骋“信息疆场”，有观天测地的“火眼金睛”之誉。受阅的气象水文观测车、地形勘测车、预报保障车、



测绘导航信息服务车等装备，都是首次接受检阅的国产新型装备。

方队中有一排军用越野车辆，外挂各种神秘的传感器，威猛而科幻的外形格外引人注目。它们就是以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李德仁院士为首席科学家，由实验室和立得空间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研制的“测绘神器”——移动测量系统(MMS)。

MMS 是一种车载测量装备，能快速采集高精度、三维地理信息，并能与无人机、有人机和遥感卫星采集的数据进行融合使用，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的地理空间信息。

所谓“兵马未动，测绘先行”，测绘与地理信息技术在现代战争中具有极高的价值。早期由于惯性导航等关键技术受到国外封锁，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与立得空间的技术人员必须自力更生，从概念、理论、技术到产品完成全方位的原始创新。在李德仁院士的带领下，技术团队经过数十年刻苦钻研，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之后，终于攻克了这一“卡脖子”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并将这一先进的技术产品成功应用到国防领域，极大地提高了我军的测绘保障能力。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9 年 10 月 1 日



我校三位教授入选国家杰青

日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 2019 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名单，我校水利水电学院陈益峰、电子信息学院袁志刚、药学院陈实 3 位教授入选。其中药学院首次获批杰青项目，水利水电学院连续 3 年获批。3 位教授均在各自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成绩。

陈益峰，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 年在武汉大学获岩土工程硕士学位，2004 年获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博士学位。获首批国家优青项目资助，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任水工岩石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岩石力学领域国际权威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Sciences* 副主编、国际工程地质与环境学会会刊 *Bulletin of Engineering Ge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编委、*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科学编辑、《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编委，同时兼任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岩体物理数学模拟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大坝工程学会大坝数值模拟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岩石工程设计方法分会常务理事等。主要从事岩土介质及地质材料复杂流动特性与控制技术研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 项、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1 项和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科研项目 20 余项。在 *GRL*、*WRR*、*JFM*、*IJRMMs* 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近 5 年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 SCI 收录论文近 50 篇。合著专著 1 部，参编图书 1 部，参编行业规程 1 部，授权国家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登记 10



余项。研究成果获 2016 年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 2012 年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 1), 参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排名 5、7), 指导 10 余名研究生获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武汉大学学术创新奖等奖励。



陈益峰

袁志刚, 武汉大学珞珈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03 年在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获得空间物理专业博士学位。2003—2004 年在日本名古屋大学太阳与地球环境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2004—2006 年在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从事二站博士后研究。2006 年获评副教授。2009 年破格晋升为教授。兼任 *Earth and Planetary Physics* 编委、《电波科学学报》编委、中国电波传播学会委员。近年来立足国内, 在武汉大学独立地开辟了波粒相互作用导致的内磁层-电离层耦合的研究方向。紧紧围绕内磁层-电离层耦合, 通过卫星与地面上联合观测, 结合计算机数值模拟, 开展了内磁层中等离子体波的特性、波粒相互作用的特征以及相应的内磁层-电离层耦合特征的系统性研究工作。发表 SCI 论文 92 篇(其中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国际权威期刊 *GRL* 12 篇、*JGR* 21 篇)。SCI 总引用 1200 余次, $h\text{-index} = 22$ 。学术成果发表受到包括欧洲空间局、*JGR*、*GRL* 等学术杂志及机构



的引用和高度评价。同时多次受到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作特邀报告。曾获得中国科学院院长奖、第 11 届全国日地空间物理大会优秀青年论文奖、37 届博士后科研基金一等资助、极地科学优秀论文奖、武汉大学优秀博士后、湖北省优秀硕士论文指导教师、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



袁志刚

陈实，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青年特聘专家、湖北省特聘专家、湖北省医学领军人才、博士生导师。2000 年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生物技术本硕连读班。2004 年博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2001—2002 年赴韩国高等科技学院进行合作交流。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任 *Microbiological Research* 和 *BMC Systems Biology* 副主编，国际化学生物学协会国际委员会成员。以通讯或共同通讯作者在 *PNAS*、*Nature Communications*、*Angew Chem Int Ed*、*Nucleic Acids Research*、*Autophagy*、*FEMS Microbiology Reviews*、*Trends in Cell Biology*、*Medicinal Research Reviews*、*Theranostics*、*mBio*、*Molecular Microbiology* 等发表论文。主持国家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重点国际合作项目、面上项目等，曾任科技部 973 课题组长。致力于表观遗传、基因组修饰与编辑、合成生物学与药物发现方面的研究。



陈实

此外，数学与统计学院饶胜，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范锡龙，生命科学学院徐可、周宇，测绘学院袁强强，口腔医学院陈刚，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夏桂松，医学研究院胡明明 8 位教授入选 2019 年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9 年 11 月 23 日



宋保亮获首届“科学探索奖” 获腾讯资助 300 万元

9月21日，由腾讯基金会和杨振宁等14位科学家共同发起的首届“科学探索奖”揭晓，包括我校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宋保亮教授在内的50位青年科技工作者获得该奖。每位获奖人将获得300万元资助奖金，分5年资助，每年60万元。

“科学探索奖”是面向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直接资助在中国大陆全职工作的、45周岁及以下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一个公益性奖项。该奖项由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腾讯基金会发起人马化腾，与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携手杨振宁、毛淑德、何华武、邬贺铨、李培根、陈十一、张益唐、施一公、高文、谢克昌、程泰宁、谢晓亮、潘建伟等知名科学家共同发起。此次评审工作共有350多位各领域的专家参与，在奖项的提名、推荐、评审过程中，超过百位两院院士参与其中。

此次评选出的50位获奖者经过初筛、评审、复审以及终审答辩4轮，经过4个多月的评审，最终从1335名申报人中脱颖而出，申报人与获奖人比例约为25:1。他们分别在数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天文和地学、化学新材料、信息电子、能源环保、先进制造、交通建筑技术和前沿交叉技术9个领域从事基础科学研究或前沿技术研发。2019年“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将于11月2日在北京举行。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9 年 9 月 23 日



乔洪武教授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9月25日，经济与管理学院乔洪武教授等著的《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三卷本，商务印书馆2016年12月版）获第十八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该奖项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获得的最高奖。该书系此届孙冶方奖中唯一的获奖著作。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系乔洪武任首席专家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最终成果，结项鉴定等级为优秀。该套著作是国内目前为止最为广泛、最为全面地涵盖从古代至当代的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专著，系统地研究了从《圣经》开始至2008年次贷危机后的西方经济伦理思想。



乔洪武(右)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2012年在北京



这套著作的重大理论价值在于：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中，哲学伦理学是其思想理论源头。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位道德哲学教授，是他率先开启了从哲学研究范式和从经济学研究范式两个向度研究社会经济中伦理道德问题的先河。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正是因为在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中“恢复了伦理的维度”而获得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乔洪武的著作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比较客观地探讨并全景展示了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同时，凸显了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和理论闪光点、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弥补了我国对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不足，完善了作为学科的西方经济伦理思想体系。

该著作不仅填补了我国经济思想史对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一项空白，研究成果中所阐释的经济伦理思想及其辩证分析，对于启迪和完善我国现代经济发展理念，推进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所必需的思想观念解放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实践指导与启迪意义。2017 年 12 月，搜狐·财经频道刊发了由北大汇丰 EMBA 与经济金融网(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联名推荐的 2017 经济学年度好书 100 种，《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三卷本)位列“经济伦理与福利经济学”类图书之首。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三卷本)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为了纪念我国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表彰和奖励对经济科学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和发展而设立。该奖项于 1984 年开始评选，每两年评选一次，我校曾启贤、辜胜阻教授分别于 1984 年、1994 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获奖作品反映了中国经济科学发展前沿的最新成果，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各领域的最高水平。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9 年 9 月 25 日



六位校友当选两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日前公布了 2019 年新当选院士名单。其中，武汉大学校友董晨、毛明、张跃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校友舒印彪、陈军、王桥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董晨 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院士



武汉大学 1985 级细胞生物学专业本科毕业生，目前任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董晨从事免疫学研究，在 T 细胞分化和自身免疫疾病领域做出了多项开创性贡献，前后分别发现 Th17 和滤泡辅助 (T_{fh}) 细胞为独立的 T 细胞亚群，也研究了免疫耐受与肿瘤免疫的重要分子机制。其研究给治疗免疫性疾病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发表论文 240 余篇，2014—2019 年连续六年入选汤森路透全球高被引



科学家。2009 年获得美国免疫学家协会 BD Bioscience 研究者奖，2011 年获得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2019 年先后获得国际细胞因子与干扰素协会“BioLegend-William E. Paul 细胞因子杰出研究奖”和吴阶平基金会医药创新奖等。

毛明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院士



1962 年 9 月出生，湖北咸宁人，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 1979 级机械专业本科毕业生。99A 主战坦克总设计师，现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兵器首席科学家。

毛明长期从事战车总体技术理论研究和装备研制等工程实践工作，在主战坦克总体设计、两栖战车研究与开发方面取得了创造性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出版著作三部，发表论文七十余篇。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创新奖、全国杰出科技人才奖、全国劳动模范、国防科技工业十大创新人物、中央电视台 2016 年度科技创新人物、2017 年央企楷模等荣誉称号。

张跃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院士

1958 年出生，湖南醴陵人，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 1977 级物理专业本科毕业生。现为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张跃长期从事低维半导体材料及其服役行为的研究，致力于将材料研究和国防重大需求相结合，在基础理论、制备技术和工程应用方面做出了系统性、创新性重要贡献。主持承担了 60 余项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首席科学家，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士。

舒印彪 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院士



1958 年 7 月出生，河北涿州人，于 2001 年和 2007 年分别获得



武汉大学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主席,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

舒印彪曾任国家电力公司国家电力调度通信中心总工程师、副主任,国家电力公司电网建设部副主任、总工程师,国家电网公司工程建设部主任兼电网建设分公司总经理,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助理,国家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国家电网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成员,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

陈军 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院士



1983年在原武汉测绘学院获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硕士学位。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原总工程师。

陈军主要从事基础地理信息建模更新与服务应用研究。2000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取得 Voronoi 动态空间关系模型、全球 30 米地表覆盖遥感制图等创新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和世界地理信息技术创新奖 1 项。1 篇论文入选中国百篇最具国际学术影响论文。2003 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017 年获得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和亚洲地理信息终生成就奖。



王桥 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院士



1992 年在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制图系获地图学硕士学位，1996 年在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土地科学学院获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博士学位，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

王桥长期从事环境遥感监测工作，主持完成国家重大科研项目 26 项，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部级特等奖 1 项、部级一等奖 4 项，获国家发明专利 12 项，出版著作 36 部，发表论文 286 篇。还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环境保护专业技术领军人才、国家环境监测尖端人才等荣誉称号。2018 年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通讯院士。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9 年 11 月 25 日



武大四位校友获国家级荣誉

8月29日，第五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100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获得“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荣誉称号。武汉大学4位校友获此殊荣，他们分别是：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小米集团首席执行官雷军、卓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阎志、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光胜。雷军校友作为优秀建设者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据了解，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评选表彰活动始于2004年，由中央统战部等相关部委联合在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开展评选表彰，第二、三、四届分别于2006年、2009年、2014年举行。

从珞珈山走出的校友们，时时不忘武汉大学对自己的培养。

陈东升曾说过，“生我的是母亲，育我的是母校，用‘母’这个称号的，一般就是母校、祖国，还有自己的亲生母亲，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别的地方都用不上。后来才明白，母亲养育了我，给我生命，母校培育了我，祖国是归属，这里面有一种人性的光辉，回馈母校也是一种本能。”



陈东升

雷军的梦想从武汉大学起航，18岁时因偶然的机会借阅《硅谷之火》，在IT信息革命刚刚兴起的年代，当他看到乔布斯这些硅谷英雄创业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内心似有熊熊火焰在燃烧”，在操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之后，他画出自己梦想的蓝图：干点惊天动地、与众不同的事儿。今年，小米集团进入世界五百强，成为中国进入世界五百强用时最短的互联网企业。



雷军

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不断演进发展，卓尔从一个白手起家的初创型企业，成长为拥有一定规模的商业体，再到中国企业500强，创始人阎志也成为湖北民营企业的骄傲。卓尔的故事是中国绝大部分民营企业成长的缩影，但或许只有诗人阎志，才能在不断蜕变重生的体验中找到浪漫和诗意。



阎志

2018年，吴光胜受邀回母校作为校友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言时表示：“我特别感恩母校，未来的人生，每个人都有很多身份，但是作为武大学子的身份将会永远烙印在我们额头，这个身份会伴随我们终身。”



吴光胜

校友总会根据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9 年 8 月 19 日相关报道整理



校友程亦凡、陈晓红入选 2019 年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美国当地时间 4 月 17 日，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AAS) 公布 2019 年新入选院士名单，12 位华人入选，其中包括我校校友程亦凡和陈晓红。



图片来源：HHMI <https://www.hhmi.org/scientists/yifan-cheng>

程亦凡当选领域为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和分子生物学，他是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 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系教授，霍华德·修斯医学研究员 (HHMI)。1978 年进入武汉大学物理系，1991 年获得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博士学位，2006 年任 UCSF 助理教授。致力于用冷冻电镜技术 (cryo-EM) 研究生物大分子结构，引入电子检测相机 (electron direct detection device, DDD)，使得单粒子 cryo-EM



从低分辨率提升到原子结构测定，为 cryo-EM 的发展带来技术突破。



图片来源：<https://economics.yale.edu/people/xiaohong-chen>

陈晓红当选领域为经济学，她目前是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86 年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1993 年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获得博士学位。1993 年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担任助理教授，2007 年进入耶鲁大学任经济学教授。

据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院士机构及地位最为崇高的荣誉团体之一，也是进行独立政策研究的学术中心。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9 年 4 月 18 日



学校纪念周鲠生先生诞辰 130 周年

3月31日，纪念周鲠生先生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我校举行，会议主题为“薪火相传——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人的使命担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万鄂湘出席并讲话，周鲠生先生家属代表，以及来自国际法学界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武汉大学师生和校友代表参加活动。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甘藏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王红玲，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游劝荣，我校党委书记韩进、校长窦贤康等出席座谈会。校党委副书记沈壮海主持座谈会。

万鄂湘表示，周鲠生先生的一生，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一生。他虽已离开我们近半个世纪，但是他的理想信念、学术贡献和道德风范相沿不辍、历久弥新。先生一生勤勉治学、笔耕不辍，他的一系列奠基性著作，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法理论体系，为中国国际法学术建设和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万鄂湘指出，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格局已经形成，中国国际法学界的使命更加光荣，责任也更加重大。纪念周鲠生先生，就要学习他不忘初心的家国情怀，学习他坚定信念的政治品格，学习他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他要求，中国国际法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国际法理论研究，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国际法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要创新国际法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加强国际法人才队伍建设；要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做大做强中国特色新型国际法智库。



“武汉大学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成长于独立自强之路，以谋求人类福祉、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国家富强为己任。”窦贤康说，自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筹建之初，周鲠生先生便与武汉大学紧紧联系在一起，为武汉大学的传承、创新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之笔。今天，我们缅怀周鲠生先生，就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先生爱国敬业、教书育人的高贵精神，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甘藏春认为，周鲠生先生作为法学界的杰出代表，用一生的实践，诠释了践行者、建设者、发展者、培养者的具体内涵。我们应该学习先生的精神，沿着先生的足迹，一代接着一代，向着理想的高度迈进，要以周鲠生先生为榜样，勤勤恳恳、勇于担当、忠于使命，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表示，周鲠生先生的一生同中国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紧密相连，与中国现当代国际法历史息息相关。他为中国国际法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在国际法理论建构、国际法人才培养、国际法知识传播、国际法服务国家外交、国际法治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贡献。

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宏、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张敏分别对周鲠生先生在我国外交方面做出的贡献进行了回顾。周鲠生先生在担任外交部顾问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期间，在丰富的实践中不断进行深耕探索，对人民外交理论进行深刻的思考和研究。他撰写的《国际法》专著第一次将传统理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相结合，系统阐述我国国际法立场，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法奠基之作，为人民外交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国际民航组织法律与对外事务局局长、校友代表黄解放，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惠康大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离休教师梁西教授，周鲠生先生外孙陈一周，国际法研究所所长肖永平，法学院院长冯果等周鲠生的学生、家属和相关专家学者也对周鲠生的建树、功绩进行了回顾和评述，对他的精神和品格给予了高度评



价，并纷纷表示要弘扬先生爱国敬业、教书育人的高贵精神，传承先生正直无私、严谨治学的崇高风范，凝聚力量，共同推进和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新时代大国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周鲠生先生(1889—1971)是我国著名法学家、外交史家、教育家，是中国现代国际法学的奠基人，1945年至1949年曾任武汉大学校长。他毕生致力于国际法学教育、研究和实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法学学科发展、外交工作、立法工作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等做出了杰出贡献。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9 年 4 月 1 日

1979 级校友入学 40 年返校 聚会纪念专栏





我的母校情怀

陈建国

离别珞珈山整整 36 年了，社会发展翻天覆地，眨眼之间我已过耳顺之年，迈入古人所说的耆老一族。按理我应在书斋中“为善去恶”格物致知了，但心未静愿未了，特别是每次涉及有关母校的事，总是心潮起伏，梦回珞珈。

于我而言，过去 36 年尘世中美好记忆的总和似乎不如珞珈山春秋四载清新清晰清雅。毫不夸张，因为不仅我人生道路的选择和阶段性目标的锁定都与珞珈山息息相关，而且我的人生伴侣也是我千辛万苦在珞珈山下寻觅而得。我有太多物之初始的珞珈情结，如今可称之为“初心情结”，不忘者方得始终。

我认为母校是我第二次生命的真正源头，或者说是我社会生命的摇篮。尽管我曾经上山下乡当过知青，后来回城工作了数年，然后 1979 年考入武大哲学系，但母校之前的经历无论多么艰辛和励志，只能是黑格尔讲的那种无法展现的“自在”状态，珞珈山才是真正的“自在自为”的原点，或者说是从潜在自我走向展现自我的原点。最终能否到达“自在自为”的境界，前路依然漫长。

我曾经写过一段感言：当我们步入社会实践时，可用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的话，我们唯一真正了解的是没有任何事情是我们真正了解的；有了这样的人生态度之后，我们可以再用法国思想家蒙田的话，观察、再观察直到永远；如果你不想仅仅做一个观察者，还可以用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话，面对这个世界，既不要笑，也不要哭，而是理解。

校友们是否有同感，人生的态度很重要，当我们始终珍惜校园



里那种奋发向上的初衷时，许多年后回望人生，无论你处于多么显赫的社会坐标点上，画面的背景总有珞珈的山影。我举两个例子：

例一，20 世纪 80 年代，母校处在教育改革的前沿，各类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最著名的当属多学科讨论会。为协调好各学生社团的活动，学校成立了武汉大学学生科学协会，因为我当时是校学生会临时党支部书记兼学习部部长，自然就当了第一任校学生科协主席。在多学科讨论会的建议下，我们举办了武汉大学第一届百科知识竞赛。那是一个因为解放思想而释放出人的被压抑太久的巨大原动力的火山时代，许多未来的杰出校友在此崭露头角。以多学科讨论会为例，参加这个学生社团的同学后来几乎个个都是精英才子。著名的有哲学系 1978 级的艾路明校友和政治经济学系 1979 级的陈东升校友。我说他俩，不仅仅是因为他俩经商成功，是最早向母校捐款过亿的校友，而是指他们全面的综合素质，他们充满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陈东升现在是著名的中国企业家论坛的理事长，艾路明是著名的阿拉善基金会的会长。陈东升校友在经济领域也是大学者，艾路明校友从漂流长江那一刻开始就注定是个传奇。我当年主持过许多校园演讲会，依稀可见艾、陈抒发鸿鹄之志的青涩身影。

例二，我们学哲学的人从政比较多，避不开追求政治地位和实现社会价值。我不方便举那些有政绩有地位的在职校友的例子。以自己为例，我认为武大哲学人为官都给自己前置了思想境界和道德底线，或者说提前播种了我们知晓或认定的善的种子。1981 年秋，中国青年报开展人生支柱讨论时，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作为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为他人的幸福和社会的责任而牺牲自己的幸福是一种崇高的幸福！”现在的小校友们或有疑问，而在那个时代，这句话没有一丝一毫的杂质。后来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论人的社会价值”。此后的 36 年，我一直践行在珞珈山形成的美好的人生价值观。我的体会是，无论社会变革多么巨大，无论我们走出校门之后人生蒙受了多少社会灰尘，我们曾经秉承的红色价值观依然是正能量，这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能量可以给予你拨开迷雾见光明的智慧。我也从不否认任何先进的思想都是正能



量，比如我在大学读王阳明心学，传统意义上都说它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经历人生风雨之后，我非常明确地觉得我是按照“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在践行“知行合一”。

我想从“知行合一”中找某种启示，真理和实践相关，但于真理厚土中常常自然而然生长出崭新的理念，与再实践并不直接相关。有时候你会洞悉现实中直觉观察和深度思考发现不了的东西，如同一道天外灵光突然闪现。

我想说在很多情景之下，我们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是由珞珈山决定的，不管你后来的人生道路有多少次选择，当你每次推开命运的某扇门时，珞珈元素总在冥冥之中发挥作用，我们的主观意识认不认可都是如此。珞珈山的溪流是涌入我们心田中第一股分辨清浊的甘泉。珍惜这股甘泉，当我们汇入社会洪流之中时，也许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我们可以不让世间的浑浊改变我们自己。拥抱珞珈山，无悔的历久弥新的母校情怀！

作者系哲学系 1979 级校友



回“珈”的感觉

郭志安

1979，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徐徐开启；1979，中国大地万物复苏；1979，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这一年，也是我们的1979，我们追赶着1977级、1978级大哥大姐们的步伐来到了武汉大学。40年过去，珞珈山呼喊着我们的名字，我们1979级的同学从世界各地走进2019，再次回“珈”了。

回“珈”真好。近千名校友回到母校，身着统一纪念服，形成了一道靓丽的“79蓝”风景线。坐在大学期间周末观看电影的梅园小操场，前后还是过去嬉笑的同学；聆听校党委书记韩进的讲话，我们仿佛在大学期间聆听刘道玉校长的训导；陈东升校友情意绵绵地说“珞珈山是他的情人”，我们才真正后悔没在大学期间谈一场樱花树下的恋爱。当每个系的队旗在舞台上飘舞，我们情不自禁地站立，恰似回到了意气风发的大学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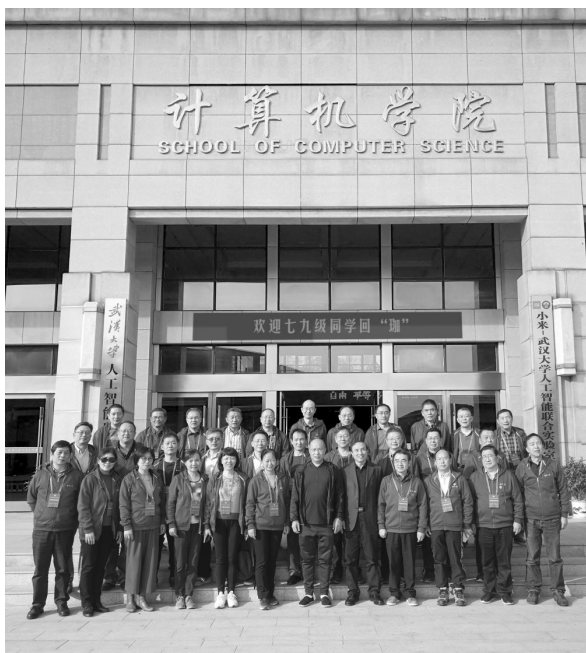
回“珈”真快乐。我们许多同学都是在百忙中专程赶回来参加聚会的，特别是从美国、德国、加拿大、日本赶回来的6位同学，来去匆匆，只为此时的欢聚。张瀚涛，24岁入校，是我们系1979级里年龄最大的同学，却只用两年半时间修满了大学四年的学分，提前毕业留学法国；文涤屏是一位快乐的世界级中国打卡妈妈，绝不错过任何景色与快乐；田琳为了博得大家的欢笑不惜“自残”，在万林艺术博物馆门前跳跃欢呼，小腿拉伤，却因祸得福，获得了“美国大兵”沈岗的熊抱与细心照料；殷凌云，还是那么羞涩低调，会静静地听着高煦与武青对撕出的关于她的美丽故事；还有蔡军，年级公认的帅哥，未曾料想会是所有女生的戏谑对象，因此成就了



女同学的开心瞬间……

回“珈”情意最浓。大学室友再聚首，40 年弹指间已是华发满头。终于明白赵镭同学为什么能成功举办我们的 30 年聚会，原来是喝酒喝出来的，靠的是肚量；再与武青同居一室，会觉得产生了代沟，石磊与我关心的是健康养老，他却只关心中小学教育；王深义、刘丰——我的两位同室“小同学”，入学时不到 15 岁，今天也已白发初现；而我呢，因为参与了本次活动的服务工作，这四天里与同学们说的话比大学四年加起来还要多……

回“珈”是一次再学习。虽然同学们大多已在科研院所、政界、商界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这次回到现在的计算机学院仍然备感兴奋，我们的计算机学院现在的规模已是 1979 年的数十倍，教学科研不断进步，学院领导中已出现了九零后的身影；雷军学弟更是校友们的榜样，在院里建立了“武汉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小米—武汉大学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捐资兴建的雷军科技楼也将拔地而起。重走武大校园，秋色嫣然，大家深刻感受到了学校为创建“双





一流”大学所做出的努力；我们这些回“珈”的校友们也情不自禁地喊出了“计算机科学，引领世界科技”的口号。

回“珈”更是一次精神的回归。11月23日晚，我们乘船游览武汉三镇，目睹了世界军人运动会后武汉的高楼林立、霓虹绚烂；亲眼看到了国家的进步、富足、强大。在长江游船上，校长窦贤康来到了我们中间，大家记住了校长言辞中“中国和母校需要你们”的殷殷重托。我们已在逐渐走向年长，但心系珞珈的情怀却是我们永远前进的动力，每次回“珈”都是我们心灵的再一次修行。珞珈山是我们安放灵魂的地方。

回“珈”的感觉真好，回“珈”的感受很多。四天短暂的相聚，贯连了40年的同学情谊和缘分，也联通了我们对母校的一往情深。愿母校更好，愿我们健康永远。

期待下一次再回“珈”。

作者系计算机科学系1979级校友



我与武大的第 N 个十年

蒯玉根

1979 年 8 月 8 日，一个改变我命运的日子，当时还在农田中劳作的我收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至此，一个乡下小姑娘告别了家乡、告别了爹娘、告别了老师与伙伴，踏上了去武汉的求学之路。

珞珈山下，东湖之滨，古典的建筑、盛开的樱花、明亮的教室、丰厚的藏书、博学的老师、友爱的同学。可曾记得图书馆的排队阅读、五教学楼的占座风波、珞珈山下的英语角、东湖边的游泳课、梅园操场的露天电影、四舍楼道的拱猪牵羊、学校球场的掂排球比赛以及三食堂美味的雪里红大包子与加餐红烧肉？这一切，构筑了我全新的大学生活，令人舒畅，催人奋进，使人难忘！





时光匆匆，四年大学生活转眼即逝，大多数同学形影单只，带着毕业证走上工作岗位；也有人成双成对，“拐上”帅哥、美女挥手告别武汉……

十年后的1989年12月，我的生命里迎来了另一个新的生命，我的儿子小珂出生了，走出母校的第一个十年我成了一名母亲，开始学习育人。儿子灵动帅气、聪明睿智，一岁零八个月就能背诵《岳阳楼记》，我窃喜着，暗下决心，将来要把他送入我的母校武大读书。

又过去了三个十年，2009年春天，我带着儿子回母校赏樱，也在他心里埋下了梦想的种子。他感慨：碧绿的珞珈山、清澈的东湖水、圣洁的樱花、古朴的校门、唯美的校园……这一切正是他理想中的学校的样子。他从此静下来一心求学，在2011年春天考上武汉大学的研究生，2011年9月正式成为武大学生。



往后的每年11月29日，我都会收到一份特殊的祝福：“学姐：校庆日快乐！”。一看落款，就知道是我那调皮的儿子发的。在这一天，他会自豪地自喻为学弟，与我分享我们共同的母校——武汉大学校庆的快乐。

如今已是第四个十年，儿子在北京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我仍在



工作岗位上发挥着余热。

感恩母校！感恩武大！

今年校庆，恰逢我们 1979 级同学入校四十周年纪念庆典，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当年的毛头小伙、清纯女孩，已变成爷爷奶奶。

我们期待着与母校共度更多个精彩的十年。

作者系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1979 级校友



梧桐雨

——Amy 和 Alan 的故事

李学宽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毕业 20 年聚会还是在欢乐与惋惜中结束了。

干练的 Amy 教授望着 Alan 教授那挺拔的背影消失在安检口队伍中，眼睛模糊了。

Amy 害怕眼泪真的会马上流下来，让其他人看出自己的失态，就迅速扭过头去，用手捋了一下耳边的头发，顺势用手里的餐巾纸沾了一下眼里的泪水，快步走向机场出口。

秋雨还在下，似乎比来的时候小了些，Amy 走到门口望了望天迟疑了一下。Amy 本来拿着伞，可她没有撑伞，漫步进入细细的雨帘里，任由这冷冷的秋雨洒在头上、脸上，还有那合体的风衣





上。身边走向停车场的人很多，她已经不怕别人注意了，止不住的泪水顺着美丽的面颊流了下来。她知道，此时别人是看不出来那是泪水还是雨水的。

走向停车场的路两旁都是巨大的法国梧桐树，水泥路上都是落下的黄绿相间的梧桐树叶。Amy 走得越来越慢，昂起头看着这些高大的梧桐树，秋雨洒在她的脸上，也洒进了已经布满鱼尾纹的眼睛里，模糊的眼看到的梧桐树似乎就是 24 年前学校里那两排高大的梧桐树……

那是入学初期，刚刚进入大学的学子们还沉浸在兴奋的状态里，尽管相互还比较生疏，却已开始嬉戏，尤其是女生银铃般的笑声，特别引人注目。

今天要去校史室参观，接受学校的优秀传统教育。辅导员要求大家到操场集合，从宿舍楼到操场的路两边也像现在机场的路一样是两排高高的法国梧桐树；天下着小雨，每个新生手里撑着一把伞望着宿舍楼方向，等待着迟到的同学。

这时候的 Amy 才 18 岁，168 厘米的身高尽管不是女生中最高的，可考究的穿戴和青春的气息使她在女生中还是有鹤立鸡群的感觉。这时候，梧桐树下出现了一位很矮的、像初中生的男生，肥大的墨绿色军用雨衣搭在他身上更显出他的瘦小，走在撑伞的男生群里是那么的与众不同。Amy 有点困惑，昨天在教室里相互自我介绍时怎么没有这位同学？

Amy 后来才知道这位男生名叫 Alan，来自贫困的农村家庭，身高只有 161 厘米；他晚来两天是因为父母凑不齐路费，东借西挪耽搁了入学时间。Alan 只有 15 岁，那么小考上大学是由于姐姐入学家里没有人带他，4 岁就跟着 7 岁的姐姐一起上小学了，没想到小小的 Alan 学习成绩比姐姐还好。Alan 考上了这所著名的大学，同一年级的姐姐没有参加高考，直接去广东打工了。

开始上课后同学们逐渐熟悉了，吃饭时 Amy 发现 Alan 总是来得很晚，总是买最便宜的菜，吃完饭后在饭碗里加上开水，在往宿舍走的路上慢慢地把碗里的水都喝了。Amy 注意到其他男同学很少与他一起吃饭。



有一次因有事耽搁了时间，Amy 很晚才去食堂，正好与 Alan 一起吃饭。Alan 与往常一样吃完饭到开水笼头接了一碗水，一边喝着碗里的热水一边与 Amy 聊着天向宿舍走去。Amy 很好奇地问 Alan：“你为什么不洗碗就喝碗里的开水？多油呀。”

Alan 脸一下红了，端着还有一半开水的碗、抛开 Amy 快速向宿舍走去，Amy 叫他也不回头，后面几天 Amy 感觉 Alan 在故意躲她。大约一周后，Amy 晚自习回宿舍的路上正好碰上 Alan，Alan 想低头装作看不见 Amy 走开，但 Amy 还是在一盏路灯下堵住了 Alan。Amy 问 Alan 这几天为什么躲着她，Alan 低着头什么也不说。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 Alan 抬起头来的时候眼里含着泪，那泪花在路灯照射下正好让 Amy 看得非常清楚。Amy 不知道为什么，只能一边安慰这个小她 3 岁的弟弟一边拉着他说：咱们散散步吧。Alan 开始只走还是不说话，等 400 米的体育场走到第三圈时 Alan 才平静下来，开始与 Amy 聊了起来。Alan 告诉 Amy，学校发的粮票不够吃，又没有钱买肉菜，晚去吃饭就是不想让同学们看到自己吃得很差，每天都在饥饿中度过，吃完饭喝碗里的开水是为了碗里那点油。这时候轮到 Amy 掉泪了，父母都是教授的独生女 Amy 从来没有过饥饿的感觉，自己为了保持身材不敢多吃肉还经常挨妈妈的批评。

他俩从操场回宿舍走到梧桐树下，竟然开始下起了雨。

这个晚上之后，为了不让 Alan 尴尬，Amy 经常回家吃饭，借机把剩下来的饭菜票送给 Alan。

Alan 还是吃完饭马上喝碗里的水，但明显的，他碗里的米饭和菜比平时多了不少。Amy 很难相信瘦小的 Alan 可以吃掉那么一大碗米饭；等两年之后 Alan 身高长到 176 时，Amy 终于知道 Alan 吃那么多是因为他正在长身体。Amy 与 Alan 的关系越来越好，尽管 Alan 比 Amy 小，聪明的 Alan 在学业上却比 Amy 成绩还好。这时候 Alan 家里已经分田到户，家里的经济情况已经有了一定的缓解，而且 Alan 一边上学一边做家教，已经不需要 Amy 的救济了。

大学生活就这样幸福地过着。有些同学拿 Alan 和 Amy 开玩笑，他俩谁也不在意，因为他们的友谊是纯洁的。随着年龄的增



长, Alan 开始喜欢这个漂亮的女同学加大姐姐, 大四时 Alan 请求 Amy 与自己一起报考北京一所高校的研究生, 同时向 Amy 表达了自己的爱意。经过这四年的朝夕相处, 尽管 Amy 心里也很喜欢眼前这个比自己高一头的小弟弟, 稍微思索了之后还是婉言拒绝了, 一是因为 Amy 不能接受相差三岁的姐弟恋, 另外是作为独生乖乖女的 Amy 不想离开身体欠佳的父母。

Amy 顺利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 Alan 也顺利进入北京某高校继续深造。Alan 去北京报道之前到学校来看过一次 Amy, 也是一个秋天, 也是晚上, 也下着雨; 不同的是 Alan 没有穿那件陪伴他四年的军用雨衣, 而是与 Amy 撑着同一把伞静静地站在高高的法国梧桐树下, 他俩在伞下说的话没有人听到, 但从鞋的距离和方向上可以判断出他俩离得很近, 而且是脸对脸地站在一起……

温柔的小雨无声地洒在那把 Amy 从入学开始一直使用的花伞上, 雨滴在这把伞上汇集成晶莹的大水滴, 掉在水泥地上, 可以听到啪啪的声音……

那次 Amy 没有去火车站送 Alan, 两人分开后偶尔会相互打个电话。过了一年, 也许都忙着做实验写论文, 慢慢的联系变得少了, 再后来就失去了联系。Amy 只从别的同学那里知道 Alan 硕士毕业后去了美国, 等再次获悉 Alan 的消息就是毕业 20 周年的聚会。

现在 Amy 是母校的教授, Alan 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 但都不是本科他俩一起所学的专业了。转眼间到了 2019 年, 同学中的大姐大和大哥大们开始张罗入校 40 周年聚会, Amy 已经是一家有四位博士和有了小外孙的外婆了; Alan 也有了小孙子, 与 Amy 及同学们在 20 年前见面后, 感叹国内的大好发展机遇, 回国建立起了一家高技术企业, 创业也有 20 年了, 公司发展顺利, 已经是行业老大。

这次 40 年聚会合影, 前排的 Amy 和站在后排的 Alan 脸上都有些岁月的痕迹, 却仍有一颗 20 世纪 80 年代新一辈不老的心。

作者系化学系 1979 级校友



我的毕业分配“传奇”

刘华新

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回顾 30 多年前的毕业分配往事，也借此倾诉对老校长刘道玉先生的感激。

1983 年，我从外文系德语专业毕业，分配到内蒙古伊敏河矿区建设指挥部，在科技处工作。前后的变化，说起来充满曲折，也颇具戏剧性。

伊敏河矿区是一个露天煤矿，是当时国家“六五计划”五大露天煤矿之一（另外 4 家分别是霍林河、平朔、元宝山、准格尔）。它地处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深处的鄂温克族自治旗，离海拉尔市 80 公里。这对于出生湖北的我来说，始料不及，因为实在太远了，离武汉 3000 多公里。

同班同学均是内地生，闻说有此分配计划（当时都是国家分配高校毕业生），无不表现出畏难情绪。远离家乡，这不难理解。

我当时正忙着写毕业论文，对此计划毫不知情。一天，老师突然找到我，称这是国家重点工程，需要派一位成绩好的学生去才行。

老实说，我的第一感觉是：怎么会是我？我学习成绩不错啊，怎么还会“发配”到边疆？

不管脑子里有多么复杂的想法甚至委屈，我还是答应了。

1979 级毕业生中，全校共 13 人赴边疆工作。我出生于 1965 年 3 月，刚过 18 岁，应该是其中最小的。行前，学校举行了欢送会。那天，舍不得我少小离家，更担心我老大不回的父母从老家赶来，道玉校长听闻，专门请我父母吃了一顿饭。一校之长，事多如麻，



现在回想起来，已觉待遇之殊了。

父母回来告诉我，校长特地说：“孩子太小，到边疆以后有什么事，就让他给我写信。”我只当是一句客气话，并未多想。

“虽毕业 900 余人，吾往矣”，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心情虽有点悲壮，亦无更多起伏。

到了单位，情绪大好。原因很简单：我发现这的确是“国字号”工程，很多国家领导人也前往考察，要求加快开采。看到 100 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和我同时抵达，了解到这个煤矿的确和以前的大庆油田一样，是国家级的大会战项目，深受震动。在这大学生云集的地方，我和大家一样，满怀豪情，决心大干一场，为解决国家能源之荒竭尽所能！

但是很快，这刚变好的心情就变成了泄气的皮球。

指挥部总指挥问：“怎么来了一个学德语的学生？”

组织部门回话：查了一下，是 1978 年向教育部要的名额，因为当年咱们煤矿准备买西德的采矿设备，所以要一名德语翻译。

“噢，原来这样啊！这都是 5 年前的事了。从西德运大型设备路途遥远，现在戈尔巴乔夫都发表‘塔什干讲话’，准备解冻中苏关系了，我们正考虑改买苏联设备呢。要不，让这个孩子借调去煤炭部，翻译英文的专业资料吧。”

于是，我在北京借调了约半年。

虽然翻译了大量英文科技资料，但毕竟德语基本用不上，我不禁有些气馁。

一天，突然想到，何不给道玉校长写封信呢？

信寄出了，却久不见回信。我继续默默地工作。

也许是机缘巧合，上天垂怜，现在看来，我们学外语的，迟早要受国际风云、中外关系变幻的影响。1984 年春，美国总统里根访华，举行答谢宴会，我一位长辈亲戚应邀出席，并与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总经理同桌。长辈问：“你们要不要德语的毕业生？”总经理答：“当然要啦，我们是涉外单位，只要孩子考得上，我们要。”

接下来我顺利通过德语笔试和口试，并写信将这一情况报告



校长。

几个月过去，依然杳无音信。

我心想，肯定没戏了，现在都 1984 年下半年了，连下一届毕业生都已分配完毕。虽然国家有专业不对口可以重新分配的政策，但这样的政策岂是一个普通学生能享受到的？说不定学校早就把我们分在边疆的学生给忘了。何况进京指标是香饽饽中的香饽饽，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就在我几乎不抱希望之时，一天，指挥部突然通知我：你赶紧办手续，回武大。

我的心一下子从内蒙古草原飞到了天上，急急打点行李，回到了武大。

学生科的一位男同志接待了我。

“你前后两封信，校长都收到了，并且当即批转学生科，要求调查是否属实。我们调查无误后，校长当即表示，可以重新分配一次，还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安排你回武大教公共德语。”

我鼓起勇气，小心地说：“我既然考试通过了，还是想去国旅北京分社。”

这话说得吞吞吐吐，因为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要知道，进京指标对于当时来说，比登天还难。

“那好。校长还说过，这次让你自由选择。”

“为什么？”我不敢相信。

“因为校长一直关心你的工作问题。校长说：去年你服从分配去了边疆，是 13 个支边同学中最小的一个，‘何况我还答应过他的父母，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学校反映、协调解决’。”

“现在 84 届都毕业了，怎么去北京啊？”我问。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校长明确表态，为了解决好刘华新同学反映的问题，武大不缺一个进京指标！”

我的心一下子沸腾起来！等学生科的同志离去，不禁泪水长流！

我至今记得，去武昌公安分局办手续的情景：

我先把相关材料从左裤兜里掏出来，将户口落到武汉。



“能从内蒙古回武汉，了不起！”女警察满脸诧异。也难怪，当时“文革”下乡的知青，有的都还没能返城呢！

“你的事办好了。下一个！”女警察说。

我却没有走，又从右裤兜里拿出来一份派遣证。

“什么——？你在内蒙古工作一年多就能回武汉，已经是天方夜谭了。还要去北京？”女警察把眼睛瞪得溜圆，盯着派遣证仔细地看了好几遍，一副“打死我也不信”的表情。我至今还记得她在大厅里大声说过的话：“小伙子，你哪来的这通天本事？”

“我没有通天本事”，我顿了顿，突然冒出一句令自己都觉得过分高大上的话：“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好！”

我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

2019年11月下旬，1979级同学入校40周年聚会，我因事未能返校，给道玉校长写信表示终生的感激，并送上一个广西壮族绣球，我特地让绣工在上面绣上“道玉校长永远年轻”8个大字，因为我觉得，校长给我们的教导和他爱生如子的仁者之风早已融入我们那一代学子的血脉，并将永远流传！

作者系外文系德语专业1979级校友



我的老师若特夫人

刘小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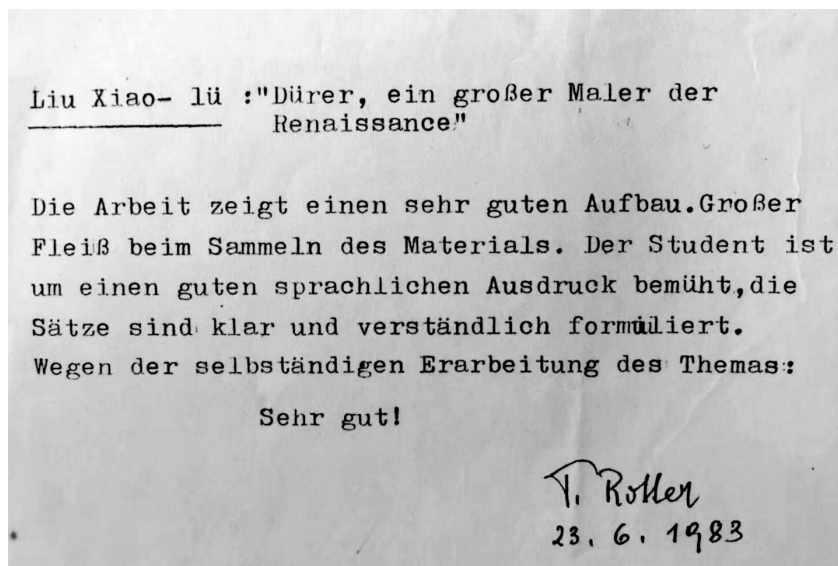
我的大学外教是来自奥地利的若特夫人。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季节。珞珈山层林尽染，片片枫叶随风飘动；樱顶望去，宫殿式建筑群古朴典雅，气势恢宏，老外文楼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教室内，时任外文系德语专业教研室主任的彭肇兴老师向我们介绍了若特夫人。我坐在第一排，一边听着彭老师介绍，一边端详着新来的外教，她身材高挑，有一头棕色的浓密卷发，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上嵌着一双充满智慧、炯炯有神的眼睛，脸上不时挂着慈祥的笑容，看起来十分随和亲切，像一位充满爱心的母亲。我对她的初次印象在日后的教学过程中得到了多次验证。记得她给我们上课时说得最多的一个词组是“我的孩子们(meine Kinder)”，这不单单是一种礼貌用语，更多的是真情流露、爱意表达。

我入校时被录取到俄语专业，全班共 10 人，9 名来自外校，唯我一人无俄语基础，无法跟上教学进度，故转到德语专业。若特夫人知道我是新转来的学生，对我的德语学习给予了很大帮助，不仅在课堂上给了我许多练习机会，课后也常与我用德语交流。聊天中，我得知她的老家是位于多瑙河畔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那里有美泉宫、金色大厅、城市公园，被誉为“世界音乐之都”；我也向老师介绍了自己的老家瓷都景德镇，那里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精美瓷器。老师听后当即表示想去看看，一睹为快。奈何 20 世纪 70 年代末交通不便，老师直到作古也未成行，令人扼腕叹息。



大学四年级，我开始写毕业论文，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画家丢勒作为选题，若特夫人是我的指导老师。为了帮助我更多地了解丢勒所处的时代和家庭背景以及丢勒作品的创作灵感，若特夫人特意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从维也纳买了一本厚厚的介绍丢勒的原版德文书籍供我学习，并耐心地修改我论文的病句，最后和中国指导老师一起为我的论文给出了评语和成绩：《丢勒——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画家》一文，结构令人满意，材料收集付出艰辛；该生力求语言表达出色，措辞明了易懂；鉴于其独立完成论文撰写，成绩评定为优秀。



若特夫人给笔者的论文评语和成绩

若干年后我来到了老师的家乡，漫步在维也纳街头，徜徉在城市公园，面对曾写下《蓝色多瑙河》的“圆舞曲之王”的小约翰·施特劳斯的金人雕像，不禁想起樱顶外文楼101教室——老师在那里教过我们跳奥地利宫廷集体舞。1983年在梅园小操场举行的1979级毕业晚会上，外文系同学就凭这支集体舞赢得了掌声雷鸣、全场



喝彩。

走在维也纳著名的帝国桥上，我想起了老家景德镇瑶里的小木桥，那是元代戏曲家马致远描述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而第一次见到武汉长江大桥，体会到的却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气势；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国外工作，曾驾车途经厄勒海峡跨海大桥，当我驶入大桥时，即被大桥的宏伟壮观所震撼，真正悟到了筑桥者的力量，即使是大海也阻隔不了人们连接两岸、实现相互交流沟通的愿望。



笔者与若特夫人在枫园外国专家招待所前的合影

桥的作用虽然巨大，但筑桥者的无私奉献更让人可歌可泣。我们不会忘记，是敬爱的老师为我们筑起了求知之桥、学术之桥，把我们引向知识的彼岸；我们也不会忘记，若特夫人作为民间大使，怀着对中国的爱筑起的“友谊之桥”，把懵懂青涩的我们引向了世界。尽管若特夫人参加不了我们纪念入学40周年的返校聚会，但我相信，远在天堂的她一定在倾听我们畅谈友谊，观看我们合影留念，与我们一起合唱武汉大学校歌，分享我们聚会的快乐。

聚会终有散，即使离别了还是要保留一颗“别离”之心，哪怕



远在天涯海角也要永远心心相印。在感叹师恩如海、衔草难报之时，我想借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一句话轻轻对老师说：襟上摘下花儿来算作别离的赠品罢！

作者系外文系德语专业 1979 级校友



四十年是什么

石汉平

7月24日晚上，与玉琼同学在北京小聚，餐间她约我为入学40周年写点感悟——“四十年是什么”。我欣然应允。但杂事缠身，一直未能静下心来。今天下午，忙完2019年最后一个大型学术会议“2019首都国际癌症论坛”后，回到家里，美美地睡了两小时，把这几天缺失的睡眠补了回来。一觉醒来，神清气爽，被糨糊塞满了的脑子似乎有了空隙；想起了老同学的约定，想到同学会即将来临，迫使我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四十年是什么？

四十年如歌，高山流水，余音绕梁。四十年岁月悠悠，我们谱就了入世的三部曲，我们奏响了岁月的交响乐。王国维先生的人生三境界“立”“守”“得”就是我们用四十年谱就的三部曲。想当年，人生迷茫，前路几何？恢复高考，喜从天降，我们从教室、从车间、从农田、从军营……走进了改变自己和国家命运的考场，立志出关，雏鹰试翼。“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忆往昔，我们守住初心，矢志不渝。四十年如一日，手不释卷，笔不停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看今朝，我们吹沙到金，云帆济海。“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四十年如歌，一滴汗水是一个音符，一串泪珠是一个音节。佳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个人从学生成为先生，是我们的礼赞；国家从贫穷走向富强，是我们的颂词。展未来，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惊栗兮若在远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四十年如诗，沉思翰藻，辞致雅贍。四十年春夏秋冬，我们实



现了实习医生到杏林高手的嬗变，我们完成了由青涩走向浓郁的升华。字字读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解剖、生理、生化，学士、硕士、博士，医疗、教学、科研。“将升岱岳非径莫为，欲指扶桑无舟莫适。”“一切为了患者、为了一切患者，为了患者一切”就是我们要攀登的“岱岳”，就是我们要抵达的“扶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勤奋是我们攀登科学巅峰的“径”，刻苦是我们抵达医学彼岸之“舟”。从寝室到教室，从国内到国外，从基础到临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们的学习从患者开始，我们的进步始于患者的痛苦。医生用汗水浇灌患者的心田，患者用泪水培育医生的成长。四十年一步一脚印，救人、救国、救世；四十年一叶一菩提，医病、医人、医心。在“生”与“死”之间抗争，完成生命的接力；在“沉痾”与“顿愈”之间奔波，实现健康的梦想。救死扶伤四十载，悬壶济世是医者。行医一时，鞠躬一生；不求闻达，但求利人。

四十年如酒，历久弥香，回味悠长。四十年寒来暑往，我们走过了人生三季，我们酿造了一坛老酒。人生的意义越来越厚重，生命的滋味越来越醇香。汽水、冰棍、雪花膏，潘晓、郎平、陈景润；我们从春华走向秋实，从轻狂走向稳重；电报、书信、收发室，钢笔、稿纸、蜂窝煤，我们从儿女蜕变成父母，爱情蜕变成亲情。在承受中长大，在光阴里成熟。现在的我们是一坛浓烈而不醉人的老酒，是一束明亮而不刺目的光辉，是一曲圆润而不腻耳的音乐，有一分无需察言观色的从容，有一种不再抱怨申诉的大气。我们脸挂一份不理睬喧闹的微笑，我们心存一丝洗刷了偏激的淡泊，在人世间最伟大地存在，在花丛中最尽情地绽放。苏轼说：“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人间最美是清秋，人生最美是成年。繁华消尽，浮躁渐去，留下的全是精华。终于懂得：人生就像一坛酒，慢慢蕴藏，终得佳酿；人生不过一杯酒，有苦，有涩，有淡，有烈；人生恰如一壶酒，可温，可冷，可醉，可醒；人生如品酒，不满，是智慧；不醉，是修养。

四十年如画，栩栩如生，出神入化。四十年风风雨雨，我们品味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我们经历了岁月的沧海桑田。我们饿过，我



们饱过；我们冻过，我们暖过；我们痛过，我们乐过；我们苦过，我们甜过；我们哭过，我们笑过；我们恨过，我们爱过。我们这一代，被艰苦的岁月磨难过，被幸福的生活滋润过；我们这一代，为个人的得失彷徨过，为高尚的情操感动过；我们这一代，为自我的实现奋斗过，为集体的事业奉献过。我们出生在这样一个国度，使我们见证了任何人间奇迹，人生的厚度无与伦比；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让我们目睹了所有斑斓瑰丽，生命的精彩无可比拟。粮票、呼机、微信，红薯、糖精、面包，我们这一代的人生经历比自然界的任何风景都更加多彩；《红头绳》与《甜蜜蜜》，《决裂》与《血疑》，我们这一代的生活跨度比地球上的所有海洋都更加宽阔。比情书的页数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兴奋，分居、重逢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缩影；绘画家巧夺天工也无法描绘我们这一代的姿彩，文学家揆藻飞声也难以书写我们这一代的波澜。

“四十年是什么？”每一个同学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时光飞逝、斗转星移是我们的同感。人生最经历不起的是时间的考验，时光的书卷终会因年久而变得更加模糊。过去的已经成为往事，岁月不可以倒转。我们不能选择出生，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出世；我们不能选择年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健康；我们不能选择昨天，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今天。把日子过得慢一点，享受当下：扫地、品茗、焚香、读《易》。

作者系医学部 1979 级校友



追忆和平同学二三事

宋新郁

和平同学离我们而去了。

多年以来，不断地听到有关和平已不在人世的不幸消息，以至于再从阿黄兄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时，竟有一丝麻木、一丝的不相信，连忙拨通惠玲妹妹的手机。事情是真的，惠妹妹刚刚送别了和平……

悲哀涌上心头。在当年的大学里，没有所谓情如手足的铁哥们儿，也很少无话不谈的亲兄弟，但同学之情却是默默种植在心里的，随着岁月的增加而愈老弥坚。和平兄又是那么一位不平凡的人——不平凡的同学，不平凡的朋友……

与诸多师兄学姐相比，进入大学的那一年，我实在只能算是一个不谙人事的青涩少年。什么时候及怎么认识和平的已不记得，印象最深的几件事伴随了我整个四年的大学时代，并将终生难忘。

我所认识的和平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却从没给人书生之感，我总觉得他更像当年上海滩的杜月笙。对，就是这种感觉：有文化的杜月笙——大气、仗义，还有那么一点江湖气。

估计在当年的和平眼里，我也只不过是那个无知少年，所以两年过去了，我跟他并无深交，直到有一天，我们专业的男生从外文系搬到了生物系楼下。正所谓店大欺客，牛哄哄的外文系男生减去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女生，要对抗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男生的生物系，无疑是以卵击石，但我们初生牛犊，但我们天不怕地不怕……

第一次冲突之后，有人提议请和平出马，好像是我们几个带头的来到英专宿舍找和平痛陈曲直，和平二话没说，大手一挥，便带



了几个其实也是中看不中用的英专“壮汉”来到我们宿舍，通过中间人找来了生物系的领头人。谈判在我们宿舍很不顺利地进行，和平用自己的拳头捶着地板说：老子是长江里拉沙子出身的，谁要不服咱们单挑！

事件的结局已经不记得、也不重要了，在我的印象中，和平那骨节格外粗壮的大拳头所透出的权威，格外令人信服。

一来二往，我们成了朋友，我对和平的了解日益增加，才知道他为了生计，真的曾经在长江里拉过沙子，这让中学毕业直接升入大学的我无比佩服。

时光飞逝，一转眼就要毕业了，那一年炎热的夏天，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坐在楼顶的平台上弹琴、唱歌、聊天。听说我本着“人若爱我，我必爱人”的原则也在试采爱情之果时，他有些不相信地地看着我说：没想到啊，你也会这个！

毕业分配在际，和平坚决不愿意离开武汉，让我有些不能相信。好像那时候所有家在武汉的同学都不愿意离开武汉，这也让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家不在武汉的同学无法理解也无法苟同。不知和平用了什么方法，他最后竟真的留在了武汉。

在一个无风高温的夜晚，我和几个至交在外文系的平台上唱歌，和平兴冲冲地跑来说他刚刚裸体围绕校园跑了一圈，并且像狗一样在行政大楼前撒了一泡尿，算作四年的纪念，以后也好闻着味儿回来！我们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能继续我们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后来我们都离开了学校，听说和平分配到了湖北省新华书店，书店的人一看他是外文系毕业的，就转手把他分到了外文书店，外文书店一看他是学英语的，就接着把他分配到了进口音像部门站了柜台。

不过即将站柜台的和平还有创举：他率领几个同学从河南安阳自行车厂筹划来一批自行车，骑着自行车去了新疆……在那个年代，和平算是拉赞助的祖师爷了。

我一直也没有能够追上和平的步伐，就像当年没有随他一起去“咱们新疆好地方”一样。后来听说他辞职去了海南，赶上了海南



建省的大潮……后来听说他在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上掘到了黄金……后来听说他患上了绝症……再后来听说他因为面目全非而拒绝见所有同学……我理解他，我们都理解他，因为他是那样一位爱面子、争强好胜的男人！

二十多年过去了，毕业分别后，我也远渡了重洋，直到今年才得到他的比较确切的消息。

痛哉和平！天妒其才，不能留你长在人间。

悲哉和平！晚年凄凉，竟想一床而不能得。

当年大学风流倜傥、仗义疏财一好汉，二十年后魂回天界，空留同学未了情！

作者系外文系德语专业 1979 级校友



父亲领我上珞珈

谭 文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汉口伢，汉口生、里弄长，直到填写籍贯要写“湖南华容”时，才知道自己原来算是湖南人。湖南人爱之深、恨之痛、行之蛮的特点，父子相传。

“我从湖中来，还归湖中去；湖本是我根，我乃湖之子”，这是父亲的一首“湖啊，湖”的长诗，诗中抒发了从家乡的洞庭湖到武汉的东湖，两湖学子对母校东湖水、珞珈山的深厚情谊。

小时候家里时常有父亲的同学、校友来往，无论是经济系温厚长者样、对我非常关心和爱护的李守庸教授夫妇，还是儒雅学者刘光杰教授夫妇，以及马列专家陈胜阳教授；抑或如契卡成员一样的政府官员向顺立和翩翩大家般长江日报社记者魏栋，自称小老弟的银行家陈绍鼎等，他们经常在家中畅谈时势。幼小的我听不懂大人们在说什么，但却非常喜欢这个场景、这种氛围，我会时常坐在小板凳上用敬仰的目光看着那些叔叔伯伯们。

父亲“文革”后从干校回来恢复了工作，有一次带我上珞珈山请高尚荫院士为武汉市政出谋划策，高院士家住在珞珈山脚下，高老留我们父子吃了一顿便饭，席间我才知道父亲原来做过高老的学生。

父亲 1947 年考上武汉大学生物系，正是高老教的一年级新生。父亲是从湖南乡下考来的，农民的儿子生物实验做不来，英语又是自学成才的哑巴英语，故而一年级后退学再考了一次，第二次考上的是武汉大学经济系，1952 年毕业。

我也是参加了两次高考：1978 年高考，我高一试考，考了 300



多分，上了本科线，离重点线差一点，上还是不上？家里面对这个问题纠结了很久；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脑海里闪过上次随父亲上珞珈山的情景：老斋舍、老图书馆、沿山而建的楼梯，还有老斋舍水房独具特色的那一排龙头……我决定继续读下去，终于在1979年考入了心仪的武汉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父亲在武大是活跃分子，时任经济系团支书、法学院团总支书记、校刊总编辑、校学生会主席，是一名“职业学生”；我也沿着父亲的道路前进着，历任班长、系学生会主席，活跃在武大，服务于同学。

在武大四年中印象最深的几件事：

第一天上学，看到了女大学生。

那时家住汉口，报到的时候（不像现在的学生，家里人是多远都要送到学校的），父亲和兄长将我的行李用一辆自行车从一元路家里推到武汉关码头，学校在那里有迎新站（码头边设有迎新站，是为了方便迎接从长江沿线乘轮船来的新同学）；在码头迎新站等齐一批人后，再用大卡车将人与行李一起送至学校。

上车时听见一位女生叫着另一位女生：“张杰，上车”，我发现同车有两名女大学生。到学校下车后，我拿着行李沿着体育馆的林荫路走上樱花大道，两位女同学与我同方向，这才知道她们是外文系的。两位女生中的另一位，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姓名，只知道她是德专的，好像来自南京，有两颗虎牙。

在学校第一次当教练，率队拿了校季冠军。

作为学生干部，我在学校积极参加并组织各种活动，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运动，我们系精英辈出，苦于自身条件，参加不了班队、系队，只能当个指挥者。当上系女子排球队教练兼领队后，率队连克强敌，如卓杨领队的法语系队，最后拿了冠军，记得当时的队员有1980级的贺卫红、朱俊杰，1981级的何俊、何亚元、肖波等，她们都叫我小岛教练。

第一次流泪，只因输了校季足球杯。

参加校季足球杯赛，我们系是从1982年开始的。由1978级的杜阿古、叶方毅带着我们1979级的踢时，没能拿到冠军；第二年



由我们 1979 级的带着 1980 级的踢时，后场全由我们级组成，有董宏瑞、武青、陈良、王深义，前场则交给了 1980 级的，成员有：万建林、查乐年、叶明军、朱勇宁等。我们铆足了劲，一路顺风连克强敌；之后碰到了数学系：球场上同学们拼劲十足，球场上我调兵遣将，直到加时赛最后 5 分钟被人打进一个球；中圈发球后，前锋万建林直冲禁区，查乐年一脚吊向对方大门，皮球砸在门框上反弹回来，可惜万建林跑过头了；更为可惜的是，叶明军接到球停了一下，面对空门、把球打飞了，这球只需轻轻一碰就会进的——95% 的概率会进，可就是没进！

比赛结束后，我们班一群男同学边喝酒边流泪，哭得稀里哗啦，特别是几个候补队员尤为伤心。1980 级的同学还有一次机会，而我们却面临毕业了。几十年过去了，1979 级、1980 级的男生还在为当时的场景耿耿于怀。

作者系计算机科学系 1979 级校友



母校像母亲

陶树生

只有母亲，才不会只为了成就的孩子欣喜，甚至还会以她的仁慈宽厚慰藉平凡，倾尽所有接济弱小；只有母亲，才不会只为身强力壮的孩子自豪，甚至更加怜惜罹患病痛的孩子，愿意舍命挽救孩子的生命；只有母亲，才不会只为顺风顺水的孩子祝福，甚至还会挺身而出庇护蒙受冤屈、惹下麻烦的孩子……

恰逢1979级纪念入校四十周年聚会，我把亲历的几件事情写出来，万语千言汇成一句话：母校像母亲。

—

1983年7月，我毕业被分配到共青团中央工作。报到后没几天，机关党委书记找我谈话。他一脸严肃，语调冷峻，要求我如实回答问题。他说，树生同志，你的入党志愿书上为什么有一个红色的大叉叉？一时间，如五雷轰顶、万箭穿心，我的声音有些颤抖。我祖宗八代都是贫苦农民，父亲、叔父、哥哥都是共产党员，我从初中起就当团干部，根正苗红，品学兼优，政治上没有半点瑕疵啊！请组织上函调我的母校吧！最后这句话，我说得底气十足。

几天后，敬爱的刘道玉校长来到了团中央。他向机关党委、组织部介绍武大的校风教风学风，介绍我和另外两位毕业生的政治表现、学习情况，用武大的尊严和自己的人格作保，说清了情况，解除了疑惑。这就是母校，这就是亲人，校长千里迢迢，不辞劳苦、不吝口舌，为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撑腰壮胆、保驾护航。



二

1983年春天，哲学系1979级的同学到我的家乡应城县的东村大队搞社会调查。我有两天没看到陈文申同学，得知他生病后，我和与他同住一个老乡家里的同学赶紧去探望，喊他他不应，房间里阴暗又沉寂，点亮煤油灯近前一看，他全身的皮肤都如油菜花一样黄，双眼紧闭，仅仅残存着微弱的鼻息。我抱起他就往长江埠火车站跑，闻讯赶来的班长刘良谋等同学一起与火车站方面交涉，因是烈性传染病，被拒绝登车。我和杨世武同学抱着陈文申强行登车回到武昌。公汽的司乘师傅得知我们是武大的学生，招呼乘客配合救人，开着只有我们三位乘客的公共汽车，送我们到了行政楼后面的医务室。学校迅疾安排转院到高家湾医院（中南医院），制定了“三保”计划，即保费用、保营养、保陪护，花了近1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200多万元），硬是从死神手上夺回了一条生命。

三

毕业前一个月左右的一天，某县公安局的两名警察到学校带走了一名学生。到团中央报到的第二天，我找组织反映了这一情况，说明我的校友可能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蒙受冤屈，建议以团中央名义商请当地党委落实宽严相济、打击与教育挽救并举的法治原则。组织上指示我代拟了两份函件：一件发给了当地县委，一件发给了母校。母校高度重视，刘校长亲自督办，校团委、保卫处、学生处通力配合，为这位校友落实了毕业生身份，分配了工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母校不愧为综合院校刑法学研究第一块牌子，大度大气有担当！

2000年10月，我蒙冤被捕。和我一同在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担任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的马克昌教授（马教授担任刑法组组长，我担任金融组组长）向学校报告了情况。学校组织了马克昌教授（《刑法》起草人）、莫洪宪教授、最高法院校友万鄂湘大法官、熊选国



大法官及我的辩护人——校友刘少雄大律师认真研究了案情，坚定认为无罪，坚决主张无罪释放。在最黑暗处，那道发自珞珈山的光亮让我坚定了活下去的勇气。

时光飞逝，几十年过去了，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做人做事，我总是以武大学生而立主标杆、定规矩，让同行同事感觉到武大的学生就是不一样；我总是以国家利益为大为上，总是想着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多做点好事，每每想起和母校的这些事情，就感觉有尊严、好温暖！

1979级入校四十周年聚会时，在学生食堂的饭桌上，我向校友事务与发展联络处的领导讲，这次回来，最想说的话就是：母校真的好像母亲！

我的母校啊，您的品格、您的气质、您的容颜，是我们每一位珞珈之子的骄傲！

作者系哲学系 1979 级校友



情到无语 事来无思

——武汉大学 1979 级 40 年聚会之图文说

王一鸣

白云黄鹤的故乡，东湖之滨珞珈山上，冬藏送出最后三天的秋获，为武汉大学 1979 级入校 40 周年纪念活动贡献了天高云淡。就在聚会的前一天，同学教我进入微信，让我点“我”、点“收藏”，编辑了“40 年 4 张照”。事后看来，好像是得到上天的喻示，聚会过程中还真发生了前后关联。以下将原文加括号，将新发生之事贯穿表述。

与《经济学名人轶事录》这个油印小册子相关的人几乎都出现在下图中。如果署名，应该是吴铁军（经济系 1977 级）、陈东升、王一鸣、毛振华等；而校学生会提供 200 元资助的正是下图中当时的学习部长陈建国。



1979 年入读武汉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1982 年与几位同学利用暑假和课余时间，编写了《经济学名人轶事录》，由武大学生会资助印刷成册。当时反对名利思想，没有署名



1977 级、1978 级、1979 级三届校友捐赠母校雕塑《潮》的揭幕仪式



1983 年毕业后，于 1984 年创办《青年论坛》，2008 年获
改革开放 30 年标志性事件候选



(从左至右)於可训、刘道玉、邓晓芒



(从左至右)朱征夫、王一鸣、刘道玉、艾路明、张俭

上图的每个人都与《青年论坛》有关系。从左至右：於可训是



兼职编辑，为若干栏目撰写过题头语；刘道玉校长是顾问，为刊物亲书“前辈寄语”；邓晓芒是作者，他和易中天的硕士论文就发表在本刊上。见面时，於可训师兄还特别告诉我：前不久访问东京大学，该校居然有“武汉期刊课题组”，重点研究的便是《青年论坛》和《这一代》，而他正好和这两个刊物都有密切关系。出席这个分享会的彭富春、朱征夫、艾路明、关敬如、周中华等或为作者，或与之有紧密联系。

为 40 周年聚会创作《珞珈山赋》及与人合作《七律·潮》而大放异彩的陈刚，当时是《青年论坛》的文史编辑；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返校聚会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赞助者陈东升和毛振华两位同学，当年分别义务兼职《青年论坛》北京记者站站长和湖北站记者。

“始终于自由的《青年论坛》”无愧于时代。

今年 11 月适逢第九届“中国经济学创新奖”在武汉大学颁奖，这本书所表达的“个人财产问题研究”是评奖的候选理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获奖人之一的洪银兴还是《青年论坛》南京记者站站长。

2012 年创意“文当山”，提出中国中部“西有武当山，东有文当山”，成立“文当书院”。“文当山”等已获国家商标局注册。1979—2019 年，与武汉大学经济系 1979 级 55 位同学一道学习、成长，还将继续努力，最大限度地加长这个过程。we79（武汉大学经济系 1979 级，w: Wuhan University; e: Economics）有一半以上的同学到访过文当书院，它已



1997 年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鲤港村经济》基础上完成博士论文《论个人财产》，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初版、再版，由母校图书馆等收藏，获 2019 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候选



谭仁杰和作者

成为同学们的一个聚集点，也是 we79 继续努力的一个标志。

作者系经济系 1979 级校友



珞珈山赋

陈 刚

邈鄂区之芳藪，历遐代而蔑声。驯晚近之颓势，亟自强以新萌。乃凿荒岩，刊丛薄，布置栋宇，大庠以成。譬开物之卓绝，祈致知之坚贞。惟当世之楚才，锡珞珈之嘉名。

中经坑辱，犹葆天禄之藏。亦遭灰劫，未减群玉之光。嗟予何幸，附骥曾游。百卉吐蕊，万条抽柔。老儒尚在，曳杖湖陂。赏此乔木，嚶鸣悠悠。发顽童之蒙蔽，示文物之风流。俟四载之奔箭，永一生之回眸。

若乃取象灵丘，规摹骊窟，蜿依幽壑，固凭嵒岵。群楼隐约，画檐凌兀。碧瓦琉璃，垩垣曲委。耀晴日之郁霭，翳回廊之迤迤。极问学之尊显，崇至圣之赫奕。东西精艺，联璋合璧。南北黉府，孰可与匹。人间泮宫，斯境第一。

其为章黄壁垒，时学锋锐。硕人连袂，瑰彦倚桂。默四库之溯洄，总百科之机慧。骏才凌烟，惊采绝世。曩日耆宿则有五老三剑之雄，饱学冠于士林，高誉腾于瀛海。迩来名舌则有鬼谷仪秦之辩，燕石为之点头，阐提从而泪悔。口耳相授，此秘甚辛。师徒砥砺，愈出愈神。至于新进溺物，学种胥沦。或荧屏邀声，裂道术于秽尘。或里巷稗贩，贸方伎以笑颦。来者不拒孔方，去矣止缘金银。赖前修之富艳，控识界之要津。

若夫绮龄逸稟，络绎来驻。关东佳儿，陇西贵裔。南海查户之奇，塞外毡乡之异。毛颖头角，囊底见露峥嵘。松筠意气，茎寸叹为堪惊。或题海大战，俱满分以倾城。或诸本逆诵，其如流而扬菁。塾师骄傲，父兄畅情。遇君闾试，售我鲛鲸。十年沉羽，一朝



冲鸣。蛾眉略施粉黛，浑号斟改雅名。愿明哲之剴切，落锈钝为琼英。冀万牛之牵挽，作七庙之丹楹。负笈汉皋上，振衣山中行。

至于仲春照晌，润毛尽绿，坡苔新茸。繁樱一开，淡馨自浓。飘穀浮縞，如雾似淞。华车挂轡，游侣胜蜂。昼倚石桌，郑女抛书，眼渐慵慵。夜伫峻窗，交甫失佩，心萦徽容。若夫湛露刚白，秋宵转长。执手桂下，指圜月以升冈。履霜枫谷，嗅红叶其若香。衡雁杳渺，瑶报微茫。至若岁暮时昏，风积云屯，霰响瓦息，雪筛林繁。缘薨冒栋，入隙滞门。三径没迹，孤村无垠。松竹束于练素，菊荏仅存枯根。惟见凌寒数朵，点缀阒寂梅园。

于是送怀遥岑，眷言玉岫。忆课余之登跻，恍失恋之狂走。薜萝纫襟，兰痕染袖。云杉密栗，松柏挺秀。落叶荐茵，青藤悬茂。听林杪之风籁，怜露巢之鸣穀。若夫精力独煎，长夜夙醒，乃绷腿拾级，一气达顶。霞上森壁，星隐云岭。遨神天色，泛睇晨景。东顾江流，修灵浩荡。北俯湖波，亡谿靡疆。斯虽小阜，观国之光。瞻洙泗其无怍，基嵩岱之莽泱。堆蓝耸翠之静，热衷者可以清凉。汉晋唐宋之雅，鄙俗者终于忘伦。

噫！吾以楚之编氓，幼慕阆苑，得攀鸿翻。四十年矣，忽焉一夕。乌骓迅逝，白霜着额。其犹未悔，敢曰蹉跎。初服尚鲜，不缙不磨。龙华一会，契阔情多。乃吹葭命律，为珞珈之歌：

江汉春来起大潮，珞珈登眺水云遥。

十年尘劫身犹在，一代风流石作标。

每惜人生兼旦暮，岂凭时势上扶摇。

萦怀常念湖山碧，梦里樱园花气饶。

此七律诗原题《潮》，为 1979 级中文系校友周达与陈刚共同创作。

注：《珞珈山赋》作于 2019 年 11 月 2 日至 4 日，武汉大学全体 1979 级学生返校大聚会之前。

作者系中文系 1979 级校友



珞珈·四十年

方 鹏

煌煌珞珈兮紫云起，烨烨其盛。炜炜东湖兮绿波生，烁烁其华。古斋起于遐荒，工巧流韵，枕山臂湖，居形胜势。以烝烝皇皇，蔚蔚穆穆之态而筑，浩气舞雩，昭昭百年余。登老斋学舍，飞檐琉璃，众兽天吠，纳长风而听湖涛，揽天目而观桐摇。汇四围之清气，成湖山之景胜：重簷环翠，抱碧涵青；澄镜弥霏，疏雨点黛。壮哉，珞珈！

曾记否，赏三月樱红，闻九月桂香。戏东湖棹波，攀珞珈嵬峨。春，草虫咿唔，鹧鸟呢喃；韶光淑气，锦簇花团。夏，赫赫炎炎，暑气熏蒸；新荷时雨，绿树阴阴。秋，暖阳杲杲，清月朗空；丹枫香桂，玉露金风。冬，雪飞风起，空翠寒皓。琼楼玉台，岁华梅傲。霎时间，仰望五色瑞云，惊闻雁鹭翔天。美哉，珞珈！

斯时也，道玉治校，立异开明。革变旧制，励志图新。学分新规，跨系择选。蔚若甘霏，风靡天音。启知悟道，功久力绵。广植桃李，学传一心。故清耿明光而裨益于终身，奋励天涯而霑濡于厚泽矣乎？伟哉，珞珈！

斯时也，尊教崇礼，竭学劬劳，萤爝星月，精研不殆。览万卷以鉴古今，研洋文以识天下。欧美文学、西洋史哲、世界画乐、华夏理教、扶桑诗说，窥四海以游遨，穷慧林之渊薮，楮墨博记，微察猎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奇哉，珞珈！

斯时也，偶无不虚空如梦，狂佞若癡。读萨特、卢梭；仰歌德、普希金；吟惠特曼、松尾芭蕉；仿泰戈尔、拜伦。常醉墨于心，赋文自妄而痴失漫夸，意无惶恐。乐西风新知泓渟，敦敦卓



卓；常嗟咨学问深宵，浩浩瀚瀚。幸哉，珞珈！

斯时也，晨晚漫步于亭台坡径，沐雨扶风，朗读对话、嬉闹娱情。阳暖花发之日，歌兮登磨山之坡，咏兮立东湖之湄。思春涵秋明，枫桂梅樱。念红情绿意，草荣嘉英。梦樱缀斋前，弘斯和艳；桂植中庭，懿此香浸。更忆情人坡上，芳华暧暧；梅操广场，曲影熙熙。或酷暑之夜，席地而眠，月光如许，邈夏光之憬憬，叹星河之耿耿。或寒雪之窗，静伫而视，阳曦煦煦，叹冬日之苍苍，瞻雪雾于芸芸。乐哉，珞珈！

吾辈英、法、德、俄、日学子，四年春秋，惠兹浸润，学脉绵延。悠悠在昔，衍衍于今。

云淡斜照，蟾明碧空。今日又归来，千里染尘风。梨花落雨，燕然遗梦。思忆旧人，泪盈痴容。谈笑欢娱间，怎不哀菊芳、悼和平、哭素怡？鹤去魂归早，常忆君含笑；往事成意象，如歌长回响。红尘禅心，泪语哀冥。春秋几度，一曲离殇。醉在回眸，怅在归期。

缆数四十年风云，斗转星移。岁月如歌，白驹过隙。四年同窗共读，一世牵手情深。朋辈毕至，故友咸集。八方归来，慕狂欣喜。当年豆蔻芳华，青春年少；如今鬓角霜染，儿孙绕膝。今日聚聚，乐悦欢颐。皓月清风，仍似昔日瑰丽之景致，旧事劳想，别裁佳趣。酌歌自适，悠然放怀。溯忆青春之光阴，陶然可醉；叹叙浮生之云烟，自得其乐，可谓幸欤？

兹作赋以寄语吾辈：秉崇山清流，致以游目骋怀。惟求真向善、恒以修德博学。倡守正开新，固以景行维贤。夕阳静好，晚霞满天。春秋不老，日月昌明。壮哉，美哉，伟哉，奇哉，幸哉，乐哉，我们的珞珈！

作者系外文系英语专业 1979 级校友



八声甘州·七九级武大医学部四十周年赋

方 胜

忆青春纵马跃云天，今朝校园还。问君归何处，春秋万斛、风影尘寰。悟道悬壶济世，弘毅踏山川。多少功勋有，负载苍颜。

菊桂馨香凝露，拂秋风清润，姹紫嫣燃。赴东湖泗水，直上珞珈山。眷苍天、峦峰黎庶，泛沧桑、黄鹤九州船。斜阳照，城楼葱郁、锦绣斑斓。

作者系医学部 1979 级校友



唱水调歌头 咏珞珈情怀

郭灵彦(山水) 彭新民(涵谷)

我和涵谷兄同为武大 1979 级校友，又是河南同乡，虽然不在一个系(我在物理系、他在空间物理系)，因经常一起上大课，便慢慢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诗词歌赋这个共同爱好，是毕业 30 年聚会后发现的。后来就在一个群里诗词唱和、不亦乐乎。人生的美好如樱花的开放，冥冥之中似有定数。

1979 级入校 40 年返校纪念的日子渐渐临近，想起珞珈山下、东湖之滨的美丽母校，各自难免思绪万千、情不自禁；于是，便开始了以水调歌头为词牌的几唱几和。遥想当年，右军一众彼此唱和，兰亭集序千古美谈。我等唱和，自对流传不存奢望，然“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之情堪可比拟。记之，供同辈校友可乐者乐之。

一、当年珞珈初相聚

山水唱：
四十年前事，
平生一华章。
应是踌躇满志，
珞珈聚星光。
你气直冲斗牛，
我志更在云上，
年少谁不狂？



汲汲在学海，
无意说彷徨。

山青秀，
水碧透，
书墨香。
有师经纶满腹，
德馨怀热肠。
恨无吸星大法，
不能一口吞江，
转身路苍茫。
至今梦珞珈，
血热仍滚烫。

函谷和：

平生无大事，
珞珈写华章。
四十年前初聚，
青衫意飞扬。
梅园裨闚纵横，
东湖扬帆激浪，
少年谁彷徨？
鱼龙泛江海，
鹤鹰任翱翔。

人俊秀，
书声朗，
梅桂香。
有师怀璧论道，
学分敢先创。
赤壁恃幽思古，



龟蛇挥斥方遒，
酒酣开襟膛。
夜梦珞瑜路，
山水两茫茫。

二、东湖之滨离别忆

山水唱：

折尽武昌柳，
挂帆征四海。
初始珞珈山道，
志在九天外。
惊砂雾漫三界，
筇路蓝缕兼程，
金箍把路开。
明知前路难，
但行莫徘徊。

赴东南，
闯西北，
战海外。
铁杵磨成长剑，
柔情却满怀。
此心此身此生，
尽付真诚热爱，
一笑看成败。
珞珈有真经，
何须拜如来？

函谷和：

蟾宫争折桂，



珞珈汇星海。
相携樱花大道，
歌声云汉外。
书山荆棘簇身，
学海风雪锥骨，
雾尽生莲台。
有志事竟成，
少年谁徘徊？

龙门戏，
京师会，
雨城来。
弹指四十春秋，
尘霜化柔怀。
无论两汉魏晋，
不知孤胆魂梦，
此身有真爱。
挥剑出彩虹，
满目光明开。

三、人未到江汉，梦已珞珈回

山水唱：
身随白云去，
魂总珞珈回。
四十春秋一瞬，
少年鬓毛衰。
也许硕果累累，
也许伤痕累累，
别问我是谁！
但斟酒一杯，



同与珞珈醉。

山青秀，
水碧透，
眼流泪。
苦乐年华饮尽，
樱花别样美。
我欲生翅成蜂，
吮遍珞珈花蕊，
谁来伴我飞？
人生乘兴来，
何不带醉归！

函谷和：

黄鹤浑不在，
白云悠然飞。
千百游子相约，
心同秋雁回。
不管行囊空空，
无论绶带累累，
岁月如流水。
昔年红颜俏，
今日霜鬓衰。

珞珈青，
东湖碧，
樱海醉。
无边劫波渡尽，
知音何须觅？
可共浴河翻浪，
可携西天斗佛，



生死酒一杯。
乘兴邀苍穹，
岂是蓬蒿辈？

四、四十又相见，珞珈情更浓

山水唱：
相见惊喜后，
离别总流连。
从来楚天高阔，
东湖卷画帘。
鲲鹏展翅苍穹，
墨子指点江山，
大潮开新篇。
四十秋如昨，
把酒忆当年。

梅傲雪，
桂清香，
樱烂漫。
浊酒一杯脸热，
搔首白发添。
此生来此为何？
原来你我有缘，
相拥在心间。
常觅人生路，
珞珈高峰巅。

函谷和：
身醉不复醒，
梦萦珞珈蓝。



八方倦鸟归来，
别是情一番。
鲲鹏扶摇万里，
庄墨化蝶论战，
故里添新颜。
久别泪相拥，
未及话流年。

行政楼，
情人坡，
校史馆。
学子挥汗如雨，
呕血绘新篇。
更有弄潮健儿，
奋臂乘风破浪，
英气满人间。
你我共勉励，
神龙正飞天。

作者系物理系、空间物理系 1979 级校友



重返珞珈

黄敬东

四十年前 着一身布衫
一些青涩 几分腼腆
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我们来到东湖之滨
第一次相聚珞珈之巅

四十年后 人已到中年
魂牵梦萦 床侧辗转
抹不去心中那一片湛蓝
今天我们终于回来了
再一次相聚珞珈之巅

珞珈之山 树木遮天
千虫鸣唱 百鸟婉转
仿佛不曾离开
熟知你的春樱秋桂
仿佛不曾告别
记得你的绿瓦红砖

多想樱花树下再次歌唱
弹起尘封已久的琴弦
多想老斋舍内冥坐片刻



默念墙上临别的赠言
多想桂花林中再嗅清香
重温月色渲染的缠绵
多想林荫道上信步徜徉
低吟心底潜藏的诗笺
多想东湖岸边扯下衣衫
再做一次追风的少年

我永远的珞珈山
变了的是我的华发苍颜
不变的是你的绿水青山
变了的是你的满园桃李
不变的是我的一腔思念

.....



作者系外文系 1979 级校友



七九级同学入校四十周年珞珈山、 东湖磨山游记

李春芳

七九校友，返聚母校。风流倜傥，谱写华章。婀娜多姿，风韵犹存。心中有爱，爱在母校。聚珞珈而游东湖，访校友以叙旧情。红男绿女，席地而坐，满脸笑容，独领武大风骚。

东湖磨山，素有盛名。群山环绕，浩淼明净。山下有水，水中有山。楚天仙境，丹凤朝阳。登高峰而望清涟，踏白浪以览群山。青石路面，红漆门柱，黄墙黑瓦，一派楚地风貌。

珞珈山麓，巍峨横亘。冈峦连绵，花木葱茏。巨岩层现，奇石峭立。小径曲绕，异鸟时鸣。观枫叶令人陶醉，聚名胜文化荟萃。建筑明丽，房舍雅致，青砖绿瓦，独具武大风味。

作者系医学部 1979 级校友



七律·潮

李任瑞

今古黉门流翰墨，
珞珈山里树新标。
诚为故国端惊谏。
便有青衿敢弄潮。
雪月春生期大道，
乾坤雨过数明朝。
虚怀天地心长在，
叱咤风云梦未消。

作者系哲学系 1979 级校友



江城子·同窗再相会

李文学

珞珈山下起歌声。似春风。绕霓裳。曲曲亲切、直使眼潮红。
身在天涯常忆旧，何难忘？四年情。

东湖碧水映青峰。浪花轻。鸟争鸣。多少云霞、你我共相迎。
今夜一别多保重，余生路，放轻松。

作者系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河流泥沙工程系 1979 级校友



珞珈赏樱四十春

李 勇

一年一度的樱花
在碧波簇拥的珞珈
拾阶而上，摇曳盘升

是谁徘徊在老斋舍前
又是谁仰望着指向星空的琉璃瓦
举起了蛋壳做的酒杯

面对粉红的百年古樱
回味昔日的踌躇满志、青春无涯
光阴与岁月，陪我赏花

树上的花，如蝴蝶、如蝉翼
而心中的花，如同屋檐上的雨点
潇潇而下

横斜与跳脱在湖畔的花枝
千姿倒影，百般无暇
不倦地挑逗着青丝与白发

在春天，在这个迷离的珞珈
花可以一年一度
人生岂能无涯！

作者系哲学系 1979 级校友



虞美人·同学聚会己亥秋

廖德仲

珞珈山蕴无穷力
惹得终身忆
师尊如斗万人钦
更有艺高点石变黄金
浮生总被离愁恼
同学情难了
爱称牢记到而今
沧海桑田能觅几初心

作者系化学系 1979 级校友



1979，永远的青春记忆

刘 丽

一九七九，
仿佛已是那么遥远。
一九七九，
又好似清晰如昨天。
还记得那慢悠悠的校车，
载着我们进入美丽的校园。
东湖之畔，
珞珈之巅，
聚集一群踌躇满志的青少年。
风华正茂，
理想高远，
年轻学子们渴望为祖国奉献。
四年寒窗，
将我们的心历磨炼。
漫园社团，
涓涓清泉滋润心田。
我们的身影，
穿梭于不同学科的教室。
我们的思绪，
飞越在珞珈的小树林间。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



小树已是巨木参天。
如饥似渴的弱冠学子，
已开始步入花甲之年。
珞珈山栽培的小树，
多已是社会的栋梁。
东湖水孕育的小苗，
正为人类做着贡献。
熟悉的教室，
仿佛听到当年朗朗书声。
老图书馆前，
犹有那一张张求学的脸。
漫步校园，
樱花开放恍如眼前。
丝丝淡香，
好似我又置身桂园。
二零一九，
我们重温武大之梦。
二零一九，
母校依然亲切如前。

作者系外文系 1979 级校友



那年

——1979 级同学入学 40 周年返校纪念

涂长庚

那年，我们十七八
相聚珞珈山下
花样容颜
金色年华

那年，校园像座象牙塔
没有靡靡之音
没有奇装异服
饭菜也是统一的

那年，我们三点一线
宿舍、食堂、教室
想的是未来
学的是文化

那年，教授是偶像
流行的是儒雅
高数老师的板书
竟能与铃声同时落下

那年，我们青春年少



意气风发
东湖泛舟
球场搏杀

那年，我们初识水轮机
在陆水坝下
花瓣桨叶
伴随朵朵浪花

那年，我们朝夕相伴
宿舍为家
抵足而眠
多少夜话

那年，情开始萌动
心开始发芽
你梦见了亚当
他梦见了夏娃

那年，我们还未长大
男女生偶遇
一个顾左言他
一个脸飞红霞

那年，我们有一颗好奇的心
不知女生悄悄说些啥
一个窃听器
留下多少佳话

那年，缝被褥
你请过她



针针柔情
线线梦话

那年，他是羞涩男孩
你是纤纤娇娃
星星望着月亮
却不懂表达

那年，最后一课
在西津大坝
一江春水
两岸山花

那年，我们各奔东西
海角天涯
你同百舸争流
他与千帆竞发

那年，已过去四十年
执手相看
亲爱的同学
你还好吗

我赞美青春
我们青春无瑕
我赞美同学
同学是永远的记挂

作者系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动力系水电站动力设备专业 1979
级校友



回不回去

——珞珈山求学四十年毕业三十六年思绪

王其红

回，还是不回，
樱花都在季节里为我守候。
三十六年间梦里回多少？
老斋宿舍的台阶都刻在心头。

琉璃瓦依然映照明月，
东湖水仍旧托着扁舟。

回不回去？
回不回去！

道玉仍安在，
今日是否有人登门问候？
和平已逝去，
谁再与我谈论独立与自由？

回不回去？！
只有珞珈山上那满园的桂花，
香着一代代新人的春秋，
馨着我一年又一年万水千山的远走。

作者系外文系英语专业 1979 级校友



七律·武汉大学入学四十年返校

许定波

珞珈山下列琼筵，
共向清江感逝川。
我与樱花同往忆，
人非锦瑟怨华年。
苔痕旧覆程门雪，
日影初红雁外天。
倒尽金尊君莫劝，
素霓意气似从前。

作者系数学系 1979 级校友



在深秋，我们回来了

许海云

在深秋，丹桂飘香
珞珈山，彩旗飘扬
东湖岸，人潮奔忙
他们来自职场，从四面八方
回到阔别的母校
叙旧情，忆过往

四十个春秋，半世纪人生忙
从少不知事的少年狂
到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
一路求学奋斗，往事沧桑
览春的美景，历夏的劳作，享秋收获
归来仍是少年狂

在珞珈山幽静的小径，重听书声琅琅
在梅园大操场，遥望健儿身影雄壮
在测绘校园，又忆同学团结互助
在东湖之滨的林荫大道，回味少年情狂
在伟人像前，留下美容俊貌
在医院病房，实习救死扶伤

母校武汉大学，学子心中神圣的殿堂



我们在那里开始实现人生的梦想
我们在那里求学求知
我们在那里互学互助，共同成长
我们从那里出发，奔向四面八方
我们以母校为荣，为母校增光

我们回来了，从各自的职场
我们回来了，没有犹豫和彷徨
我们回来了，带着收获的喜悦
我们回来了，带着事业的辉煌
我们回来了，心怀感激之情
我们回来了，祝福母校永耀荣光。

作者系医学部 1979 级校友



蝶恋花·同窗聚

徐学福

一别经年今相见。
把酒言欢，
共叙同窗暖。
岁月无情华发显，
难寻旧日娇容面。

遥忆青春多浪漫，
质朴无邪，
寒夜书为伴。
花谢花开时序换，
人间几处沧桑变？

作者系哲学系 1979 级校友



七律·再聚首

姚传宝

时光荏苒四十载，
芳华已去沧桑留。
依稀别梦催人老，
难忘同窗忆心头。
厚积薄发成栋梁，
各领风骚争上游。
珞珈山下再聚首，
指点江山志不休。

作者系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治河系 1979 级校友



七律·重聚抒怀

——纪念医学部 1979 级入学四十周年同学聚会有感

袁流海

别梦依稀四十载
今朝重聚校园来
青春少年风华茂
同窗情谊印脑海
似水流年人生短
三世情缘今犹在
不问西东常思念
情怀永在心不改

作者系医学部 1979 级校友



致敬 1979

赵仙泉

一眨眼就这么老了
一眨眼又回到过去
这就是穿越
在时光隧道里
我们身不由己
但鲜活的是记忆
在岁月底片的档案里
珍藏着青春的魅力

四十年足以长成一棵大树
四十年前我们的枝叶已在摇曳
四十年陪伴我们的是一路风雨
而每个人不只是一棵树
更是一本传奇的书
字里行间都是故事
悲欢离合都成经典
喜怒哀乐皆为旋律
而这一切都源自 1979 的武大
是高考的筛子
把我们筛到武大

那年珞珈山的秋季



就是我们人生的序曲
肉体可以不再年轻
心灵却能够永远如花似玉
永是珞珈一少年
成为我们共同的心迹
我们愿脸上刻印无形的标记
那是樱花隐形的图案
名校的光环畅行世界各地
.....

作者系中文系 1979 级校友



珞珈山

邹鸣琴

日照青峰耀楚天，
湖光山色碧相连。
秋随桂子香风醉，
春赏樱花笑语妍。
树影重重掩楼角，
书声隐隐落池边。
钟灵毓秀今朝最，
百载弦歌继古贤。

作者系化学系 1979 级校友

珞珈风采





鄂栋臣：测量地球两极的人

记者 王俊 实习生 应悦



1989年1月，鄂栋臣参加创建中山站(受访者供图)

姓名：鄂栋臣 性别：男 享年：80岁 籍贯：江西广丰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职业：中国极地测绘事业开创者、极地测绘与遥感信息学奠基人、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原主任

从中国到南极，随船要走20多天，即便在南极的夏天，内陆地区依旧只有零下40摄氏度，并且南极天气变幻莫测，早上的晴天持续不了几个小时，暴风雪可能就会来临。而要到北极去执行科



考任务，则基本是在北冰洋上进行，至少两个月时间都需要随船。

这样的条件下，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原主任鄂栋臣去了7次南极、4次北极参与科考工作。中国在南北两极科研探索方面起步晚，而鄂栋臣1984年就跟随中国第一次南极科考队，连续20多年奋战在中国极地测绘科研一线，推动了中国极地科考的发展。

测绘完成中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参与创建南极长城站、中山站和北极黄河站，为南极山川湖泊冠以中国地名：长城湾、望龙岩、龟山、蛇山、八达岭，在北极建立GPS卫星跟踪站，扩展中国卫星跟踪轨道范围……鄂栋臣的从业经历，串起来就是中国极地考察发展史。

这位把测量极地作为一生任务的“极地赤子”，于2019年2月21日凌晨，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去到了比极地更远的地方。

去南极，就是死了也光荣

“极地气候条件比较恶劣，且在内陆地区会有高原反应。”鄂栋臣的学生、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教授周春霞跟《新京报》记者讲起极地的环境，“但与鄂老当时去的时候比，现在的条件、装备已经好太多了”。

“现在极地都有中国的科考站，鄂老当时去建站的时候，没有站点，只能睡在帐篷、睡袋里，早上起来，身上都是雪。”鄂栋臣的学生、武汉大学博士艾松涛说。

鄂栋臣最先前往极地考察的时候，是中国在极地的“探险时代”。

20世纪80年代初，已有18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40多个常年考察基地和100余座夏季站，而当时的中国，在极地科考方面还是一片空白。

直到1984年11月26日，由591人组成的中国首支南极科学考察队，从上海浦东港口起航，开始了中国人对南极的探索之路。

鄂栋臣，就是这591人中的一员，并担任考察队党支部副书记



和测绘班班长。

彼时，鄂栋臣已经 45 岁了，还有了 3 个孩子，妻子王紫云不能理解丈夫的冒险行为，迟迟不肯在“生死状”上签字。“就是死了，我也光荣。”鄂栋臣毅然决然地自己签下了名字。

鄂栋臣曾回忆起第一次南极科考：船长说，我船上带了一些大塑料袋。我们问他，带塑料袋干什么啊，他说准备装死人的。如果有人牺牲了，就用塑料袋一装，放到船底下的大冰库里冷冻起来，再带回家。

“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九(久)卧不起，十分难受。”南极长城站首任站长郭琨曾用顺口溜描述当时的情景，字句里都是那时的艰辛。

30 天的艰难航行过后，我国第一支南极科考队到达目的地——乔治王岛。队员们脚穿雪地靴，身上臃肿的棉衣外围着救生衣，戴着印有“中国”字样的帽子，举着五星红旗，在乔治王岛留下中国印记。

抵达目的地，建站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作为工程实施最基础的测绘工作，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进展得异常艰难。鄂栋臣和测绘分队每天扛着木桩、铁锹、镐和铲去勘探测量。“一锹下去挖不了多深，稍有不慎还会掉进冰海里。”

最后，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 4 平方千米范围内布设了 33 个控制点和图根点，野外测量 1665 个地形点，用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站区选址与地形测绘。

地点确定后，队员们的身份便转化成了“建筑工人”，每天穿着防水衣，扛沙袋，爬冰入海，建造科考站，一天之中甚至会工作近 20 小时。

1985 年 2 月 20 日，农历正月初一，中国第一座极地科学考察站——长城站正式建成。

鄂栋臣也测绘完成了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在这幅 1:2000 的地图上，他把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赋予南极无名的山川湖泊：长城湾、望龙岩、龟山、蛇山、八达岭……



在科考队，我们都叫他鄂大爷

在鄂栋臣心里，自己注定是要做极地科考的。“鄂老师几乎不晕船，他自己认为很适合做这行。在别人吐得稀里哗啦时，他还一切如常。”周春霞说。

第一次去南极已经年近半百的他，在往后的 20 余年里，依旧在极地科考中亲力亲为。

2004 年，已经 65 岁的鄂栋臣第三次赴北极进行科考，当时他和艾松涛一起，负责中国北极卫星常年观测站的建立和地理信息基础框架的构建。

北极卫星常年观测站是与中国南极长城、中山卫星观测跟踪站一起，作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卫星观测定轨和导航定位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摆脱他国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对我国的制约、建立独立卫星跟踪定轨系统的有益补充。

“2004 年我们一起去北极，鄂老是年纪最大的一位，已经是极地圈的大爷，为人又和蔼可亲，我们都叫他鄂大爷。”艾松涛回忆道。

这位极地圈的“大爷”，共参与了 7 次南极考察和 4 次北极考察。中国南北极地的科考站长城站、中山站、黄河站一一建起，他是全国唯一的三大站创建工程亲历者。

“我做的事很有限，但我的后半生都献给了极地。”鄂栋臣曾说。

带学生，开学第一课都是听他作报告

除却亲赴极地科考，鄂栋臣也愿意将探索极地的科学精神传播下去。在武大不少学生的印象中，鄂栋臣的“开学第一课”是共同的记忆。

“1996 年本科入学的时候，鄂老师给我们作报告，讲他去南极



科考的经历，给我们展示从南极带回的标本、实物，大家都非常兴奋。”艾松涛现在依旧记得当时的那场报告。

周春霞告诉记者，之前在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现武汉大学），很多人校新生都听过鄂栋臣的报告。“得知鄂老去世，很多人都怀念他，大家都记得入学后鄂老作报告的样子。”

“有不少学生受到启发，研究生读了极地测绘专业，后来参与到极地考察中来。”近几年来，鄂栋臣带着团队在全国各地的中学、大学作报告，科普南北极相关知识，在全国各地大学、中学作了近600场南北极报告。

“他总是愿意给学生制造机会，包括让我们去其他学校学习必要的课程，推荐我们去极地考察，资助我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周春霞说。

“每一次有学生去南极科研，鄂老都会亲自带队去机场送行。鄂老亲自去送行已经成为我们团队的一个传统。他是严谨的导师，也是慈祥的长辈。”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庞小平说。1991年，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成立，一直到现在，该中心都坚持在极地考察的传统。

2001年，庞小平第一次前往南极进行科考。“南极那么远，条件很艰苦，走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些难受。但老师能来送我，真的感到心头很暖。我当时就想，到了南极一定要把研究做好，对得起我的老师。”庞小平表示，自己在南极期间鄂老师还打电话关心他的日常生活。

在鄂栋臣之后，武汉大学参与了中国的历次南极科学考察，累计派出师生110余人次，是我国参加南极科学考察时间最早、次数最多、成果最丰硕的高校，也是唯一一所“全程参与”的高校。

外界常赞誉鄂栋臣是“极地测绘之父”，对这一称号，鄂栋臣曾说，自己做的事很有限，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他愿意用“极地赤子”。



追 思

“我感触最深的，是鄂老对极地事业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把极地测绘的工作坚持做下来。极地测绘没有钱赚又很苦，很多人不愿意干，鄂老师却坚持；有钱没钱都要干、都要尽量去干，并带领我们不断跟踪国际前沿、掌握最新动向。”

——艾松涛，鄂栋臣学生、武汉大学博士、副教授

“鄂老师把中心（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成立起来，花费了很多心血。他一直工作到 70 多岁，一直工作在一线，很多时候赶材料到夜里两三点，很希望中心能够更好地蓬勃发展。”

——周春霞，鄂栋臣学生、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教授

原载《新京报》2019 年 2 月 24 日



桂建芳：四十年求学与从研的人生感悟

桂建芳

校友名片

桂建芳，1956年6月生，1982年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学系细胞生物学专业，1985年硕士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学系遗传学专业。武汉大学第八届杰出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桂建芳多年潜心于鱼类育种生物技术相关的遗传、细胞和发育生物学研究，是我国鱼类遗传育种与发育遗传学领域知名专家。



2019年5月16日下午，武汉大学杰出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桂建芳



回到母校，作为校友鲲鹏大讲堂第五场的嘉宾，为师弟师妹们分享了他四十年求学和从研的人生经历。

武汉大学省委常委、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成为桂建芳颁发鲲鹏大讲堂纪念牌，1978 级哲学系校友、武汉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骆郁廷，1977 级生物系校友丁毅，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秦正保，武汉大学校友事务与发展联络处副处长刘赛男及生命科学学院师生共同到场聆听。

感悟一：笨鸟先飞、乐观进取是成长的关键

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让高中毕业当了四年农民的桂建芳看到了改变命运的机遇。他在生产队劳动之余看书复习，最终成功考入武汉大学生物系动物学专业，后改为细胞生物学专业。面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桂建芳倍加珍惜，大学期间心无旁骛，如海绵般汲取着知识。桂建芳面带骄傲地说：“硕士导师余先觉老师是从美国知名实验室回来的，当时 20 多人报考他门下，我是唯一被录取的。”之后，桂建芳继续在武汉大学攻读遗传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从事鱼类染色体分析。

1985 年，桂建芳被分配到与武汉大学一墙之隔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说到这份工作，桂建芳十分感谢导师的良苦用心。为了他毕业能有更好的去向，在毕业答辩时，导师特意请来了水生所的老师当评委。“那是一个产生了十一位院士的地方，有着优良的传统和严谨的学风研风，能进去工作我感到特别骄傲。”通过自身努力，1989 年桂建芳成为水生所第一位年轻的副研究员。

1991 年桂建芳获得赴美深造机会，在那里他遇到了武汉大学 1977 级校友，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进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工作的付向东教授，并幸运地成为他实验室的第一位雇员。在美期间，桂建芳在 *Nature* 和 *PNAS*（《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文章，研究成果还获得了 *Nature* 专论的高度评价。

1994 年桂建芳归国，正好遇上国家启动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凭借在美期间突出的研究成就，他顺利获得资助。有了这样一个平台，桂建芳的工作进展越来越顺利，一路从水生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室主任晋升为常务副所长、所长，到后来出任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1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桂建芳说，考入武汉大学、进入水生所工作、赴美深造和杰青资助，是他生命中四个重要的转折点。在40年的科研人生中，他几乎拿遍了青年类的各类奖项，从所长的位置卸任后又荣获了多项国家级重奖。他谦逊地说，个人发展与人才激励政策紧密相连。

感悟二：持之以恒、执著拓新是科研成就产生的路径

从研40年，桂建芳共发表各类论文450多篇，其中SCI 260多篇，共计被引用过万次。他向师弟师妹们强调，“好论文尽可能发好期刊，才能有高关注。”“有创意、有特色、总结全而新的综述论文也很重要。”

如此高的科研产出，桂建芳将其归因于自己有两个理想的研究对象：银鲫和黄颡鱼。他与大家分享了破解银鲫生殖奥秘和全雄黄颡鱼培育养殖的故事。

20世纪70—80年代，桂建芳的老师蒋一珪发现银鲫很特别，是单性生殖，即精子进入卵子后，雌核、雄核不会融合，产出的后代只表现母鱼的特性，由此培育出第一代新品种异育（异源精子刺激发育）银鲫。后来，蒋一珪等人又揭示出银鲫单性雌核生殖克隆的血清蛋白异质性，选育出异育银鲫第二代新品种高体型异育银鲫。

20世纪90年代初，桂建芳接过研究接力棒，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和发育遗传学技术，经过多年实验，发现银鲫具有独特的单性生殖和有性生殖等多重生殖方式，并于2008年培育出生长快，体型、体色好，鱼鳞不易脱落的异育银鲫“中科3号”。这一发现及其科学价值被10本国际专著引用和肯定，引起包括从西欧到美洲在内的30多个国家同行的研究兴趣。同时，“中科3号”在市场上广受欢迎，极大地提升了全国鲫鱼产量。鉴于此，桂建芳团队获得了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应用研究成果“异育银鲫中科3



号的培育和推广应用”2011 年荣获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995 年，在一用团头鲂精子授精激活银鲫 E 系的卵子再经 1~4 度冷休克处理的组合中，发现团头鲂染色体片段整入了银鲫基因组，由此创造了新的种质，桂建芳团队开启了长达 20 多年的异育银鲫“中科 5 号”培育。从用雌核生殖和冷休克进行银鲫育种核心群创制，1996 年到 2013 年连续十代的选育，到与分子模块相结合，“中科 5 号”选育成功，并显出在生长速度和抗病能力方面的优势，2018 年获得全国水产新品种证书。

在成功揭示银鲫的遗传机制后，水生所一位研究黄颡鱼的老先生找到了桂建芳，希望利用他的分子标记法，做黄颡鱼的性别遗传标记。原来，黄颡鱼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即雄性比雌性生长快两倍以上，老先生的学生刘汉勤提出了生产全雄黄颡鱼的技术路线，但又因为获得黄颡鱼雄鱼精子，必须解剖取出精巢，这样一来，鱼也就死了，使得研究难有进展。

接下这个任务后，桂建芳的团队通过大量实验探索，开拓出一条 X 和 Y 染色体连锁标记辅助的全雄黄颡鱼培育技术路线，协助培育出黄颡鱼新品种“全雄 1 号”，用于大规模全雄黄颡鱼的养殖。“这样培育出来的黄颡鱼都是雄的，可以长到三两到四两，雌的只有一两半左右，生产效益非常高。”

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应用领域也极大地带动了产业的发展，总结自己的工作时，桂建芳做了个比喻，“可以理解为架起了鱼类遗传育种从基础到应用的桥梁”。

感悟三：珍惜机遇、豁达行事是快乐幸福的钥匙

桂建芳说：“适时出版专著是积累和传播知识的节点，也是快乐的源泉。”在 40 年研究生涯中，他共编写了 8 本书。

1994 年从美国回来，虽然发了一些文章，桂建芳始终觉得没有把研究的内容讲明白，于是用两年时间完成并出版了《RNA 加工与细胞周期调控》一书。意外的是，桂建芳半年内陆续收到了近十封业内专家、同行的来信好评，他觉得比得奖还要高兴，深受鼓舞。



说起编写《发育生物学》这本书的缘由，桂建芳内心充满感激。当年从美国归国前夕，同在一层楼工作的在读博士李蓬送给他一本关于发育生物学的大学教材。在那个信息交流还不充分的年代，桂建芳如获至宝，带回国后便带领了一个博士后、博士团队，共同为水生所的研究生们编写了这本《发育生物学》教材，并一直担任主讲老师。2015年李蓬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她的这份恩情桂建芳至今铭记在心。

进入21世纪，中国科学院对中文学术刊物的状况感到非常担忧，大家普遍追求国外高水平期刊，而像 *Science China*、*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这样的期刊基本处于荒废状态。为提振中文学术刊物，中科院组织了一批高水平编委，2008年桂建芳入选其中，随后主持编辑了多本专刊，并发表多篇高质量论文。桂建芳也因此连续5年被评为《中国科学：生命科学》优秀编委。桂建芳笑着说，“能做一点事，还是觉得很开心的。”

感悟四：常怀感恩之心

回顾过往人生，桂建芳觉得自己十分幸运，在人生重要的转折点，有导师的关心、同窗的情谊、挚友相助、前辈和领导的提携，还有不相识贵人的帮助。在2015年湖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颁奖典礼上，桂建芳表达了对他们的感激之情。“这一切让我常怀感恩之心，更时刻告诫自己，要用平和的心态，坚守在最初的科研之路上，保持谦逊。”

虽然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但桂建芳院士一直有着深深的文学情结。在人生的重要节点，他喜欢用诗意的表达来总结。得知受邀回母校做客校友鲲鹏大讲堂，他在飞机上写下了四句话：四十年前上珞珈，求学问道喜成家，从此小鱼游科海，也效鲲鹏展芳华。

“感谢武汉大学，在我成长路上给予的相伴和支持，在这里，我找到了人生的伴侣，确立了追寻一生的事业，遇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桂建芳把自己比作“得水的鱼儿”，从武大游入科研的海洋，最终一展才华，服务社会，惠及民生。



李德仁：“传帮带”送卫星上天

张过口述 肖珊整理

1996年，我从河南考入武汉测绘科技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读这个专业也是阴差阳错，选专业时只看到“摄影”二字，以为是拿着相机咔嚓咔嚓拍照玩儿的，却忽视了后面的“测量与遥感”。

刚进武测没多久，意识到自己的专业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好玩儿”，质疑“学这干嘛”，一度想退学重新考大学。正在动摇时，时任遥感信息工程学院院长的李德仁院士，给两个航测班的新生上了一堂班会课，认真生动地讲解了学科的发展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李老师这堂班会课对我们这届新生影响巨大，两个航测班共60人，没有出现一例转学和转专业现象。2006年，我组织航测班入学20周年同学聚会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回忆起这堂班会课，可见它对当年十八九岁的我们影响多么深远。许多同学跟我一样，因为这堂班会课，改变了人生的轨迹与命运。

环境对科研起关键作用

2005年博士毕业后，李老师将我留在实验室工作，参与国产第一颗测绘卫星“资源三号”的立项论证和工程研制。

为解决卫星“看得清、看得准”的问题，在李老师和龚老师的直接指导下，我和团队成员反复研讨、论证方案。经过无数次修



改，终于在 2012 年卫星发射后一周完成精度报告，完成我国第一颗自主民用高分辨率立体测绘卫星的精度测试，该卫星精度全面满足 1 : 50000 测图精度，填补了中国在立体测图领域的空白。

在“资源三号”研究过程中，李老师叮嘱我，“国产上天的器件比国外的差，要善于以软补硬，要勇于超越。有超越才有创新！”

我不敢辜负李老师的期望，潜下心来做研究，主攻几何定标、标准产品生产，但我没有走前人的基于畸变模型的几何定标方法，而是提出了探元指向角的时变定标模型，并在此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我提出的虚拟重成像解决多 CCD 拼接方式，已经成为我国光学卫星标准产品生产的标准生产模型。

李老师知道对地观测科研项目往往周期较长，短期内难出成果，他不为我们定指标、放压力，给予充分信任和宽松的氛围。“任何科研机构，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因素差异并不大，最终什么因素决定能不能出成果？我认为就是环境因素起关键作用。”这是李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即便全年没有产出显著科研成果，年终考核时，实验室仍会给年轻人提供较好的福利待遇，不让大家有后顾之忧。

在“资源三号”从 2005 年到 2013 年的 8 年研究过程中，我们团队是没有束缚的，每个人都可以直接表达意见。我刚提出探元指向角定标模型时，在遥感 6 号上进行了首次试验。一天下午，我给李老师汇报进度时，可能是表达得不太清楚，李老师当时没有听明白，但他说：“我们是工科，所有理论和技术都应在数据上验证。只要数据验证和理论方法是真实无误的，我现在不明白也没问题，你全力去做。”

发射卫星的机会来了

2015 年初，针对地理信息产业如何发展，李老师撰写文章《迎接地理信息产业与 IT 产业的大融合》。他指出，地理信息产业与 IT 产业融合发展中，产业链融合、多技术集成是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这篇文章使我深受启发，思考如何才能将李老师的想法付诸实践，促进地理信息产业与 IT 产业的大融合。做一颗多功能集成卫星——这个想法在我心里落地生根。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心里想着这件事，成天琢磨怎么将它变成现实时，契机真的来了。

这一年的元宵节，我在出差期间遇到一位从英国学习归来的航天五院朋友。他和我分享英国学习见闻时，提到的一个信息让我心潮澎湃：300 万元可以搞一个小卫星。

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武汉大学发射卫星的机会来了！

出差后一回到学校，我便和李老师讨论发射卫星的可行性。他强调，我们的卫星要和其他高校的不一样。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做的卫星，主要是验证卫星本身的技术。我们的卫星首先要解决我们学科发展的痛点，同时要引领卫星的发展。

李老师建议，小卫星命名为“珞珈一号”。“我们后续发射的卫星都命名为珞珈一号××星，不会命名为珞珈二号、珞珈三号等。我们珞珈，是永争第一的。”李老师说这句话时，语气跟平时一样，但在我听来却振聋发聩。

2018 年 6 月 2 日，珞珈一号顺利升空，李老师打来电话，“珞珈一号发射成功，是火箭的功劳，后续要做好夜光遥感应用和导航增强试验，这才是重中之重。”

共享共赢共同发展

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回到学校后，珞珈一号进入飞控、在轨测试阶段。我们团队的微信群里，只要有成员报送研究动向，李老师总是秒回，以鼓励和肯定为主，稍加指导。另外，他每天给我打两个电话，中午和晚上各一个，关心进展，指导测试。在通电话的过程中，李老师说得最多的是“胆大心细、不急不躁、踏踏实实”，叮嘱我们心平气和地一步一步做好测试。

记得 6 月 4 日中午，珞珈一号发射 48 小时，刚好拍摄下传处



理成功第一景数据，李老师打电话过来。他看到数据后说，“珞珈一号除了能进行 DMSP 和 NPP 社会经济参数估算外，还可以进行城市主体功能区划分的评估。为了发挥珞珈一号 01 星夜光数据的作用，武汉大学将联合国内外相关优势团队开展深入研究，充分发挥它的夜光遥感作用，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同时，他要求，珞珈一号夜光遥感数据一定要对所有研究机构免费公开，共同促进夜光遥感的发展。

这就是我的导师，心里永远装着国家，装着学科，装着武汉大学。我们怀着“吃螃蟹”的心情研发珞珈一号，其间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可谓巨大；研发成功后，导师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共享”“共赢”“共同发展”。我们实验室这些年来发展得很好，一路走得很顺，究其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一份公心和大爱，正所谓得道者多助。

跟李老师熟识以后，我发现，李老师出差的箱子里，总是多装一套衣服，以备不时之需。“衣服便宜与否没关系，一定要整洁，穿着大方得体是对别人的尊重。在快节奏的当下，这样能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他跟我解释。

2012 年，我开始跟着李老师读博士。他认为我有做学术的潜力，对我倾力培养。说到个人问题时，他笑着建议，以后你会非常忙，找的对象要以学校为圆心，在方圆 5 千米以内找对象。最终，我相中的是一位武汉姑娘，而且比我早一年毕业。李老师帮她在武汉解决了工作，让我们终成眷属。

有时和李老师一起出差，生性比较淘气的我会揶揄他一起做年轻人爱做的坏事。有次在回程的高铁上，恰逢饭点，我捅捅他的胳膊，“吃份盒饭，来罐啤酒？”他笑着“接招”，“朱老师（李德仁夫人）不在，可以来一罐。”我听了莞尔。

就着啤酒和盒饭，我们聊着科研的事儿。那一幕，就像父子闲时对酌，这难得的放松时刻，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9 年 5 月 27 日



林绍新：从珞珈学子到共和国将军

黎文全

校友名片

林绍新，1938年10月出生于广东兴宁市宁中镇，1957年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1962年毕业后入伍到中国空军工程学院，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空军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副主任（正团级）及系主任（副师职）、空军工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正师职）及训练部部长（副军职），1993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林将军一直从事军事教育和军事科研工作，曾培养多期本科生、研究生，编写过《电磁场理论》《天线与电波》《微波技术》《机载电子设备》等十多部教材；在担任各级领导管理工作期间，主抓部队的教育训练，致力于教育改革，1997年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在军事研究和装备科研工作中，林将军承担并主持多个研究项目，发表过多篇论文，并获军队科技进步奖、省部级以上研究成果奖多项，其中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省部级科研成果二等奖4项、三等奖4项。在20世纪90年代，他还参与我军第三代战机的引进和人才培养及设备科研工作。

法国名帅拿破仑有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是，一个军人要成为一名将军是很难的，这就犹如攀登金字塔塔顶，需要千锤百炼，需要时势造就。然而，武汉大学的学生中，就有这么一个人，他由一名高等学府的理科学生，成长为有卓越功勋的将军——他就是被中央军委授予空军少将军衔的原空军工



程学院训练部部长林绍新将军。

林绍新将军，1938年10月出生于广东兴宁市宁中镇，1962年从武汉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入伍，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军事教育和军事科研工作。历任空军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教研室副主任（副团级）、电子工程系副主任（正团级）及系主任（副师职）、空军工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正师职）及训练部部长（副军职）。

前些日子，我们以武汉大学广州校友会物理分会的名义拜访了林将军。初见林将军，他那始终挺拔的腰身、意气风发的神态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简洁有力的语言，以及言行举止中的军人气质。

林将军的校园生活

林将军来自广东兴宁县客家一个小山庄，从小爱读书爱动脑，学习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第一名，在当地小有名气。1957年林将军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比他高一届的1956级全国招生录取了24万人，但1957年他那届，全国只招生10万多人，少了一多半，学生质量也相应高了许多。当年物理系招了160多人，考进林将军所在的班很不容易。2017年武汉大学物理系的老校友返校聚会，到了40多人。林将军说，报考武大也是缘分，本来想报中山大学物理系，当时，武大是5年学制，中大是4年学制，就觉得肯定是学制越长所学知识越多，所以选择了武大。那时全国几个重点院校，北京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是南开大学，上海是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广州是中山大学，武汉地区则是武汉大学。

为什么报考物理专业呢？林将军说，20世纪实际就是物理学的世纪，大的科学家几乎都是物理学家，包括爱因斯坦、玻尔、费米、居里夫人、普朗克等，他们的科研故事时时激励着他，是他学习的榜样和动力；而且，物理学既是基础科学，又有顶尖的实际应用，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林将军的学习理念就是学习知识、报效祖国。那时的“运动”



比较多，1957年“反右”、1958年开始“大跃进”，系里除了搞科研也办工厂。当年林将军在物理系参与了金准智老师的“铁氧体”项目，后来又在实验室从事“波谱仪”的研究。武大5年的学习和锻炼，对他今后人生的成长和发展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培养了他勤奋好学、积极上进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林将军对物理系的几位知名教授桂质廷、龙咸灵和王治樑等老师印象深刻。王治樑老师后来成为他们的系主任。王老师教的“量子力学”是很前沿、很深奥的专业课程，但因为王老师讲得深入浅出，林将军很快就听懂和领悟了。



1993年被中央军委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那时，林将军把许多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林将军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学生，没有任何背景，能上这么好的大学，不但不用交学费，还有助学金，吃饭也不要钱，这些让他充分感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关怀，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形成了他珍惜时间、珍惜生命、珍惜亲情的基本观念。那时课余生活很少，可每周梅园小操场的电影，他看的都不多。

那个年代多次的“运动”对大学生的成长也是一种磨炼。运动的大环境提高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及政治判断能力，培养了他们的政治“眼光”。“眼光”与“视力”的概念不同，“视力”是看得见的东西，“眼光”是看不见的东西，是刻在头脑里的。通过认真学习、



1997 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勤于思考，就能站得比较高、看得比较远。通过在武大那几年的学习、锻炼和“运动”，林将军逐渐形成了一些基本观念，这些基本观念又成为了他未来人生成长的基本要素，这些观念和要素，影响了他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以至于影响了他的一生。

1962 年 10 月，物理系毕业分配方案出来，林将军被分配到了空军，很快空军单位来接学生，他在西安的空军工程学院一直工作了 36 年，从普通教员成长为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在每一步成长过程中，林将军说在母校形成的一些基本理念起到了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平凡又不平凡的军人生涯

林将军说，他是个平凡的普通人，工作也是平凡的。他主要从事军事高等教育、武器装备科研和组织领导工作。然而，林将军又是不平凡的，不平凡的是他硕果累累的人生。他从教多年，曾培养多期本科生、研究生，授课时间长达 3000 多学时。林将军编写过《电磁场理论》《天线与电波》《微波技术》《机载电子设备》等 10 多



部教材，共计百余万字。

在部队担任各级领导管理工作期间，林将军主抓教育训练，致力于教育改革。1997年他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又荣获国家航空教育学会颁发的“为航空教育科研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荣誉证书，他还被陕西省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评为优秀组织领导管理工作。

在从事军事教育研究和装备科研工作过程中，林将军承担并主持多个研究项目，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获军队科技进步奖、省部级以上的研究成果奖多项；其中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省部级科研成果二等奖4项、三等奖4项。在20世纪90年代，林将军还参与我军第三代战机的引进和人才培养及设备维护科研工作。

当林将军谈及这些经历时，他是谦虚和平静的。但那一部部厚重的教材、一张张烫金的证书和一个个荣誉称号，却记录着他一直以来默默耕耘、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辛勤奉献，及他几十年如一日努力探索、攻坚克难，为祖国航空教育科研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深深足迹。

林将军的教育理念和人才观

林将军向我们讲起他的教育管理理念和人才培养塑造时，微笑着的脸上，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了些许自豪。

林将军认为，军事院校高等教育比普通院校高等教育的针对性更强，要求更高也更严格。林将军提出军事院校大学生应做到“四个学会”：一是要学会生存，特别是在艰难环境中的生存能力。作为一名军人，在战争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尤为重要，只有保存了自己才能消灭敌人。二是要学会学习，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还要在社会实践中学习，向有经验的人学习，尤其要掌握学习方法和规律。学贵有恒，学贵善思，学贵知行，学贵著述。三是要学会做人，知书达理，品德高尚，做一个有学问、有本事、有益于社会、有清醒头脑的人，这是一个人一生都要修炼的核心课题。四是要学会创造，只有创造才有发展，只有创造才有美好未来。



林将军认为办学有三个核心问题需要解决：办什么样的学校——明确办学方向；培养什么样的人——明确培养目标；怎么去培养人才——明确培养方式和途径。林将军认为一个好的学校，特别是名牌学校，要达到“三出三好”。所谓三出，一出高质量的人才；二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三出权威（权威性的学者、权威性的学科专业、权威性的实验设施）。所谓三好，就是要有好的领导班子，好的师资队伍，好的校风（包括好的学风、教风和领导作风）。

其中，高质量的人才要具备“五才三要”。所谓五才：一是专才，有较深的专业造诣，过人的本领。别人会的你要会，别人不会的你也要会，在关键时刻能独当一面。二是文才，拥有较深厚的文化底蕴。三是口才，出口成章，能言善辩，表达能力强，善于与人沟通。四是帅才，有帅才的人有见识、有胆识、有知识、有组织才能，站得高、看得远，能把握大局，能办大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五是德才，要有好的思想品德，能为人师表。所谓三要：一要有亲和力，能团结人，善于与人合作共事；二要能吃苦，能经受艰难困苦环境的考验，始终坚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三要有自知之明，既要知晓自己的优势、特点和长处，更要明白自己的劣势、毛病和短处，经得起表扬，也经得起批评，能闻过则喜，随时纠正自身的缺点、错误。

这是林将军的智慧，是林将军经验的积淀。从中我们明白了林将军成功的原因。他虽出身贫寒，却凭着对祖国人民和空军事业的满腔热忱，凭着脚踏实地的工作精神，凭着勤奋睿智、勇于创新的优良品质，从一个普通的理科学生，成长为荣誉满身的共和国将军。他永远是珞珈学子的骄傲和杰出榜样。

本文收入《羊城珞珈情》2018 卷。

作者系物理系 1986 级校友



梁西：毕生耕耘国际法

付鑫鑫

“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留下的诗句，用来描绘梁西先生宁静致远的为人品格和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或许最合适不过了。

近日，45万字的新书《梁西论国际法与国际组织五讲》通过了审批。“我希望，今年农历八月前，这本书能顺利出版，以此纪念自己95岁生日。”梁西说，在他过去发表的著作文章中，“有的内容还有点意思，虽然谈不上全是创新，但有些原创性的见解，我想集合起来，分享给大家。有人说，名字叫‘精选集’更好，我说要不要，因为那样太狂妄了，还是就叫‘五讲’比较实在。”

自2014年鲐背之年开始，梁西已经“两耳不闻窗外事”，既不出山讲学，也不出门旅游，每天只是读读书、看看报。无论是客厅的沙发，还是卧室的床头，回个头、转个身都能看见书报，触手可及。

采访中，他随手从茶几上翻出一张《参考消息》，上有关于巴黎圣母院被烧毁的多则报道。在报纸的边缘，先生用红笔做了标记，“总想说点什么?!”透明文件袋里，还装着各式各样的剪报。尽管一生布衣、身在珞珈，但先生对国际社会的风吹草动依然保有一颗悲天悯人的赤子之心。

人物档案

梁西，别名梁宋云，1924年生，湖南安化人。国际法学



家，国际组织法学的奠基人。1953—1982年执教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83年起执教于武汉大学，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选批准为国际法博士生导师。曾先后兼任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顾问，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法律顾问等。我国20世纪50年代大学教师中最早的兼职律师之一，曾多次出席最高人民法院与北京市法院重大涉外案件的庭审。1955年5月最高法院开庭审理卡麦隆(L. W. Cameron)驾驶美机侵入中国领空一案，接受委托担任被告律师。此案在中美关系史上影响重大，举世瞩目。主要学术著作有《国际法》《现代国际组织》《国际组织法》等，主要译著有《联合国与裁军》《希思外交报告：旧世界新前景》《吉米·卡特》等。其有关国际组织的译作，对我国1971年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后的初期工作有实用价值。

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夫人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一周的对华访问。在这次会晤后，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一周，被外界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松访华前，还是比较保密的，外面并不大清楚。基辛格打前阵。”梁西先生回忆道。在得知尼克松有访华意愿时，外交部就委托北京大学法律系对一些可能会涉及国际法的外文资料进行翻译与编辑。当时，北大法律系为尼克松访华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编译小组。时年56岁的北大法学副教授梁西，是七人编译小组的成员之一。

“尼克松访华结束后，编译小组并没有解散。此次临阵磨枪，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对联合国、国际组织、国际社会还缺乏全面了解。为了弥补不足，编译小组又承担了更多外文资料的编译工作。”梁西说，不计其数的文献，让他乐在其中。“我对联合国、国际组织方面的资料越翻越有兴趣。后来，有个同事说，梁西对联合国有兴趣，让他多搞点。而且他们都很信服我的译文，觉得梁西的英文比他们差，但翻译水平绝不比他们差。”



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肖永平告诉记者，梁西先生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国际组织法的开拓性研究，对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字之差，险些与武大失之交臂

实际上，梁西之所以对国际法、国际组织如此痴迷，与他成长的那个动荡年代有着密切关系。

1924 年，梁西出生在湖南安化县一个普通农家，是家中长子，小名“容儿”。他自 5 岁入乡间私塾，习晓四书五经。六七岁时，村里来了一位着中山装的读书人，穿鞋袜走路，彬彬有礼，其上衣的四个口袋引发了容儿的好奇心。

容儿纳闷：“这是个什么人啊？”母亲黄菜英告诉他：“这是教书先生！”从此，读书当一位先生，成为容儿的梦想。可惜，3 年私塾之后，因家境清寒，他不得不辍学，当起放牛娃。

梁西 9 岁那年，父亲梁让惇由于不识字，将一张卖牛的字据误认为是抵押字据，并在上面按下手印，牛贩子把牛牵走了……这件事激起了梁西继续求学的想法。

1936 年，他瞒着家里只身前往 10 多千米外的一所新式小学，找到校长，请求读书。校长说：“你姓梁，那就写篇《凉快》的作文给我看看。”他很快写了一篇短文，校长看后觉得不错，答应接收他上学，条件是“必须用功学习，把功课赶上来”。在邻居的鼓励下，父母也同意，咬紧牙关供孩子继续读书。

1940 年，梁西考入湖南省立第五中学。中学时代，梁西显露出一超强的逻辑思维能力，物理、几何成绩很好，同时还喜好文学。初二时，他小试牛刀，创作了一篇骂贪小说《蛙声》，并在当地期刊《楚风》上发表。受鲁迅《两地书》的启发，梁西还陆续创作了《两地蔷薇》《樊城风雨》《文明与野蛮》等多篇抗日小品文。

外孙女爽爽坦言，时至今日，抗日剧仍是外公梁西最喜欢看的电视剧，没有之一。



中学期间，梁西遇到了后来的夫人刘文敏。“开始时，我找她约稿；后来，借约稿的机会，我就给她写信，她也回信。”梁西先生说起一生挚爱的、已仙逝三载的夫人，泪水涟涟。

1946年，凭借作文《多难兴邦》和各科优异成绩，梁西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当时，按他的分数可选择的大学很多，最终与武大结缘“纯属偶然”。

“和同学闲聊，有一个同学说，武大最好。我说，你知道武大？他说：‘武大在武汉，千湖之城，还有长江，多好啊！去了以后，有山有水，武大很美。’就是人家这么一个建议，我就不去考北大，也不去考湖南大学，就挑了武大。你说，这个事情有多偶然！”梁西对记者说。

之所以报考法律系，则是因为法律系免收学费，不会增加家庭负担。等待发榜的日子，梁西到湖北公安县当家庭教师，自食其力。当时的通信联络很不发达，一个多月后，他在一份迟到的报纸上看到了武大的录取名单，遗憾的是并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一个与自己仅一字之差的“梁采云”。朋友们都劝他就此作罢，然而他却怀揣一份“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信念，仍决定亲赴武昌探个究竟。

武大体育馆门前的法国梧桐，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绿琉璃瓦屋顶，樱花大道旁高大的宿舍楼老斋舍，令梁西心驰神往。最后到了注册组，惊喜地证实“梁采云”就是“梁宋云”。几天来路途上的紧张与疲惫消失殆尽，他随即给父母亲写信报喜。

“感觉就像丑小鸭变成白天鹅那样幸福。”梁西掩口笑道。

七年编译，为国际法研究厚积薄发

1946年，武大法律系名师荟萃。“韩德培先生主讲国际私法和西洋法律思想史，刘经旺先生主讲公司法，姚梅镇先生主讲民法。燕树棠先生主讲亲属继承法和婚姻法，他讲课很风趣，对学生也很有吸引力。我至今还记得他第一次上课的开场白：‘燕树棠，何许人也？乃珞珈山上最年轻、最漂亮之教授也。’”梁西先生笑着说，“其实，当时的燕老师已经很年轻了！”



次年，曾任“联合国成立大会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的周鲠生校长，在法学院开设国际法课程。周先生讲课时旁征博引、论证严谨，尤其是结合参加联合国活动的实况，对《联合国宪章》及对华不平等条约的讲述，使梁西深感“弱国无外交”，并进一步萌生了研究国际法的念头。

也是在1947年，刘文敏考入武大。既是中学笔友，又是大学校友，梁西与刘文敏走得越来越近，珞珈山见证了他俩“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

梁西激动地告诉记者：“结婚前，我送给夫人的礼物，只有一支铅笔、一个小本子、一张小照片。”在那本A5纸大小的本子上，刘文敏写下了三句话：“流不断的江水，数不尽的离亭，说不完的言语。”

在老斋舍的黄字斋81423号房间，梁西度过了难忘的大学时光。当时，两字名很流行，梁西是梁宋云的笔名，3位室友便随他改了两字名，吴珊君叫吴东、曹圣高叫曹南、盛禹九叫盛北。

1950年，梁西毕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随后，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苏联法学。1953年，经组织分配并应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邀请，梁西赴北大法律系担任教员。儿时憧憬的当一名教书先生，终于在未名湖畔圆梦。

“当老师，我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引起学生们对我讲课的兴趣，以及对我的信任与尊重。教师如果得不到学生的尊重，讲课的效果肯定好不了。”梁西说。为了获得最好的讲课效果，他专门买来一台录音机，上课前，自己预先试讲一次，用录音机录下来，反复聆听、不断改进，直到感觉满意为止。“开始时，请夫人听我试讲，她作为学生坐在课桌前，我站在讲台上，边讲边板书。我的第一堂课讲给她听，她给我提了很多意见。”

在北大校园，梁西传道授业解惑，曾先后主讲苏联法学、欧美刑法、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法等多门课程。

“文革”时，梁西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的“北大五七分校”劳动。在鄱阳湖畔鲤鱼洲，先生戏称自己住的是“牛公馆”。

原来，牛棚左边关了6头水牛，右边就是梁西和夫人的床铺。



夏天，牛粪臭气熏天，即便如此，他仍未停止关于联合国组织、国际法学的思考与研究。

1971年年初，尼克松指派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来华进行秘密访问。此后不久，梁西回到北大，参加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的编译小组。小组之外，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的谢冰心也应邀参加了《尼克松：六次危机》的部分翻译工作。

此后7年，梁西先后分工翻译了《联合国手册》等6本书以及大量资料文件，对我国1971年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后的初期工作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参加编译组的7年，不仅使我躲进了一个远离动荡与纷争的‘防空洞’，而且对自身语言能力的提高和研究素材的积累大有裨益，比再读几个大学的收获还要大！”梁西感慨地说，“解放前后，我们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对国际组织、国际法方面均重视不够。而西方国家、欧美学者，对这些已经研究得很多了。”

“文革”一结束，梁西就构建出研究国际组织法的基本体系，并在北大率先开创一门崭新课程——国际组织法。

定居珞珈，武大就是自己的家

1984年，在教学基础上，他精心撰写的《现代国际组织》正式出版，这是国内首部全面系统论述国际组织法的专著，先后修订、增补和再版数次，2011年第六版更名为《梁著国际组织法》，开一派风气之先。此外，他主编的《国际法》先后三版，已发行至30万册，是全国发行最多的国际法教科书之一。

梁西倾其毕生精力投入国际法领域的教学与研究，通过授课、著作、演讲等方式，在国际法基础理论、国际组织法原理以及联合国体制等方面，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如“社会基础论”“结构平衡论”“国际法的五大发展趋势”“安理会否决权制度的三脚架原理”“关于国家自卫权制度的三驾马车观点”等均具新意。特别是“社会基础论”和“结构平衡论”，高屋建瓴，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存在基础与发展规律分别作了高度概括，深化了国际法学与国际组织法



学的原理。

同时，梁西对学生尽心尽责，在教学中一向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主张“学国际法的，应时刻关心国际社会的现实”。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到了梁西这里，他常说：“一个好老师在讲台下的准备（研究）往往是讲台上所花力气的10倍。”

“没有充分准备，绝对不上讲台！”是先生教学的首要原则。凡是他主讲的课程或学术讲座，都有自己精心编写的详细讲稿。

在北大，先生是青年教师中开课最早（1955年）的教师之一。后来，他还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际法班的班主任。1983年，应武大国际法研究所所长韩德培先生之邀，梁西重新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珞珈山，回到武大法学院，“武大有一个全国初创的国际法研究所，对我未来的教学和科研很有意义”。回到武大，梁西便将自己的根扎在了这里。

在未名湖畔、珞珈山上，当年跟着梁西一起上课、晨跑、练英语的学生，很多成了我国的外交官、条法司司长、大学校长、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雇员。

桃李满天下的同时，随着多部著作的问世以及论文的发表，梁西关于国际组织法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在法学界的地位也逐渐提高。有人开始尊称他为宗师，而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

“做一辈子的教书匠，对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精耕细作，也是一种活法。我们每个人不过是社会结构里的一颗小螺丝钉、沧海之一粟。回首往事，第一个30年求学读书，第二个30年教书科研，第三个30年定居珞珈，都是很值得的。”梁西先生说，他很知足。“珞珈山是我生根落叶的地方——我和夫人经常把这句口头禅放在嘴边，也放在心灵深处。她88岁走了，珞珈山是她、也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这是我们两个共同的约定！”

的确，梁西早已将校园当做自己的家，武大的一草一木，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故事，都融进他的血液之中。对武大、对法学院、对珞珈山，他有着诉不尽的情愫。“我女儿经常说我住的这房子太小，书堆得装不下……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自己的家虽



小，但武大就是我家，武大这个家是很大很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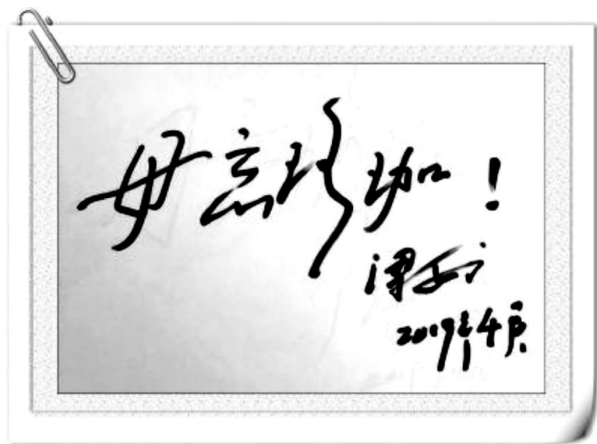
梁西还说，将来身故，他就和夫人一起化作两株小草，厮守在珞珈山上。



1947年6月，武大老斋舍81423室的四同学，从左往右依次是盛北、吴东、曹南和梁西



梁西



记者手记

跟着感觉走，童心未泯

梁老的家在珞珈山半坡一栋6层居民楼的4楼。站在阳台往下看，恰好可以看见不远处的门球场，那是他平日锻炼的地方。“现在，不打门球了。有时，我就到楼下坐坐，看别人打门球，和他们聊聊天。”梁老说，如今下楼的次数比以前少了些。

阳台东侧有个三角柜，摆有各式各样的漂亮石头，那是梁老收藏的宝贝，有非洲来的，也有美国来的，还有从祖国新疆、湖南、海南各地来的。每一块石头，他都能说出是自己的旅游纪念品还是亲友学生相赠之物，并为它们一一取名，“我一生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玩石头”。

客厅里裱有一幅字画——“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因为意境突出、笔法遒劲，一直被挂在东墙作装饰。梁老说，他喜欢把所有美好的东西与人分享。比如说，为了这次采访，先生不仅细心地提前复印、装订资料，而且将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灰色外套别上一枚红色纪念章，配上带有红色船舵花纹的围巾。

梁老说：“我也不知道这个纪念章是不是天津来的，就是觉得



它好看，所以别在胸前。你来之前，我还让外孙女爽爽特意帮我看了一下，问她，我这样穿搭行不行！她说，行的！我才出来。”说完，我俩一同笑了起来。

和梁老闲话家常，聊到平日起居，梁老说：“不定时，跟着感觉走。想早睡就早睡，想晚起就晚起。”唯一雷打不动的是，每天他都要用高倍放大镜看书读报，并做一些笔记。想来，这正是他做了一辈子“教书先生”养成的习惯。

原载《文汇报》2019年5月15日



毛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在武汉大学 2019 届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毛 明

校友名片

毛明，中国工程院院士。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机械工程系工程机械专业 1979 级校友，中国兵器首席科学家，99A 坦克总设计师。长期从事坦克装甲车辆总体技术理论与工程实践工作，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分别排名第 1 和第 2），国防技术发明一等奖 1 项（排名第 1），出版专著 3 部，发表论文 8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18 项。曾获何梁何利奖、全国杰出科技人才奖、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建设工程重大贡献奖、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创新争先奖状、第二届央企楷模和央视 2016 年度 10 大科技创新人物等重大荣誉称号。





尊敬的韩书记、尊敬的窦校长，各位老师、家长，亲爱的学弟学妹们：

大家好！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毕业盛典。感谢母校给予我这次机会，让我得以重返校园，感受青春茁壮的脉搏，重温老师的谆谆教诲，接受人生的阶段性洗礼。

珞珞如石，光辉如玉。又一批珞珈英才将走出武大校门，走向更广阔的世界。祝愿你们心怀梦想，前程似锦，大展宏图！

看到你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年轻面庞，我不禁回想起自己的大学时代。我 1979 年考入武汉大学工程机城专业，那时候在座的同学们都还没有出生呢；我和你们一样，都在武大这风景如画、古朴典雅的校园中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40 年弹指一挥间，记忆中的画面虽已变淡，但那种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却依然清晰。记得那时，不分寒暑，我每天早晨 5 点多钟就起床跑步、背英语单词，晚上在大教室或图书馆看书做题，不到深夜 11 点基本不会回宿舍睡觉。那时候生活很清苦，我吃得最多的是 5 分钱的鸡蛋汤泡米饭。但对知识的渴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盖过了物质贫乏的窘迫；在那个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明天的朋友来相会》的激情年代，心中作为“天之骄子”的小自豪，撑起了奋勇勃发的那口气。

那时的我不知道未来应该干什么，只知道拼命读书、认真学好每一门功课，更没有预料到我会和坦克战车结下一生之缘。我要特别感谢班主任朱河海老师和教我“机械设计”的温乃扬老师，他们鼓励我报考中国唯一从事坦克装甲车辆总体设计的兵器 201 所的硕士研究生。经过两年半的硕士学习，1986 年初，我考入北京理工大学攻读军用车辆工程专业博士学位，师从张相麟老先生，老先生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记得 1989 年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我就去了中关村打工，想出国，想下海挣钱，也想当老师，就是没有想再回 201 所搞坦克。就在我彷徨着等待分配的时候，我收到老先生亲笔写来的一封长信，我至今还珍藏着这封信。他老人家在信中饱含深情地呼唤我回到需要人才的 201 所，希望我为国防事业做点事情。就在读完信的那一瞬间，我所有的彷徨一下子云消雾散。



从那时起我在 201 所工作了一辈子，一生就此一份工作，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也是从那时起，我一点点建立起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从助理工程师到中国兵器首席科学家：我主持研发了液力机械综合传动装置，使开坦克从此像开自动挡汽车一样方便，这里有我们武大巫世晶教授团队的贡献；主持设计了我军第二代履带式步兵战车水上分系统，使两栖战车的水上航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主持设计了 99A 坦克，其已成为我国陆军的一张名片，立于世界先进坦克之列，就像 2015 年 93 大阅兵一样，今年共和国 70 周年阅兵，99A 坦克还会作为地面装备的第一方阵再次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一代人有着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历史机遇。回顾过往，我非常庆幸自己生逢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那是一个充满个性、尊严和梦想的时代，一个付出就有回报的公平正义的时代，凭借自己的知识、才能、智慧和创造力，就能成就一个英雄不凡的自己！这是一个不辜负人的时代，只要付出努力、不懈奋斗、敢于拼搏，每一个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展望未来，我更羡慕即将毕业、进入社会的学弟学妹们。羡慕你们欣逢一个更为瑰丽的伟大变革时代，一个百年未遇的变革时代，一个创新创业创造的新时代，一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直抵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的崭新时代。这个时代更考验人、更磨炼人，它考验和磨炼着每一个试图摆脱“卡脖子”掣肘的人，也成就着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所有人！

辉煌 40 年，成为过往；下个 40 年，昂首阔步。时代的责任赋予你们，国家的未来属于你们。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在这庄严激动的时刻，我衷心希望各位学弟学妹牢记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校训，不忘初心，只争朝夕，确立目标，实现梦想，无悔人生！

我衷心祈愿各位老师身体健康，福寿绵长！祝愿母校人才辈出，硕果累累！

谢谢大家！



周旭洲：母校，我心灵的故乡

——出席“纪念武汉大学西迁乐山 80 周年活动”专题演讲

周旭洲

校友名片

周旭洲，1956 年 3 月生，1978 年考入武汉大学，1985 年硕士毕业于武大图书馆学专业。宇业集团、美瑞健康国际 (02327. HK) 董事局主席，中珈资本董事长；武汉大学第八届杰出校友，武汉大学校董、兼职教授，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副理事长、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长三角分会会长；安徽大学兼职教授、安徽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湖南（全球）异地商会联谊会名誉会长；江苏省湖南商会会长；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中华慈善突出贡献人物，2019 中国慈善企业家榜第 65 位。





尊敬的窦校长、谈广鸣常务副校长、唐其柱副校长，尊敬的刘永年大师兄（97岁、1940级校友）、各位领导、各位校友：

这次来成都有一种返乡寻根认祖的情愫，感谢会议组织者给我这样一次机会，聚会新朋老友，凭吊乐山武大80年前家园。

我久别学府，远离讲台，做实体经济，面对学者和老师演讲真是有些紧张。来的路上，我一直在琢磨：是什么样的情感能让我们这些大忙人，临近繁忙的年底还愿千里迢迢奔赴某地，如此热情、如此亲近地汇聚在一起呢？

是武大，是母校。我足迹遍及几十个国家和中国几百个县市，现在去得最多的是武汉，谈得最多的是武大，接触得最多的是校友。由此悟道：母校，是我情缠梦绕的故乡。

我1978年考入武大，1985年硕士毕业去了湖南省委办公厅。武大求学七年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不仅仅给我留下了东湖、珞珈山、老斋舍、樱花等诗情画意般的图景，还积攒了改变我一生的知识、信念和力量。

在武大我发表了学术论文，编辑了学术刊物，拥有了自己人生第一本出版物。读研究生时，每天在梅园四舍的屋顶平台上，我们端着饭碗聚谈天下事，感觉一个火红的年代来了，逐渐有了心系天下的情怀。我曾下过乡，在水利工地当个工人，人生最大愿景就是进都市做个文化人。武大求学的这段时光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与目标，武大是我事业扬帆的港湾，是我人生走向成功的阶梯。唯一“遗憾的是在武大没有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没有像艾路明校友一样为爱漂流长江，像雷军校友一样两年拿完学分……

毕业离校后，20多年里，我虽为信息管理学院做过两次赞助，却没有回校过一次；但心系武大，情系武大，与武大校友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感谢晓红校长亲自去南京把我牵引回了武大，感谢东升学长创造了一个校友交流平台——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我现在几乎成了武大最活跃的份子：11月23日至24日回武大参加校庆；27日飞香港参加秋波校友的香港公司庆典；12月上旬发起成立铜陵一中辅初教育发展基金，窦校长冒着鹅毛大雪凌晨两点赶到当地，曾文涛、毛振华、关敬如、余仲廉、杨莉等校友组



成的一个武大团队赶到了，连地方行政长官都发出了赞叹：武大人真是齐心；今天又来到了成都……大体估算了一下，我一年中几乎百分之五六十的时间与精力都在围绕武大、武大校友忙活，却是不亦乐乎，喜气洋洋。

陈东升、雷军、阎志、毛振华、艾路明、曾文涛、阮立平、于刚等，这些曾经只能在电视媒体上看见的优秀校友企业家，现在几乎天天都有联系，月月都有聚会，他们不是我的股东，我却是他们的投资者。我几乎成了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的“大众合伙人”。

2017年我与文涛等出资10个亿，联络八位武大校友组建了中珈资本，一年投了十几个项目，丰收了；今年我们投资了阮立平的公牛集团，现已报会上市候审。今年初小米上市时，我们投资了二十几个亿，成了小米香港IPO最大的单一投资者。几天之内有五六个亿的盈余，我们没有规模性减持。我内心追求的就是“与优秀者同行，向伟大致敬”，与雷军、与小米风雨同舟，月亮走，我也走。

武大是我们完善自我、展现人生的大舞台，校友是没有血缘的兄弟姐妹，武大校友是一张名片，又是一个平台。凭着植根心中的那份武大情怀，哪里都可以寻觅到一份校园情、兄弟谊，并可以找到投资、找到项目，就可以创造效益、快乐与幸福。

年纪大了，梦想少了，回忆多了，母校就成了心灵皈依之所。我自创业伊始，一直以回馈社会为指向，捐赠有百余次。但第一笔大的捐赠却是从晓红校长来南京开始。校长不远千里来看望一个学生，让我受宠若惊，我主动提出捐赠母校2000万元，不久后带着支票回母校，这是我人生此前最大的一笔捐赠。2017年初晓红校长调离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与文涛回武大，特意去拜访新来的窦贤康校长，原想捐1000万元的，但几十分钟的会见和沟通后，我被窦校长重振武大，从引进世界一流人才入手，三五年引进世界性人才500位及获诺贝尔奖的教授等这样一种胸怀与战略所感召和激励，当即表态三年捐3000万元，文涛也当场跟进表示捐赠2000万元。当时说的是一年1000万元，三年兑现，但签了合同后我四个月内就将3000万元资金全部到账了。2017年8月，在南京举行



了武汉大学人才引进基金成立揭牌仪式，得到了陈东升、毛振华、曾文涛、阮立平、艾路明、阎志等一大批武大校友的积极响应，现在基金资金已过5个亿。

赚钱是快乐的，奉献是幸福的。武汉大学给了我一生的荣耀与梦想，给了我金子般的荣誉，夫复何求？唯有竭尽全力、尽余生之力回馈母校，哪怕只是给武汉大学增添了一丝丝光彩，也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最后，衷心祝愿四川、成都武大校友会、武大西南研究院越办越好，秉承乐山底蕴和精神，为各位校友营造一个“创造友谊、创造效益、创造幸福”的大平台。

谢谢大家！

珞珈记忆





争鸣道不孤 开拓永不息

——记我国图书馆学家皮高品先生

陈 鹏



人物档案

皮高品(1900—1998),字鹤楼,湖北嘉鱼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图书分类学家和图书馆学教育家。1921年入武昌文华大学文科学习(1922年开始兼学图书科),1925年获文学士学位和图书科毕业证书。历任南开大学图书馆主任、齐鲁大学图书馆主任、燕京大学图书馆编目部主任、青岛大学和武汉大学图书馆主任、重庆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教授、浙江大学图书馆馆长兼教授、英士大学教授、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教授、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著有《中国图书史纲》《图书分类法评论选集》《中国历代名家、名著评介》等,其编制的《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引》与北京大学刘国钧先生的《中



国图书分类法》、中山大学杜定友先生的《杜氏图书分类法》为我国早期三大分类法，人称“北刘南杜中皮”。

炽炭一炉真玉性，浓霜千涧老松心。皮高品先生自 1900 年 10 月 31 日出生在湖北省嘉鱼县一个普通家庭，到 1998 年 3 月 1 日以 98 岁高龄仙逝，近一个世纪以来，尽管颠沛流离于十余所大学图书馆，甚至饱受战乱炮火和动乱摧残，他始终以一腔热忱，在图书馆学领域笔耕不辍、培桃育李。在他面世的学术成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是对于图书分类法的研究；让同道和学生最为敬仰的，在于他紧跟时代、勇于争鸣、开拓创新、泽被后学的治学精神。

创前人未所创：编一部适合中国图书馆的分类法

20 世纪 20 年代，正值中国“新图书馆运动”蓬勃兴起之时，一批有识之士秉持“教育救国”理念，反对封建藏书楼，提倡建立美式公共图书馆，并兴办现代图书馆学教育。1925 年，皮高品从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毕业后任天津南开学校图书馆主任兼英文教员，他发现全国大多数学校图书馆采用的是杜威十进分类法，这种分类法并不适宜中文图书分类尤其是线装书分类。他认为“杜法为西书而设，初非兼中籍而并筹者；盖我国之学术，自有其特性，不容偏废苟简”。于是，他下决心要自编一部适合中国图书馆用的分类法。

在当时的旧中国，这个雄心壮志对年仅 25 岁的皮高品来说非常艰难，一编就是整整 8 年。他先后在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国立青岛大学辗转流徙，搜集资料，挑灯夜读，着手编撰分类法。在编撰过程中，他虚心求教名师大家，比如请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帮忙匡正善本类、文学家闻一多先生帮忙审定文学类、清华大学刘廷藩先生帮忙核定佛教类、图书馆学家沈祖荣先生帮忙订正图书馆学类、目录学家毛坤先生帮忙审阅目录学类，以更加凸显分类的严谨性。1934 年 12 月，一部 500 余页的图书馆应用工具书籍《中国十



进分类法及索引》终于诞生了，该分类法分为四个部分：类表、英文索引、中文索引、附录。类表有10个大类：000 总类、100 哲学、200 宗教、300 社会科学、400 语言文字学、500 自然科学、600 实业与工艺、700 美术、800 文学、900 历史，全表类目约13000个。

著名图书馆学家沈祖荣先生盛赞：“编纂这本书他是费了很长时间的，前后八年之间，该是多么不容易……近数年来，我国图书馆在各处之建设，有日新不已之势，对于图书馆应用工具的书籍常感缺乏，今皮君能编成这样一部分类法的书籍以贡献于本界，由此可以看出图书馆在中国之进步。”《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引》面世后，被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天津北洋大学、重庆大学等多家高校图书馆采用，被誉为近代图书馆三大分类法（杜定友杜氏分类法、刘国钧刘氏分类法、皮高品皮氏分类法）之一，从此在中国图书馆学领域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1933年，皮高品受聘为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主任，他主动立下“军令状”：“两年之内把图书馆整理好，如届时没有整理好将自动辞职。”他从改编馆藏图书入手，在两年时间内完成所有图书改编任务，并编成馆藏中文书、西文书的书本式目录。1938年，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尽管吃的是糙米夹砂石的“八宝饭”，甚至屡遭日寇飞机的空袭，皮高品与廖维祜一起编印了《丛书子目分类索引》，为查找丛书的子目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工具索引，并发表了《中国经书分类的问题》《中国语言文字书籍分类的问题》等文章。

不畏争鸣：“四分”还是“五分”？

理不辩不明，学术不论不真。不论辈分和身份，与同行、同事甚至与学生，通过学术期刊、学术会议等各种渠道进行认真严肃的学术观点讨论，对于皮高品而言是再常见不过了。在他发表的文章中，大部分是“关于……的商榷”“与……再商榷”“对……的回答与讨论”之类的文章。他说：“批评和批判是把学术推向前进的动力，应该欢迎。学术的问题，只有在实事求是、批评与反批评的前提



下，这门学问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假使能在学问上做到比前人多走一步，在文化宝库中添点东西，即使微不足道，或可供后人参考借鉴，亦不至于歿则已焉，虚度一生也。”

在皮高品的学术生涯中，则不能不提“四分”与“五分”的激烈争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皮高品深感解放前的图书分类法不能适应新中国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应当编写一部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图书分类法。他说，“解放前，我们所编的图书分类法是为了实际便利而写的，没有学术体系做根据，不能为新中国图书馆之用。”于是，他重点研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等书籍，认为图书分类法体系只有建立在恩格斯关于“从简单的机械运动到复杂的社会运动和思维运动”的科学分类以及毛泽东关于“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分类理论的基础之上，才是科学正确的。他说，“今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我们的图书分类法就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物质运动形态发展的基本规律来适应这个蓬勃飞跃发展的新形势。”据此，皮高品提出图书分类法的基本大类是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类，此外还有一类是按图书写作体裁编写的综合性的类，它不属以上三类，需单独列为一大类，即综合性图书。

1956年4月，皮高品参加文化部在北京主持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图书分类法《中小型图书分类法》编制会议，向会议提出了数万字的以“四分法”为体系的《新中国图书分类简表》。会议反复论证，决定以此为基础编制中国新型图书分类法，将“四分法”改为“五分法”，即单独设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类，并置于各大类之首。尽管皮高品的“四分法”没有被完全采用，但皮高品多年来一直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他发表的《编制图书分类法的几个基本问题》《关于图书〈分类浅说〉中的几个问题——和刘国钧先生商榷》等有关图书分类法的文章都在探讨和维护自己观点的科学性。更让人敬佩的是，尽管与同行刘国钧先生和杜定友先生在“四分法”还是“五分法”上有激烈的学术争论，但皮高品每每提及他人，总是虚怀若谷的。后来在“文革”期间，皮高品因坚持“四分法”而不幸罹祸，先后被打成“白旗”，并被学界口诛笔伐，他仍然



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坚持自己的“四分法”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关于知识分类的科学理论的。

老骥伏枥：只要还能工作决不停止

1951年，皮高品应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之邀担任教授，讲授图书分类课。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并入武汉大学。据武汉大学前图书馆学系主任谢灼华教授回忆，每次上课，皮高品老师腋下夹着讲稿，步履稳健地走进教室，然后以浓重的湖北口音开始讲课，无论是谈论学术还是讲解史料都是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上课更是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在“中国图书史”这门课期末考试时，所有学生在教室围坐一圈，从皮高品老师手中抽取试题，进行口试，这在当时可谓考试形式的创新之举。

1976年十年浩劫结束，76岁高龄的皮高品不顾年老体弱，主动要求在武汉大学带图书分类法方向的研究生，为培养和造就图书馆第三代和第四代学子做出了杰出贡献。据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程焕文教授回忆，某一日在没有任何预约的情况下去登门拜访皮高品老师，说明来意后，待人热忱的皮高品与他在客厅讨论“皮氏分类法”，并逐渐推及其他分类法，不知不觉就是两个多小时。程焕文从武汉大学毕业后，皮高品还寄过几篇分类学方面的文章嘱他“斧正”，年逾九十的皮高品如此不耻下问，让程焕文教授由衷地敬佩！

1985年，皮高品在《八十五寿庆感想》中说：“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成就，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虽年已八十有五，只要还能工作决不停止……继续学习、研究，把自己一点微力、一得之愚献给图书馆界……为了尽早实现图书馆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图书馆工作者加紧努力，完成这个既艰巨又光荣的任务。”1986年，皮高品以86岁高龄离开了三尺讲台。他从未停止过学术研究，不顾年老体弱，常到图书馆、资料室查考图书资料，日以继夜地整理过去的研究成果，并撰著新篇，先后有《中国图书史



稿》《中国历代名家、名著评介》《图书分类法评论集》等著作面世。特别是1989年出版的《中国历代名家、名著评介》约60万字，涵盖了包括六经、诸子百家直至建国初期的历代名家名著，并把五四运动时期影响中国新文学新文化的欧洲名著名家评介列为附录，书中既分析了名著家的历史价值，又对各种研究观点进行剖析和评论，指出某些观点的正误，补充某些论证的不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1996年，皮高品在96岁高龄，仍以前瞻的眼光和独特的视角，发表了《论市场经济体制下图书馆改革与发展》一文。逝世前不久，他先后接受黑龙江《图书馆建设》杂志和《中国文化报》采访，袒露心声，念念不忘中国图书馆事业。

注：本文部分内容转引如下文章：

1. 皮高品：《八十五寿庆感想》，《图书情报知识》，1985年第1期。

2. 程焕文：《著名图书馆学家皮高品教授》，《黑龙江图书馆》，1988年第6期。

3. 黄宗忠、查启森、李美爱：《一代宗师皮高品先生记略》，《中国图书馆学报》，1998年第5期。

4. 白国应：《皮高品先生的生平活动及杰出贡献》，《文华情怀——文华图专九十周年纪念文集》。

5. 谢灼华：《皮高品教授生平及主要学术成就》，《图书情报知识》，1998年第2期。

6. 彭庆怀：《虚心直节 千古文章》，《图书与情报》，1999年第2期。

* 文中照片由武汉大学档案馆、信息管理学院院史陈列室协助提供，笔者还采访了皮高品学生、武汉大学前图书馆学系主任谢灼华教授，在此一并表示诚挚感谢。

作者系图书馆学系2000级校友



师从吴于廑先生习史小记

陈 勇

吴于廑(1913—1993)，原名吴保安，祖籍安徽休宁，少年成长于大运河畔的江苏宝应。1935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9—1941年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习经济史。1941年秋考取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入哈佛大学文理研究院，1944年、1946年分别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47年应周鲠生校长邀请，回国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兼任系主任、教务处长、副校长等职。

吴于廑先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合作主持了两批全国性世界史大学教材的编纂，开创15世纪、16世纪世界历史研究，主要论著集结于《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在中国史学界，其倡导的整体世界史观，被誉为“世界历史新理论在我国兴起”。所撰《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卷前专文《世界历史》，以及4篇专论世界史整体进程的系列论文(《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更是对整体世界史观的系统阐述以及运用新史观对人类历史的宏观勾勒。诚如齐世荣先生所言，1978年以来中国学者对世界史体系的深入探讨，以吴于廑先生的成就“最为突出”。

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史研究有多方面建树，按学术类别有通史编纂、世界史资料汇编、世界上古中古史研究、15世纪及16世纪东西方历史综合比较、西方史学研究及史学名著编译、中西文化比较



等。其才、学、识为学界广泛称道。成就的取得源自长期的潜心求索所积淀的深厚学术底蕴。早在青年时代，其留学哈佛的同窗好友，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杨联陞就曾以一首归国诗送吴于廑先生：“思能通贯学能副，舌有风雷笔有神，同辈贤豪虽不少，如君才调恐无伦。”

治学三阶梯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入风景秀丽的武汉大学读历史学本科，在一次师生迎春会上，教授们纷纷吟诗赋词，时为系主任的吴于廑先生书赠 4 个大字勉励同学——“由博返约”，意为青年学子应打下宽厚的学术基础，以便将来于某一领域作出专门性成果。10 余年后的 1978 年，本人有幸重返母校，直接跟随吴师读研究生。先生对我等“文革”后首批 4 名弟子谈治学，又进一步提出人生治学之“三阶梯”：宽——窄——宽。据先生解，人在青年时代求学应博览群书，学历史不仅要认真阅读专业方面的“看家书”，如基本的历史典籍，还应当涉猎与此相关的其他学科知识，如与经济史相关的经济学名著，与思想文化史相关的中西哲学，避免学识单一、视野窄狭。这就是三阶梯中的第一个“宽”。中年时代治学者已有一定的基础学养，可集中精力选择某一专题探讨，以期深入下去，在前人基础上做出自己的成绩，形成自己的学术主攻方向和治学特色。最好能在某专门领域中发现一系列连锁性研究课题，使专门研究赋有生命力。应力避中年治学仍方向不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浅尝辄止、事事无成。此谓之“窄”，即向专深方向发展。至相对老年阶段，由于基础扎实，专门研究业已取得拓进，治学者便可重新放宽视界，在专精基础上转向综合，于较大学域内提升研究界面，获取更新的成果。此谓之第二个“宽”。吴师在随后讲西方史学的课程中，又以近代西方客观主义史学创立人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为例加以说明。兰克青年时代在莱比锡大学先后学习语言学、神学和史学，毕业后任中学古典文学教师，进一步钻研西方古典时代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李维、塔西陀等人的



名著，为日后研究打下了较好的语言文字和史料基础。29岁时发表处女作《拉丁与日耳曼各族史》，附录《近代历史学者批判》提出“如实记述”的客观主义史学原则，在西方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渐入中年后以16~18世纪西欧政治史为主题，以各国档案库原始史料为依据，撰写了一系列包括德、法、英等西欧国家的国别史以及突出上层政治人物的教皇史。晚年编纂7卷本《世界史》，虽仍以西欧为中心，但已超越国别史界限，体现了其综合趋向。



20世纪80年代，吴于廑先生(中)和学生在一起

“宽——窄——宽”的治学三阶梯说并非一个呆板和僵硬的治学格式，而是反映治史者应当重视的成才之路：学步时要奠定厚实的基础；研究问题切忌大而空泛，应科学选择自己的学术主攻方向；综合应当在专深的基础上进行。这些从学术发展史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对有志向抱负的青年学人无疑起着引路指向的启蒙作用。历史研究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素养和较长的周期，史学家往往不易在青年人中大量涌现。治史者应尊重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作长期求索钻研的思想准备。治学三阶梯说为人们学习史学乃至整个人文学提供了闪光的学术智慧和门径。从吴师习史的众多研究生弟子，多年后仍体会到这种教诲的可贵。



学术转弯与学科发展

吴于廑先生讲究师德，也十分尊敬自己的老师，更善于从老师的谈话中吸取治学的营养。吴师生前多次与弟子谈及自己被南开大学经济所免试录取为研究生的经历，先生所撰《自传》中对此有更翔实的记载：“1938年冬，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初期一段流离失所的生活之后，我到达了昆明。当时昆明已经设立了包括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校在内的西南联合大学。陈序经先生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兼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陈先生同我谈话约一小时，问了我好些问题，其中有的涉及东西方对知识的看法。谈话将要结束了，他说：‘南开经济研究所正在恢复，计划招收几名研究生。你来吧，不用考试了。’……在他同我仅仅作了一次谈话就决定收我作研究生，这对我确实是出乎望外。”其实，这种不拘一格的录取方法，正反映了这位具有很高办学才能的学者之慧眼所在。陈序经(1903—1967)毕业于复旦大学，赴美留学时获伊利诺大学哲学博士，后又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31岁即受聘为南开大学教授并主持南开经济研究所，35岁已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免试”其实不“免”，只是变换为更讲实效的“面试”。陈序经先生的眼力很准，他此次“破例”录取的学生，两年多以后与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的张培刚一起，成为清华大学第五届公费留美学生(总数17人)中仅有的两位文科学子。

吴师从陈序经先生谈话中尤为受益的是另一种学术上的“潜影响”。尽管陈先生已决定收他为研究生，青年吴于廑仍感犹疑，原因很简单：大学学历史出身的人能否改读经济类研究生？陈序经先生对此问题的答复也很简单：“在学术道路上，不怕转弯，多转几个弯，自有好处。”一番话语拨开了学子心中的疑云。在南开学习期间，吴于廑先生不但首先从经济史入手试行“转弯”，而且进一步认真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歇尔、张伯伦等西方经济学大家的原著，也读经济地理方面的书籍。进入哈佛后，又在治经济史的同时兼治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法制史。经历诸次学术转弯，



吴师渐渐萌发对东西方文明作比较综合的构想。20世纪70年代起，作历史综合研究的想法又在他脑海中再度活跃起来，并最终形成从全局考察和研究世界历史的整体史观。

联系前述杨联陞先生赠吴师由哈佛学成归国的诗句“思能通贯学能副”，自然会想到学术转弯与学科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吴师晚年对学术转弯的益处有深刻的总结：“所谓转弯，就是多踏进一些相关的学科领域。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开阔视野，不以一隅自限。学术上转弯，会带来不同发展的可能。一种是转弯后不再回头，一种是转了弯又踏上原路。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利于祛除狭隘之弊。学历史的人……应当力避狭隘，因此不妨转转弯。”以开放的心态治学，善于从相邻学科中吸收于本学科有益的成分，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这也就是当今国际学术界盛行的“学科交叉”。某种学术的突破性进展，往往出现于学科的交叉点上。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和华盛顿大学教授道格拉斯·诺斯之所以荣膺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因为他们把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研究经济问题，为经济史研究的新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用陈序经、吴于廑先生的话语来说，也就是运用“学术转弯”的方法。

直至晚年，吴于廑先生一直保持着这种开放的治学心态，从不故步自封。先生病故后，弟子们清理他所借图书，其中一本为借阅不久的英文《气候史》。法国年鉴派史学近年开辟气候史、体质史、心态史等新史域，为原有经济社会史范围的扩展，这种新的史学动向受到吴师的及时关注。人类社会与环境自然的关系，是历史研究不应忽略的层面，气候变迁也是治史者应适当具备的知识成分，对这方面情况的了解或许也可称作学术转弯，同样便于扩大视野。

治史与治史学史

谈起“史学史”，不少学生对此感到陌生，连一些历史专业的学生也是如此。实际上，史学史就是历史学学科的发展史和学术发展史。1978年从吴师攻读15世纪、16世纪世界史硕士研究生，他



所开设的第一门课就是近现代西方史学，从人文主义史学一直讲到现代西方的形态学派。开始我也不甚理解，为什么导师不针对专业和研究方向，而直接先谈历史本身？以后渐渐明白，治史者必须兼治史学史，这既是吴师本人的治学特点，也是每一位习史者应当遵照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吴师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包括治学方法、学术观点、历史思想以及由此完成的著述，其自身就是历史的产物。”之所以如此，盖出于以下两项原因：其一，任何史家在治史过程中总离不开自己所处时代的影响。他们选择的课题、研究的侧重点和所得出的结论，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代表某一历史时期主要发展方向的史学流派，其著述和观点往往就是为了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其二，任何史家也总离不开史学学科发展状态的影响。“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不论他们成就或大或小，都是历史学这门学科发展链条上一个或大或小的环节。关于这一点，不一定每个从事历史学习或研究的人都能很清醒地意识到。但是不论怎样，他总不得不受这门学科已有发展的影响，他的先行者的影响。”吴师强调指出，要认识治史与治史学史的关系，必须看到这第二种影响。

近年来我自己也指导研究生，对治史与治史学史之间的关系便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和学术发展史，如哲学有哲学史，文学有文学史，自然科学诸学科有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天文学史等。同样，历史学也有自身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学习任何学科的人都应当知晓本学科的学术渊源与沿革。治史者不可能毫无学科上的历史依凭，也就是前人的学术遗产。史料、历史编纂方面的承继关系自不必说。没有《史记》，就不会有《汉书》。即便在史学思想、学术观点方面，治史者也不可能脱离这种依凭。后学之人当然不会一概墨守成规，完全袭承师法，但他们总不可能摆脱史学发展水平的总体制约。如果他们赞同前人的体系和观点，那么其所从事的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大。如果他们对已有的学术成果持不同意见，那么其后续工作就是批判或扬弃，乃至另辟蹊径、别开生面。即使是后种情况，后学



者的研究仍需以前人的基础为前提，以前人的观点为自己思考的起点和参照点，而不能凭空展开自己的研究，一切从零开始。不仅如此，后人在历史研究中的发展和创新，其所能达到的程度，亦不能脱离史学学科已有的基础和条件。总之，治史者必须关注学科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史学研究的制约作用，清醒地认识自身在整个史学发展长河中所处的地位和阶段，既善于在前人基础上创新，又贵有历史的自知之明。

吴于廑先生对自己弟子的培养既宽容又严格。通过西方史学的讲授，他使学生看到长期受西方影响的世界史学科确实需要开拓和发展，尤其是摆脱西欧中心论和堆砌国别史的不良影响，有许多研究课题等待人们去探索，使后学之人看到自己拥有的学术活动空间和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他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肯定西方近现代史学业已取得的积极成果，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在专门研究上的多面积累，已经为世界历史的比较、综合研究准备了可以认真着手的条件。他要求学生认真研读西方史学名著，密切关注西方史学的新成果，在厘清学术前史的情况下搜集资料、策划选题，明确论文写作可以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防止枝蔓旁生，大而无当，使学生感受到哪怕在一个具体问题的论述中要想取得成绩，也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他充分肯定兰克开办讨论班（“习明那尔”）的培养方法，在研究生论文的具体选题方面发扬学术民主，尊重作者本人的意愿，不以导师的研究兴趣作取舍。曾与笔者先后同期攻读硕博博士学位的一位学友，在吴师着力探讨的社会经济史范围以外选择了宗教改革思想的课题，亦受到积极鼓励。凭借宽松的学术氛围和导师渊博学识的播化，其论文水准不仅获得外来专家的一致好评，而且拓宽了所在研究集体的学术层面。

跟随吴师在治史的同时兼治史学史，诸弟子的学术视野为之大开，学术思路也变得活跃起来。西方史学过去经历了哪些流变，形成了哪些史学传统，有哪些史学遗产值得借鉴，这些问题经常出现在学子的脑海里和彼此的讨论中。带着这些问题再去阅读西方学者的史著，对历史的观察就比以往深入和全面得多。事实表明，兼治史学史不仅促进了研究生论文的写作，而且作为一种基础学养，也



为他们以后的治学研究提供了后劲。接触了风格各异、流彩纷呈的历史题材、史学思想、编纂方法、写作技巧，这些也利于学子博采众长，逐步形成自己的治学特点。

“眼高手低”新解

“眼高手低”作为既定的成语，本意是指一个人的眼光高而能力低，此语颇具贬义。吴于廑先生在论世界史学科建设时却借此文字赋予新解，谓“眼在远处，手在近处，视野要开阔，研究要具体，这是从事历史学任何一个分支学科研究者能够取得成绩的必由之路”。

对于这个问题，吴师的思考可谓由来已久。西方史学经兰克强调“如实记述”原则后，收集考订汇编史料在西欧各国蔚成风气。19世纪下半叶起，各类国别史、专门史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是兰克客观主义史学影响下的产物，也标志着史学在西方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专门研究将史学发展引向注重历史的局部和细节，虽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成绩，却易于使史家的眼光偏于窄狭。及至20世纪中叶，形态学派大师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指出，绝大部分西方的历史学家都在向研究细节的历史这一方加权，他们明于观木，而暗于观林，因而有必要把森林带回到人们视力的焦点中来。吴师高度评价了汤因比为西方史学发展所作的“再定向”。

然而，汤因比所称的“细节的历史”和“整体的历史”，即历史的局部和历史的全局，其两者间的关系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毕竟是一个不容易处理好的问题，对于初涉史林的学者来说尤其如此。吴师对“眼高手低”所作的新解，为人们寻求两者的平衡提供了宝贵见解。吴师十分强调治史者眼界要高远，特别是世界史，应当把研究重心置于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局问题中。他有一个颇为形象的说法，世界史要勾画的是“长卷的江山万里图”。在1982年应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之邀所作的学术报告中，又借滇池西山的石刻旧联改作新联，认为研究世界史要“置身须向极高处，放眼通观大世界”，



对广大世界的历史加以通观，进行全局的考察。但是吴师又指出，通观必须以对一个一个关键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为前提，不但自己要研究，还要熟悉别人专门研究的成果和著述，尽管他们不一定是从较为宽阔的广度来进行考察的。没有这个前提，通观就会流于模糊，就不会是一种比较透彻的、在大小轻重之间能够取舍得当的通观。这实际上就是吴师所说的“手低”。



武汉大学历史系“文革”后首届研究生毕业师生合影(1981)

吴师曾对研究生多次谈及“眼高手低”问题。他认为，研究生作论文，题目不宜过大，但眼界却不能偏窄，他借用兰克的一席话作诠释。兰克说，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两种品质，一是乐于进入其本身具有意义的具体事物，二是必须注意事物有普遍意义的一面。吴师认为，兰克所说的第一种品质在今天可以理解为治史者应具有“钉子”精神，能对具体课题进行深入钻研。第二种品质则要求人们不局限于就事论事，而能在比较宽广的背景下审视局部，看到局部与全局的内在联系，以全局在胸的姿态从事专题研究。受先



生教诲，从事 15 世纪、16 世纪世界史专业学习的弟子们，多能注意从这一时期世界历史重大转折的全局出发去选择课题，在所确定的专题中又注意辛勤搜集史料，反复推敲学术思路和写作大纲，确定论文的重点和难点，努力在历史研究中作出具有创新意义的成果。

语文是史学基础的基础

跟随吴师习史，语文基本功的锤炼是又一难以忘怀的收益，也可以说是治史者应当终身力行的修炼。这种体会不仅是吴门弟子的一致看法，也为国内史学界诸多学者所强调。美国史知名教授李剑鸣近年著有《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一书，深论研究历史必须注重的基本要领。在论及史学写作的文字功底时，该书特地将武汉大学唐长孺和吴于廑先生，与北师大的陈垣和北大的田余庆先生一起，称为中国近世史家的“写作高手”，如吴于廑先生晚年论文《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在最终展望 20 世纪世界经济格局后，以“略一涉及，以觐前景”八个字作结，构成一个“精妙的结尾”，“寥寥数语，确有余响不绝的意味”。在新著《隔岸观景》中，李剑鸣再度谈到吴先生极高的文字境界，即“用词准确考究，行文从容流畅，文风庄重典雅，叫人百读不厌”。

当年一位同窗学友听课休息时，得到准许，细细观看导师吴先生摆在讲台上的讲稿，不由得大为感叹，认为讲稿文字完全达到成书出版而无需修改的精致程度。据出版界有关人士介绍，吴先生应约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撰写长篇卷前专文《世界历史》，这篇两万余字的文章成稿后，负责此项编撰出版工作的胡乔木在审阅后的意见是：一字不改，照发。吴先生深厚的文化修养和精湛的文字功底，使从师的弟子们获益匪浅。弟子们深切感到，语文是史学基础的基础，在史学写作中应当反复推敲、斟酌、打磨、凝练行文文字，不断提高自己文字表达的意境和水平。研究历史需要多方面的学养，理论、史料积累和辨析、史学名著的阅读分析、史学动态与学术前沿的观察与思考、交叉学科的借鉴与融汇，然而毫无疑



问，语文是史学基础的基础。通俗点说，历史研究拼到最后，往往拼的是语文，文字功底的磨炼永无止境。

吴先生晚年多次谈到自己的求学经历，非常怀念自己幼年读私塾时候的发蒙老师。或许先生擅长诗词歌赋和书法，与这段经历打下的基础有着密切关联。作为国内世界史的著名学者，吴先生又善于将旧学、新学和留学获得的西学有机结合融通起来，从而奠定了深厚的语文功底和精湛的文字底蕴。眼下人们在开放大潮下容易出现中学欠缺、西学欠通的双重不足现象，从事世界史学习和研究的学人，尤其应当防止和克服这种现象在自己身上发生滋长。吴于廑等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身体力行所达成的学术基础修养，特别是语文和文字修养，为后学之人和史学同仁树立了非常值得学习的榜样。

作者系历史系 1978 级研究生校友



那一段温柔的旧时光

崔雯晴

前言：《那一段温柔的旧时光》本来只是一篇由吃衍生出来的怀念文章，哪知道斯人斯地斯物斯景竟点点滴滴涌上心头，不可抑制。

我曾经在一篇怀念母校的文章里说过，母校对于我的精神意义更甚于故乡。虽然常常觉得四年里，我的校园生活和很多同学比起来显得苍白贫瘠，当时只道是寻常，岁月回首，才知道其实很多东西早已融入血脉之中。

广州和武汉也不过千余公里，高铁4小时，飞机1小时有余。可是，总有一种“再也回不去了”的伤感。回不去的是时间，带不走的是流年。也只有在字里行间捡拾起时光的碎屑，给青春留下一笔注脚……



建设路的法国梧桐长得很粗壮。每天早上坐61路，下车必经这条并不宽阔的梧桐道进入成电。离开这条梧桐道，转瞬已逾十年。

工作的时候成电还没扩建新校区，我常常嫌弃它不用15分钟就可穿堂而过的校园，和武大比起来，实在太小了。只有校门外的法国梧桐，总是能勾起千里之外的思念。

武大从凌波池到樱花大道，或经梅园小操场到行政大楼，也是梧桐道。梧桐很高很大，春绿秋黄。记忆中最美的那幅画，是男孩



儿推着自行车和女孩儿施施然缓缓走过，梧桐叶落，影影绰绰。多年后，在成电万人宿舍外看见李欣骑车载着一长发飘飘白衣妹子缓缓擦肩而过时，蓦然心动。也不知后来她是否成为了他的妻？

去教五，多是走梅园小操场的梧桐道。和女伴三五成群，从樱花大道转情人坡侧路，进入梧桐道，再沿着银杏树小路去到教室。移步易景，目之所及，梧桐参天别有风骨。从湖滨去教五最是远了，却最适合邂逅，尤其是凌波池畔，四通八达交汇处，还有一棵歪脖子树，经年常在。可“邂逅”这样风花雪月的事，不是想就可以有的，来来往往的人潮里，就是没有“那一个”。等到秋风也老，再无偶遇，只剩必然。

“梧桐叶上三更雨，叶叶声声是别离。”秋天入校，夏天离去，是不愿听这离愁别绪？想起自己那时是如此匆匆离开，也许也是同样心境吧。其实，读书那会儿粗糙得很，倒是如今方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情。梧桐夜雨是美的。武大的路灯一向都是昏黄的，灯光透过密密的树叶渗出丝丝线条，若遇微雨，青绿与昏黄交错，靡靡如烟，梅园小操场白墙倒映树影，倒有些《桃花扇》里“月落烟浓路不真，小楼红处是东邻”之感了。

说到底，读书的时候，当时只道是寻常。十年一觉故园梦，及至重逢，纵然良辰美景，也已欲说还休……

二

面前放着三道菜，香煎糍粑鱼、泡菜苕粉肉丝、清炒白菜苔，还有一罐莲藕排骨汤。

糍粑鱼和泡菜苕粉肉丝是大学四年永远吃不腻的菜。离开学校后，这是第一次齐刷刷端上桌享用。

糍粑鱼太甜，苕粉肉丝加了豆瓣酱与辣椒，白菜苔老了，只有莲藕还是那段莲藕。陡然觉得，10年过去了，再不是当年的味道。有些落寞。也许，桂园的味道和湖滨不一样吧？可是，湖滨已经没有了小炒了。

读书的时候，泡菜苕粉肉丝3元就能吃到。常常和好友跑去湖



滨后面的旮旯小店点一份作为午餐，有时实在贪吃那恰到好处的酸，会跟老板娘说“麻烦给个4元的”，多一元，感觉多出好多分量来，有种沾了不少便宜的窃喜。其实，哪有老板娘吃亏的呢？

湖滨二楼的小炒，糍粑鱼是不错的。大三开始成了常客，一盘糍粑鱼吃得恨不得把葱姜蒜都刮干净，心里偶尔还计较好友多吃了一两块，就像从自个儿嘴里夺去好大一块肥肉似的，生生地肉疼。

吃小炒最开心的，是和阿俊一起。我只管吃，他只管说，滔滔不绝，没事儿就装成熟跟我胡侃些人生大道理。最神奇的一次，是他唾沫横飞地告诉我，男人身心可以割裂云云，对我进行男女思维方式大教育，我惊得生生地吞掉了一整块糍粑鱼。前些日子翻捡出来和阿俊、丽娜在梅园操场的三人照，煦暖的阳光照在笑脸上，时光如箭！

毕业后，再没吃到过这两道菜，它们仿佛再无瓜葛般地和我说了“再见”。它们在我口齿留香，继而升华到脑海，变成对武汉的思念，就仿佛校门外“绿洲酒家”的桂花米酒和生煎包。读书的时候，那里是我们的校外食堂，过早的佳处。其实，绿洲的桂花米酒汤圆常常是过于黏稠的，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稠得让人快乐的“腻味”。

纵然很甜很腻，却难以割舍。

三

大师兄说，武大早樱开了。风有信，这才2月底，竟要春意枝头闹了么？

和武大结缘是因为樱花。填报志愿时，宁宁哥说：“去武大吧，我同学是武汉的，说那里冬天有梅花，春天有樱花，还卖门票，美得很……”就这样，我从温润的成都来到燥热的武汉，开始了全新的人生。

樱花对所有武大学子来说，都是其校园记忆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每到三月中下旬，大家就开始呼朋唤友：“来看樱花吧！”这也是全武汉人的节日，到处可见“去武大看樱花”的海报广告。这两



年高铁开通后，影响更广，大学校园俨然成为旅游胜地。

“柳色青堪把，樱花雪未干。”樱花盛开的日子，整个樱花大道如云赛雪，再配上中西合璧、民国风十足的樱园建筑，恍如穿越。但我更爱夜雨下的樱花大道。

春夜微雨，白日喧嚣已远，撑一把伞缓缓行于樱花大道上，路灯泛黄，丝丝细雨在灯光下绵绵而下，生出氤氲之气。微雨昏黄下，一朵朵山樱重瓣或白或粉，素雅仙姿，不受红尘俗世干扰。白天的樱花是游人的背景，还有些任人粉饰、为他人作嫁的感觉；到了夜晚一片宁静时，它们才终于又回到自己的世界里，素静向灯下，享受温馨慵懒的时光。

樱花花期很短，及至小半月，一夜小楼听春雨，再见，已是一片碧绿涨气深，唯有香如故了。

读书的时候，学校很多校园歌手创作了不少和樱花有关的民谣。最有名的是彭挺的《樱花树下的家》——“半个月亮珞珈那面爬上来，又是一年三月樱花开，这一别将是三年还是五载，明年花开你已不再来。我真想这一辈子坐在樱花树下弹着我的破吉他，雪白的花瓣贴着脸颊飘落。美丽樱园我的家，梦中的樱花伴着珞珈的晚霞，你我曾在樱花树下渐渐长大？明天你将启航去海角天涯，别忘了她，咱们樱花树下的家……”

很怀念夜雨下樱花相伴踽踽独行的日子。

四

每年的平安夜总是会想起入学第一年的那个平安夜。

说起来，那是一个女生凄美的爱情挽歌，可现在回想起来，想爱就爱、爱我所爱，未必不是一种值得尊重的勇气。

如花美眷有情天。可若遇到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就有些心伤了。小孙姑娘看上了小周哥哥，喜欢得要死要活，喝多了酒鼓足勇气要求个结果，大晚上从湖滨狂追到樱花大道，情人坡抱着大树不肯走。小周哥哥怕小孙姑娘跳了东湖，把我和阿俊阴差阳错弄成了陪客，一路跟着，苦口婆心劝着，电影里看过的、书上写过的都成



了现实里活生生的戏码。

还记得小孙姑娘哭着就一句话：“我就是喜欢你！”那时，都没恋爱过，哪见过这阵势，寒风泠泠中，就希望她突然想通了放手。四个人就这么混乱着度过了一晚，凌波池边凌晨四点冻得瑟瑟发抖。好不容易挨到早上六点，小孙姑娘这酒也醒得差不多了，大家瑟瑟缩缩去绿洲过早，然后，一切算是结束。

其实，情愫这事哪儿是这样说结束就能结束的呢？大学四年，小孙姑娘一直都对小周哥哥极好，恋人做不成成了朋友，当年尴尬的平安夜怕是早已随风而逝了。这也是一种友情吧，舍不得、放不下，既然不可得换种方式也未必不可。

湖滨楼下的花坛边，曾经多少少年情侣深宵不忍话别；湖滨男女生宿舍铁栅栏两边，熄灯后还有难舍难分的人儿在你依我依，宿管阿姨也无能为力。读书时恰逢情窦初开，那会儿人也单纯很多，不去讲门当户对，不去讲有房有车，只是“看对眼”，就仿佛有了不顾一切的力量。

“是那处曾相见？相看俨然，早难道好处相逢无一言。”珞珈山，东湖水，樱顶月，梅园雪……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多年后归去，烂漫的梧桐叶倏忽间唤起少年时的梦，剪碎冬日满目晨光。曾经错过的银杏把片片金黄投射在古朴的老图上，说着只有行过千帆才能懂的淡然。在绚烂枫华下，转身，邂逅，听到十八岁那夜，心花怒放的声音，浅浅走过。

五

2008年，汶川地震。某日，收到一封电邮，竟是海钦。信很短，从英国来，询问地震有否影响到我，家人亲友是否无恙。激动感谢之余，速回信，竟云雁杳杳。及至再有音信，已是五年后。

和海钦认识，是通过大学一场演出，从此成为搭档。那时大学生艺术团刚成立不久，我们俩并不是艺术特长生，因参加校园器乐比赛“脱颖而出”，成为赛男老师的心头宝。

海钦是蒙古族人，血液里流着草原民族的因子，天真直率。我



喜欢听他弹钢琴，自带有一种激情，性情流露，不是“生演”。我们俩都是自小学琴，可我天生缺乏情绪，木讷得很。可自从和他搭档，渐渐练出些感觉来，音乐也有了些生气。

那时练琴并不容易，学校开放的钢琴房很少，为了演出排练甚至还要去到校外琴房。我们常去的地方是樱顶大学生俱乐部。一幢旧房，古朴简单。木结构的俱乐部练琴很有质感，琴音嘹亮。《新疆之春》《牧歌》是最常练习的曲子，背得滚瓜烂熟。音乐是有灵性的生命，你的每一个情绪波动都会随着指尖音符流淌，或婉转悠扬或如泣如诉。这样的樱顶时光温暖馨宁。

及至四校合并，艺术特长生也渐渐多起来，艺术团也日益成规模。每年的金秋艺术节越来越专业精彩。而我自己也慢慢把精力转移到了别的地方，成为了一名看客。

十年一别，钦哥儿已经海外归来在京城执业，我也早已跨过蜀道定居南国。偶尔拨弄琴弦，塞北江南值此一轮樱顶月。

作者系中文系 1999 级校友



珞珈山七年求学记

邓咏秋

我的本科生老师们

我是1993年从湖南考入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图书馆学专业的，我们本科班一共24人，此外还有一个约旦留学生，本科班的导师是研究分类法的张燕飞老师。第一门课是袁琳老师讲读者工作，没有教材。第一学期开的必修课中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黄宗忠老师的“图书馆学导论”，他的湖南娄底口音很重，虽然我是湖南人，仍然听着很费劲；不过只要上课注意力集中，我基本能听懂。其他人就不确定了，有一个广东同学张凌，经常因为听不懂黄老师的课来问我，我也因此有点小得意。

这门基础课开在第一学期，为我们宏观了解这个学科以及图书馆的功用打下了基础。当时，黄老师要求我们去阅读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的书，然后讨论并写出自己对做好图书馆工作的建议。那个时候，国家经济还不富裕，拨给图书馆等公共文化事业的经费有限，黄老师带领我们思考“有些公共图书馆办成了租书馆对不对”等问题。

在来武大之前，我对图书馆学专业一无所知。刚上学时还带着一些不甘心的情绪，觉得从图书馆学毕业后就是到图书馆工作，而图书馆是一个轻闲、缺少刺激、工资也不高的地方。但在武大学习的这七年，我不仅学习了专业知识，而且逐渐培养起了对专业的热爱。我了解了这个学科的历史，知道了韦棣华和学院的前身（文华



图专)；尤其是当我们了解到自己所学学科在全国位居数一数二的地位时，心中充满了自豪。

本科四年，有幸亲炙师教的还有：彭斐章、谢灼华王秀兰夫妇、马费成、俞立英黄葵夫妇、曹之、詹德优、邱均平、刘家真、陈传夫、王新才等诸位先生。谢灼华老师讲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是必修课，他总是笑眯眯的，他的广东客家话不是一般地难懂，这次轮到广东同学张凌得意了；王秀兰老师的西文工具书讲得很好，鼓励我们大学期间翻译专业的书评；曹之老师教我们古代汉语、古籍编目；詹德优老师讲中文工具书等。地方文献课有实践内容，我们还在樱园顶上的老图书馆查过家谱与地方志。老师们都平易近谦和，特别是当你表现出好学的时候，他们非常愿意帮助你。就是在这些可爱可敬可亲的先生们的影响下，我逐渐爱上自己的专业，开始了潜心学习。在这所美丽的校园中，在师长们与同学们的相互影响下，我在大学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个性塑造。

在上武大之前，我不太自信，也不太会与人交往。在大学里，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室友们：黄岚、王传燕、张馨、林芳、王红梅（她是档案专业的，后来转到我们寝室）。我们住在桂园二舍，每屋六人。在与她们朝夕相处间，我学会了多欣赏别人的长处，多想别人的好，学会了乐于助人。

本科期间我喜欢去图书馆，大四时还在武大图书馆实习过，编目部给我印象最深，当时是一位女主任带我们，每当我们对新书给完分类号，她都检查并给我们总结。虽然后来我没做过图书馆业务，但分类编目这些图书馆学核心知识对我以后的工作很有帮助，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对知识进行组织（含分类等）。

在大学四年级时，我以年级第三名的成绩保送研究生，当时保送名额很少，全院五个班一共保送了五名学生。我们班保送了两名，还有一位是我的室友林芳，研究生期间我们住在枫园。

王余光老师给我们上课是在大学三年级时，讲中国历史文献学。王老师讲课相当精彩，既有丰富的知识又很有趣（套用后来一个图书馆员听了王老师讲座后的评语——这位老师不是在讲课，是在说书），听得过瘾，讲《尚书》《诗经》《史记》《汉书》，大约讲到



“前四史”的最后一部《三国志》，这学期就结束了。受这门课影响，我去找了《史记》《诗经》等来阅读。

王老师的课是大学期间少数不用点名也能保证出勤率的，但王老师给我们本科生的感觉并不亲切，反而是比较严肃，加上他学问大，我们都有仰之弥高的感觉，不敢在课间跟他交谈，担心暴露自己的无知。后来有机会保送研究生了，很想拜他为师，但是我很没自信，下了很大决心才鼓起勇气跟他说：“王老师，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想写您的（请您当导师）。”没想到，他居然答应了。然后就问我是哪人。得知我是湖南人后，他眼睛一亮，给了我一个题目：“最近你们湖南长沙走马楼考古发现了竹简，你就把这些考古发现的简牍研究写一下吧。”于是，我的本科论文就写简牍形制了。

枫园三年——记研究生阶段的师长们

那时研究生都住在枫园，我于是从桂园搬到了枫园，开始了三年的研究生生涯。王余光老师带的研究生方向有两个：民国出版业研究与文献学，我的研究方向是民国出版业研究。

因为保送了研究生，省了复习考研的时间，我从大四时就开始帮导师做一些基础性的科研工作。从大四至研究生一年级，我在王老师的指导下编了一个“20世纪中国出版业论文索引”。王老师说做学问要从抄卡片、做索引这类基础工作开始，于是我用陈光祚老师教的计算机数据库知识，把这些东西做成一个小数据库，后来导出编成一个 Word 版的索引，我独立署为编者，这个索引收录在王老师《中国新图书出版业初探》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后作为附录。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我多次往返武汉大学出版社（当时的出版社与我们学院在同一栋楼里），与责任编辑严红有很多的来往，跟她学习编辑校对知识，开始接触出版实践。这对我自己后来投身出版社工作很有帮助。

读研究生时一个主要的收获是，导师带我们认识了他的很多朋友，经常在一起喝茶清谈或组饭局，因此得以在一种更轻松的环境下跟更多的老师一起学习。我们跟导师和其他师长交流特别多，类



似于古代师父带徒弟。



导师和学生，摄于武汉大学。后排（左起）：刘洪权（现安徽大学教授），王余光老师，吴永贵（现武汉大学教授）及女儿，汪涛（现朝华出版社社长）；前排（左起）：陈幼华（现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和我

比如王三山老师，虽然没教过我，但是在饭局上经常相见，他笑起来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他精于传统文化，善书法篆刻，还给我起了个雅号“邓蝉”，其实是想形容我的话太多。三山师有很多妙语，其中一句是“师可忍，叔不可忍”，意思是，我们这些学生与师长们交游时，有些言行举止不妥，导师还没批评，师叔们已经忍不住要替师父教育我们了。

黄鹏师兄当时是武大图书馆馆长助理（后来升为副馆长），他专心学问，出了很多成果。饭桌上他的话很少，但总是冷不丁突然冒出一个“冷笑话”，人送外号“地雷”。

王新才老师当时还不是武大图书馆馆长，是系里的老师，给我们本科生上过目录学课，经常能大段背诵目录学的古文。新才老师属于神童级才子，16岁就上了武大，20岁本科毕业读硕士，他也



是中国培养的第一届图书情报专业的博士(1991级,与柯平老师等同级,导师为彭斐章先生)。他给自己起了个笔名“王心裁”,写《梁启超读书生涯》署的就是这个名字,还给我们赠送了签名本。新才老师博闻强记,思维敏捷,是饭桌上的活跃分子,总能找到很多可调侃的段子,且常有典故。

王子舟老师当时还在武大读博士,完成了《陈寅恪读书生涯》一书,正在写他的博士论文《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师友们关心他,每有饭局总叫上他,希望改善一下他的艰苦生活。子舟老师呢,写陈寅恪书时,言必谈陈寅恪;写杜定友时,又言必谈杜定友。记得一次在枫园聚会中,动筷之前,他谈得滔滔不绝,三山师急得敲着筷子说:“科举制度害死人!”我们大笑,终于可以开吃了。

子舟老师的博士论文答辩非常精彩,我们这些硕士生都去旁听学习了。听完后我写了一篇日记,后来写成《一次精彩的论文答辩》一文,不知天高地厚地投给核心期刊《大学图书馆学报》,居然发表了。主编王波还打来电话约稿,希望多有一些这种对博士论文答辩的生动记录。交谈中得知,他也是武大毕业的学长。

研究生阶段的阅读主要是研究驱动,即带着研究目的去阅读。因为做民国出版史的研究,我读了很多竖排繁体字的资料,如张静庐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王云五的《岫庐八十自述》《岫庐最后十年自述》等。图书馆是我们常去的地方,系里资料室也有很多专业书。那时买书主要是逛实体书店,导师和他的朋友们经常一起逛书店,有时也带着我们。他们顺手拿起一本好书点评几句,我们就可能买回来读,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就是那时买回来读的。

1997—2000年研究生期间,除了做民国出版业的研究(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以外,我们在导师带领下,很早就开始做起了阅读推广的工作,虽然当时还不太有“阅读推广”的提法。早在1993年,王余光、徐雁二位先生主编的《中国读书大辞典》,就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在当时读书风气低迷、倡导读书受到冲击与质疑的环境下,这本书犹如一股清流,得到了季羨林等老先生的鼓励。从那以后,王余光老师立



志：“我将终生致力于鼓舞人们读书的热情。”若干年后，他发起成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这是后话。

在《中国读书大辞典》之后，他又主持编写了《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塑造中华文明的200本书》《名人读书生涯》等书（丛书）。等我跟他学习时，他指导我们对20世纪以来的学者、机构推荐书目进行统计，排出中外名著排行榜，我参与编写出版了《中国读者理想藏书》（光明日报出版社）、《名著的选择》（云南人民出版社）等。从目录学（推荐书目）到阅读推广工作，这中间是有关联的。可以说，我后来能投身阅读推广事业，也是缘于武大研究生阶段奠定的基础，我对名著版本的关注也是起于这一时期。



硕士学位答辩后，与答辩老师合影。左起：徐丽芳（答辩秘书）、方卿、陈传夫、邓咏秋、彭斐章（答辩主席）、谢灼华、詹德优，王余光

结 语

后来王余光老师回他的母校北大教书，我考入北大继续跟着老师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工作至今，这都是后



话了。虽然我最后在北京安了家，但一直视武大、武汉为第二故乡。珞珈山七年塑造了现在的我，我在那里度过了最青春的年华，在学业、性格养成和做人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收获。我特别感谢在武大遇到的这些师长（恕不能一一提及），也许仅仅是因为我努力好学，老师们就给了我很多鼓励，学校也给了我很多机会（比如获奖、保研等），让我自由发展、快速成长，发挥出自己的潜力，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作者系图书情报学院图书馆学专业 1993 级校友



小滢的两封家书

郭玉瑛

编者按：标题中的“小滢”即陈小滢，是现代著名学者、作家陈西滢凌叔华夫妇的独生女儿，20世纪30年代初生于武汉，少年时先后在武汉、乐山、北京读小学，后又回到抗战时期位于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附属中学读书。1946年她到英国，在伦敦大学和马德里大学学习中、英、西班牙、法、俄联合国通用的五国语言文字后，转入香港美联社工作和香港的BBC工作，以后又考入伦敦BBC国际部工作13年，先后担任记者、播音员等，获得永久职位。1980年到1983年期间，她在北京大学教授英语，现任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理事，苏格兰中国友好协会公共关系主任。

抗战时期，我家随在武汉大学机械系任主任的父亲郭霖迁往四川乐山，在那里度过了我的少年时代。1941年小学毕业，我考取了乐嘉中学(后改名为武大附中)，在中学我结识了同班同学杨衍枝，她是乐山唯一一所仁济医院院长之女。她长得眉目清秀，性格内向，举止文雅，擅长书法。那时的我也性格内向，胆小腼腆，不苟言笑只知读书。相似的性格使我们两个人很快成了好朋友。

1942年，班上来了一位新同学，叫陈小滢，她是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陈西滢)之女。她聪明伶俐，天性活泼，耿直豪爽，性格外向，颇有些男孩子气。她胆子特大，敢攀高上树，爬吊绳，落地时双手磨破了皮，鲜血直流也不在乎。她的个性虽然与我和衍枝截然不同，但是我们居然一见如故，坦诚相交，每天上学都是结伴而行，畅谈个人理想抱负，议论战争，谈论形势，关心国家的存



亡，很快就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武大是一所学术气息很浓的学府，从1937年开始，周恩来、陈独秀、郭沫若等人曾先后来武大演讲，传播进步思想。武大附中的历史老师上课时，结合国内形势，分析战争情况及当前中国危机给学生灌输爱国主义的思想，激发我们的爱国热忱。生活在这样一种进步思想氛围中，小小年纪的我们也产生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抗击日寇的强烈愿望。

当时小滢家订了很多报纸，其中有一份《新华日报》，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共产党解放区的一些情况，都感觉到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我们三人憧憬着有一个民主进步的新社会来替代国民党统治的社会。那时我们最敬佩《水浒》中的绿林好汉，无事时常在一起背诵一百单八将的名字及绰号，还各自选择了一个与自己性格相似、自己所崇拜的好汉名字作为自己的外号。小滢性急自称“霹雳火秦明”，我则因做事动作鲁莽，选择了“黑旋风李逵”。这还不算，看了《三国演义》后我们又想当英雄，学桃园三结义结拜成乐山三姐妹。三人中我长得比她们两人高，被称为刘备，衍枝是关公，小滢年龄最小，只能当张飞了。说心里话，我们并非想当什么英雄好汉，只是借古讽今，对国民党不积极抗日宣泄怒气而已。

由于志趣相同，我们课后经常一同去武大校园看壁报和进步刊物。主办者与地下党有联系，有时也如实报道《新华日报》的内容，刊载一些来自沦陷区流亡学生思念家乡和充满对日本侵略者仇恨要求抗日的文章。这些报刊使我们认清了腐败的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险恶用心，更加激发了我们的爱国热情，树立起了牺牲自己、保卫国家的远大理想。

乐山当年是处于四川西部的一个偏僻小县，靠近西康。刚到四川时，生活还算稳定。1939年8月18日，日本侵略者出动了36架轰炸机，飞临乐山上空，投下了大量炸弹和燃烧弹，小城顷刻之间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三分之二的街区被夷为平地，约两万人在熊熊大火中丧生，惨不忍睹。短暂安定的生活被日寇的轰炸毁灭。

从此，武大师生的日子每况愈下，学生靠贷学金生活，经常以酱油加水当菜下饭，大学教授的生活也十分拮据。物价飞涨，有时竟然



百倍增长。当时武大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中文系教授苏雪林，曾将自己准备养老用的积蓄两根金条捐献给国家作为抗日之用，由于物价飞涨，生活极端贫困，她只得靠自己种菜维持生活。

我的父亲胸怀满腔爱国之心，捐出积蓄的 1000 银元，并夜以继日地设计水雷快艇以抵抗日寇的水上侵犯，但未被国民党采用。为了减少作战时前方战士的伤亡，他还亲自设计了钢盔和防毒面具，在校办工厂生产制造，供前方将士使用。由于生活贫困，积劳成疾无钱医治，父亲于 1942 年 2 月英年早逝。

武大历史系主任教授、同班同学吴令华的父亲吴其昌伯伯，在“九一八”事变后，为要求政府出兵抗击日寇而到南京政府绝食请愿。他在武大期间，一直坚持把授课科研与宣传抗日结合起来，宣讲撰文以爱国主义教育学生，为宣传抗日写了百余篇论文。后来，吴伯伯终因生活贫困，劳累过度无钱医治，在我父亲去世两年后，也被疾病夺去了生命。我们看到吴令华为父亲穿戴孝衣非常难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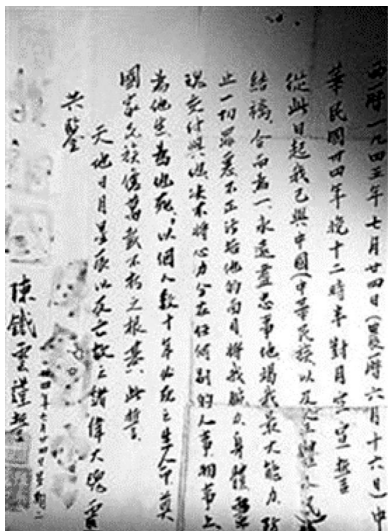
不久，日寇大举进攻四川周边省市，广西、湖南、贵州等省的大城市相继失守，四川处在日军包围之中，国家危在旦夕。凡有一分爱国之心的人，都不能容忍日寇欺侮我中华民族，都不甘当亡国奴。这时报上刊载动员青年学生参加青年志愿军的号召，提出招收十万知识青年入伍，组织青年远征军，抗击日寇，保卫中华民族。街上贴出大标语：“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我们的血沸腾了。



三个写血书立志从军的少年好友，左起杨衍枝、郭玉瑛、陈小滢



1944年12月1日，年仅14岁的我、小滢与衍枝破指写下血书，弃学报名从军，终因年龄太小未被批准。小滢难过极了，彻夜未眠，在灯下读《正气歌》。她干姐杨静远（杨端六与袁昌英之女）看了心疼地说：小滢这孩子简直把心完全献给了国家。



小滢的血书

小滢激动之余，还给这时被国家派往英国帮助宣传中国抗战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小滢的信于1945年1月才寄达英国，陈源教授读后十分激动，为女儿的爱国行动自豪。他当即将此信交给在英国出版的《中华周报》的编辑看，编辑看后颇为激动，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国家有如此杰出的青年，绝不会灭亡。”当即决定将此信加编者按刊登在报上，原报摘录如下：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十八日，一封十四岁女孩子的信。

编者按：陈源教授十四岁女公子从乐山来信给她爹爹，要求从军。编者捧读再三，实在爱不忍释，我们中国将来必然有灿烂的前途，因为有这样爱国的女孩子。我们中国的教育不曾



失败。编者征得陈源教授的同意，发表原信，一字不改，以飨读者。想我们每一个留英同胞读后，都将感到惭愧和奋勉。下面是陈小滢小姐的信。

最亲爱的爹爹：

这几天你和姆妈都没有来信，你可以想得到我的不安与焦虑的。本月一日，我和玉瑛、衍枝都报名从军了。我想你一定很惊骇的。但是我们为了多种理由终于决定从军，一方面敌人已经攻至六寨，昨天听说已到独山，我们的军队步步退却没有一点力量反抗，国家的危亡就在旦夕之间。我觉得时至今日，只要有血有肉的人，都不能忍受下去，都要与敌人去拼。国家给予我生命，培育了我。我要把生命还给国家。将血肉之躯供置在祭坛上，以生命的代价争取国家的生存。虽然多我一个人不会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相信国家亡了，战争失败了，我的学习及事业都会完全废了。何况上前线并不一定死，即使是死了也是光荣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受不了、看不惯这些后方官吏们的淫靡生活，这无耻及黑暗的社会，若是这样下去，我会疯狂毁灭。他们那些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是什么东西呀！

但是，我痛苦的是想到你们，若是我死了你们会是多么的悲痛，我不敢设想。虽然我用“忠孝不能两全”来安慰自己，但是她不能安慰我的心。我想到陈家除了我，只有贻春（堂弟）一人，我去了，陈家又少了一个后代。

前夜我一夜未睡着，干妈等劝我说：“犯不着从军，长大后致力于更大的事业，对国家的贡献更大……（以下报纸残缺）

今天来看，在那个战火纷飞的艰难时刻，我们国家有这样多的人发誓与侵略者抗战到底，中国能亡国吗？

果然时隔一年，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是最令人难忘也最令人高兴的一天，日本宣布投降了。乐山全城沸腾，鞭炮声大作，人们举着火把自发游行。武大和武大附中的学生游行队伍，绕着乐



山走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子夜才散去。我们苦苦盼望的胜利终于来到，中国人民终于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站起来了，这时的小滢，又怀着激动的心情给她的父亲写了第二封信，信中写道：

最亲爱的爹爹：

我在极度大兴奋中写这封信给你，今日晚上听广播中称，日本投降！晚饭后八时许，忽听山下缪恩钊家大嚷，日本投降了！我听了狂极跳了出去和缪家的一个女孩拥抱起来。我和同学克强、永直一起跑下山，疯狂地跳着、喊着，我一只皮鞋底掉了一半。我买了炮（爆）竹，一路点一路奔跑耍舞，人火混在一起都分不清楚了，我们一直跑到公园门口又碰到一些男孩子，遂点着火把高呼口号，我们都疯狂了。后来我们又跟着一批大学生一起跑，一直跑到半边街，大喊“中华民族万岁”“祖国万岁”等等。后来永直头发全起了火，头发烧光衬衣烧烂。我和永直及方家的一个孩子站在路边高跳喊着“抗战军人万岁”。走回家中冷静下来，想到一些死亡了的受伤了的军民，遂很严肃地起誓我要将身体献给国家。我是真高兴又难过，真的我要疯了，写不下去了。深夜近安！

女小滢上 卅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又：现在深夜三时，我独自徘徊在满乱坟的山上，我大哭。彷徨看到无数的同胞在空中向我呼怨，向我求救。爹爹，我哭了，当时我又立誓“一定报仇！”。今夜我不睡了，我要等到黎明，看那九年来第一次光明的日出。

抗战胜利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们三人天各一方，我大学毕业报名参军，终于圆了少年时的从军梦。小滢到英国以后很长时间音信皆无。衍枝继续了父亲的医学事业，在北京从事医务工作。岁月如梭，今天我再捧读这两封经历了一个甲子漫长岁月、发自当年少年小滢肺腑之言动人的从军留影信，不禁感慨万千。

在我们分别半个世纪后的 1996 年 3 月，小滢自北京专程来武



汉看我。2000年10月，我又专程去北京看望小滢和衍枝，我们畅叙往事，圆了离别半个世纪以来的相聚之梦，我们都深切地体会到，由抗日爱国共同理想建立起来的友谊是值得终身珍惜的。

原标题为《小滢同学抗战时期的两封家书》，选自陈小滢《散落的珍珠：小滢的纪念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2018年11月5日



师恩师德 山高水长

——纪念唐明邦先生

黄 钊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著名教授唐明邦先生离开我们一周年了，一年来，先生的音容笑貌时时在眼前浮现，他的高风亮节更是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永志不忘。我曾于 1961—1966 年求学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当时唐先生已是哲学系的讲师，他虽未亲自给我们年级授课，但他平时撰文发论、纵谈中国哲学智慧、论述易道中的微言大义，早给我辈许多启发与教诲，让我们受益良多，因而我一直尊他为老师，从内心敬仰他，并自觉地对他尽弟子之礼。

1987 年秋，我自湖南湘潭大学调入母校武汉大学后，有幸与先生同居珞珈山麓。我们两人由于学术上的研究兴趣与爱好十分相近（他研究中国哲学史，我研究中国德育思想史；他立志深探易学，我曾爱好道家学术），因而数十年来交往十分频繁。回忆我们相处的日子，彼此知根知底，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合作得相当愉快。唐先生德高望重，为人真诚厚道，谦虚淳朴，潜心学术，爱岗敬业，关爱后学，笔耕不止，著作等身，桃李遍天下，深受学界同仁拥戴。我从内心无比钦敬他，既把他尊为恩师，亦将他看做挚友，协力同心，真诚地切磋学术。

回忆在武大生活的日子，我俩曾多次结伴赴外地参加海内外相关学术会议，例如，曾结伴赴河南安阳、洛阳两地参加易学研讨会；曾携手赴北京和山东曲阜参加纪念孔子诞辰 2550 周年国际儒学会议；曾结伴赴台湾参加海峡两岸道教学术研讨会；还曾结伴赴湖北襄阳及河南鹿邑参加全国道家学术研讨会，等等。在这些学术



会议上，我们既各自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又相互切磋若干疑难问题，使我受教良多，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先生对后学的提携与关爱，如同春风化雨，润泽心田。对于这一点，我自己感受犹深。



1999年10月中旬与唐明邦先生参加纪念
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会议时合影

1990年，我主编的《道家思想史纲》书稿杀青后，曾邀请萧蓬父和唐明邦两位先生分别为该书撰序、题辞。两位先生均热情应邀，且以大方之家的手笔，赐以文稿。唐先生在《题辞》中开章明义地写道：“源远流长的道家思想文化，数千年来一直与居于‘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文化相互对立、相互补充，共同汇成中华思想文化之主流。道家思想以其旷达玄远、气势清高，素为世人所钟爱。黄钊同志主编的《道家思想史纲》，对此作了多向度、多层次的透视，集中反映了近年来道家思想研究的新成果。”开题之后，



先生在文中从道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发展演变过程、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现实价值等四个层面，阐明了他对拙作《道家思想史纲》的读后感，字里行间表达了老师对后学的支持与抬爱，令人特别感动。

2006年3月，拙作《儒家德育学说论纲》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拿到新书后，亲自登门捧送到先生家，请求指教。先生甚为高兴，给予了许多鼓励与赞扬，并在一段时间后，撰成一篇题为《一部系统论述儒家德育学说的新著》的书评文章，于当年11月18日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指出：“《儒纲》作者多年潜心研究中外伦理道德学说，厚积薄发，久磨弥光。全书视野广阔，立论新颖，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浓郁的现实感。其对儒家德育学说的评判，持论平实，判断公允，予人启迪良多。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儒家德育学说的专著，《儒纲》的出版，具有填空补白的意义。”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我深知拙著之质量与水平，距先生的赞美还有很大差距，便暗暗勉励自己，一定要将先生的赞美之语，作为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在学术上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脚踏实地，奋力拼搏，努力沿着先生指明的方向前进。

由于先生的信任，我和肖汉明、罗炽等同志曾被邀参与由先生主编的《周易评注》一书的撰稿工作。按照写作分工，我承担了《经上》“屯”“蒙”等二十四卦之评注及“易学名词概念简释”的初稿撰写任务。该书在中华书局出版后，曾先后两次再版，在易学界享有盛誉。需要说明的是，每次再版修订时，先生都邀我参与其中。我撰写的“易学名词概念简释”章，正是在修订中逐步加以完善的，对此，先生给予了高度肯定，他在赠送给我的第三版《周易评注》新书中的空白页上这样写道：“黄钊同志：这本书是我们团结合作的产物，值得永恒珍视，我当特别感谢你的支持。唐明邦二〇〇九年八月八日。”

以上几例，从不同侧面回忆了我与唐明邦先生的师生情谊。正是由于从内心对唐先生的真诚敬仰，2015年在先生喜迎90大寿之际，我曾作《贺唐明邦老先生九十华诞》拙诗为之庆贺，诗曰：



唐师华诞九十春，难忘春风化雨情。
说儒论道开愚意，释经解典启后生。
领衔执笔注《周易》，携手赴台考“三清”。
仁者德高天赐福，恭作百岁长寿星。

与此同时，我还作嵌名联一副，并用毛笔、宣纸写成条幅赠给先生，楹联曰：

明师执教杏坛培桃育李德风璀璨耀华夏
邦国寄寓胸怀探儒究道学识渊深泽环宇

先生收到楹联后，甚为高兴，特将之裱好挂在书房中。

由于我和先生之师生情谊深厚，在我于 2013 年幸逢 75 岁生日时，先生亦作《黄钊同志七十五华诞志贺》之诗赠我，诗曰：

评注《周易》多创见，通论老庄善钩玄。
彰显儒学献巨著，深研孔圣率群贤。
博古通今宣大道，敬德修业重承传。
闲吟古诗抒雅兴，淡泊明志乐翩翩。

在这首诗中，先生给予了许多赞美之语，我感到受之有愧。在无比感激先生的真挚盛情时，我决心将其鼓励牢记在心，努力鞭策自己敬德修业，以回报先生的关切爱护之情。

以上拉拉杂杂阐述了我对唐明邦先生的真诚敬意。古谚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值此唐明邦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将心中的千言万语，凝成十六字短句，曰：“珞珈苍苍，东湖泱泱，师恩师德，山高水长。”以表达笔者此时此刻对先生的怀念之情。安息吧，先生！您的英名必将千古常在，永垂不朽！

作者系哲学系 1961 级校友



那些年在珞珈山看电影听讲座

珈 言

20 世纪 80 年代在梅操看电影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珞珈山求学的我们，最好或者说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周末看电影、开舞会，舞会经常在地上满是油腻的食堂举行，当然还有更小型、更即兴的——就在宿舍的走廊或露台；电影则在我们那时的精神家园——梅园小操场观看。

瓜子：女生看电影时的标配

看电影时，女生必不可少的标配除了那张四四方方的小板凳就是瓜子了：小板凳是进校报到时学校统一配发的，四年中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坐着它在梅操看电影（当然，还有无数次拎着它穿越整个武汉测绘学院、远征华中师范大学看电影的经历。那时的全国高校电影巡展大多在华师进行，会持续好些天，放映的基本上都是由世界名著改编的电影，如由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改编的电影《苔丝》、根据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等）；花一两角钱菜票就可以从守候在宿舍楼门口的老太太手中换购到一包包大小不等的葵花子；在宿舍楼没来得及买瓜子也没有关系，那些躬着小小身子、在看电影的我们中穿梭往来的少年小贩们，是绝对不会让同学们失望的。

银幕上在演绎着古今中外他人的各式花样人生，梅操上的我们则是一边与瓜子“死嗑”，一边对演员们的演技小声品头论足着；



观影后披星戴月走在寂静校园的我们，继续的话题仍然是电影中的角色和情节；甚至回到寝室还要在床上为之卧谈、讨论到深夜。我们寝室的L同学对电影中的角色有着超乎常人的记忆力，每看完一部电影，只要是电影中出现过的人物，无论角色大小，她都能记得清清楚楚——电影演员的本名及饰演的角色等，这让我们寝室对电影的讨论甚至争论变得格外热闹和激烈。每看完一部电影，大家都会将整部电影再集体回忆一遍，持不同意见时还会争得面红耳赤……

电影散场后，地上常常被铺上了一层密密实实的瓜子壳。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只快乐的小仓鼠，利用看电影这几个小时的空闲，集体无意识地、无所顾忌地享受着物质和精神上的饕餮大餐。这也是我们在最美校园度过的最美时光的一个最好缩影，我们对露天电影那盛大、热闹的场面有着深切的欢喜与热爱：从梅操中心延续到山坡上那黑压压的观影人群，是一种特别壮观的美丽景象。

那时的电影常常一放就是两场（现在仍然如此，我有时周五下班后去梅操转悠，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个传统节目还在继续，只是看电影的只有站在操场中央的极少数人，再没有那时蔚为大观的壮丽场景了），一般是一场国内一场国外，5分钱一枚的电影票，有时两枚、有时得四枚，可能是根据电影的好看指数及能拿到胶片的难易程度决定吧。

风雨无阻的观影

一到周末，我们一般都会风雨无阻地守候在梅操等着电影开始。即使大雨倾盆，也会毫不犹豫地坚持到底。电影开映前也许看不到多少身影，只要银幕一亮，人们就会从看不见的四面八方汇聚过来，如雨后春笋般连成一片，操场上马上就是黑压压的人和雨伞了。“小碉堡”（放映室）射出的那束强光就是我们心中希望的升起，就是电影开始的召集令。



有时因为雨太大，我们只能在人群和雨伞的缝隙中看银幕上影影绰绰的身影，但即使是听电影，即使全身湿透了，大家也会在风雨交加中坚持把电影“听”完。有时大雨过后，梅操的积水都能没过脚面，即使这样，也少有中途退场者。其实，珞珈山的雨是很有灵性的，基本上不怎么为难我们，真正顶着大雨观影的机会并不多；更多的是在电影放映前大雨如注，等电影真正开始时雨就小多了，有时甚至停止了。雨应该也知道，看电影是那个年代我们最好的放松和娱乐休闲方式了。于是，在梅操端坐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带着雨水的湿气及享受完精神大餐后的精气神，回到寝室继续着心中的电影了。

梅操的现场教学

那时的老师们也是和我们一起看电影的，中文系很多老师在看电影时都能在梅操碰到，他们总坐在相对固定的位置、於可训老师一家四口的出现格外引人注目，大家当时都以为他那年龄相差不多的两个女儿是双胞胎；他们一到场，总能引起小小的骚动，不少人还会站起来看个究竟。我听到的有关电影美学最生动、最有现场感的一课，就是在看电影时，由当时教我们“电影文学与电影艺术”



课程的曹永慈老师现场讲授的。那晚看的电影是《盗名窃玉》《逃往雅典娜》，我正好坐在曹老师旁边，趁机向他请教如何欣赏电影等问题。曹老师非常热心，也非常耐心，只要电影画面中出现不一样的拍摄手法，如转移镜头、长短镜头、出画入画、切入切出、定格等，都一一详细讲解，让我对电影艺术有了深入到技术层面的、更进一步的了解和理解。

曹老师上的这堂宝贵的现场教学课，让我对电影有了极大的兴趣，之后还写了一些影评在《长江日报》发表，尽管那时每篇影评的稿费只有七八元，对于一个月只花费十几元生活费的我已是非常不错的额外福利了。当时班上 H 同学的一篇小说发表后得到 136 元稿费，一下就成了同学中的富翁。由于中文系学生在《长江日报》《武汉晚报》发表的作品相对多一些，《武汉晚报》副刊编辑还来到同学们中间，要与我们共同建设报纸副刊。

胶片永远在路上

一次，武汉军区搞军民共建活动，为庆祝教师节，来学校为大家放映电影《第一滴血》（由特德·科特切夫执导，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理查德·克里纳、布莱恩·丹内利、大卫·卡罗素等联合主演的动作片，1982 年 10 月 22 日在美国上映），大家非常兴奋和期待，早早地就搬了小板凳到梅操占领有利地形。尽管胶片一开始就比预定的时间晚了十几分钟，放完一卷后又等待了一个多小时才继续观影，大家却异常耐心和安静，没有抱怨，没有中途退场，也没有在此种场合经常会出现的喝倒彩和口哨声；大家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守候着下一卷胶片的到来：大概一是为了尊重放映单位，二是因为电影确实好看。

另一次看电影《马可·波罗》（三四集），说好 7:40 开始的，结果 8:40 胶片才来，放映后中间又是断断续续的。那时可能是电影胶片发行数量有限，一部电影的同一部胶片总在几个地方同时放映，每次放电影时就会准备一辆专门用来跑片的车辆：去某处拿胶片或将放映完的胶片送往另一放映点。观赏一部由多盘胶片组成的电影，很可能看完了这一盘那一盘却还在别处或前来的路上，大家



就得在梅操候着，一部一个多小时的电影也许得花两三个小时才能看完整。因为已经看过《马可·波罗》一、二集了，大家就坚持等着要看完三、四集。可久盼之后，等来了胶片却没有等来预想的观影惊喜，大家普遍认为三、四集比一、二集拍得差多了——也许是都等困了、等累了吧。

这就是那时候的“串片”，电影在放映过程中得排队等候着一卷一卷胶片从远处抢送过来。

.....

一起看电影的同学、与同学一起看过的电影，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中端坐在小板凳上观影的年轻的我们，就是现在的我每次走过梅操时脑海中涌现的青春记忆，它们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渐清晰和美好。

那些年在珞珈山听过的讲座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珞珈山求学的我们，对知识、对新生事物有着强烈的渴望与热情，仿佛少听一场讲座就少了一次与大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就少了一次成长的可能，就追不上他人前行的脚步了；只要看到食堂门口张贴的、认为对自己有帮助的讲座预告，就会趋之若鹜，就会整个人处于兴奋之中，并且马上付诸行动。伴随着听过的讲座涌来的记忆，就是为听讲座抢占座位及因抢占座位而跑过的路、吵过的架。

大家感兴趣的热门讲座大多会安排在学校容量最大的教室——教三楼的 001，那时还没有听讲座专用的报告厅、图书馆大厅之类。

“我上午就将本子放在这个座位上了，这是我占的位子。”

“我先来的，我一点半就来了，根本没看到什么本子！”

“肯定是你把我的本子丢了！”

.....

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随着争执的加剧，火药味也变得越吵越浓。每次争吵的结果基本上是：哪边人多哪边就会最终获胜，大家



也不分谁是谁非。这是那时讲座开始前最常见的一幕。

为了那些可遇不可求的讲座(尽管晚上七点才开讲),我们会午觉都不睡就拿着书本去占座位,有时甚至上午就去了;晚饭时室友还得轮流值守在那;座位争抢到白热化时,一些平时被大家公认为优雅淑女范的女同学也早就放下身段,会为争抢一个座位完全不顾形象地一屁股坐在桌子上,以此姿态驱赶座位上的男同学;男同学此时也早就没有了怜香惜玉的绅士风度,照样岿然不动如泰山般稳坐着,你怎么激将、嘲笑、讽刺他都行,就是不挪位子。开讲前的景象经常是热闹得一塌糊涂,像极了你来我往、人头攒动的集贸市场。教室的走廊、过道上都挤满了人,窗户上也挂满、吊满了人,用“水泄不通”来形容绝不过分。

有时讲座明明预告在教三楼001教室,等我们占好座位、守候在那时,却说临时改在樱顶的大学生俱乐部了,于是学校就出现了一股强大的从教三楼穿过鲲鹏广场,拼命奔向樱顶学生俱乐部的乌压压的人流,与现在热播的综艺节目《奔跑吧兄弟》中的某些场景极其相似;等我们大汗淋漓地冲到学生俱乐部时,又说改回教三楼001教室了。听讲座于我们,不仅拼的是对知识的热情和渴望,更需要拼的是体力和耐力。有时为了听一场心仪的讲座,我们得在校园戮力狂奔数趟,更重要的是:为了抢占有利地形,我们得拿出不亚于战场上冲锋陷阵的精气神和勇往直前的锐气。尽管每一场讲座都听得千辛万苦,大家的热情却从未消解过。内容丰富的各种讲座,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点燃了我们心中的梦想和希望,滋养了我们的精神和灵魂。

一次,著名作家丁玲的讲座在南一楼(行政大楼往万林艺术博物馆方向的路上)最大的教室举行,大家当然是蜂拥而去,以求一睹为快。

那天的丁玲穿了一件红黑相间的格子衬衫及深红色外套,戴一副茶色眼镜,她神采奕奕地举着双手向我们走来,全场掌声雷动、欢呼雀跃。看着一张张青春洋溢的笑脸,丁玲的步伐也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轻盈,这是一位青春永驻、活力四射的老人!

丁玲给大家做了一场热情洋溢的报告,讲述了她的生活经历、



成长过程及奋斗之歌；回忆了她 60 多年来走过的革命之路及发生在她身上的几次大的人生转折；希望在座的我们再没有 20 世纪 30 年代时的他们那样的苦闷和烦恼，希望我们有勇往直前的探索精神，希望我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多做贡献……

讲座进行至正酣处(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教室突然停电了。在珞珈山重新回到青春岁月的丁玲，倡议大家用唱歌等待来电。她和爱人陈明一起带头高唱《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曲，并担任了临时指挥。这时的她精力充沛、热情洋溢、动作敏捷，完全不像一位年过 80 的老者(她是来做讲座的前一天过的 80 岁生日)。从她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永远张扬的青春活力，永远昂扬向上的激情斗志。此时的她，更像一位年方 18、青春正盛、朝气蓬勃的小姑娘，就像她自己在讲座上说的：“我今年 80，明年 18！”这应该就是真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吧！年过 80 的她，竟然站着讲了近两个小时。

由此想起学校最近某晚停电时，湖滨某栋男生宿舍自发而起的歌曲联唱，还有苏德超教授在停电时，在教室里继续着的“形而上学”课程，这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我们在丁玲老人的指挥下，连唱革命歌曲的场景是多么惊人地相似，这是否说明每一位来到珞珈山以及在珞珈山生活过的人，身上和心中都会生长出一种质朴的浪漫，一种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精神？这或许就是珞珈山精神气质的一脉相承吧！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生活在珞珈山的我们，听过的讲座还有很多，如：青年作家韩少功指点文坛江山、激扬当代文学的激情发言；作家姚雪垠、刘宾雁各具特色的创作漫谈；当时第一届作家班学员严婷婷、水运宪(在刘道玉校长教育体制改革下开始创办作家班，从三年级开始，学习两年，毕业后拿本科文凭)给我们讲授“创作·读书·阅历”等；我们还听过“知识男性与知识女性的恋爱观比较”等现实性、实用性较强的讲座。

……

黑夜对话哲学，眼眸升起灯塔…… 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求，是珞珈人心中永远闪耀的光芒。



注：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女，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毕业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1936年11月，丁玲到达陕北保安，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丁玲的到来，给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原本力量薄弱的文艺运动增添了新鲜血液。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做出过无法取代的贡献。代表著作有处女作《梦珂》，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莎菲女士的日记》，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等。

作者系中文系 1983 级校友



那年正芳华 我们在珞珈

李福信

挥别珞珈，一晃，就 30 年了。

思念是一根弦，总在不经意的角落，不经意的时间，弹奏起故园之恋，唱响起同一首歌。

只是，想看到同学、想从同学的笑脸上、想在同学的拥抱里，看到彼此当年的身影，感受到同学的温馨美好，已是一种奢望了。

不管毕业多少年，无论珞珈有多远，亲爱的同学，你总在我的记忆中；敬爱的老师，学子对您的思念，永如母校侧畔的东湖水，绵绵无绝期。

在绵绵的思念里，在流淌的旋律中，我们沉醉不知归路，又回到了那些年美好的芳华，回到了那个如梦的珞珈……

十八岁那年，阿信考上了枕东湖、怀珞珈的武汉大学。

火车行走了一天一夜，阿信蹲守在自己装着棉被的笼箱旁。第一次出远门的阿信不敢打瞌睡，不敢离开。车到攸县，碰上一个考上武汉大学数学系研究生的学长，才敢去上了趟厕所。到了武昌站，跟着迎新的学长学姐，乘上大卡车来到了珞珈山，武大桂园八舍 104 便迎来了一位山乡学子。

同室八人，比阿信先到的有蕲春的叶文，长兄相送；有鄂州的建强，大哥相送；有仙桃的良才，小哥相送；有京山的远文，父亲、弟弟相送。然后是老乡领着去报名，领着去购买生活用品，领着去逛陌生而美丽的校园。无亲人相送、无老乡接待的阿信，默不作声地跟着郭远文父子和武大中文系的晏姓老乡去教务处注册报到，又随着他们去了东湖、樱园，然后就一个人踟蹰于樱花大



道了。

此时的阿信，孤独无依，强烈地思念母亲、思念大哥、思念远方的亲人和家乡鲤溪，只想马上冲到火车站，踏上回乡的路途。可是又怕大哥骂自己不成器，终于忍住，一个人落寞孤独地回到了104。

晚饭后，无聊无助地坐在104上铺发着呆。忽然，一个气质俊雅、黛发飘逸的学长走进了104，“请问这里有一位叫阿信的同学么？”“我就是。”阿信一纵而下。邓建，一位就读新闻系大二的学长来看阿信了。似曾相识般，阿信紧随着邓建去了桂园六舍，看到了正在铺被子的高大俊秀的新天，正谈笑风生、来自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学军。看到了他们，阿信仿佛看到了大哥，高兴难抑，随后跟着他们一起去桂园八舍后面的水院露天电影院看了电影《武汉1938》。

自此，一颗忐忑的心、一颗思乡念亲的心平静了。

开学不久，就快到中秋了。黎钟、李萤、四民、玉芬、建强等一干班委成员和活跃分子组织大家在体育馆西侧树林空地搞起了中秋晚会，为大家更好地熟悉彼此，也是为柯卉的生日开Party。其实阿信也生日，只是来自农村的阿信腼腆未说。李萤主持晚会，一通击鼓传花，花落阿信身后，李萤为阿信抽签得唱《春光美》，从未听过《春光美》的阿信脸红说不会，只能作罢。

又一通击鼓传花，不知是谁作祟，或者是阿信运气太好，花又落在阿信身后，李萤又为阿信抽签需唱《望星空》，慌张至极的阿信满脸通红，只好又说不会。同学们哄堂大笑，掌声四起，阿信涩然窘然。恰好邓建远远招手来邀阿信东湖赏月，就趁大家开心地听四毛韵味十足地演唱《南屏晚钟》时，悄然而去。

京山永清，与远文同乡，大哥心性，男女同学都呼老四，都爱与他亲近。大一流行溜旱冰，阿信随老四去篮球场学滑，一不小心将右手掌骨摔伤，半年不能握笔，就连罗昌宏老师的“经济管理应用文”学科考试，都是以面试取代笔试的。秋红、玉芬、李萤、林莹、邓欣、柯卉、梁颖七仙女闻讯，晚上齐齐来104宿舍探望挂彩的阿信，让一见女同学就心跳脸红不已的阿信感动激动万分。



建强性直、耿爽，人称吴大牛，如梧桐叶茂伟岸，是系里的美男子。建强爱唱《冬天里的一把火》，有女生对其甚有好感。只是年轻时不懂爱情，红叶映梧桐，唯留美好在心中。

叶文一头卷发，情感细腻。一个周末夜晚，大家拿了小方凳结伴去小操场看外国电影《舐犊情深》。天空中细雨霏霏，银幕上父慈子爱，感天动地，至情至深。不经意回头，见叶文凝眸有泪，不觉心为之敬。叶文爱佳人，1986年春游庐山时，与良子演绎过“庐山恋歌”，是同室一棵最早开花的树。大三时，与历史系的彗子牵手过“梁山伯与祝英台”。叶文也重情，因为那年，阿信毕业后南征北走，最后归了故乡小镇，是叶文最早千方百计给阿信老家写信寻找阿信的。

申荣最晚到校。他人上学是皮箱，独申荣是木箱、阿信是篾箱，家境都不好。申荣读书刻苦，如钻头挤木，同学雅呼“申头”，常为毛蕴诗等老师抄写书稿，深得毛师喜爱。

大一要军训，一日下午，货车载大家去野外辨踪。栏杆四周全被先上车同学占据，独有邓欣等几位女生与阿信背靠背相隔一尺站于中间，手无凭栏。车开得飞快，刹车也飞快，一个个前俯后仰；邓欣四肢着地面朝车尾扑倒，面朝车头的阿信一屁股跌坐邓欣背上，想起却未能起，全车笑声一片。邓欣疼痛有加，委屈万千；阿信脸红十分，内心歉然。

瘦高的陈坤来自洪湖，爱抽烟，写得一手好颜体。同班初有32人，7女25男，有党员朱四民1人，团员30名，独陈坤潇潇洒洒。有古道热肠大姐风范、来自山西平遥的玉芬和团支部书记文斌等为大好河山一片红，左说右劝，终于将陈坤拉进了组织，只是心中有理想，手中烟不灭。

良才是班上最后一任团支部书记，感情细腻，心中美好。良才爱围棋，有事无事总喜欢找班上的围棋三剑客阿信、仕保、阿飞厮杀几局，却常铩羽而归。偶有得胜，必击掌欢呼买酒买酒，醉而不醒。

远文擅工笔、好文学，爱看港台情感剧，常与阿信漫步东湖看夕阳，夜走樱园闻花香。大三时，学校为每个班配了一台电视机。



正值《昨夜星辰》响彻神州，每晚一俟开播，爱听《今晚八点半》音乐的我们、爱听小说连播《天涯孤旅》老故事的我们、爱看外国电影的我们，纷纷从收音机旁和露天小操场电影院围聚 306 室，为的是感受其中爱恋，跟着素云哭跟着阿香笑。

一晚，从 306 看《昨夜星辰》归来，熄灯卧谈会开始。阿信拿着从物理系转系来班的志强的手电，沉浸在《红楼梦》的章回里。帐外硝烟渐起，这一方远文、建强当头，叶文、阿信死顶，一致赞成《昨夜星辰》中阿香最美最好最动人，那一方良才强烈反对，老四附和，申头、陈坤鼓噪，说另一个女孩素云最好最靓最动心，争来争去，无有结果。

眼看人疲马乏、行将鸣锣收兵，喜好热闹的阿信开始火上浇油，战火又起：这边远文、建强渐占上风，那边良才力孤难顶，为着心中美好，气急爬起拉灯抗议。自此，好为阿香争议老谈不息的远文多了一个名号“老谈”。自此，老谈与良才为着捍卫心中美好互不搭理，大学毕业劳燕分飞时才相逢一笑泯恩仇，大笑三声挥手去。

而今，离开珞珈已 30 年，珞珈人却永远年轻。回想同窗四载，学友团结互爱、奋发争先，有几许美好的回忆，有多少温馨的情谊。这些个美好的印象，这些个美好的年华，这些个美好的人和事，都已是昨夜星辰。

作者系管理学院经济管理系 1985 级校友



我的苏联老师亚历山德拉

李声权

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大学里外籍教师寥寥可数。当时，母校武汉大学外文系仅两位苏联教师，年纪大的叫亚历山德拉（中文名字：苏兰），年轻的叫伊琳娜，她们的丈夫都是中国人。亚历山德拉教我们一、二年级俄语口语，每周两节课。她出生于白俄家庭，在我国哈尔滨长大，上过护校，在解放军里当过护士，并随军南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丈夫留在汉口陆军医院工作，她被安排在武大外文系教书。亚历山德拉老师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苏联人：高个，褐发，蓝眼，身着布拉吉（连衣裙），看上去四十岁左右。她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女儿黑发黑眼，梳着两根小辫子，戴着红领巾，读小学四年级；两个儿子却是黄发蓝眼，大的读二年级，小的上幼儿园。屈指数来，如今亚历山德拉·格里戈里耶夫娜（Александра Григорьевна）老师应是耄耋老人了。虽然她只给我们上了两年的课，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往事如昨，历历在目。

苏兰老师对教学认真负责，对学生严格耐心。班上如有同学一个音没发准，她必定走到跟前纠正，不厌其烦，直到发音准确为止。一次上课，她讲完之后问同学们懂不懂，大家迟疑一会儿，回答说：“понятно.”（懂。）她看了看我们的脸色，知道我们是碍于面子，便直言道：“Нет, вам непонятно.”（不，你们不懂。）于是又给我们重复了一遍。

苏兰老师非常重视口语教学中的模仿训练。听录音、听广播、看电影乃是模仿正确语音、语调的主要方法。学外语就得学会一口洋腔洋调，而不能停留在“中国人听起来像外语，外国人听起来像



汉语”的境地。苏兰老师会讲汉语，这有助于教学，也有益于学生学习。有次上课内容是有关《国际歌》的，她要求同学们到讲台上朗诵，有几个同学害羞不敢上去。这时，老师用汉语说道：“怕什么，也不是戏园子。”同学朗读时，她站在一旁指导：“с чувством！”（带着感情读！）我至今还记得苏兰老师在课堂上放映幻灯片的情景：基洛夫在少年时代喜欢钓鱼。一天，他从河里扯起鱼竿，只见鱼钩上挂着一条活蹦乱跳的小鲫鱼。在我们但还没看清是什么鱼时，老师立刻用武汉话说：“喜头鱼。”顿时，同学们哄堂大笑，教室里充满了活跃的气氛。

为配合口语教学，我们系里经常放映外国原版电影，其中不乏苏联原版影片，如根据著名作家盖达尔的中篇小说《学校》改编的《培养勇敢精神》（《Школа мужества》，1954），描写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柳托夫走上革命道路的《波罗的海的光荣》（《Балтийская слава》，1957），表现俄国十月革命题材的《在十月的日子里》（《В дни Октября》，1958）等。有个晚上法学院天井里在放《波罗的海的光荣》，我刚好坐在苏兰老师的左边，她右边是她的女儿，我便抓住机会练口语，不时与老师交谈着。银幕上军舰甲板上站满了穿着白色海军服的水兵时，我说：“Народу тьма-тьмущая。”（好多人呀。）老师补了句：“Как снег。”（如同白雪一般。）见她女儿默默坐在一旁，我便对她说：“给您女儿讲吧。”她说女儿听得懂。过后想起这件事，真有点不好意思。

结合当时国际形势，系里将“九评”（即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两家编辑部发表的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的部分文章作为补充教材（例如：关于斯大林问题、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等），这自然会涉及中苏关系这个敏感话题。作为苏联人，亚历山德拉老师在课堂上朗读着我国批判苏联及其领导人的文章，这真有点为难她了。但毕竟因为她在华生活和工作了多年，对中国还是有感情的，也是友好的，所以课还上得比较顺利。

1964年苏联十月革命节，系里组织部分师生为亚历山德拉老师举办了一场小型联欢会，向她表示节日祝贺。她欣然而至，并带上了自己的女儿。联欢会上，高年级同学演唱了苏联歌曲，亚历山



德拉的女儿朗诵了俄语诗歌。在热烈欢乐的气氛中，系主任卢振中先生即兴演唱了一支俄國小曲，得到在场全体师生的喝彩。

1968 年底，我们年级的同学被集体分配到国务院外办，暂时送往广东汕头牛田洋军垦农场劳动锻炼。此后，我对母校和老师们的情况就不是很清楚了，只听说亚历山德拉老师带着三个孩子回苏联去了。

30 多年以后，我从电视里得到了关于亚历山德拉老师女儿的消息：2003 年 11 月 29 日，武汉大学在湖北剧场举办了 110 周年校庆晚会，在介绍贵宾——从俄罗斯海参崴远道而来的国立远东大学（ДВГУ）校长库里洛夫教授时，主持人文清风趣地说：“说起来呀，库里洛夫教授还是咱们武大的‘女婿’，其夫人朱苏华女士是原武大外籍专家苏兰的女儿，他今天是探亲来了。”经查阅俄网文及所附照片，此消息得到了证实：亚历山德拉（苏兰）的女儿朱苏华女士确系库里洛夫校长的夫人，其俄文名字为 Конкорд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Курилова（孔科尔季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库里洛娃）。

现在，库里洛娃女士是俄罗斯国立远东联邦大学（ДВФУ）东方学院汉语言教授、孔子学院院长、汉语中心主任。她领导下的孔子学院是俄罗斯第一所、世界上第二所孔子学院。2008 年 12 月，该院因成绩卓著获得世界先进孔子学院称号，库里洛娃院长获得世界孔子学院先进个人称号。

当年母亲在中国教俄语，现在女儿在俄罗斯教汉语，母女俩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继承与发扬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奋斗着。正如 2013 年 3 月库里洛娃院长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用非常流利的汉语说的那样：“能和俄中两国同事一起，在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岗位上，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感到无上光荣。”正所谓女承母业，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作者系外文系 1968 届校友



珞珈山的怀念

刘怀俊

李四光与珞珈山早期建筑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1971年4月29日),原名李仲揆,湖北省黄冈(即黄州)人。他父亲李卓侯是一位乡塾教师,祖父是蒙古族人,名叫库里,老人常给小孙儿讲“太平军”的故事:“咸丰年间太平军从广西崛起,反对清政府,英勇推进到长江流域,六进黄冈……”在仲揆幼小心灵播下了革命种子。他六岁就到父亲所在的私塾读书,1902年得到父亲支持到武昌上学,填写入学考试报名单,在姓名栏误填上“十四”,便将“十”改写为“李”,成了“李四”,又从厅堂匾额上取了“光”字添上,“李四光”这新名字不错,“四面光明”。李四光经过考试被武昌第二高等小学堂录取,同班中有一位小同学叫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湖北崇阳人,留学英法,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俩人学习都出类拔萃,成了好朋友。李四光1904年被选拔到日本留学,两人秉烛畅谈至深夜,设香案行八拜礼义结金兰,立志发奋求学、报效祖国。

李四光到日本后进入弘文学院学习日文和数理化,在这里结识了宋教仁、马君武两位学长,1905年孙中山到日本筹组反清大同盟,李四光随宋教仁、马君武一起去见了孙中山,并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对李四光十分赞赏,摸着他的头亲切勉励说:“你年纪这么小就参加革命,很好,有志气,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李四光十分感动,将中山先生赠予他的八字铭记



在心。1910年，李四光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造船科毕业，回国担任武昌昙华林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员，兼附属工厂厂长。工作之余惦记同盟会重任，积极参加武昌起义，酝酿组织联络工作。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全国响应，李四光投入革命。1912年元旦，革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国号中华民国，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从此三千年封建制度退出中国历史舞台。湖北军政府推选李四光为实业部部长，掌管农林工商矿等实业事务。此时王世杰由北洋大学肄业，毅然回武昌投入革命洪流，担任湖北省都督黎元洪秘书。在李四光、王世杰等满怀报国之志，准备为振兴湖北、“复兴中华”大干一场之际，却传来霹雳般的消息：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紧接着黎元洪开始在湖北排挤打击革命党人。孙中山对此痛心疾首，预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高瞻远瞩提出“要为革命储备人才”，特批李四光、王世杰等青年赴欧留学。

李四光、王世杰等从上海乘远洋邮轮来到英国伦敦，王世杰进入伦敦大学，李四光则进入伯明翰大学采矿系，后转入地质学系，在导师鲍尔顿(W. Boulton)教授指导下，刻苦用功，查阅大量地质资料，并自学德文、法文，日积月累，笔录摘记大量资料卡片，成绩斐然。鲍尔顿教授十分赞赏李四光的勤奋好学，让他参加学术讨论，介绍他暑期到伯明翰附近煤矿实习。1917年，李四光以优秀成绩通过毕业考试，获得科学学士学位。1918年，他又写成三百多页长篇英文论文《中国之地质》，得到鲍尔顿教授等专家一致好评，通过评审和论文答辩，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1920年，李四光、王世杰等接受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归国。到北大后王世杰任法律系教授，李四光任地质系教授兼系主任。李四光对教学工作极其认真，将理论教学与实地考察紧密结合，常带领学生到全国各地山川旷野作业。他在地质学领域陆续有三大发现：

(一)在北方地质地层考察中发现古生物化石“蠕”，并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1927年，李四光的专题著作《中国北部之蠕科》出



版，成为世界首部“鲢科”古生物学专著。得到导师鲍尔顿高度赞赏，伯明翰大学特授予李四光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二)发现我国第四纪“冰川遗迹”。1928年，李四光常从上海沿江而上到武昌主持武汉大学新校舍建设，途中多次到江西庐山、安徽黄山等地进行地质考查。1932年参加武汉大学一期校舍落成典礼，再登庐山，发现五老峰后一条U形谷和七里冲另一条U形谷斜交会合，经分析认为“庐山在第四纪地质时期至少经过两次冰期”。写了《庐山地志略》，刊载于《庐山志》。1936年，李四光用英文写成《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刊登于《中国地质学会志》，引起中外学者极大关注，德国冰川学家魏斯曼(H. Wissmann)看后大吃一惊，两次亲临黄山察看，他兴奋地说：“看到了！看到了！”“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并立即给德国《土壤冰川杂志》写评论。李四光的研究方始得到国际科学界的正式承认。

(三)创立新学说“地质力学”。李四光进行北南方地质考察中，发现我国北方以“陆相”地层构成为主，南方则是“海相”地层占优。他发现“高纬度区海浸时，低纬度区发生海退；而当低纬度区海浸时，则高纬度区发生海退”，即：海水有两极向赤道、赤道向两极反复进退运动的规律。他对此地质学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锲而不舍的研究，创立一门新学说——地质力学。据此分析我国地质条件，确认华夏体系沉降带储油，并在松辽平原发现大庆和华北大油田，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

1928年7月，以蔡元培为院长的国民政府大学院决定在武昌第二中山大学(原武昌高师)的基础上建立国立武汉大学，委任刘树杞^①为筹备委员会主任，8月，受命为国立武汉大学代理校长。任命李四光、叶雅各、王星拱、石瑛、张难先、麦焕章等组成新校

^① 刘树杞(1890—1935)，字楚青，湖北蒲圻县人，1890年(光绪十六年)3月18日出生。由湖北省官费留学美国，入伊利诺伊大学和密西根大学化学工程系，1917年获学士学位，191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学位。1921年回国任厦门大学理科主任。1928年春任湖北教育厅厅长，7月任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8月任代理校长。和李四光一起选定珞珈山新校址，使武汉大学成为中国最美大学之一。



舍“建筑设备委员会”，李四光为委员长。下面是李四光、叶雅各、王星拱等委员的肖像资料图片：



在这班委员中，有地质学家李四光、农林学家叶雅各、化学家和教育家王星拱、工程学家石瑛、经济学家张难先等专家学者。这一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在上海成立，李四光调任地质研究所所长，兼任新组建的武汉大学的建校工作。李四光对在自己家乡建设大学鼎力支持，常往返于上海武汉两地，统筹兼顾协调工作：一方面为国家地质事业忘我工作，另一方面又始终关注武汉大学新校舍建设进程。当时“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是教育部核准设立的，是学校的一个独立机构，其收入与支出，皆与学校经费分离。“建委会”秘书叶雅各协助李四光工作，在李四光离开武汉期间，叶雅各便负责各项具体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近十年时间，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工程包括工学院、理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图书馆、学生寄宿舍、学生饭厅和俱乐部、体育馆、水工实验室、半山庐、教授住宅、校门牌坊十二处单体、群楼建筑全部完成，我们这位敬爱的“委员长”方始卸任！

学校本部原址位于武昌东厂口（即阅马场东部蛇山南麓的一个小院落，如今已建成蛇山公园绿化带），校舍十分拥挤。李四光、叶雅各等都认为要实现武汉大学“办成一流水准”目标，必须另择新址。一天，身兼湖北省农林厅技术负责人的叶雅各从武昌东湖岸



边考察归来，告诉李四光“发现了新校址”。李四光二话没说，于次日一大早带干粮骑毛驴，与之前往武昌东湖岸边罗家山（传说为“落驾山”）察看。两人对地形地貌再作认真考察，认为这里“地势绝佳，其天然风景……国外大学亦所罕见”。之后，又组织全体委员同去查看，大家看后一致表示同意以此“风水宝地”作为新校址。1929年2月，大学院正式任命王世杰为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他把建校工作作为头等大事，即以学校名义向湖北省政府申请划定学校范围“红线”，从东湖西南岸到街道口（几十户人家组成的小街），校园面积3200亩，规模之大，首开国内高校之先河。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群自设计至落成，始终和校舍建委会委员长李四光，叶雅各及各位委员，还有三位校长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的关注、关心分不开。

闻一多命名珞珈

刘树杞代校长到任伊始，便希望有一批知名教授学者来武大工作，于是亲自到南京去请湖北同乡闻一多，动员他到武汉大学“服务乡梓”，并请他出任文学院院长。闻一多^①（1899—1946），著名诗人、文学家，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1946年夏与李公朴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接连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①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字友三，出身于湖北黄冈浠水县闻家铺书香门第家庭，1912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喜欢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等。1922年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美术学院。1925年回国，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即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闻一多1928年8月到校工作，与他共事的著名教授有：陈源、刘赧、徐天闵、高翰、袁昌英、陈登恪、游国恩、谭戒甫等人。1937年抗战开始，闻一多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的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在西仓坡宿舍门口即被国民党昆明警备司令部枪杀。1948年8月，《闻一多全集》出版，由朱自清主编。



1929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王世杰为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到任后便将学校规模扩大，把原有之社会科学、文学、理工三个学院改为法、文、理、工四学院。聘请闻一多教授为文学院院长、皮宗石教授为法学院院长、王星拱教授为理学院院长、石瑛为工学



学院院长。闻一多虽不是筹备委员，却亦热忱参与国立武汉大学的筹建工作，并且提出将新校址罗家山（落驾山）改名为珞珈山，“珞珈”二字充满灵气，充分体现了他的高雅智慧和诗人气质。王世杰校长接受了闻一多的建议，从此新校址正式名称改为“珞珈山”，以“珞”（坚石）与“珈”（美玉）寓意筌路蓝缕、开启山林“攻坚克难、坚毅不拔”的气概，同时也寄托着把学校建成环境优美、学术一流著名大学的期许。这一雅号沿用至今，以武汉大学的代称闻名海内外。闻一多在任期间还为武汉大学设计和书写了小篆体“武大”二字的校徽，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期武汉大学学生以佩戴此胸章而备感自豪。

叶雅各绿化校园

武汉大学筹建初期，由园林学家叶雅各全面负责学校的园林建设，他在校园范围内荒山隙地、道路两旁，亲自采种育苗、栽植维护，并从全国各地辛勤采集树种数十万株，分植道路两旁和林园苗圃。选用木本（针叶阔叶）植株混种，形成良好的生态平衡的自然环境。大小道路两旁主要由法桐、香樟、枫树、银杏、白杨、绿柳以及各色冬青等植株组成。又有梅、桂、樱、荷、菊、玉兰、紫薇、紫荆、芍药、枇杷等花卉点缀校园荒坡隙地。经叶雅各先生“十年树木”，珞珈山遍披绿装、满目清秀。数十年来珞珈山校园因其林木茂盛、山岚叠翠，引来百鸟聚汇、巢栖入林，鸟儿是一切害虫的天敌，又无形中保护了树木，进一步形成了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迄今为止，学校园区从未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病虫害灾害，成为



武汉三镇园林样板之一。

李四光请来凯尔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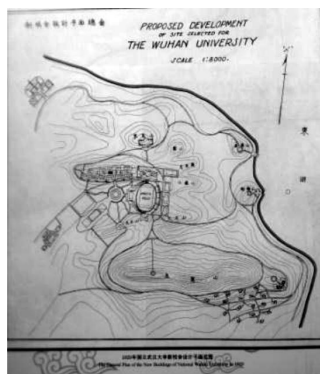
要说珞珈山的人文景观，当数那掩映在苍松翠柏间，上下纵横、错落有致、溢彩流光、若隐若现、精美绝伦的数十座古典建筑群落。那便是担任武大新校舍建委会委员长的李四光于 1928 年 11 月从上海请来的，曾在三年前参加南京中山陵设计获奖的美国著名建筑师弗朗西斯·凯尔斯(F. Kales)设计的^①。凯尔斯听说要在武汉市郊建大学，便欣然表示愿意前去作一番“考察”。他在上海早就听人提起武汉是华中水陆交通重镇，被称为“东方芝加哥”，因此很想见识一下这座“与自己故乡并称的大都市”。于是便随李四光一起来到武汉，并在李四光陪同下实地察看了“新校址”。凯尔斯环视山麓前后地形地貌以后，兴奋地高举双手，放声喊道“Wonderful(好极了)!”。学校还接受了凯尔斯的建议，聘请了凯尔斯的两位助手：美国建筑结构设计师莱文斯比尔(A. Levenspiel)和德国土木建筑工程师萨克斯(R. Sachse)，三人组成新校舍建筑设计“黄金搭档”。与此同时，学校还聘请了同样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教授缪恩钊(1893—1959，江苏常州人，清华大学毕业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土木工程系)担任新校舍建设的监造工程师，兼任工程处负责人。此后，缪恩钊因工作需要正式调入武汉大学为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教授。事实证明：建筑大师凯尔斯不负所望，圆满完成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的大学建筑群，堪称“完美”杰作。而缪恩钊与汉协盛、上海六合等著名营造厂，均以高水平高质量完成了校舍各座建筑群体的营造任务。

^① 弗朗西斯·凯尔斯(Francis H. Kales)，1882 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1907 年麻省理工学院建筑设计专业毕业，20 世纪 20~30 年代来华，参与许多大工程设计，是国际知名的建筑师。他对武汉大学校园的建筑设计，既总揽全局又细致入微。“他对我们的帮助实在大得很!”(王世杰校长语。)



1929年3月，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校舍建设主轴线由李四光亲自勘测确定。缪恩钊和他的助手沈中清等开始地形测量绘制，经过5个月艰苦努力，于当年暑期按时完成勘测任务。与此同时，总设计师凯尔斯亦立即开始蓝图设计工作，他不止一次来到珞珈山北麓丘陵起伏的小山头上，进行细致考察。时已入冬，天气渐寒，他依然在山间小径冷峭山头徘徊，经常一待便是一两个小时，以其奇思妙想反复构思，逐步形成校园总体规划和各幢建筑具体设计蓝图“腹稿”。他总揽全局，力求精益求精、尽善尽美！在两位助手的协作下，半年之内便完成了全部建筑工程的总设计图。事实证明，这是一整套十分优质高效的设计蓝图。

狮子山上起宏图 凯尔斯运用中国园林、寺庙惯用的建筑布局手法，巧妙建造殿堂式院落。他说：“在这么美丽的地方建大学，是我早就有的愿望。”他站在珞珈山北坡鸟瞰全局，从作为校园建筑中心区的落驾山北麓直至东湖岸边的广阔园地有火石山、小龟山、狮子山、团山、笔架山、乌鱼岭、扁扁山、侧船山、廖家山……



李四光建议说：“东侧的理工区应当采用西洋风格，以体现我们在理工方面向西方学习的决心。狮子山的图书馆区则应该更具中国特色，以传承中国的人文历史传统。”凯尔斯点头表示完全同意，并补充说：“珞珈山南麓风景优美，我计划在这里建造教授别墅，散点在山间……”他们当时何曾意识到，这组建筑日后饱经岁月沧桑，抗战时期以来逐渐形成“红色历史纪念地”、闻名遐迩的武大一区“十八栋”。

凯尔斯按李四光勘定的“校舍建设主轴线”倚山就势展开建筑规划：南山（火石山）建工学院，北山（小龟山）建理学院，其中间低洼地带平整成运动场，形成贯穿工学院、理学院的南北中轴线。理、工学院“以山为基”，南北遥相呼应，中间偌大运动场“盆地”相嵌，更显两学院高峻挺拔，宏伟壮观！



古典宫殿式图书馆 又从理学院向西偏北，横亘拢起一岭狮子山(文、法学院与图书馆所在地)，此处从东、北两方向皆可放眼浩渺东湖，而从东湖亦可清楚看到狮子山顶轮廓。



凯尔斯将宏伟高大的图书馆设置在狮子山顶，主楼四角建设四座配楼形成“工”字形庞大建筑物，图书馆顶部塔楼为单檐双歇山式、八角重檐，寓涵八卦之博大精深；上立七环宝鼎，呈七级浮屠通灵宝塔状；簧馆楼顶形似皇冠，蕴含学府之国学学术走向世界一流。塔楼既有建筑装饰美，塔顶又兼排气功能，体现艺术与实用的完美结合。古典簧宫式图书馆高耸狮子山峰顶，成为武大校园建筑制高点。民国年代到解放初期，从汉口江汉关轮渡码头远眺武汉大学图书馆，那霞光闪烁、碧绿飞檐屋顶造型清晰可见，成为武汉三镇一大景观。

簧宫城堡十六斋 凯尔斯对环境有透彻的理解和神奇的利用，特别是对学生宿舍独出心裁的设计，在构思蓝图时巧妙将“四幢学生宿舍连成一片”，造型波澜壮阔，使其与文、法学院图书馆建筑群有机结合，运用“地不平天平”的设计手法，倚坡筑厦，造就规模宏大、视野开阔，宛如布达拉宫式的中西合璧的城堡殿堂建筑群。凯尔斯设计用三座罗马式拱形大门将“学生宿舍”四幢建筑有机连接，更在三个“城门洞”楼顶设置亭楼，取中国传统建筑“斗拱飞檐、翡翠琉璃”盖顶，凌空呈现三座飘逸欲仙的亭台楼阁。由此，才使得“高高山三孤庙”的文、法学院和图书馆面前出现“平米万



图为一期工程：理学院、文学院、学生寄宿舍、学生饭厅与俱乐部，均由汉协盛承建



方”大平台，七座单体建筑仙斧神工联成整体，形成以图书馆中心线与学生宿舍中门中线为“中轴线”东西对称的“城堡拱托殿堂”建筑群。历经数十年黄馆殿堂耸立掩映于葱茏绿荫丛内，四幢十六斋①学生宿舍隐蔽于百年梧桐“碧影洞天”中，自然景观、人文风韵“融合而一”。凯尔斯对地理环境的深刻理解和对地形地貌的巧妙利用，令人叹为观止。

汉协盛的贡献 在第一期工程，首先设计建造学生寄宿舍、文学院(由文、法两学院共享)、理学院(由理、工两学院共享)，由凯尔斯设计整体建筑蓝图，在助手萨克斯协作下完成全部图纸绘制工作。在施工方面，通过招标由汉口大型营造厂汉协盛中标承担第一期建筑工程施工任务，包括学生宿舍(四幢)、文学院(一幢)、学生饭厅俱乐部与理学院球冠穹隆顶主楼四处建筑。

汉协盛老板沈祝三先生在汉口经营建筑事业数十年，汉口市區的主要建筑如汇丰银行大楼等都出自他的手笔，他虽双目失明有年，但仍是汉协盛营造厂的灵魂和主心骨。1930年3月，武大新校舍工程正式破土开工之日，作为主承包商的老板沈祝三“每天准时从早至晚都坐在他的办公室小桌旁接应电话，指挥珞珈山工地的工人从事工作”(王世杰校长于1932年3月7日在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汉协盛第一件杰作便是那城墙一般稳固的地基，让人领略什么是“坚如磐石”。三大城门楼，巍峨壮阔，十六斋舍对称排列整齐划一，所有内室房间无不采光良好，走进门洞八十级台阶步步高升。登上楼顶平台顿感豁然开朗，一马平川之阔，三座城门顶亭楼阁优美如画。文学院、法学院、大图书馆堂前广场浑然一体，俨然欲与布达拉宫遥相媲美。

除学生宿舍巨大工程外，汉协盛第二件杰作便是技术极其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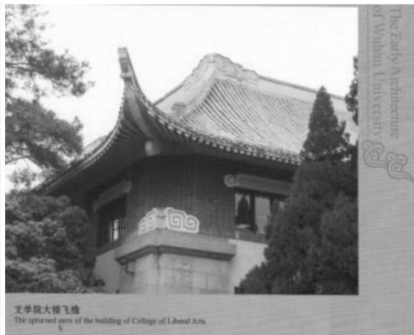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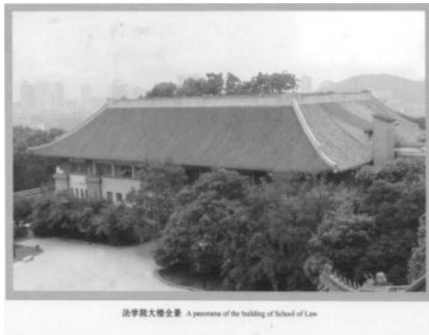
① 学生宿舍从东到西四幢，由三大拱门相连，每幢四层，整体形成十六斋舍。自东而西、自下而上分别采用《千字文》前四句十六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命名：天字斋、地字斋、玄字斋、黄字斋，宇字斋、宙字斋、洪字斋、荒字斋；日字斋、月字斋、盈字斋、昃字斋，辰字斋、宿字斋、列字斋、张字斋。东幢第三层“元字斋”原是“玄字斋”，为避康熙玄烨讳，以“元”代“玄”，沿用至今。



的理学院主体建筑——古罗马式天穹穹隆顶施工，当时国内建筑尚无先例。沈祝三以“质量就是根本”，恰与武大工程“坚固经济，保固百年”原则相契合，“进料选优质，处处严格检验把关！”

“天穹球顶”理学院 今天我们欣赏武大理学院和工学院雄姿，便是凯尔斯本着中国古代神话“天圆地方”观念设计的。理学院采用古罗马拜占庭式球冠顶设计，其结构力学设计十分复杂，整体主建筑采取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使体高量重的圆穹顶完全由周围墙壁及诸多门窗拱券承担，四周墙体自下而上向里倾斜，使承重更加集中，支持“天顶”使建筑益加稳固。理学院坐北向南，一楼设置三个阶梯大教室，分置于东、西两厢和后部，二楼设置小隔间作为当年数学系办公用房，而第三层即天顶盖内周围则最大限度开启数十扇小巧玲珑的采光玻璃窗。又将本楼层分隔若干小间，可做小教室或学生自习之用。理学院主体建筑东西两侧，建设两所“配殿”，作为物理学系（西侧）和化学系（东侧）用房，数学系则设在理学院二楼。又于小龟山北麓即理学院后部建起两幢钢筋混凝土建筑物，西栋（二层）为物理实验室，东栋（四层）则为生物系全部用房。

法学院端庄方正 文学院文采飞扬 图书馆东西两侧分置文学院、法学院，其规模和风格就整体来说大致相仿，呈现左右对称、稳定平衡！然而，设计者匠心独运，于对称之中又有微妙变化：文学院的屋顶翼角舒展，采取斗拱飞檐造型——寓意武大学子文学艺



图书馆西侧法学院造型平正方檐，东侧文学院造型斗拱飞檐



术之文采飞扬；而法学院的屋檐平缓，采取端正方檐造型——象征国家法制之庄严公正，寓意武大学子将担负执法正大光明、平等公正的职责。

上海六合的杰作 凯尔斯采用当代最新技术和新材料设计工学院、体育馆。采取钢混框架和三铰拱钢架结构用于设计蓝图，并在助手莱文斯比尔的协助下完成全部设计图纸的绘制工作。二期工程（1932—1937）包括图书馆、法学院、工学院、体育馆、水工实验室等，由上海六合营造厂承包全部施工任务。

工学院——四坡重檐玻璃

顶 凯尔斯以空前大胆的设计魄力，在国内首开先河采用最新建筑技术、新材料，在工学院



建筑结构设计中运用中西合璧、洋为中用，面目一新，再现中国古典建筑大屋顶，独出心裁设计了“方正四坡玻璃顶，斗拱重檐四周窗”的玲珑剔透、完全采光的中国传统方塔顶。主楼内部又大胆设计了中央五层中空庭井，使学院主体整座大楼晶莹通透。运用当时国际最新技术——钢架结构四坡重檐玻璃顶，使得工学院外秀内雅，天井贯通，第五楼清雅娴静，形成环形阳光制图设计室，为中国民族建筑史留下了一份可借鉴的宝贵财富。工学院主建筑四周设置四座配殿，分别作为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土木工程系和尚未设立的地质矿冶系用房，工学院后部建设一排三层楼房作为设备库房之用。

凯尔斯对于工学院建筑群的精心设计，可说完全遵照“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规范建筑理念，形成一座典型杰作；而理学院、图书馆等其他建筑群落配置又各有不同，变化错落有致，从而形成了风格各异、丰富多彩的校园建筑群落。

三铰拱钢架结构——体育馆 凯尔斯又一精彩建筑精品，便是位于珞珈校园之西坡平缓地段的武汉大学体育馆。体育馆的建筑结构设计，除开钢混框架结构的四壁墙体以外，其房顶屋架设计便是当代建筑技术崭新的三铰拱钢架结构——一座“钢铁的世界”，展现出“万方尺平无一柱”的神奇大厅，头顶上方钢铁梁柱纵横驰骋，



钢铁管材犬牙交错；百支钢柱不落地，千根铁梁卧悬空。那照眼明光的三铰拱钢构架高悬馆舍楼顶，竟能如此这般稳如泰山，让人见识了当代建筑新技术之进步。



体育馆建筑面积 2748 平方米，于 1935 年 10 月开工，1936 年 7 月竣工。仅仅九个月时间完成如此技术极其复杂的大工程亦堪称奇迹，应称“武大速度”。体育馆四周回廊环绕形成“轮舵式”山墙和“三重檐”歇山顶。建馆资金 10 万银元由曾任民国大总统的武汉黄陂人黎元洪（字宋卿）捐赠。解放初期体育馆为学生周末放映电影之用，人手一凳，可容千人。平时可作体育理论课教室，雨天可进行篮球赛。体育馆、工学院和图书馆是上海六合营造厂的三大建筑杰作。

图书馆 图书馆主楼第一层正面采用水泥台基和西式双联廊柱托起中式八角歇山式屋顶，在中国建筑首次出现，而支撑起这奇高屋顶的则是当代最先进的钢筋混凝土和组合钢桁架结构。匠人将屋角飞檐上乘风仙人，塑造成乘马负笈学者，让仙人下凡走向现代，而整体建筑堪称中西合璧的典型范例。



图书馆两侧的翼楼似前伸双臂欢迎来宾，给人以亲切感。前廊并立两对廊柱雄伟挺拔，给人以凝重庄严、神圣静谧之感，宽广长廊中间唯一正门显得格外厚重而深邃，一股博大精深文化底蕴的书香气息扑面而来。

图书馆的主入口为三开间单洞门，进门眼前呈现一方高大宽广的阅览大厅，平面取八边形布局，厅内整齐放置一排排红木桌椅，肃静典雅。室内四角设有旋转楼梯，古朴典雅，拾级而上，螺旋上升，可直登四楼袖珍阅览室，厅外环绕一圈回廊，凭栏眺望，东湖碧波千层，珞珈秀色满园，让人心旷神怡。图书馆珍藏图书典籍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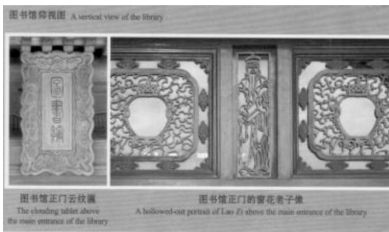


置于主楼后侧两座翼楼中，馆前两座翼楼，则供师生查阅学习研究资料之用。老图书馆已于 2013 年校庆 120 周年辟为校史馆，作为“珞珈讲坛”课堂，迎接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传播科学技术文化经典。

图书馆长毕祖老子像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华夏族，出生于春秋时期陈国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约生活于公元前 571 年至 471 年间。曾任周朝掌管国家典籍的“守藏室史”，是

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管理大吏，堪称图书馆馆长的祖师爷。武大图书馆正门上方镂空窗花图案以铸铁勾画老子全身画像，造型老子手持竹简，慈祥矍铄，目光深邃，远瞩前方。此幅简笔画像，纪念老子弘扬华夏文化、收藏国学经典。画像两侧云纹图案寓意“青灯伴书卷”，象征武大莘莘学子“刻苦读书、认真治学”，优良学风传统永承。



图书馆门前正上方镂空花匾额篆书“图书馆”则为中文系教授刘赧手笔。刘赧^①（1891—1978），字博平，湖北广济人。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留日，师从黄侃、章太炎，为章黄学派嫡系传人。1929 年由黄侃推荐来到武汉大学，担任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其治学之渊堪称一绝，虽“两节课讲一字”意犹未尽。博平先生一生教学研究笔耕不辍，1956 年被教育部评定为一级教授，是“中文系五



① 刘赧（zé，1891—1978），字博平，湖北广济人。祖父刘燁（yì，1829—1891）为咸丰进士。据说刘燁于常德知府卸任，不幸于洞庭湖牛鼻滩舟中溘然逝世，时光绪十七年辛卯五月初八（1891-6-14），“燁公刚落气孙赧即降生”，祖母胡老夫人对此孙儿疼爱有加，直视其为祖父化身，博平亦自号牛鼻滩生。刘赧早年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师从国学大师黄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蕲春人，历任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金陵大学等校教授），1917 年毕业，游学日本，在东京拜于国学大师章炳麟（1869—1936，字太炎，浙江杭州人）先生门下，归国继随导师黄侃研究语言文字、音韵、训诂学。他与黄侃之侄黄焯（1902—1984）同为章黄训诂学派嫡传继承人，三代文擘对中国语言文字学有独特贡献。



老”之刘博老，曾任中文系主任，是第三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他博学善书，尤擅篆体，除篆书图书馆匾额外，国立武汉大学牌楼背面“文法理工农医”亦其亲篆。

1932年珞珈校园第一期建筑完成，中央大学院长蔡元培、建委会委员长李四光和建委会全体委员参加庆祝典礼，王世杰校长发表庆典讲话：“十年前，我和李四光在回国路上曾经设想，要在有山有水的地方办一所现代化的大学，现在这个理想实现了。”

作者系数学系 1952 级校友



吾爱吾师

卢基林

2019年9月10日，是我国的第35个教师节。昨晚至今早，一些学生陆续发来了节日的问候与祝福。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自己的老师们。一个人在一生的成长过程中，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会遇到许多老师，他们教给我们科学文化知识，对我们进行人生方向的指引。仅大学时期我就有过数十位老师，三四十年过去了，我对一些老师的印象依然深刻，并保持着联系；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留下他们的照片。不过，老师们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早已铭刻在心，他们是我学习和工作的好榜样。

1978年10月，我幸运地考入了武汉大学化学系，开启了难忘而美好的大学时光。大一时，首门专业基础课是“无机化学”，主讲者邵学俊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当时恢复高考还不到一年，许多课程缺乏正规教材。邵学俊老师就编著出版了《无机化学》教材，还有相应的《无机化学习题解答》，为我们的学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后来，邵老师还赠予我一套新版的《无机化学》教材作留念。这套书一直是我院（湖南文理学院）化学化工类专业学生选用的优秀教材。退休后，邵老师与分析化学课程的尹权老师一道，多次应邀前来我院讲学，给考研班的学生们做辅导，深受同学们欢迎。我院学生的考研录取率多年位居全校首位，他们功不可没。

大二时的物理学是胡老师主讲的。他讲课言简意赅，逻辑思维缜密清晰，颇具理论造诣。在讲解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 $E=mc^2$ 时，他告诫我们说：越是简单明了的就越科学，就越接近事物的本质。



相比之下，化学还是一门实验科学呢。

物理化学是一门比较艰深难学的课程，上册由屈松生老师讲授，他说话带有湘音，可这并不妨碍他的教学水平。屈老师总是深入浅出地阐释着那些抽象的概念和原理，细致而缜密地推导、演绎众多的计算公式。面对同学们的勤学好问，他总是乐呵呵地解疑释惑，轻言细语；退休后他曾应邀来我校指导教学工作。物理化学的下册是林智信老师教授的。林老师还是一位诗人，我们毕业后几次聚会时，他都登台即兴吟诗作赋，谈笑风生。

印象中教授概率论的老师不怎么修边幅，衣着随便，有时竟忘了拉上裤子的拉链。后来了解到，他不是不想讲究，而是家庭生活负担太重。不过他能把抽象枯燥的知识内容讲得生动具体而有趣。一次他说道，1957年“大鸣大放”时，因讲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被发配到偏远的西北农村接受再教育，在那里专业无用、前途无望，只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结婚生子，接二连三生育了六个孩子，居然全是千金。可见，个别事件未必都符合概率论和统计学的规律。让我们在笑声中增长了科学知识。

陶映初老师未曾给我们上过课，而是指导了我的毕业论文，因而接触较多。那时他们一家四口蜗居在一间狭小简陋的平房里，前面有一小块地，他们种植了一些果蔬。有时看我们做实验比较晚，他会摘些黄瓜、西红柿之类的带到实验室给我们吃，新鲜美味得很。毕业后我们常有联系。

第一次上英语课，进来的是位小伙子，个子不高，比有些同学还年轻。我们至今还记得他的开场白：Hi, I am Zeng Lingliang(曾令良)。有些腭腭发音也不太纯正，原来他是外语系法语专业刚毕业留校任教的。后来曾老师转攻法律，担任过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是长江学者和著名的国际法专家。从法语专业的“工农兵学员”逆袭成为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相当于院士)，需要多大的才智和勇气，所付出的努力是可想而知的。令人痛心的是，2016年7月却惊悉曾老师因病去世的消息，他只享年60岁，英年早逝，我们深感痛惜！

还有两位老师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一位是我们的系主任查全



性院士，另一位是我们的校长刘道玉先生。他们都是我们化学系的前辈。

查全性教授是著名的电化学专家，他的《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是我国电化学界影响最广泛的学术著作之一。他老还有一大历史性贡献：1977年8月，在邓小平同志主持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上，率先提议尽早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并被邓小平同志当即采纳。停止了11年之久的高考录取制度于1977年冬季恢复，为千千万万莘莘学子求学成才打开了大门。我们非常感激他。查老90华诞时，来自五洲四海的弟子们为他举办了隆重的学术报告会。今年8月1日，95岁高龄的查老安然离世，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多种方式表达了对查老的哀悼。

1981年刘道玉出任武大校长，是当时国务院任命的重点大学最年轻的校长。他掀起了教育改革和创新的热潮：学分制、双学位制、转学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和插班生制等，营造了自由、民主、好学、包容的学习氛围。百年武大，迎来了一个红红火火的发展时期。小说和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的校长路石就是以他为原型创作的，因此，刘道玉先生被武大学子尊称为“武大的蔡元培”“永远的校长”。

后来，刘老校长在收到我的《赋闲集》之后，很快寄来了他的《拓荒与呐喊》一书，并题字和回信鼓励我。我写了读后感《高教改革不屈的老兵》，谈了对刘道玉先生的深刻印象：刚直不阿，教改不辍，争议不断，矢志不移。并附诗表达敬意：

珞珈山麓一倔叟，高教改革拓荒牛。
荣辱沉浮身外事，甘洒热血写春秋。

2012年，我们回母校参加毕业30周年聚会活动，有幸再次聆听了刘老校长的“训话”。当听到他动情地说：“20年后，我还要参加你们毕业50周年的聚会。那时我才99岁，一定会来参加的。”全场欢声雷动，大家报以热烈掌声。我们都期待着，并相信这个夙愿定能成真！



从左到右排序：尹权(2)、邵学俊(3)、屈松生(5)、曾令良(8)、查全性(9)、刘道玉(10)

2018年金秋十月，化学系1978级回母校参加“入学四十年周年聚会”，有幸见到了许多健在的老师。虽然他们大多迈入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



“入学四十年周年聚会”部分师生合影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2020年的金秋时节，我自己也将离开熟悉而眷恋的三尺讲台，告别38年的教学生涯。但愿自己没有辜负老师们的培养和学生的期望。届时，我会续写本文的姊妹篇《吾爱吾生》的。

作者系化学系1978级校友



走访亚当斯同学的故乡

毛 芷

1954年2月24日，有21名朝鲜战场被俘美军选择到中国居住，而不是返回美国，这在当时反华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笼罩下的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被认为是一起重大的投敌事件。

其中有三位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两年基础中文之后，来到武汉大学中文系1956级，他们是：黑人亚当斯(Clarence Adams)，白人科登和维布。亚当斯是三人中唯一与我们一起读完本科的美国同学。

亚当斯，鬈曲的头发、黝黑的脸庞、雪白的牙齿、永远挂着的微笑以及运动场上矫健的身影，给那个年代的武大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与刘林凤女士(武大外文系毕业，时为武汉测绘学院外语教师)喜结连理，曾给那个闭塞年代的珞珈山带来一个不小的震动。如果不是“文革”，我想他会永远留在中国的。

1966年“文革”初期，在“造反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声浪中，亚当斯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协助下，带着他的中国妻子和一双儿女悄悄回到美国。时间飞逝，转眼四十余年过去了，亚当斯已于1999年在他的故乡去世。这对异国情侣是怎样走过这段历程的？亚当斯夫人及其后代现在怎么样了？这是武大的老同学所关注的。

2004年暮春三月天，带着同学们的嘱托，我和先生龙囿村走访了亚当斯的故乡田纳西州的孟菲斯。

田纳西州是大量的黑人(应称非裔美国人)被残酷奴役过的地区。20世纪50年代，美国虽然经过南北战争废除了黑奴制，但黑人并没有完全获得解放；林肯总统倡导的“人是生而平等的”直到



60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的人权革命以后，才有所改变。亚当斯在50年代选择到中国的原因之一是对美国种族歧视不满。他曾与一白人男子发生争执，受到过美国警员不公正的对待。亚当斯到中国以后，某些媒体报道他“被中国的共产主义洗脑”，而他自认为得到了真正的“人”的待遇。他在中国有了良好的物质生活待遇，读完了大学本科，组建了幸福美满的家庭，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当翻译。这期间，他在中国到处旅游，度过了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家人说亚当斯有一种解不开的中国情结，笑称亚当斯就是为了寻找三姐（夫人的爱称）去中国的。

在走访孟菲斯的日子，亚当斯的夫人刘林凤一直陪伴着我们，含泪叙述着她与亚当斯的恋爱故事和他们回美国后的艰苦创业历程。

他们回美国后，本想在夏威夷落脚，没想到竟遭到监视，亚当斯很快被招去华盛顿接受质询。临行前，亚当斯将所有的积蓄留下，冷静地对妻子说：“如果我不能回来，你就带着孩子去纽约投奔科登，再设法回中国。”

在国会的法庭上，他据理力争，不请律师，自己辩护。当涉及所谓“叛国罪”时，他坦荡荡地回答：“我没有出卖国家机密，谈何叛国？”当问及“被共产主义洗脑”时，他答辩：“我为什么不能去中国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何况朝鲜停战协议允许战俘选择去敌对国家，其中就包括中国。”亚当斯被宣布当庭无罪释放。

在夏威夷因为人生地不熟无法立足，他们不得已回到家乡孟菲斯。虽然回到了亚当斯亲人身边，但他母亲却不肯接纳中国媳妇；而在家乡人们的眼中，亚当斯仍然背着“叛国者”的罪名，找不到正式工作。一家四口只有靠亚当斯打零工维持生计，在困境中挣扎。

困难压不倒亚当斯夫妇，勤劳智慧的人总是会有生存空间的。聪明的亚当斯夫妇想到了传统的中国饮食文化，当时的孟菲斯还没有真正的中国餐馆。刘林凤设计了几道中国菜，亚当斯又按美国人的口味予以改良。经过多次试验，1970年，他们成功地开了一家美式中国餐馆，得到当地美国人的喜爱。一家中国餐馆还不能满足



亚当斯 刘林凤和女儿黛璐于武汉 1960s

需要，他们接着开起了第二家、第三家。直到亚当斯去世，整整30年，一天又一天，他们将中美友谊融化在一盘又一盘的美味佳肴中。亚当斯、刘林凤这对异国情侣，在亚当斯家乡的土地上，开风气之先，使中美友谊播种开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亚当斯是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因肺气肿吐血突然离世的。整整30年，他一天也没有离开过餐馆。他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在当今“人生70才开始”的年代，却在70岁那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刘林凤女士告诉我们：亚当斯去世时，军方为他举行了标准的军人葬礼，棺木上覆盖着美国国旗，多位国会议员发来唁电，称他为“国家珍宝”。

亚当斯心胸坦荡，拒不认错，坚信自己选择去中国是正确的，这种君子之风不仅得到国会多数议员的认可，而且受到战友的钦佩。当年先期回国的战友，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大多承认自己“被共产主义洗脑”。比亚当斯先回美国的科登，去孟菲斯看望他们时，亚当斯问他：“你为什么给《生活》杂志写文章，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叛徒’‘被洗脑’，你的脑子有问题呵！”科登回答：“你不明白，当时为了保护我的家人，我不得不那么说。”科登又说：“我信奉共产主义，相信中国最终会赶上美国。”战友们都向他道歉，



因为他们回国后接受质询时，大多数攻击了当时还留在中国的亚当斯，亚当斯一一原谅了他们。

从中国授予他“世界和平战士”的荣誉称号、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会见，到美国国会议员称他为“国家珍宝”，亚当斯一路走来，为捍卫世界和平、发展中美友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刘林凤女士在亚当斯去世后住进了老人公寓，在孟菲斯落地生根了。但她仍然念念不忘家乡武汉，她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回去看看。不幸的是，不久就传来她逝世的消息。

亚当斯夫妇育有一儿一女，女儿黛珞在珞珈山出生。记得当年我和贺令江同学曾应亚当斯的邀请，去他家看望过小黛珞。一个非常漂亮的中美混血儿，高高的鼻梁、深邃的大眼、长长的睫毛、鬈曲的黑发，像亚当斯；黄中带黑的皮肤、娟秀的脸庞，又透露来自母亲的东方人的神韵。亚当斯给女儿取名黛珞，他当时解释说：“林黛玉的黛，珞珈山的珞，又与美国女孩名字 Della 谐音。”

我们到达孟菲斯当晚，黛珞便带着她的儿子和侄女来相聚。已是中年的黛珞发福了，但风采依旧；特别是她那标准的京腔（虽不流利，但字正腔圆），惊动了中餐馆的服务员。她说：“我是中国人，前年我回过北京，我想念中国……”黛珞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公司工作，与前夫离婚，育有一个儿子。儿子很帅，像外公亚当斯，那年即将上大学。黛珞现带着儿子和侄女一起生活。

亚当斯夫妇的儿子是在北京出生的，回美国时很小。这个儿子是亚当斯夫妇心中永久的痛，他虽受过高等教育，有很好的专业，工作也不错，但后来择友不慎，遇上一个大他几岁、又有毒瘾的女人，他也染上了毒瘾，两人还生下了一个女儿。亚当斯夫妇曾花不少钱为儿子戒毒，请律师控告、撤离那个女人。撤离办成了，毒瘾却戒不掉。祖母留下了孙女，和黛珞共同担当孙女的监护人。

科登和维布

亚当斯为人慷慨，且重同学友情义。他曾经邀请科登和维布到孟菲斯游玩。科登住了一个星期；维布呢？一家四口住了三个



月。那是 20 世纪 80 年代，维布带着他的第二任波兰妻子和儿女，从波兰回到美国，一时生活无着，亚当斯便接纳他全家来居住，直到维布在家乡找到了工作。

目前维布仍生活在他的家乡美国南部地区。科登则依然喜欢共产主义，而且认为共产主义中国最终会赶上美国。

原载武汉大学海外校友科学基金会编辑出版的《天涯海角 梦萦珞珈》(2013)。

作者系中文系 1956 级校友



民国造船专家武大工学院教授郭霖

牛 军

郭霖，当阳坝陵长岭郭家畈人。说到郭霖，不得不说 1929 年 9 月 23 日，他在国立武汉大学开学典礼会上的那次演讲。他的演讲声情并茂，打动了无数莘莘学子，使他们热情奔放地投入到了发展中国工业、振兴中华民族的洪流之中。

郭霖的那篇演讲不长，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在此全文载录：

诸君：

刚才许多教授都讲得很清楚，别的话也无须我再赘说，只是我还想讲一讲中国工业的前途。

就现状论，中国工业界本呈一种黑暗的景象，但是从今日起，中国工业界却又添了一线曙光。这一线的曙光，就是武汉大学新添的工学院。安知这一线的曙光将来不发扬光大变成一种熊熊烈烈的日光，照得大地通明咧！若果如此，那么这种光的“发光体”是谁呢？不消说，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武大”同学。明显一点说，就是我唯愿“武大”同学，人人都变成一个“发光体”。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现在这种发光体还在播种时期，所以工业界的黑暗仍不稍减。不说别的，只说中国的建设。现在许多党国要人，总是苦口婆心地说要建设；做下层工作的人，也大声疾呼地说从事建设。但是，一直到于今，建设在哪里咧？几乎可以说“等于零”！这是什么缘故呢？未必是当局无建设的诚意吗？我想这决不然。我以为，最大原因之一，就是



工业界的人才太少。换句话说，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种“发光体”太少！因其如此，所以不得不借用外人。例如聘请美国顾问、德国工程师等等，这也可以说是“借光”。只是我们不能常常借人家的光啊！若是天长地久地借别人的光，中国也就不能天长地久了！所以我们还是自己来造这种“发光体”的好。那么，此次武汉大学添设工学院，就是自造这种发光体的。所以，我希望工学院的同学，从今天起，就拿出决心来，以将来的发光体自期！

但是，这也有限定工学院的同学，别的学院也是一样。譬如文学院同学，可以开发民智，在国人思想上作一种建设事业的领导。法学院的同学，更不必说了，他们可以借法律的势力来扶助中国工业的发展，即如关税及条约等问题，对于一国工业之发展，是有绝大效力的！理学院的同学，尤其不必说了，他们在科学上，可以扶助中国工业之进步；中国工业落后，实由科学落后而起。这样说来，岂不人人都可以做中国工业的发光体，把一个黑暗的工业界照成一片琉璃世界吗？到那时，不但中国工业界有无限的光明；凡是我们做中国人的，觉得与外国比较，不致相形见绌，也实在有无尚的光荣呢！

郭霖教授的讲话得到了同学们经久不息的掌声。此后，这篇演讲稿以《武汉大学工学院要成为发光体》为题发表在当年《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0期杂志上。

郭霖的这篇演讲稿，至今读起来依然还有那种鼓动人心的感召力和阅读上的审美感。可以说它既是一篇精美的散文，又是一篇向知识精英界呼吁发展中国工业的宣言书。它告诫人们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工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自主创新，离不开高端人才的培养。

一位理科教授为什么有这样好的文笔呢？其实，郭霖从小就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他不仅文章写得好，书法也是一绝。抗日战争初期，武汉大学搬迁到四川乐山时，学校校牌也是他书写的。

郭霖，出生于1894年11月17日。青少年时代正处于清朝末



年，眼见的是中国社会的千疮百孔、中国经济的积弱积贫，西方列强用轮船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大肆掠夺中国的财富。孩童时，郭霖就萌发了一种造大船就能强国的思想，学习十分上进。父亲郭鸿建是清朝秀才，父亲深厚的古文基础对郭霖影响较大，且随父学得一手好书法。18岁那年，郭霖走出大山，到县城新制高级小学读了一年半后考入湖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每科成绩都名列前茅。23岁考入国立唐山工学院（即西南交通大学的前身）。在学校读书时，经历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的洗礼后，进一步加深了郭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立志工业救国。

1921年，27岁的郭霖以优异成绩获取湖北官费留学资格，考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攻读机械造船专业，在学校读书时获8国留学生数学竞赛考试第一名。1924年，获海军建筑学士学位，后入该校研究院任潜艇研究员。毕业后，受聘于英国维克斯造船公司，任造船工程师。

英国当时是世界工业强国，集聚着世界各国的工业人才。在机械造船工程方面有所成就的郭霖，本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但他为实现其工业救国、使祖国早日摆脱贫穷落后境况的夙愿，毅然辞去英国的职务，回到祖国，任福建马尾造船厂、上海江南造船厂机械设计师，主持轮机设计。

因为这段经历，1929年武汉大学组建工学院时，校长王世杰（王雪艇）聘请他到武汉大学工学院当教授，也就有了郭霖教授在国立武汉大学开学典礼上铿锵有力的演讲。

王世杰校长是一位颇具创新精神的人物，为了把优秀人才吸引到武汉大学任教，在校园内修建了十八栋别墅楼，被后人称为“筑巢引凤”工程。郭霖被王世杰校长以造船专家身份邀请到武汉大学任教，和苏雪林、杨端六、刘博平、桂质廷等一代名师都曾住进过十八栋别墅楼。“十八栋”的第五号楼，就是郭霖教授曾经住过的地方。

1933年，武汉大学设立了机械系，郭霖教授以充沛的精力、满腔热忱协助工学院院长邵逸周，致力于机械系的筹建工作。由此，他成了工学院机械系的第一任主任。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在



1953 年以其全部和电机系部分与其他学校组合，成立了华中工学院，后改名为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建立之初，任务艰巨，他夜以继日地筹划工学院的建筑工程和实验室的筹建。同时，一面参考英、美各著名大学的工程设置情况，制定课程计划；一面四处求贤，延聘教师，充实教师阵容，先后聘请了萨木忻、孙云霄、笕远纶、谭声乙、白郁筠等知名教授来系任教。同时进一步充实材料、实验室及实习工厂的设备。增设蒸汽透平发电厂，还与谭声乙老师一起建立热工实验室。郭霖教授为机械系的建立呕心沥血，历尽艰辛。通过他带领全系教师通力合作，机械系的设施日趋完善，为武汉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武汉大学决定西迁四川乐山，郭霖任迁校委员会委员，他和杨端六等人先期到达乐山。他负责房屋校舍的维修管理，在很短时间内，通过当地士绅和哥老会完成了修缮工作，比学校原定的时间提前开课。他书写的校名“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校牌悬挂在文庙校本部门前。

郭霖教授治学态度严谨，要求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他说工科学生如果没有动手能力，将是可怕的事。他在学校建立了一流的实验室和实习工厂。他讲授的材料力学课是工学院的“霸王课”，课程讲得新颖别致，既有实用性，又有前瞻性，成为工学院热门课程。他曾主讲机械工程设计、材料力学、船用机械、航空工程、应用力学、材料试验、汽机设计、机车工程、图解静力学、工厂实习、机械画、飞机工程、飞机学、机械原理 14 门课程，很多教材都由他自己编写；还兼任《工科季刊》编委会主任，以及建筑设备、《理科季刊》、图书、仪器、出版、公共经济、免费及公费学额、研究生论文及工作审查等委员会委员。被教育部批准为部聘教授。

郭霖在繁忙的教学中，还做了许多设计工作。1936 年设计制造的“建阳轮”，行驶在汉口与武昌之间，是当时公认为设计最好的一艘渡轮。该渡轮航速较快，美观大方，乘坐舒适、安全，燃料耗费量较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艘渡轮仍在武汉江面上行驶了一段时间。



1937年全面抗战初期，郭霖教授将全部积蓄1800余银元捐献给前线抗战将士，并亲自设计钢盔压机赶制钢盔，供前方使用。同时，为加强国防，他精心设计了阻敌于海上的“轻快水雷艇”，由学校上报给国民党海军部，可惜当时未引起重视；武汉沦陷前夕，国民政府派人来商议建造“轻快水雷艇”一事，但为时已晚，学校已开始搬迁，且内河也无法发挥轻快水雷艇的作用，此事让郭霖遗憾终生。

郭霖撰写了很多论文，发表在报刊上的有《潜行艇》《巡岸艇与国防》《建阳轮及其主机设计概要》等。

在四川乐山时，郭霖教授还参与了乐山大逮捕营救工作。1940年3月，中共乐山中心县委领导普益经纬公司工人罢工，震动了国民党乐山县，也惊动了国民政府经济部。罢工斗争的结果是，普益经纬公司同意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罢工胜利。但领导罢工运动的部分中共党员（里面也有中共武汉大学特别支部的党员）在此活动中暴露身份。事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乐山城区进行大逮捕，中心县委宣传委员及武汉大学中的部分共产党员、进步学生、爱国人士共30余人被捕入狱。郭霖教授受学校委托出面，组织教授们联名向国民党质问：爱国何罪？抗日救亡何罪？要求立即释放无辜被逮捕的学生。在社会各界的声援下，国民党特务机关被迫释放了武大学生和其他人员。

郭霖教授热爱祖国，勤奋学习，专心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为振兴工业、富强祖国而奋斗一生。由于长期劳累，生活清苦，终至积劳成疾，因患黄疸性肝硬化，于1942年2月20日夜逝世于四川乐山。

郭霖教授逝世后，武汉大学校方及校友为郭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校长王星拱亲自主持了追悼会。1946年，郭霖灵柩由其子郭玉骅运回家乡，安葬于当阳长坂坡。

作者现为三峡大学民族学院兼职研究员，供职于湖北省当阳市档案局、市史志办公室。



风骨傲然的宪法学大师何华辉

秦前红



人物档案

何华辉(1925. 11. 07—1996. 1. 17)，湖南益阳人。我国杰出的宪法学家与政治学家。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51年毕业，同年被选派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研究生班，主要从事宪法学研究。1953年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法律系从事宪法学的教学与研究。1954年宪法颁布后，其与人合著的《什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较早系统阐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专门著述之一。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得到平反并恢复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91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曾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中国政治学会理事等职。在数十年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共发表论文、译文60余篇，主编、参编或



独著、合著的教材、著作共 13 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学
科的奠基人之一。

历尽磨难 追求真理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湖南一地，人才辈出，法学领域更是颇多潇湘风流人物。作为中国宪法学的泰山北斗，何华辉先生也是湘籍法学家群体中的一员大将。1925 年 11 月 7 日，何华辉出生于湖南益阳的一个小作坊主家庭，他自幼聪慧过人，是闻名当地的早慧才子。1946 年，何华辉从湖南省省立第一中学毕业，高分考入当时青年才俊最为倾心的北京大学，就读于法律系攻读法科专业。彼时北大校长胡适先生正雄心勃勃致力于北大的全面复兴，欲“把北大做到最高学府，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在全国范围内不遗余力地为北大延揽人才，这对于求学阶段的何华辉而言可谓是恰逢其会。其兴趣点不仅仅局限于法科一隅，而是旁及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门类，为其日后进行更深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1 年，何华辉从北京大学本科毕业，以优异成绩被选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研究生班，从事宪法学专业的专门学习与研究，其乃我国最早自主培养的法科研究生之一。1953 年，完成研究生班学业的何华辉被分配到武汉大学法律系任教，自此与珞珈山结下不解之缘。

初到武汉大学的何华辉还不到 28 岁，主要负责讲授国家法、苏联国家法、人民民主国家法和资本主义国家法等课程。作为青年教师，虽然教学工作经验尚有不足，但何华辉为学生授课生动活泼，加之对学生高度负责，赢得了学生们的一致好感。同时，自身学术基础本就扎实的何华辉更是勤勉上进，很快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他凭借自身的才华与努力得到了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先生的赏识，承担起校长法律秘书的重要工作。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颁布后，在李达先生的主持下，何华辉做了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一书的写作，其后



又与人合作撰写了《什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书，该书系统阐述了作为国家根本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问题，这些研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学的创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57年，何华辉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曾经有人试图劝说何华辉“揭发”某位前辈学人来换取不被戴上“右派”帽子。出于对前辈学人的敬重，更出于对自身底线原则的坚守，何华辉拒绝出卖师长。这位年仅32岁的青年教师被迫离开自己心爱的教研舞台，黯然接受下放劳动的命运。



1982年韩德培先生、马克昌先生、何华辉先生(右一)参观武汉市司法局的监狱改造农场

何华辉最初被下放到八里湖农场劳改。1961年“反右”形势有所缓和，他虽未摘帽，但得以回到哲学系接受监管。1970年，又以“右派分子”身份被发配到武汉大学的湖北沙洋分校。名为“分校”，实质是沙洋劳改农场，在沙洋的近十年间，这位科班出身的青年法学学者的主要工作就是喂猪和填饱自己的肚子。

如果说离开武汉大学只是让何华辉失去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且需承受身体上的巨大折磨，那么妻子携带一双儿女不告而别则更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无限痛苦。妻离子散，众叛亲离，在那段人生最黑暗的岁月里，何华辉甚至曾经有过一死了之的灰暗念头。正是在



这种层层块垒难消的抑郁中，何华辉烟不离手，健康每况愈下，这为其年老之后的羸弱多病理埋下了祸根。

1976年，全国政治气候转暖，何华辉从沙洋劳改农场回到了武大哲学系资料室接受监督劳动，距离重回自己魂牵梦绕的讲台终于只有一步之遥了。197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启动拨乱反正的伟大工程，何华辉与全国五十余万“右派”得以摘帽重获正常人生。从1957年被划为“右派”到1979年得到平反并恢复工作，昔日英姿勃发的青年才俊已是年华老去、两鬓斑白。不经历乱世坎坷，不能明白盛世人权的可贵。20余年坎坷如一梦，赋到沧桑句便工，身躯残破却更要仗义执言，或许正是那一代法学学人的宿命。

1979年，尽管何华辉已经54岁，但是他重整书囊，依然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武汉大学法律系的恢复与重建工作之中。1980年，法律系恢复招收本科生，何华辉为本科生主讲“宪法学”等课程。由于历史原因，何华辉在1980年时职称还只是助教，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1981年晋升为讲师，同年晋升为副教授，1982年晋升为教授，一跃成为同辈中的佼佼者。

1982年何华辉招收硕士研究生之后，又为研究生开设了“比较宪法学”“外国宪法学”“西方政治思想史”等课程。韶华易逝，何华辉只能用更为勤奋的治学来弥补在牛棚猪圈间蹉跎的时光。他焚膏继晷，兀兀穷年，著述连续问世，硕果累累。在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授课之余，何华辉笔耕不辍，先后发表50余篇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独著或与人合著学术著作14部，诸多观点对于中国宪法学学科发展乃至中国民主法制社会建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正是基于何华辉在宪法学界的影响力，1984年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成立时，何华辉即被推举为学会首届副理事长，1989年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将他选入《世界名人传》，1991年何华辉作为宪法学家被载入《中国法学家词典》和《中国当代名人传》，1993年武汉大学100周年校庆时，何华辉位列59位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

除了学术成果斐然得享大名外，何华辉在晚年终于拥有了幸福的个人生活。1982年，在同事的介绍与何华辉的执著下，同样作



为教师的赵宗荃女士与何华辉喜结连理。



1985 年何华辉先生(左一)、吴家麟先生、许崇德先生在宪法学年会相聚

何华辉烟瘾极大，是下放农场改造期间养成的痼习，每天几乎烟不离手，因此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据他的学生回忆，20 世纪 80 年代末，何华辉已不怎么能自如活动，到了 90 年代，出门就只能坐轮椅。由于何华辉哮喘病加重，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每年冬天都要离开武汉到海南过冬，病重时上下飞机都得使用轮椅，呼吸要借助氧气，发展到后期晚上睡觉甚至无法躺下。

1995 年冬，何华辉考虑往返、武汉海南之间太兴师动众，决意在武汉过冬，孰料就此一病不起，于 1996 年 1 月 17 日不幸辞世。在弥留之际，他还惦记着博士点的建设和在校博士生继续培养的问题，并留下遗言，将他名下的学生托付给马克昌先生和许崇德先生指导。

道德文章 饮誉学界

何华辉勤于科研，文笔优美，且时有创新，这一点为宪法学界的几代学人所公认。他发表的《也谈人权问题》《实行法治就要摒弃



人治》《论宪法监督》《浅论三权分立》《建立新的比较宪法学刍议》《中国宪法之特色》等论文具有广泛影响。他与许崇德教授合著的《分权学说》，以十分洗练的文字对三权分立这样一个众说纷纭的资产阶级宪法原则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对其理论钩稽渊源，对其实践运用多方考察，是一本用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学观对三权分立进行科学分析研究的力作。他的代表作《比较宪法学》在体系和内容方面因创新开拓而卓然一家，被学界誉为我国比较宪法学研究成果的代表性成果。尤为可贵的是，他的不少论著不为时讳，透露着率直和对真理的追求。

何华辉在教学科研之余，还致力于中外法学交流。1985—1986年，他先后应邀赴美国、加拿大、荷兰等国多所大学的法学院讲演中国宪法专题。因1980年的荷兰向我国台湾地区出售潜艇事件，为表明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中国政府在1981年作出中荷外交关系从大使级降为代办级的决定，整个改革开放初期荷兰与中国的交往都比较淡薄，不少荷兰人对中国和中国人了解很有限，有的甚至存在较大的偏见。有一次，何华辉去海牙的一所大学讲学，没想到对方接待他的人很傲慢，以挑衅的口吻询问何华辉在演讲中到底是准备使用荷兰语、西班牙语、英语还是法语。他本来准备了一个英文讲稿，看到对方言语不恭，马上表示：“我这次演讲打算用中文。”对方竟说：“用中文演讲在这里没有先例。”何先生反问：“请问在这里用荷兰语、西班牙语、英语以及法语演讲的先例是谁创立的？”对方一时语塞，半晌才说：“使用这些语言演讲的先例现在已无从查考。”何华辉马上说道：“请你记住，用中文在这里演讲的先例是由中国武汉大学的何华辉所创。”对方这才意识到自己礼数不周，理亏之下，只好依从何华辉用中文演讲的决定，并临时找了个翻译。何华辉的智慧和骨气由此可鉴。

何华辉强调，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他常教导学生“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一个人如果能做到无私心杂念，就可以大义凛然。他希望学生成为品德高尚、思想进步、忠于国家、热爱事业的人，成为能独立思考、不阿附权贵、不讲假话的人，这也正是他自己的人生写照。尽管曾经遭受过22年的不公正待遇，但他却用常



人难有的宽容来看待自己所经历的劫难，很少提及受过的委屈，总是乐观地对待人生，豁达地笑谈得失。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著名哲学家陶德麟教授在《宪法学研究文集》的序言中，曾这样评价初上讲坛的何华辉：“一位才思敏捷、言辞犀利、英气勃勃的青年学者。每有争论，他总是敢于直陈己见，有时力排众议，不少假借。而每有所发，总是言必有据，决不肯媚俗趋时，牺牲真理。他对教学高度负责，授课时谨严生动，要言不烦，当时就深受青年学子的欢迎。……他始终不失赤子之心，淡泊自持，不为利锁名缰所困，唯学术是从，唯真理是依。他刚正不阿，决无丝毫乡原习气。他宁可得罪人，决不作无原则的圆通迁就。”何华辉一辈子当过的最大的“官”也不过是教研室主任。何华辉已逝去 20 多年，但在武大、在中国宪法学界、法学界，凡是认识他的人，提及他时无不肃然起敬。



1985 年在耶鲁大学法学院，何华辉先生（右一）、马克昌先生与欧文·费斯教授、哥斯廷教授

春风化雨 慈严如父

在学生们的记忆中，何华辉讲课很有特色。他从不点名，教风



洒脱，授课旁征博引、事例丰富、观点新颖、启迪性强。有意思的是，他嗜烟如命，讲一段必定要点支烟，几乎是接着抽烟，如偶尔忘记点烟了，他的思维似乎停滞了，这时讲授会突然停顿，教室也静寂无声，大家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更加聚精会神地望着，只见他缓缓拿出烟，划根火柴点上，美美地吸上几口，然后在吞云吐雾中再次开讲。

对待学生，何华辉集严肃与和蔼于一身，如《论语》中所谓：“望之俨然，即之则温，听其言厉也”。何华辉对学生有着深沉的挚爱和殷切的期望。他竭心尽智，授业解惑；他无私扶持，奖掖后学。凡是有利于学生发展成才的事，他都尽心尽力而为。同时对他们的为人治学又要求极严，始终把做人放在做学问之前来要求弟子，一旦发现学生在做人品行方面的不足，便会很严肃地提出批评，甚至采取旁人难以理解的严厉方式予以责备。他批评弟子时，眼神非常严厉，话语虽不多，却透露着无形的震撼力和说服力。

何华辉注重学生道德人格的修炼，但从不对弟子进行空洞的说教。有一次，几个弟子在他家参加首次研究生见面会，他说自己和马克昌先生到韩德培先生家中拜访时，通常要站着向韩先生请安、汇报，如果没有韩先生的口头直接示意，他们是不会落座的。他是用这样一个例子来告诉弟子，应该对师长保持礼貌尊重，对前辈怀有一颗感恩的心。

武汉大学宪法学博士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的几个法学博士点之一，博士点的创建凝聚了何华辉先生的巨大心血。这个博士点培养出的许多学生如童之伟、周叶中、秦前红、胡肖华、朱福惠、邹平学、周伟、董嗥等都已成为当下中国宪法学界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些都与何华辉独到的选才育才视角、开放的学术胸襟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有关。何华辉开始招博士生后，就规定自己以往的硕士弟子们，如要读博士，一年只许一个人报考，即使万不得已有多人报考，他也只会招一个。他说，如果对自己的弟子太过偏爱，只招自己教过的学生，“江湖”上谁还敢报考他的博士？当时的研究生招生人数较少，考试的制度安排通常是笔试完后立即面试。每年研究生面试后，何华辉都会让他的妻子赵宗荃在家亲自做饭，宴请全



体考生。赵宗荃是烹饪高手，饭菜做出来色香味俱佳，加上先生这份礼贤天下的情怀，每位考过他研究生的人都终生难忘。



2016年秦前红教授与师母赵宗荃在何华辉先生塑像前合影

何华辉对体育比赛有着浓厚的兴趣，象棋棋艺也十分高超。如果来访的人能够与他旗鼓相当地杀上一盘，他便快乐无比。师生饭后共赏体育竞赛或棋盘对杀的场景，也成为众多弟子难忘的人生记忆。

何华辉一生经历坎坷，可以说浓缩了他那一辈宪法学人的命运轨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不平凡历程。正如他在自撰《七十抒怀》中所言：“七十人生古来稀，人生忧乐总同栖。挑灯夜读忘更鼓，踏露晨耕听晓鸡。昂首堂前宣国法，侧身阶下着囚衣。晚年幸得升平乐，欲引歌喉怯调低。”

本文图片来源于《何华辉文集》和何华辉家庭影集。部分内容转引自以下文献：

1. 邹平学，《追忆恩师何华辉教授》，载《宪道》20161031期。
2. 秦前红，《师道永存师恩难忘——秦前红回忆导师何华辉教



授》，载搜狐网“中视联播”20161104。

3. 许崇德《序》，载《何华辉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4. 陶德麟《序》，载《宪法学研究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作者系法律系 1981 级校友



皮公亮：珞珈山的第一代孩子

宋骥弘

今年是皮公亮学长从国立武汉大学毕业 70 周年（1949—2019），也是他老人家从事新闻工作 70 周年。写下该文，意在向 94 岁的学长致敬。学长及其父辈们与珞珈山的故事精彩而绵长，我笔力笨拙，挂一漏万，但我愿意分享给各位前辈后学校友，只因为我们都是珞珈山的孩子。

邂逅忘年之交

认识皮公亮学长，是我住进长江日报高家台宿舍 3 栋之后，时间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他住一单元，我住三单元，房子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的，共 6 层，没有电梯。他住最东头，围墙外就是别的单位，所以他每天进进出出，必须从我这儿经过。

我认识皮公亮学长时，他已退休。得知他生于 1925 年时，真的难以相信：这位鹤发童颜、神采奕奕、谈笑风生的前辈，居然只比我父亲小 4 岁。

学长斯斯文文的，亲和幽默，灰白头发往后整齐梳理着。当他背着手从远处踱过来时，自带一股仙气。

学长会讲很标准的京片子，但更多的时候是操着地道的武汉方言，据说他的英语非常好，特别是口语。

记忆力惊人，是学长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他是典型的六要素思维与表达，言简意赅。说起数十年前的事情，但凡涉及时间地点，都能脱口而出，且精确到年月日和具体街路门牌号码。听他说



事，特别有现场感。

我与学长交流时，常常以普通话起兴，以表示对前辈的礼貌。聊到好玩的话题，彼此就会很默契地“回车”，嗓门提高八度用武汉话吼。他笑咪咪地听着我口无遮拦胡说八道的神情，让我感到特别温暖。

我知道学长的身世、学养和阅历都非同一般。他是我国现当代著名教育家和法学专家皮宗石的独子。

皮宗石字皓白，别号海环，湖南长沙人。1887年8月23日出生于长沙东乡福临铺西冲皮家大屋。先后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政法专业。1920年学成回国后，应蔡元培邀请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27年8月随蔡元培到南京，任国民政府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国立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28年4月，任司法部秘书长。9月应邀到国立武汉大学任社会科学院教授、院长。1929年6月社会科学院改为法学院，继续任教授、院长，讲授财政学课程。1930年兼任法学院经济学系主任。1933年4月，任武汉大学教务长兼



著名教育家皮宗石先生（1887—1967）



图书馆馆长。1934年10月，兼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律系主任。1936年7月，辞去武汉大学教务长职务，应湖南省政府邀请担任省立湖南大学校长，同年湖南大学由省立升国立，担任国立湖南大学第一任校长。1939年3月，出席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1941年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5月，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

今天，我们在南京民国时期总统府、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陈列的民国政府时期文物中，可以看见皮宗石的简任状，简任状编号为“简字第贰贰贰号”，全文为“任命皮宗石为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此状”，署名是常务委员胡汉明、古应芬、伍朝枢、张人杰；颁发时间是中华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八月五日，盖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大印。



简任状

1949年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于1950年4月10日任命皮宗石为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向他颁发了毛泽东亲自签署的委任状。

1954年，皮宗石调任湖北省政府参事并被选为湖北省政协常委，又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1956年列席全国政协会议。



毛泽东签署的任命皮宗石为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委任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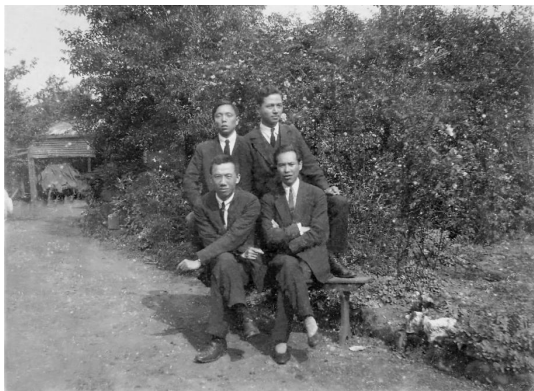
1967年12月30日，皮宗石先生因患脑出血在武汉去世，享年80岁。

据资料记载，皮宗石1903年考取湖南官费赴日留学，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在日本，他结识了湘籍革命人士黄兴、宋教仁、林伯渠等。1905年8月，皮宗石在日本认识了孙中山先生，正式加入同盟会。当时蔡元培是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皮宗石多次奉同盟会委派从日本回国办事，其中在上海的联系人就是蔡元培，两人的深厚友谊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辛亥革命成功后，皮宗石从东京回国。黄兴设法为他申请了公费赴英国留学，皮宗石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在伦敦，他结识了王世杰、李四光、丁西林、陈源等中国留学生。

从东瀛到英伦再到法兰西，皮宗石从青年时代起，无问西东辗转求学，回国后在多所高校从事方兴未艾的现当代高等教育和管理，持续21年。他推崇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爱护学生，尊重教师，鼓励学术研究，支持社团活动，宣传抗日救国。

在武汉大学任教务长期间，皮宗石除在教学、教务方面尽心尽



皮宗石(后左)与李四光(后右)等在英国

力外，更以豁达兼容、刚毅坚卓之精神，在武大建设筹款诸方面，表现出了创造性的卓越的执行力。武大法学院的教学楼是皮宗石等湘籍教授向当时湖南省政府争取了 12 万元捐款建成的；理学院和工学院的部分教学仪器设备，也是皮宗石等联系中华文化基金会捐赠的。



时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的孙洪芬(左四)为支援武大理、工两院购买设备的部分经费，来武大考察，与皮宗石(左三)等人合影，叶雅各(左一)、查谦(左二)、周鲠生(左五)、陈源(左六)



皮宗石在武汉大学工作的九年，协助王世杰、王星拱两任校长，本着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很快把武大办成了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



在英国留学时与湖南籍留学生一起合影。前排左一杨端六，前排中皮宗石，后排左一任凯南，后排右一李毓尧，后排右二周鲠生

珞珈山的第一代孩子

皮公亮 1925 年出生于北京，1932 年至 1936 年就读于武大附小，1936 年至 1937 年就读于私立武昌东湖中学（武大附中前身之一）。1936 年 7 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命令，省立湖南大学改为国立湖南大学。行政院简任皮宗石为国立湖南大学首任校长，皮家从武汉搬到长沙。抗战期间，皮公亮与父亲历经艰辛逃难至重庆，于 1944 年就读于乐山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次年考入经济系，1946 年随校迁回珞珈山，1949 年夏天毕业。

特殊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植根于心底，武大不仅是皮公亮发蒙的学校，更是他自幼的家园。皮公亮亲历了国立武汉大学在父辈们手上从无到有的过程，他伴随脚手架在荒草丛生的罗家山上搭起



而一天天成长，并一天天看着罗家山变成灰墙绿瓦的珞珈山。他自己从懵懂孩童到情窦初开，收获知识也收获爱情，及至从武大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服务社会、为国效力。他对武大的深厚感情可谓血浓于水。



1931年，住在武大老十八栋的一群发小（左起）叶绍智、叶葆宁、杨静远、皮公亮、叶绍俞。摄于武大校园内的拖拉机上



1930年，皮公亮（左）与发小叶绍俞（叶雅各儿子），摄于文华中学

1932年，皮公亮在武大附小就读。当时在附小执教的师资中，曾有多位武大教授兼职。学长告诉我，著名美术教育家、中国画家端木梦锡，曾是他小学三年级时的美术教员。

武大附小实行小班制教学，一个班级最多十来位学生，多为武大首批教授的子弟，多住在老十八栋，彼此相熟。他们生活在四季有不谢之花、八节有长青之木的武大，流连于东湖一带的湖光山色中，春捉蝌蚪、冬打雪仗、夏粘知了、秋采野果。陈小滢（陈源之



女)学姐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她的童年“就是和小伙伴在草丛中打滚,疯跑,你追我赶”。这群孩子中先后出了两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查全性、杨弘远。

1928年11月国立武汉大学成立,1929年确定珞珈山一带为新校址。王世杰校长为了实现“创造一个新的武汉大学”的愿望,决定修建“良好的校舍”以“提高教授的待遇”。1931年,学校在珞珈山东南面山腰上一共修建了十八栋错落有序的英式洋楼,作为知名教授住宅区,统称珞珈山“十八栋”。第1栋住过杨端六、袁昌英夫妇等;第2栋住过刘迺诚、陈源(陈西滢)凌叔华夫妇等;第3栋住过查谦和桂质廷等;第4栋住过范寿康、陶因、钟心煊等人;第5栋住过郭霖和蒋思道;第6栋住过缪恩钊、高翰;第7栋住过陶延桥、李儒勉;第8栋住过王星拱、皮宗石、刘正经;第9栋住过查谦、余炽昌、吴维清和席鲁思;第10栋住过汤佩松、方重、陈鼎铭、吴于廑以及刘炳麟和查谦;第11栋住过周鲠生、刘秉麟;第12栋住过徐天闵、张有桐、方壮猷;第13栋住过叶雅各;第14栋住过邵逸周(后改为招待所);第16栋住过葛杨焕等;第17栋住过陈华葵、周如松夫妇;第18栋则分别住过三任校长王世杰、王星拱和周鲠生;第19栋和第20栋有周恩来、汤藻真、刘永济、高尚荫等人先后住过;第21栋则住过许崇岳。

我不知道怎样描述学长童年和少年时代丰衣足食、安富尊荣的生活场景。那个时代,能够过上皮公亮一样优渥生活的同龄孩子,绝对是万里挑一的。学长是独子,学富五车的父亲,按月领着550元现大洋的俸禄,一家三口住在珞珈山老十八栋上下四层的“独栋别墅”里,电灯电话,24小时热水供应,雇有保姆厨子各一人,为三口之家打理家政……为了让住在十八栋的名教授们专心教学科研工作,学校专门安排往返汽车定时接送。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到1946年,国立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师生怀抱“明诚弘毅”的校训和“教育报国”的理想,恪守自由民主的校风、严谨高端的教风、笃实勤恳的学风,励精图治,坚韧乐观地度过了八年艰难岁月。

1944年,已经随父离开武汉珞珈山入住长沙岳麓山7年的19



岁皮公亮，考入乐山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后转入经济系。



1944年，皮公亮就读于乐山时期的武大

彼时的皮公亮不再是养尊处优的贵公子，湖南大学从长沙搬到湘西的辰溪，他独自去到沅陵，在雅礼中学念高中，寒暑假才能与父母团聚。

《巨流河》的作者、前辈学姐齐邦媛，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她当年也是从湖南逃到乐山去念武大的，“我认识齐邦媛，在乐山她是高班生，我是低班生，我认得她但没说过话”，皮公亮对《巨流河》里描写的逃难经历的细节如数家珍。

乐山两年，皮公亮亲身亲历了武大学人破庙里弦歌不辍、打伞遮漏苦读，参加远征军做翻译，校长养猪，教授种菜等日常教学科研和衣食住行；体验和见证了武大学人在艰难困苦中不屈不挠、立志为学的事迹与风骨。武大师生的艰苦与辉煌，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守与薪传，点点滴滴注入了他的心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013年11月28日，当年第一代珞珈山的孩子王秋华（王世杰校长女儿，现住台湾）、皮公亮相聚武大。

晚年皮公亮

皮公亮学长的岳父刘永济（1887—1966）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古典文学家、词学家。刘永济字弘度、宏度，号诵帚，晚年号知秋翁，室名易简斋，晚年更名微睺室、诵帚庵，湖南省新宁县人。1911年肄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942年至1949年主持成立国立武汉大学文科研究所，兼任研究所主任，同时担任文学院院长，代理校长。刘永济先生对屈赋和《文心雕龙》研究深厚，主要著述有《文学论》《十四朝文学要略》《文心雕龙校释》等。

1956年，经教育部批准，刘永济被评为高教一级教授。1949年后任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文学评论》编委等职。

在刘永济先生著述丰厚的一生中，“文革”前公开出版发行的专著主要有六种：《文学论》《国风乐府合选》《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十四朝文学要略》《屈赋通笺》《文心雕龙校释》。“文革”结束后，经其长女刘茂舒编辑出版的刘永济遗著主要有《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等十种。



1966年10月2日，刘永济先生不堪忍受所遭受的批斗、毒打、辱骂等摧残，死于家中。3个多月后，他的夫人，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曾担任湖南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黄惠君女士因悲痛太甚，自缢于自家厨房。

1979年5月15日，武汉大学在体育馆为蒙冤去世的刘永济先生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追悼仪式；其夫人黄惠君的冤案亦于同日举行了平反昭雪仪式。1985年4月25日，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批准，为刘永济黄惠君夫妇合葬立碑，建墓于武汉市九峰山陵园。



刘永济先生全家福，“文革”前摄于武汉大学。前排：刘永济（右）与夫人黄惠君（左），后排右起：长女刘茂舒，儿子刘茂瑞，次女刘茂新

皮公亮青梅竹马的妻子刘茂舒，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是刘永济教授的长女。不幸于1993年12月1日心梗去世，享年68岁。

皮公亮与刘茂舒1933年相识时只有8岁。两人都是著名教授



的后代，同在武大附小读书，后来又一起就读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1946年一起随校返回珞珈山。

刘茂舒1950年从武大毕业后即进入汉口《大刚报》工作，后随报社变更为武汉市委机关报《新武汉报》《长江日报》做了编辑记者，1963年奉调回武汉大学，协助父亲工作。刘永济先生蒙冤去世后，刘茂舒整理、编辑、出版的父亲遗稿著述主要包括：《诵帚庵词两卷》（1980）、《唐五代两宋词简析》（1981）、《词论》（1981）、《元人散曲选》（1981）、《唐人绝句精华》（1981）、《屈赋音注详解·附屈赋释词》（1983）、《十四朝文学要略》（1984年）、《刘永济词集》（1984）、《微睇室说词》（1987）、《云巢诗存·默识录》（1992）十种，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学、训诂学、目录校勘等学科领域。

刘茂舒秉持父亲严谨求实的学风，生活低调，但在专业领域却长袖善舞、游刃有余。她编辑出版了父亲刘永济先生十余种传世遗著，以卓异的学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她借调到北京全国妇联主办的《中国妇女》杂志担任英文版编辑时已年近六旬，却凭着武大外文系毕业的专业学养，能将著名作家数万字的英文作品缩写成四五千字。她一气呵成的长文《唤回心底十年人——追忆我的父亲刘永济教授》，不啻为血泪交融的绝唱。

皮公亮与刘茂舒相识60年，恋爱5年，结婚43年，是一对琴瑟和谐、情真意笃的恩爱夫妇，他们相互敬重，彼此欣赏，低调行事，历经风雨波澜不惊。

爱妻的突然离世，使皮公亮的精神和身体均遭受重创。加之住在5楼没有电梯，每天上下楼梯愈来愈吃力，几年前，学长住进了汉阳区社会福利院。

谁也没有想到，学长的入住，一下使武汉市这家相对偏远的公立福利院知名度爆棚。每周都有好几波这样那样的机构媒体或牵挂皮老的老老少少亲戚朋友等，上门去看望他、采访他。我两次去看望他，刚报出名字，保安就笑了，直接将学长所住楼层和门牌号告诉了我。我跟学长打趣，没想到您做了一辈子新闻记者，老了变成新闻人物了。



唯有母校不能辜负

今年是“珞珈山的第一代孩子”皮公亮学长从武汉大学毕业 70 周年(1949—2019)，也是他老人家从事新闻工作 70 周年。当年他的那一群发小，目前健在的已寥寥无几了。

我去福利院面对面采访学长两次，他老人家年事已高，不方便较长时间讲话，而长江日报社与他同龄的同事和友人，目前健在的已不多。学长淡泊宁静，鲜少将自己的过往与人谈起，所以我采写他本人的日常故事时，占有鲜活材料的路径相对狭窄，给本文留下不少遗憾。但我笃信，原生家庭和生长环境对一个人性情与人格的养成几乎是决定性的，一个人从何处来，最后到哪儿去，存在着逻辑上的联系。

我知道，每一位毕业生都是母校的名片，一代一代珞珈山的孩子们，共同聆听着“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校训，在茫茫人海中坚守着母校赋予的豁达兼容人格，敬畏朴诚勤严以人为本，恪守开拓创新敢为人先。无论生命存在或者消失，唯有母校不能辜负。

本文采写过程中得到学长儿子皮明远先生支持，特此致谢。

作者系中文系校友



我的导师朱英国院士

孙 俊

武大的学子们都会铭记珞珈山、东湖水、三月樱、八月桂，还有行政楼边上的九一二广场，梅操的周末露天电影。而我的武大时光有一段是在湖滨枫园尽头的稻田边度过的。30年前，在那里，我师从导师朱英国教授，探索湖北光敏核不育水稻的遗传学机理，开始了人生第一次科研学术研究。

1988年底，遗传班的学生导师丁毅老师通知我和另外3名8562班的同学，说我们有保送免试研究生的资格，可以开始联系硕士导师了。我去找高年级的同学打听，他们异口同声建议我去联系朱英国老师。他们的原话是：“朱老师刚刚拿到国家的863大项目，经费富余，足以养活整个生物系。”于是，我来到朱老师在湖滨的植物遗传所。在当年的遗传学界受苏联米丘林的环境论影响很大，摩尔根学派的基因论没有多少声音；朱老师的课题是研究湖北光敏核不育水稻的遗传学机理，有理论新颖性，也有应用潜力。面试时，朱老师问我的动手能力如何，怕不怕吃苦等，我都一一作答。于是，我在1989年有幸成为朱老师的第一名女弟子、第三位研究生。我也见证了朱老师实验室创立早期的艰辛和后来的发展。

在湖滨的实验室和水稻田工作，我初次体会到科研的甘苦和农人的辛劳。我们的实验材料是水稻花粉和叶片。在湖北，一年只有两季水稻，为了增加一季实验，冬天，实验室的老师们到海南去育种。那儿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我多次主动向导师提出去海南，他都微笑着说再等等。后来我知道，老师是顾虑在试验田边找厕所都难，女生去确实不方便。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国内的科研设备有限，经费有限，年少气盛的我想到学校测试中心做实验，使用刚刚进口来的新仪器。我跟朱老师说：“请您给我转 3000 元到测试中心，我保证出好结果。”3000 元是当时武大教授月工资的 20 倍。没想到老师爽快地答应了。后来，我在武大测试中心用透射电子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水稻的线粒体叶绿体在细胞水平的结构变化，顺利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我使用的不是当时遗传学的传统手段，我的导师给予了我充分的学术自由，让我利用最先进的科研技术去探讨机理。俗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师生关系也是类似的。我是在自己带了研究生后才真正体会到朱老师教书育人的良苦用心。2018 年在美国，我和学生们一起用电子显微镜观察自吞噬引起的细胞结构变化，我还给他们讲起这段往事。



人文馆前合影，左二为作者孙俊、左六朱英国院士

1999 年，朱老师的湖北光敏核不育水稻的遗传学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老师把获奖证书寄到广州给我，我在硕士期间观察到细胞器的结构和功能变化，也是成果的一部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个奖励的分量。后来我改学生物化学，在海外从事肠炎肠



癌的病理研究。2010年，我回国到武大中南医院消化科讲学，朱老师特地赶来中南医院。师生相见，我说：“您当年教我学水稻，我现在研究肠道。”老师依旧是理解而宽厚地一笑。

2017年8月9日，老师去世的噩耗传来时，我刚从芝加哥飞抵英国伦敦的机场。一到地面，就看到师弟李学军的短信，我无法相信老师的离去。在我的心目中，朱老师永远是中年人的模样：勤奋、认真、沉着、善良。就像老校长刘道玉所描述的：“他从不抱怨，总是脚踏实地，追求他心里的梦想。”

我到国外后对植物遗传的关注减少了。其实，导师的成就和影响早已让他成为国宝级的专家和学术界的楷模。朱老师很喜欢一段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老师用一生的实践，成就了大师级的事业。

作为学生，我永远记得的是朱老师宽厚的笑容和对科学赤子般的热爱。老师在走向成功的路上，曾有过无数次面对困难、误解和挑战时的宽厚一笑。他对学术的热爱就像火炬，照亮着崎岖的攀登之途，令他勇往直前。他用榜样的力量启迪后学，让更多的武大人传承这种纯粹的科研精神。

30年来，我会常常想起武大时光。学术路上的艰辛，后来，我也深切体会到了。身为珞珈学子，觉得尤为珍贵的是：我接受了大学老师传给我们的人文财富，让我们学会做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单纯的学者，直面自己热爱的专业，尽心做喜欢的事情；面对任何世事变化、流言蜚语，都能报以宽容的一笑。

作者系生物系1985级校友



说说民国时期的武大法学院

涂上飙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国民政府通过整顿学风、落实经费、限制滥设、整顿院系、调整课程、充实设备、注重实科等措施，使得大学不断成长壮大，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国立、省立和私立大学。在这些大学中，学院制普遍盛行，出现了一批实力强劲的学院。当时，有人认为北大的“文学院”、清华的“理学院”、交大的“工学院”、金陵大学的“农学院”以及武大学的“法学院”，是国内最有地位者，称为大学中的“学院之王”。下面对“法学院之王”作一介绍。

一、“法学院之王”的基本情况

20 世纪 30 年代，大学里普遍实行学院制。在发展过程中，武汉大学法学院成为当时最为有名者。

国立武汉大学初创时，根据王世杰校长的意思，要将武汉大学办成一所拥有文法理工农医 6 个学院、具有崇高理想、规模可达万人的综合大学。现在校门牌坊背面书有“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字，即代表的是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和医学院。

1928 年新大学组建时，设有 3 个学院，即文学院、社会科学院和理工学院。社会科学院设政治经济学系。1929 年 4 月，王世杰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上任后，将社会科学院更名为法学院，并在法学院增设法律学系和商学系。1930 年，法学院的政



经济系分为政治学 and 经济学两系。1932 年 9 月，法学院所属的商学系又并入经济学系。

在法学院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皮宗石（1929—1932）、杨端六（1933—1936）、刘秉麟（1937—1938）先后任院长。法律学的系主任，先后为燕树棠（1930）、王世杰（1930—1931）、皮宗石（1932—1933）、周鲠生（1933—1938）。经济系的主任先后为皮宗石（1930—1931）、任凯南（1932—1936）、陶因（1937—1938）。政治学系的主任先后为周鲠生（1930—1934）、时昭瀛（1935）、刘迺诚（1936—1938）。

作为一个人才培养单位，法学院培养了不少法律政治经济专门人才。这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招生中可以窥见一斑：

年度	招生人数			
1930	法律学系 27	政治学系 18	经济学系 25	商学系 1
1931	法律学系 30	政治学系 10	经济学系 36	商学系 7
1932	法律学系 14	政治学系 8	经济学系 23	
1933	法律学系 8	政治学系 4	经济学系 20	
1934	法律学系 6	政治学系 8	经济学系 28	
1935	法律学系 12	政治学系 10	经济学系 37	
1936	法律学系 9	政治学系 10	经济学系 38	
1938	法律学系 17	政治学系 21	经济学系 53	

在培养本科人才的同时，还招收了研究生。1931 年学校决定创办大学研究院，1934 年通过了《法科、工科研究所组织章程》，1935 年法科、工科研究所成立。法科研究所下设经济学部，任凯南为学部主任。1930 年法学院招收 3 名研究生：李谋盛、刘特读，入学后进入行政门学习；刘涤源，入学后进入财政金融门学习。



20 世纪 40 年代，虽然是一个战乱的年代，但法学院的教育并未因此减弱，反而在 30 年代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发展，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也越来越大。从 1943 年的情况来看：法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中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史门、会计门、财政金融门以及政治学部的行政门、政治理论门和行政法部门都进行了招生。

20 世纪 40 年代，法学院招收的研究生有：1940 年共招收研究生 4 名：王名扬，进入行政门学习；黄仲熊，进入财政金融门学习；余长河、文浩然，进入经济政策与经济史门学习。1941 年招收 1 名研究生刘伯玲，进入行政门学习。1942 年共招收 4 名研究生：王沛珩，进入行政门学习；姚贤镐，进入财政金融门学习；何广扬，进入经济理论门学习；周林，进入法科研究所学习。1943 年共招收 7 名研究生：晏孝祺，进入行政门学习；邱坤，进入政治理论门学习；陈安明，进入行政法部门学习；项恂达（女），进入行政法部门学习；尤钟骥，进入财政金融门学习；甘士杰，进入财政金融门学习；谢国璋，进入经济理论门学习。1944 年共招收 4 名研究生：丁良诚，进入经济理论门学习；黄滋，进入经济政策门学习；袁徵益，进入会计学门学习；谭本源，进入财政金融门学习。1945 年共招收研究生 4 名：曾启贤，进入经济理论门学习；朱馨远，进入经济政策门学习；鲁庭椿，进入会计门学习；万典武，进入财政金融门学习。

二、成为“学院之王”的原因

有一批一流的学者

武大的法学院在当时国内具有很高地位，这与学院有一批一流学者不无关系。此时的三位院长都是赫赫有名的学人，不仅有海外背景，留学出身，而且很早都成就了功名。

首任院长皮宗石是研究财政学的经济学家，湖南人。早年加入同盟会，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在汉口创办《民国日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后转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学成后应蔡元培的



邀请到北大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与王世杰、周鲠生等是北大法学院的台柱教授。1928年，皮宗石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社会科学院院长，后又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1936年回湘担任湖南大学校长。

法学院的第二任院长是著名的货币金融学家杨端六，湖南长沙人。曾经留学英国，专攻货币银行学，20世纪40年代的部聘教授。1920年回国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次年担任商务印书馆会计科长。1928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出任所长并任研究员。1930年5月受聘为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教授，讲授货币与银行、会计学、企业管理学等，1932年至1936年担任法学院院长。著述甚丰，主要著作有《商业管理》《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货币与银行》《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等。

法学院的第三任院长刘秉麟生于湖南长沙，是著名财政学家，20世纪40年代的部聘教授。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班、德国柏林大学经济系研究员班毕业。1932年任学校经济系教授，1937年任法学院院长，后担任过代理校长。出版有《各国社会运动史》《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史》《李嘉图经济学说及传记》《亚当·斯密经济学说及传记》《李士特经济学说及传记》等专著。

除了三位院长外，法律、经济和政治三系的系主任个个也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法律系第一任系主任为燕树棠，是著名国际法学家，留学美国，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大法学院教授，1928年到武汉大学任法学院教授，后又任北大法学院教授、西南联大法律系主任，1948年任司法部大法官。后又第二次回武大任教直到去世。

第二任系主任为王世杰。王世杰曾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辛亥革命爆发，回武昌参加革命，任鄂军政府秘书。“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欧洲留学，191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士学位，不久转赴法国，1920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0年冬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法律系主任。1927年6月任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1929年5月至1933年5月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后



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外交部长。1948年3月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去台湾，历任“总统府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总统府资政”。著有《比较宪法》《宪法原理》《中国奴婢制度》《王世杰先生论著选集》，主编《故宫名画300种》《艺苑遗珍》等。

第三任系主任为周鲠生，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参加同盟会。1913年赴欧洲留学，先后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和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1年回国后，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经济部主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1928年7月任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29年9月至1939年6月，任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兼政治系、法律系主任，法科研究所所长，教务长。后赴美国从事讲学和研究。1945年7月回国，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直到解放。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部副主任、外交部顾问等职。著有《国际法》《近代欧洲外交史》《近代欧洲政治史》《不平等条约10讲》《现代国际法问题》《国际政治概论》等。

当时法律系的教授还有吴歧、吴学义、胡元义、陶天南、蒋思道、刘经旺、葛扬焕等。

经济学系在法学院中是整体实力最强的，前面所叙三任院长都出身经济系，实力强且名气大。经济系的系主任除了皮宗石外，任凯南和陶因两任系主任也是非常有名的教授。

任凯南，字拱辰，湖南湘阴人（今汨罗市），近代著名教育家、经济学家。曾官费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辛亥革命后，在汉口与皮宗石、周鲠生、李剑农等创办《民国日报》。后又官费留英，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获博士学位。来武汉大学前曾任省立湖南大学校长。1928年8月，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32年10月，出任武大经济系主任，1935年兼任武大法科研究所经济学科主任。1937年7月，回改建后的湖南大学任教务长兼经济系主任。一生精研西洋经济史和西洋经济思想史，融汇中西，成



一家之言，在武汉大学任教时期声名远播，被经济学界誉为“南任（凯南）北马（寅初）”。

陶因（1894—1952），号环中，安徽舒城人。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后又在德国获得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28年任广东中山大学教授。1929年到安徽大学任教，任法学院院长。1930年9月被聘为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教授，1936年被任命为经济学系主任。1946年初，教育部决定重建安徽大学，后被任命为安徽大学校长。陶因也是我国经济学泰斗之一，有“南陶北马”（马寅初）之说。主要著作有《经济学史》《经济学大纲》等。

经济学系的教授还有朱祖晦、戴铭巽、伍启元、韦从序、钟兆璿等。

政治学系的主任除了周鲠生是全国闻名的大家外，时昭瀛、刘迺诚两位在业内也是耳熟能详的人物。

时昭瀛（1901—1956），湖北枝江人，外交家，汉学家。清华大学政治系毕业，英国明尼苏达大学学士，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硕士。回国后，任《中央日报（英文）》总编辑、中央大学外语系副教授、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等职，曾为蒋介石讲述国际法纲要，担任过中华民国外交部次长。著有《近世中国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研究》等。

刘迺诚，号笃生，安徽巢县人，伦敦大学博士，柏林市政学院卒业，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研究员，1932年9月到校任教。其《比较政治制度（英法美）》（上卷）、《比较政治制度（德俄意）》（中卷）及《比较市政学》（上卷）等著作，都是当时影响很大且有分量的专著。

政治学系的教授还有樊德芬、张有桐、邵循恪、鲍必荣、吴之椿等。

有一批丰硕的学术成果

此时的法学院之所以有“学院之王”的美名，一是有上面一批响当当的学人，二是与这批学人都有丰硕的学术成果有关。

王世杰是公认的宪法权威，其《比较宪法》是当时高校法学专业必用的大学教材。周鲠生、燕树棠在当时是国际法的两根台柱



子。周鲠生的《国际法》是世界国际法学中自成一派的法学著作，在我国国际法学界具有权威地位，也是当时解决国际争端必看的理论指导书。刘迺诚是当时政治学界耳熟能详的人物，他的《比较政治制度》（上、中、下卷）可以说是一套鸿篇巨制，通过对英、法、美、德、俄、意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比较，为当时的政治建设提供理论借鉴，也是高校政治学专业的重要参考书。

经济学领域名家繁多。杨端六、刘秉麟、任凯南、陶因等都是该领域红遍中国的人物。如经济学教授杨端六，不仅著作多，而且关于中国金融、币制和税制等方面研究的论文也颇丰，深受国内外同行学者的好评。他的《六十五年来中国贸易统计》一书，成为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填补了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研究的空白，成为重要的外贸参考书，也是宏观管理外贸的依据，至今仍受到重视。他的著作《货币与银行》于193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一直作为教科书，以后每年修订，被列为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再版多次，20世纪40年代大多数大学经济系都用它作教材。他第一次把现代会计原理和商业活动有必要采用的现代会计方法介绍给中国商界，被称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他的《工商组织与管理》教材，不是专门谈科学管理的著作，而是全面介绍了工商企业的组织与管理。因此，有人评价杨端六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管理科学化的重要先驱者之一。

除上面所说以外，20世纪30年代法学院的教授们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有如下一些成果：

经济学著作有：杨哲明《市政工程ABC》；王昌华《检查实务》；杨端六《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会计学——官厅会计》《会计学——官厅会计、票据制度、分店会计》；彭迪先《近代资本主义进化论》；陶因《经济学大纲》《外界赠阅期刊一览表》《农业政策》；谢举荣《现贴问题》；朱祖晦《国际贸易 市政计划》《经济选读（一）》《经济学英文选读》《统计学入门》《人口统计新论》《三十年之汉口外汇拨数》《会计名词中英文对照表》《人口统计新论》；李剑农《中国经济史（古代之部）》；刘秉麟《近代中国财政史》《现代中国财政史》《近代中国财政经济》《银行学纲要》《财政学目录》《财政学



大纲》《中国古代财政小史》《经济学》《经济学原理》《分配论》《公民经济》《亚当·斯密》《理嘉图》《李士特》《俄罗斯经济状况》《凡系主义》；任凯南《经济思想史》。

政治学著作有：刘秉麟《各国社会运动史》《社会运动史》《世界各国无产政党史》；郑孝齐《各国社会运动史》《近代中国政治史》；李剑农《政治学概论》；张有桐《社会学原理》《社会学纲要》《社会学》；刘迺城《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制度（英法美）》（上卷）、《比较政治制度（德俄意）》（中卷）；张百高《晚近社会学之主要趋势》；樊德芬《英国首相制与美国总统制之比较研究》《英国工党世界和平政策》。

法学著作有：吴岐《劳工法》《劳工法讲义》；葛扬焕《刑法分则讲义》；蒋思道《刑法总则》《行政法》《新〈刑法〉之理论的基础》《刑事诉讼法讲义》；刘经旺《海商法》《票据法》《保险法讲义》《债编各论》《公司法讲义》《保险法》《债编各论讲义》《票据法》；胡元义《民法继承》；周鲠生《条约之国际的效力》《国际法大纲》《国际组织的发达》《国联的前途》；孙芳《民法总则》；吴学义《权利妨害与权利的滥用》《法学纲要》《破产法讲义》《民事诉讼法讲义》《民事诉讼法》《民法概要》《法院组织法》《劳工法》《中国民法总论》；陶天南《行政法讲义》《法律哲学》《国际私法》；周新民《物权法要论》；张熙存《继承法讲义》；李浩培《国际私法》。

以上统计，并非全部，只是依据所能见到的材料进行了统计，仅仅涉及著作中的一部分，不包括论文。

三、“法学院之王”的影响

武大法学院的发展，对武大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因法学院的影响和带动，学校获得国际国内的认可

20世纪30年代，国立武汉大学经过调整、整合，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武大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阶段之一。截至1936年，学校已有文（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哲学教育系、史学系）、法（法律



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理(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工(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农(农艺系)5学院14学系。五大学院尤其以法学院实力最为强劲。学校因有法学院的王世杰、周鲠生、燕树棠、杨端六、刘秉麟、任凯南、陶因等一批名教授的影响,名气不断扩大,在20世纪30年代与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并誉为“民国五大名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武汉大学与全国众多高校一样迁往内地办学,千余名师生以空前的爱国热情前往四川乐山。在这里,教授们尤其是法学院的刘秉麟、周鲠生、李浩培、刘迺诚、陶因、杨端六等名家在此任教。他们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始终屹立讲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所需人才。在这里,为推进内地的社会教育,他们进行了抗日宣传、民众教育、学术介绍、经济调查、法律咨询等活动。在学术讲演中,燕树棠、刘秉麟等名家纷纷登上社会讲台。杨端六还开办了几期短训学校,办起商业簿记补习班,为平民增加商业知识。法学院的教师们在勤勉教书、笃实育人的同时,学术研究笔耕不辍,杨端六的《货币与银行》、刘迺诚的《比较政治制度》等著作,都是勤勉治学的结晶。因学术地位的提高和社会声誉的大涨,学校与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大和国立浙江大学一道,被世人并誉为抗战“四大名校”。

1946年武大从乐山迁回珞珈山以后,法学院以其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优势得到国际认可。1948年2月20日,教育部国际文化教育事业处函告学校:英国牛津大学已认可武大本本科毕业生在牛津的研究生地位。即武大的毕业生凭学习成绩即可申请攻读牛津大学的研究生。享有同等待遇的还有北大、清华、南开、中央(大学)、浙大及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六所院校。

法学院为全国师资力量最为强大者

说法学院的师资最强,可以从教育部进行的两批部聘教授的评选中窥见一斑。部聘教授是20世纪40年代由教育部直接聘任的教授,是当时中国教育界的最高荣誉,有人称之为“教授中的教授”。



它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实施的尊师重教、稳定队伍的一项重要举措。

部聘教授的推荐和评选，由教育部指定吴俊升、傅斯年、吴稚晖、竺可桢等 30 余人组成的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负责。参加部聘教授的评选须具备下列条件：在国立大学或独立学院任教授 10 年以上；教学确有成绩，声誉卓著；对于所任学科有专门著作，且具有特殊贡献。部聘教授须由教育部提经学术审议委员会全体会议出席委员 2/3 以上表决通过。

部聘教授名额定为 30 人，每学科 1 人。这些学科包括三民主义、经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史学、哲学、教育、艺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心理、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商学、农学、林学、土木水利、电机、机械航空、矿冶、生理解剖、内科医学、外科医学等。每科以设 1 人为原则，“宁缺毋滥”。实际上，三民主义、艺术、气象、商学以及外科医学因未有人选而取消，而将内科医学一科改称医学，经学与中国文学归并为中国文学科。裁并结果，最后剩下 24 科。于是，将各科设置名额重新进行分配：中国文学、史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6 个基础学科各设 2 人，其余 18 科各设 1 人，总人数不变，仍为 30 人。

部聘教授的推选共进行了两批。第一批在 1942 年 8 月。该批全国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总数为 156 人，最后经学术审议会临时常务会议表决，共有 30 人入选。他们是杨树达、黎锦熙、吴宓、陈寅恪、萧一山、汤用彤、孟宪承、苏步青、吴有训、饶毓泰、曾昭抡、王琏、张景铨、艾伟、洪式间、蔡翹等。武汉大学的周鲠生、杨端六当选。

第二批部聘教授推选在 1943 年 12 月。计有中国文学胡小石（光炜）、外国文学楼光来、历史柳诒徵、哲学冯友兰、教育常导直、数学何鲁、物理胡刚复、政治萧公权、法律戴修瓚、经济刘秉麟、农学邓植仪、工科刘仙洲、化学高济宇、医科梁伯强、艺术徐悲鸿共 15 人。除胡光炜外，其余都是以推荐票数第一位者当选。武汉大学的刘秉麟当选。



部聘教授人数的人员分布情况为：国立中央大学 13 人，西南联合大学 9 人，国立浙江大学 4 人，国立武汉大学 3 人，国立中山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国立重庆大学各 2 人，其余 10 家单位各 1 人。

从上可以看出，武大入选的三位教授全部来自法学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校的法学和经济学科的实力和科学研究水平。

“法学院之王”虽是对武大的一种赞誉，但确实是武大学科实力强劲的一种表现。

作者系历史系 1984 级校友



梦回珞珈

汪 洋

我一共读了三所大学，本科是在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那时简称“水院”，现为武汉大学工学部）读的，硕士是在上海一所大学读的，博士是在国外读的。我也参观走访过不少海内外美丽、著名的大学，母校武大的美景及当年在母校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记忆，我对母校的怀念之情已深深融入到血液里。当年许多美好的画面和场景虽已久远，却都已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不时在梦里浮现。

1978年夏的一天，我正在老家豫南大别山的一个田埂砍着柴，忽见大队支书向我走来，他笑嘻嘻地对我说：“汪洋，恭喜你考上大学了，这是你的录取通知书。”我连忙放下手中的镰刀，小心翼翼地接过一个又大又厚的信封，只见一张红体字的欢迎信展现在我眼前：“欢迎你，新同学！珞珈山在起舞，东湖水在欢笑……热烈地欢迎你，亲爱的新同学！”就这样，一个还不满17岁的砍柴娃，非常幸运地从当时落后贫穷的大别山农村来到了武汉：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来到大城市，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别样的。

母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校园的壮观和美丽，她坐落于珞珈山，毗邻东湖，东湖水茫茫，珞珈山苍苍。母校早期的建筑是由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选址规划的，雄伟壮美的建筑群与山水融为一体，宛若自然天成。母校的樱花更是扬名海内外，每年樱花盛开时，到处人山人海，形成了不只是人在赏樱花、樱花也在观人潮的奇异美景。

母校校园如诗如画，到处都是美轮美奂、中西合璧的建筑。我



印象极深的是坐落在楼顶的老图书馆，它最蔚为壮观，是母校的地标性建筑；其次是依山而建的、以《千字文》中“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命名的大学生宿舍：如天字斋、地字斋等，它们本身就都是独具魅力的风景，在以武大为拍摄地的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就有真实的展现；再次，就是民国时期的女大学生宿舍——蝶宫，即现在用作外国专家公寓的湖滨一舍，像一只张开翅膀的蝴蝶，矗立在文理学部与工学部的交界处；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就是母校建筑物上随处可见的绿色琉璃瓦了，将母校独具特色的建筑群和校园美景点缀得恰到好处。

由于从小生长在农村，家境贫困，从7岁开始，我就一边上学一边放牛砍柴干农活，从没离开过家乡，更没见过外面的世界，身心尚未成熟；在母校学习的四年，是我身心不断成长的四年，是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逐渐形成的四年。

10月初，我带着亲戚赠送的多种生活用品来到了学校。入住学校宿舍的第一天，一位个头较高、年级较大的高年级同学将林成福同学带到我们寝室，由于林同学只有14岁且个头不高，完全像个孩子，我就纳闷地问那位高年级同学：“你上学怎么还带着儿子？”大个子连忙解释：“不，不，他是你的同学，我是送他来你们宿舍的。”那时高校里确有父子同堂的佳话。

1978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也是首次全国统一高考（1977年虽是第一年高考，却是由各省自行出卷考试的）。水院是全国重点大学，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南腔北调”是我们同学的一大特色，由于我从小没学过汉语拼音和普通话，上大学时我说的就是有点像湖北口音的家乡话。同学们大多是来自“文革”后多届积累下来的初高中毕业生及应届生，年龄相差悬殊，最大的32岁，最小的才14岁。同学们的成长环境相差也很大，有来自大城市的，有来自农村的——超过一半的同学来自农村；有上山下乡、当过兵和见过大世面的，也有从未走出过家乡、从未见过外面的世界的（我就是其中之一），其中吴小芳、吴敏是来自于南昌的一对姊妹花。

我所读专业叫“电厂化学”（现为能源化学工程），当年共招收



了105位同学，被分成3个小班——7891、7892和7893班。我清晰地记得第一堂课是在第五教室上的，当时窗里窗外都飘着阵阵桂花香，大家都充满期待地坐在宽敞明亮的大型阶梯教室里，由陈绍炎教授给我们做专业介绍，谈到电厂锅炉的大小时，陈教授问：“你们知道电厂锅炉有多大吗？”他用双手比划着大教室的样子，说：“电厂锅炉比这个大教室还要大呢！”他讲的话、手势和语气至今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那时，国家正在大力提倡建设“四个现代化”，而我国教育正处于青黄不接、百废待兴之际，能考上大学的比例很低，同学们都非常珍惜上大学的机会，大家对知识如饥似渴。我四年的大学生活基本上是在图书馆、教室和宿舍度过的，除了认真读专业书，还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天文、数学、哲学、历史及其他各种书籍和报纸杂志。我们宿舍还有个习惯——卧谈：晚上熄灯之后，8位同学喜欢躺在4张高低床上谈天说地、评古论今；特别是李汉平，他读书又杂又多，思想活跃，最喜欢跟我辩论，他说的一些话乃至说话时的语气至今我还记得（李汉平同学不幸于2019年4月因患癌早逝）。

武汉的夏季很热，东湖是纳凉的好去处。那时没空调没电扇，特别炎热时，吃过晚饭后，我就和同寝室的孟述安同学一起去东湖边散步，有时一散就是几小时。我们边散步边聊天，他是城里来的，年龄比我大，当过兵下过乡，生活阅历和人生经历都比我丰富，且正在和家乡一女孩谈恋爱。他跟我聊他的趣闻轶事，我则跟他解释学习上的难点疑点，聊着聊着，也就不觉得天热了，时间也就飞快地过去了。我18岁生日那天，孟述安请我到黄鹤酒楼用白酒为我庆祝，我人生中第一次喝酒就醉了，感觉特别美好。

对母校最难忘却的场景是周末的露天电影。一到周末，我们会兴高采烈地拿着小方凳去大操场看露天电影，电影屏幕悬挂在操场中间，正反两面都有观众，反面的影像和文字其实是反的，可大家照样看得兴味盎然。通常是一晚看两部，好多电影都是由世界名著改编的，如《王子复仇记》《基督山伯爵》《佐罗》《东方快车谋杀案》《巴黎圣母院》等；还看过许多记忆犹新的名作：《流浪者》《追捕》《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庐山恋》《牧马人》《少林寺》等。有



一次，大家正在观看《风雪大别山》，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雪，数千观众或打雨伞或不打雨伞，照样津津有味地看完了整部电影。那情那景那场面，是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的。

现在很多人都懒得看中国足球赛了，但在我们那个年代这却是大家的最爱。那时还没有电视，我们是通过收音机“观看”足球的。有一天，世界杯亚洲预选赛中国队战胜了沙特阿拉伯队，许多同学激动得拿起洗脸盆、瓷缸瓷碗，敲盆打碗地庆祝；还有的同学燃起了火把，有的同学把碗和盆扔出窗外以制造声响来庆祝。即使这样，大家还是觉得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各自的兴奋和激动；最后，很多同学干脆自发地走出宿舍去游行庆祝了，一直游到省委省政府门前，边游行还边高喊着爱国口号。“振兴中华”就是从那晚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游行中喊出来的。

尽管我们学的是工科，但那时学校也会组织一些有意义的文艺活动。我们听过中央交响乐团著名指挥家李德伦的音乐讲座，也在体育馆接受过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吴雁泽的艺术熏陶。我们班的业余活动之一是晚上在男生宿舍楼的阳台一起学唱歌，由具有音乐天赋的吴小芳、郭鹏宁同学教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脍炙人口、催人奋进的歌曲就是那时学会的，至今还能张口就唱。

我们还会不时地组织一些集体外出活动。有一次，同学们头天晚上在寝室先包好饺子，第二天再带去东湖边的磨山野炊，灶台是捡的石头临时搭建的，柴火也是在山上拾来的。我们在磨山上吃饺子的香味和开心快乐的场景，终生难忘。

我们那一届大学生应该我国最后一届需要集体学农的。大一的冬季，我们专业的同学一起站在几辆解放牌大卡车上，浩浩荡荡地来到了离校几十千米的東西湖农场。到农场的当天正好赶上下大雪，我就用稻草铺成了床垫。我们本来是要去种小麦和油菜的，结果很多同学却干了搬砖和拾粪的活。我们在农场吃、住、劳动了半个月，尽管当时天气很冷，生活条件也较差，但我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学们也都乐在其中。

那时，每位同学根据家庭经济状况，经个人申请、同学和老师



评选，分别能得到双甲、甲乙、单甲、乙等和丙等助学金，资助标准分别是 17.5 元、16.5 元、14.5 元、11.5 元和 7.5 元，我得到的是双甲资助，每个月由学校发给 14.5 元的餐券，另发 3 元现金作为零用钱。虽然每月的餐费只有 14.5 元，但吃得很好。由于国家采取了上述经济保障措施，我们都生活无忧地顺利完成了学业，我发自内心感恩国家对我们这代大学生的鼎力资助。

那时还会时不时地发生一些激动人心和值得庆祝的事情。大四的某一天，校园里有个地方突然响起了冲天的鞭炮和锣鼓声，原来是水利系一位 1977 级的同学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并被保送出国。这件事让我很是震惊，我原以为考研很难（那时考研与现在相比确实难得多，录取名额极少）。我想，既然同校学生能考上名校的研究生，我应该也可以啊！尽管当时我们的专业在母校并不招收研究生，我也决定考研，于是寒假就不回家了。我去行政楼查看贴满墙的各个高校的招生目录，决定报考上海的某所高校，通过两个月紧张的复习和备考，来年果然考上了硕士研究生。

1982 年 7 月，快乐充实、奋发向上的四年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毕业前，我们班决定向每一位同学赠送一本纪念册，页首由郭鹏宁手工作画，集体赠言由唐福全用钢笔提书，如我的：“献给：同窗四年的学友汪洋。一切过去了的都会变成亲切的怀念。”册内含有每一位同学的肖像照及赠言。每当我翻阅该纪念册和阅读各位同学给我的赠言时，感到既亲切又激动，这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由于同学们感情深厚，毕业后，我们每隔四五年就相约着在不同的城市聚会一次。我们最近的一次聚会，是 2018 年 11 月在母校进行的。由于这次是我们进校及相识 40 周年的聚会，在校的老师们都来参加了。老师同学欢聚一堂，气氛非常热烈。大家一起回忆走过的岁月和时光，都感到无比的温馨和幸福。最让我们高兴的是，40 年前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毕业后大部分同学再未见过的、如今已 90 高龄的陈绍炎教授也来参加了。主持人叶春松同学（也是武大教授）高兴地说：“请大家安静，欢迎陈教授再给大家上一堂课！”陈教授声音响亮地对我们说：“各位同学，本堂课我就给大家



布置三个作业，请你们回去好好研究并找出答案：第一，研究如何做好你的工作和搞好你的事业；第二，研究如何有个美好的生活和幸福美满的家庭；第三，研究如何搞好身体和保持健康。”听完陈教授这堂幽默而又充满哲理的“课”，大家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40年弹指一挥间，我们师生情谊永难忘。

最后，我仍想借助此文表达对李邵箕老师的怀念。李老师教我们“化工原理”，爱生如子，我考上研究生后，他还特意邀请我们考上研究生的5位同学一起去他家吃饭，以示庆祝。可惜李老师在50多岁时就因病早逝了。我永远记着李老师对我们的培育之恩。

.....

母校，是我人生新的起点，是我接受启蒙和长大、成熟的地方，在这里我学到了知识，开阔了视野，更结识了一群亲如兄弟姐妹的同学。有许多记忆虽似遥远，却又好像发生在昨天，至今历历在目。

母校，您是我今生永远的最爱！



大学毕业时的合影



相识 40 周年纪念大会合影



当年的电影券

谨以此文纪念和献给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青春和岁月。

作者系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1978 级校友



回望珞珈山的师长们

吴令华

编者按：武汉大学自创办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迅速发展成为一所拥有文、法、理、工、农5大学院，15个系和2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1938年被迫西迁四川乐山，开始了八年艰苦却辉煌的办学历程。2018年适逢武大西迁乐山80周年，武汉大学报/新闻网特开设专栏以飨读者。

胸有千秋史的高亨

第一次见高亨，大约是1939年秋冬在四川乐山。

那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听见客厅后的小餐室里有客人说话，这在我家是少有的事，便扔下书包进去看个究竟。

只见父亲和一位伯伯正在逼仄的小屋里喝酒，两人的面孔都红红的，看来已喝了好一会儿了。见我进去，父亲对我说：“过来，见过高伯伯。”我腼腆地叫了一声，刚要退出，父亲又说：“告诉妈妈，酒菜不够了，再拿点来。”于是妈妈又切了些卤鸡蛋什么的，还夹了一碟腌瘤芥菜（大概与做榨菜同一原料，不过我母亲是连嫩菜叶一同腌的），说：“在北平时，你爸爸的同学都爱吃我腌的菜。”我端着小菜送去，爸爸随口问我下午上的什么课。当知道是音乐课教唱《长城谣》时，高伯伯兴奋起来了，一定要我唱给他听。爸爸说：“高伯伯是东北人，他的家人都在东北，你好好唱。”我不好意思地唱起来，高伯伯听不够，要我唱了一遍又一遍，还让我唱《松花江上》《高粱叶子青又青》等。我唱得很用心，紧张得声音有



点发抖，但高伯伯听得很动情，闭着双眼，轻扣节拍，眼角微微渗出泪水。

那晚，他和父亲聊到很晚，过不了江，便住在我家。次晨，天微亮，他起床不辞而别。后来，父亲问他：“这么冷的天，为什么不吃早点，至少也洗个热水脸再走？”他笑了：“洗热水脸？那出门才冷呢！”父亲对母亲转述高伯伯的话时，提到“他在清华时就爱在盥洗室光着身子用冷水擦澡，冬天也不停”。

多年以后，我从戴家祥先生写的怀念我父亲的文章中，印证了此事，并知道了当时校园流行这样几句话：“研究院，三宗宝：高叟杨妃吴其老。”其中“吴其老”是指我父亲吴其昌，因在全校大会上唱《道情》“老渔翁”“老书生”而获此尊号；杨妃是杨世恩，曾在《贵妃醉酒》中演杨贵妃而得此美称；而高叟，就是高亨，则以寒冬腊月洗冷水澡引人瞩目。可惜的是，“三宗宝”中的杨、吴二位，寿皆不永，杨世恩自研究院毕业几个月内便在上海溺水而逝，我父亲吴其昌也仅活了40岁，只有高亨，得享86岁遐龄。

当时高亨任武汉大学教授，常来我家，与父亲喝酒长谈。我记得他好像不是在历史系，而在国文系或哲学系。不久，他就离开武大了。

高亨(1900—1986)，字晋生，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研究生。在《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上，有“其所著《韩非子集解补正》六卷，梁任公先生称其‘冠绝’”等语。梁先生还曾对他说：“陈兰甫把《说文》带到广东，希望从你开始把《说文》带到东北。”我父亲也说高文“任公师许以‘不朽’，且谓‘白山黑水之间，绝塞荒寒，文献种子，以高君为第一人矣。’”无论“冠绝”或“不朽”或“第一人”，都可以看出梁先生对弟子高亨的喜爱及高度肯定，并赠以对联：“读书最要识家法，行事不须同俗人。”在做学问上，高亨恪遵师训，认准了清乾嘉学派的高邮二王夫子(王念孙、王引之)的家法，并继承发扬之。

1926年他从研究院毕业，回东北在吉林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完成《老子正诂》二卷，父亲认为足以与乾嘉大老“抗颜夺席”。“九一八”事变起，他全家陷敌，只身入关，来到北平。其时父亲也正



为抗日奔走呼号，愤极哀绝，生人之痛，只得与老友诗书消磨，聊至沸血。不久，父亲南浮江汉，执教武大。高亨又寄来了《诸子今笺》，将出版，父亲为之作序，提出：中华民族近古 1000 年来，先师先哲学风之因革命转变的动力是“求真”。宋明学者之非汉唐，清贤之否宋明，都只是为“求真”，并历数乾嘉以来至当代诸子研究之成就。序作于 1933 年，补充于 1939 年，但高书却迟迟未得出版。直到 1961 年才以《诸子新笺》面世，其中缘由，不得而知。我猜想，这一方面是因为高先生精益求精的严谨学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时局动荡出版不易所致。

高亨晚年执教于山东大学。他为世知名是因为那首《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确是好词，以致有些人误会是毛泽东所作，很快传播开来。于是《人民日报》不得不专门发表一次，署高亨名，以正视听。这也使得他在浩劫的年代里少受些磨难，多做点学问。依我看，高亨胸中烂熟中国千秋史，尤其是 2000 多年前的上古史，他的本色还是学人，如他自己定位的，过“三书”（读书、教书、著书）生活，而不是政治中人。他在易学、诗经学、先秦诸子、文字训诂学等领域的成就，奠定了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他对《周易》的研究独辟蹊径，主张将“经”“传”分开，开创了《易经》研究的新路子。他的《诗经今注》，是我常置案头随时请教的老师。他对先秦诸子书的训诂，以文字声韵通训诂，匡正旧说，言之有据。据赵俪先生说，“除了唐兰，就数他了。”其有些训诂成果已被《汉语大字典》收录。而他的文字形义学、通假字会典，又是汉文字学研究的一座高峰。

读书友谊度时艰

年末检点陈物，几页华笺映入眼帘。那秀丽的笔迹，隽永的诗句，引我回到 70 多年前的乐山，父亲吴其昌和王献唐（凤笙）、高亨（晋生）二先生的诗酒交往。

全面抗战前一年暑假，父亲自武汉先到北平，旋游到山东，到青岛做《民族复兴的自信力》演讲。在济南，获交于时任山东省立



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先生，晤谈甚欢。抗战起，父亲抱病随武汉大学内迁四川乐山。王献唐先生则将图书馆馆藏善本典籍、金石宝彝，装箱运载，移曲阜，过铜山，经汉口，上万州，抵重庆，复西行，计程七千余里，于1938年底达乐山。图书文物妥藏于凌云凌云寺俗称大佛寺侧的岩洞内，而看守人员的工薪一直由王献唐个人负担。在乐山，王曾执教武大，不久，辞去教职，专事著作，寓居于凌云寺下院。

这时父亲可兴头了，授课撰文之余，不顾新染咯血重症，时而踏乌尤，与马老人藏经阁读经，吃斋饭；时而登凌云，与王、高谈史说文，煮老酒。乌尤清幽，凌云高阔，嘉州美景，尽收眼底。国难时艰，朋友相聚，诗书唱和，极文史之乐。

高亨抗战前即已撰成《诸子今笺》一书，父亲曾为之作序，此时更加以补充，指出：“中华民族近古一千年来，先师先哲学风之因革转变的动力是‘求真’。宋明学者之非汉唐，清贤之否宋明，都只是为‘求真’。”对学术界有些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求真的科学精神提出不同的见解。另外，我手头还存有一纸词作，可惜没有落款，但我依稀记得是某次高亨先生来我家饮酒时用我的作业纸笔写的：

沁园春

休说嘉州，苏子楼空，尔雅台荒。叹金瓯形缺，铜驼暗影，沙虫泣月，猿鹤惊霜。河浪膺风，江潮羯雨，不敌英雄血迹香。涂毒处，是千秋涕泪，一度沧桑。

思量。往事堪伤。记当日仓皇去沈阳。更燕台漂泊，梁园羁旅，武关南下，鄂渚西航。万里流萍，八年零雁，直把他乡作故乡。家何在，有愁云漠漠，大野茫茫。

子馨大兄晒正

“八年零雁”，原为“十年”，随更为“八”，可证此词作于1939年。高亨先生是吉林人。清华毕业后，他在沈阳教书，“九一八”事变起，全家陷贼，他只身逃到北平。八年流浪，家国之痛，无过



于此。如果我少年时的记忆无误，不知高亨先生的诗词集中除有“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外，是否还收有此阙？

1940年夏，高先生要去北川，王先生也要到重庆国史馆任职。知音告别，何况又是离乱时期，分外伤感。王先生取出他珍藏的两册“清贤手札”，是清代朴学大师如戴东原、章学诚等十八家的遗翰。他对此书十分珍爱，特写了题记及两首绝句：

青李来禽故不如，风流还似永和初。昭陵劫后铜驼冷，珍重儒林尺素书。（其一）

虫鱼注罢便相寻，一炷清香直到今。正是乾嘉全盛日，论交如见古人心。（其二）

郑重约请高、吴二人题咏。高亨先生的题记畅叙两年相聚之欢：“揖峨庐中，三峨曦曜，孤塔月华，九峰秋云，两江春雨，相与啸敖，时而商论古籀，摭谈经史，杂以谐言，共为拊掌，亦避寇旅居之胜概也。”并期望战后重逢：“异日千佛山边，大明湖上，重开此轶，当别有会心也。”父亲则题四绝句（二和原韵）：

奉题凤笙太史所藏清贤手毕

湖上相逢记昔游，历城亭子饮清秋。兵戈今日西南见，恰似杜林客宜州。（余于二十五年秋薄游济南，始获定交于献唐先生。殤余于东鲁酒家，甚欢。今因国难故重邂逅于川南之嘉州，至可感也。）

赤文青简传奇书，戴孔邵章到硕甫。何必来禽珍逸少，尽堪朴学驾黄初。（集中有戴东原、孔巽轩、邵二云、章实斋、张介侯、周书昌、刘楚桢、刘孟瞻、冯鱼山、何子贞诸帖，下逮陈硕甫，东原再传弟子也。）

张许南雷万代芳，东来寇盗正披猖。纲常忠烈无今古，我欲范金铸陆娘。（内三浦张庚一帖，表彰唐张睢阳之姊氏陆家姑忠烈殉国一节，尤使余心感动不止。）

野史亭荒不可寻，中兴实录草自今。集贤清閤应多暇，独



注虫鱼别会心。(最近中枢新创国史馆，征献唐为史官，不日即上渝都矣。)

并在后记中表露依依不舍之意。值得玩味的是，三人的诗文中，都提到了“会心”“见心”之语，可见相知之深，友情之重。三年多后，父亲谢世。王先生闻知，伤感不已。

多年后，他检阅旧藏，重睹古人手迹，又写下一阙《醉蓬莱》：

醉蓬莱

几番尘劫，踏遍西川，又来东土。倦眼重开，看海宁题署。细字蚕眠，孤灯残蜡，梦向黄炉去。羽换官移，天荒地老，问君无语。

回忆昔年，凌云峰上，煮酒谈经，乱红飘絮。一曲高歌，欲行行还住。喋血疆场，欧心坛坫，报国身同许。如此江山，重翻旧恨，凭谁听取。

亡友吴子馨先生，治卜辞金文为世推重。所《金文世族谱》《金文朔历谱》《殷墟书契解诂》诸书多已刊行。“九一八”事变，方执教清华，绝食三日，生徒哭劝乃止。继执教武大。抗战入川，与余同居嘉州，过从甚密。时患欧血，仍日授课，曰：“战士死于疆场，教师应死于讲坛。”哀其言，不忍卒听也。篋中旧蓄《清儒手翰》两册，将去嘉州，为余题四绝句。月前由川寄来，灯下展读，牋触万端，念子馨之墓木已拱矣。寒夜不寐，为赋此解。时庚寅大除夕，越岁元月三日书之。献唐

庚寅除夕，是1951年初。当年7月底，王时任山东古代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他所护卫的古籍文物，此时方从四川运回点检。

今年是父亲一百一十年冥诞，离世七十周年，记下这段佳话，以为深切的纪念。



方壮猷与勾践剑

想起我童年时期十分熟悉的、父亲的清华老同学方伯伯——方壮猷教授。

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考古界的一大成果，是在湖北江陵楚墓中发现了越王勾践剑。那是一柄精美绝伦的青铜剑，剑身刻有八个变体篆书。时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年逾六十的方壮猷受命主持宝剑的研究工作，首先解读铭文、确定剑的主人。他们初步释读出剑铭中的文字：“越王 * * 自作用剑”。然而中间两个应是王名的关键字，却难以破译。

于是方壮猷发起了一场书信大讨论，参加者有郭沫若、唐兰、商承祚、夏鼐、容庚、徐中舒、陈梦家、胡厚宣、于省吾、苏秉琦等一大批国内顶级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方壮猷将铭文的拓片寄给诸专家，请学者们各抒己见。从出土的竹简确定墓主人姓邵，邵是楚国的望族，方最初提出剑铭中间的两个字可能是“邵滑”，得到郭沫若的确认；但公认为识得甲骨文最多的唐兰却推断这两个无人认识的“鸟虫书”是“鸠浅”，而“鸠浅”，则是“勾践”的通假字。经过两个月的书信切磋，学者的意见趋于一致，认定了剑身铭文是“越王勾践自作用剑”。以后又有专家对剑的工艺进行专项研究，发现此剑被硫化物镀过，故能千年不腐，而这项技术比西方早了两千多年。

一件埋藏地下两千三百年的国宝级文物、一柄真正的王者之剑的身份终于认定，一场轰动一时的学术大讨论也圆满落下帷幕。学者们的书信被编成《楚墓通讯集》，永远记录下这段考古史上的佳话。而这也是方壮猷晚年学术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四年以后，一代学者方壮猷被迫害病逝。

方壮猷(1902—1970)，字欣安，湖南湘潭人。据我父亲吴其昌的介绍，年轻时的方壮猷兴趣广泛，尤爱文学，“浸淫于西洋文学，凡诗歌小说剧本无不毕嗜，亦时有创作，然君自言自娱而已，非示人者，随即脱手焚之。后此治毛诗，攻中国文学”；入大学



后，“又转其志于社会科学，凡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宗教、心理、哲学诸书无不攻读。且及于吾国史、汉、通鉴、通考及记事本末、宋元明学案诸籍，益期有所成”。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期间，他“治文史之学，著《中国文艺史》十四卷，《太平天国志》若干卷，此外积稿尚多。然君素不表暴，肩诸篋而已矣”。父亲说他：胸怀大志，“为磊落慷慨奇男子，然外又以和易隐之，温柔敦厚，人目之为妇人女子，君笑颌而已”，“得于诗教者独深”。奇怪的是，父亲总把他当作弟弟看，“与余同年，日月后于余。故其亲予也，亦殊异于他人云”。但我从克立教授给我的《方壮猷传略》得知他比我父亲足足大了两岁，这也可以看出方壮猷平时为人的谦逊温和。

方壮猷在研究院学习一年后毕业，到上海一些大学教书。1929年，赴日留学，在东京大学白鸟库吉研究东方民族史。次年归国，在北平各著名大学讲课，并连续发表《室韦考》《契丹民族考》《匈奴语言考》等多篇有关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研究的论文，风头正健；其间发生了一些事，便复南下，1934年赴法，入巴黎大学研究院，从伯希和继续研究东方民族史，两年后回国，到武汉大学任教。

我记忆中第一次听到方壮猷的名字就在那时。一天，父亲和母亲说起在北平时与宾四（钱穆）、欣安等同游长城的趣事，两人大笑，父亲顺便提到：“欣安从法国回来了，景况还不好，我对某某说了，请他来武大教书。”又过了些日子，方携全家来访。与以往不同的是：每次来客，都在客厅接待，除非深入探讨学术问题，才请进书房查书。而这方伯伯初次来访，略事寒暄，父亲便把他让进书房，留下母亲陪方伯母在客厅聊天，我则和克强、克定兄弟在地毯上玩“过家家”。过了许久，我们的游戏角色已经变换多次，我已想不出新鲜花样了，他俩才从书房出来。

后来父亲对母亲说：“欣安全家刚来，人生地不熟，你多陪陪方太太”，又叮嘱我多和克强兄弟玩。正好他家和我家同住在新二区，所以，从珞珈山到乐山，我们两家来往一直较多。

记得1937年夏，父亲大病初愈，老同学戴家祥出川，特意到珞珈山探望，方壮猷设宴，父亲作陪。过了一个月，日寇入侵，平



津陷落，一大批文化人逃出北平南下，叔叔吴世昌夫妇也来到我家。一天，沈从文、杨刚、萧乾同来我家访父亲和叔叔。父亲专门从汉口订了北平烤鸭，也请方壮猷作陪。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吃烤鸭。那次宴请使我现已八十八岁的表哥徐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至今齿颊留香，认为现在只有一些酒家的精品烤鸭差可比拟，并对我的无知健忘深为遗憾。我则一直搞不明白那时从汉口到珞珈山，是怎样保持烤鸭的嫩脆的。

方壮猷在武大授课有自己的特点，很受学生欢迎。有一位学生说，他讲《宋史》准备了两套书发给学生，让学生按不同专题整理剪贴，剪贴完了，一部“宋史资料分类长编”的雏形也出来了；学生们则学到了一种治学方法，受益匪浅。

父亲去世以后，方壮猷在撰写的《吴其昌教授事略》中强烈呼吁国民政府改善教授的生活境况，“顾自入蜀以来，物价指数率增至三五百倍而有加无已，大学教授薪津所得，远不逮贩夫走卒之差足温饱。学课之余，卖文售益，力竭声嘶，犹不足糊口腹，赡妻子，更何暇乎节劳养疾之足云哉！”批评当局对“既成之才，弃之若敝屣，悉任其贫病潦倒”，并列举武大抗战中死去的教授：“前乎君者，既繁有徒（武汉大学教授先君而卒者为郭泽五、黄方刚等三君，其余讲师助教死者尤多），踵乎君者，恐更将接十连百而未已也！是岂国家前途之幸哉！”我记得，在我父之后，又有萧君绛等教授相继病逝。

直到抗战胜利复员之前，方伯伯对我家这流落异乡的孤儿寡母曾多加关照，至今铭刻在心。方壮猷继我父任武大历史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任湖北省图书馆、文物管理等单位领导职务。1983年我公出武汉，特到珞珈山访旧，问及方壮猷夫妇，已含冤故去多年，空对旧居，唯有长叹。

选自《回首萧瑟处》2016年版，作者系吴其昌之女。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8年10月30日



忆中文系教授吴济时先生二三事

许先国

2018年12月18日正午，深圳的冬天暖阳高照，草木苍翠。我从沙湾殡仪馆出来，坐在朋友的车上，眺望窗外街头的繁华喧嚣，耳边却还回响着殡仪馆低沉的哀乐和先生女儿们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如放电影般在脑海掠过，泪水渐渐模糊了双眼……

先生姓吴，名济时，别号阜隆，1929年8月30日出生在湖北省随州市安居镇一杂货商之家。日本西乡隆盛有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16岁的先生毅然挥别双亲，孤身一人来到省城武汉，入读著名的武汉博文中学。先生在这里加入了地下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武汉的解放尽了绵薄之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武汉市公安局的一名公务员。本来职业是前途无量的，但对知识的渴求却使他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大学，1956年考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省文化厅工作。因众所周知的“文革”浩劫，1972年被下放到湖北宜昌一家工厂，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北京大学中文系高材生的资格调入百废待兴、求才若渴的武汉大学中文系，在当代文学教研室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敏捷的才思、扎实的功底，使他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脱颖而出，很快被评为教授。1989年离休后依然笔耕不辍，70高龄时出版学术专著《生态文艺学》，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

我于1980年9月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后开始了与先生的交往。以后又分别于1994年、1999年读了先生夫人付明贤教授的硕士和



博士研究生，有了更进一步的相处机会。先生渊博的学识，真诚豁达、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性格，如春风细雨、润物无声，影响、改变着我的思想、性格和行为。

一纸便条

读大三时承蒙大家厚爱，我有幸做了我们年级二班的班长，需办理班上的一些公共事务。按教学计划，我们每学期都会安排一次艺术教学观摩活动，公费看一次戏剧演出。当时在武昌阅马场的湖北剧院正在上演大型史诗歌剧《编钟乐舞》，同学们都很想看，可是一票难求，我到窗口去排队，却根本买不到票。先生当时正跟我们讲当代文学，知道这事后马上为我写了一张便条，告诉我：你去找找我这位朋友。原来先生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在省文化厅工作多年，在那里人脉深厚，而湖北剧院正是省文化厅的下属单位。我拿着先生的便条找到他的朋友，很快买到了《编钟乐舞》的全班同学的门票，大家欣赏了艺术家们精湛的表演，饱餐了一顿文化盛宴。那可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是一个物质、文化都匮乏的年代。先生的古道热肠真如“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让我倍感温暖。

特殊考试

那时，我们年级有位同学叫别林业（现在国务院侨办工作，职衔已至副巡视员）不幸摔坏了腿，无法正常进入教室学习。平时在寝室自学还行，但期末考试就难办了。选修课可以做课程论文，必修课是必须考试的，不考试就拿不到学分，只能重修。先生当时主讲的《当代文学》课程则正好属于必修课，必须进行闭卷考试。我跟先生反映别林业同学的特殊情况后，先生说：那就让他进行特殊考试，提交一篇课程论文吧！别林业同学提交课程论文后，拿到了 90 分的高分，顺利完成了学业。



一封介绍信

我现在国务院侨办所属的广州暨南大学工作，工作稳定、收入可观、儿女双全，作为农民的儿子已十分满足，这份幸福生活却离不开先生的帮助。

那是1999年12月，正逼近年关。别人都欢天喜地在迎新年，我却如坐针毡。当时我的工作关系在海南省委党校，考取了先生夫人付明贤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因指标限制，我只能读委托培养，需缴学费4.5万元。以当时我在海南月薪500元的收入，这笔学费无异于天文数字。我联系了委培单位暨南大学，想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以缓解经济压力。但调动手续办得很不顺利，系里同意接受，但人事处没批。我一时心灰意冷，想放弃读博，就在海南终老此生。当我向先生说出此想法时，当即遭到先生痛批。先生以他的人生经历告诫我，风物长宜放眼望，千万不要被眼前的困难吓倒；在博士指标如此紧缺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也要咬牙拿下博士学位；闯过这一关，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在了解我调动受阻的原因后，又建议我导师给广州中山大学的同行好友、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王乐夫教授写介绍信，看能否请他给暨南大学校领导推荐我。先生的话如醍醐灌顶，使我茅塞顿开，而他的建议更是雪中送炭。我的导师傅明贤教授按先生的建议提笔给中山大学王乐夫教授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介绍信。通过王教授向暨南大学校领导推荐，我最后得以成功调入暨南大学，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业，生活也由此发生了质的变化。

才女的追思

才女者，喻杉也，我的大学同学。她在大一时就因写出短篇小说《女大学生宿舍》而轰动文坛，拍成电影后更是风靡全国，在中国高校卷起武大旋风。之后很多年，《女大学生宿舍》都是武大学子新生入学的首场电影。



在这篇文章快写完时，收到喻杉发来的微信，她告诉我，在新生刚入校不久她就由亲戚介绍去拜访了先生。先生的真诚热情如春风扑面，让她有宾至如归之感。先生的指点让她很快度过了新生刚入学时的不适应期，迅速找准了自己在大学的人生坐标。以后又多次在先生家与先生谈文学、谈理想、谈人生，每次都受益匪浅。

郑板桥有诗云：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表达了一个古代政府官员对老百姓的关爱。先生不是“些小州县吏”，先生是一位师者。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可是先生对学生所做的一切，又何尝不是“一枝一叶总关情”呢？

最后，用一首小诗表达对先生的怀念：

悠悠岁月穿梭过，
恩师情谊浩似海，
人生如梦阴阳隔，
唯有功德荫后来。

先生在天堂里安息吧！

作者系中文系 1980 级校友



追忆聂文杞先生

张箭飞

我读武汉大学英语系的时候，“英国文学选读”一课的主讲人是聂文杞先生。他似乎快到退休的年龄，显得有些精力不济，讲课的语速比较缓慢。20世纪80年代初，建于民国时期的天井内廊式的外文系小楼，多年没有修缮，已被恣意生长的桂树、香樟、蔷薇、紫藤紧紧包裹了起来，天光很难穿透绿帷翠屏射进窗户。于是，底楼的教室，即便整日开着顶灯，也有一种昏如幽冥的氛围。初夏的午后，讲台上是一位神情淡淡的老先生，低声咏哦《贝奥武甫》的一段，讲台下是十来个神态各异的学生。逃课的学生已经理直气壮地逃了——20世纪80年代的武大，依然还有一丝民国大学的遗风，许多教师有“来者不问，去者不追”气度，学校也不强求老师点名，把学生死死箍在他没兴趣的课堂上。我那一级就有好几个逃课牛人，正经的专业课上，很少露面，倒是长期霸住老图书馆的座位，自修起高深的尼采哲学来。我属于逃课牛人不屑为伍的那种模范学生，每周必与几个闺蜜，联袂捧场几门“票房毒药”的课程，聂先生的课也许就是其中之一吧。诚实地说，我们几个的死忠不是由于别具“人弃我取”的眼光，之所以每堂不落，大半因为乖学生的惯性，小半因为怀着一个盼头：聂先生“声声慢”的间隙，不时会插入一段忆往昔风流人物，往往是因为某个词句的解释令他想起当年自己的老师是如何教的。话题就这么跳转到他的燕京时代，西南联大的逸事。当英语换成中文，聂先生滞缓的语流变得畅快起来，一直半闭的眼睛渐次全开。因为我就坐在第一排，他眼睛的这个切换动作，犹如慢镜头一般，给我一种很深的印象。后来去



川外念研究生，我曾把这种印象形容给一位写诗的好友，说是“百叶窗打开，往昔照射进来”。她半开玩笑地说：“算得上一句好诗。”

其实，聂先生打开百叶窗后，就连脑袋在课桌上啄米好半晌的同学也支棱起两只耳朵。聂先生提到的人，三十多年前的人，也就是我们的年龄吧，他们怎么就那么有趣啊，好像个个身怀绝学，成就非凡呢。我们瞪大眼睛听着，只有啧啧惊叹的份儿了。偶尔的，我也会给邻座投去一个纸条，自惭自嘲一下下：“你不是王佐良，俺不是许国璋。”邻座凑趣：“旁听沈从文，相约逃课去。”20世纪80年代的大陆，王佐良、许国璋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常被英语系的老师挂在嘴边。不过，由聂先生嘴里说出来，我觉得他们不再是遥远的星辰。

聂先生那时虽然体弱，记忆却十分强健。他来讲课，也会带上几本书，就往桌子上一放，眼睛半闭着，嘴巴一张一合，唱片缓缓转动，有那么一点从容、一点迟疑。有时候，唱针咔哒一声，不用看，就知道是聂先生在拧水杯的金属盖。此时置身台下的我们，就像在语音室里自修听力，往老旧的留声机上放上一张灵格风，听着听着，魂儿飞上绵软的云层，身子漂移到万里之外。毕竟，按时到堂的这些人还没哪个对《简·爱》之前的英国文学有真正的兴趣。尽管明白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很伟大，但是真要去读他们的文本，哪怕就是一些节选，还是相当吃力的。何况，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学万象更新，无数新鲜惊险的话题正被1977级、1978级的“老三届”们讨论着、传播着。一个大三“老学生”的即兴演讲，一个大四“青年诗人”的诗歌朗诵，一场标着“教学专用”的外国电影，要比老先生们的课程更有上座率。班上那些最有才华、最有主见的学生不是翘课自修，就是忙着各类社团活动。当然，还有几个已在暗暗准备出国申请，改修法律、经济去了。那样一个年代，在我们的武大，有种种希望，有种种诱惑，有种种挑战，而课堂里的聂先生则如淡定的老僧，对着十来只牛犊，兀自弹着他的竖琴。

念到大三的时候，赶上学校试验牛津导师制，我有幸分在聂先生门下。他和师母两人空巢，我就蹭上了他们的寂寞，上门请教，



时常混到一顿饭吃，听他聊到很多如今都是神话级学界人物的掌故。比如，他随燕京撤往后方，走走歇歇，弦歌不辍，燕卜逊教授口述弥尔顿《失乐园》逐句解读，他买来当地土纸，逐行记录——最后装订成两册笔记。

可惜的是，我那时愚钝寡闻，不知道世上还有一门叫做“口述史”的学问，更不知道自己正面对的是一位重大时代、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只将聂先生的回忆当做课间的逸兴，不曾用心记下他提到的那些人和事。再后来，读到易社强(John Israel)的西南联大研究，结识了长于口述史的郭于华，那个悔呀：我错失了一个口述史最佳的访谈对象，错失了访谈的最佳时机。现在的回忆，都是吉光片羽，无从核实：比如闻一多的传闻，袁昌英的法语，沈从文的水平——最后这一桩，我倒是印象较深：燕京学生的家底，富贵者多，眼界高大，不免傲娇，不大看得上沈先生的课，这可大大颠覆了我得之于中文系的印象。其时，沈从文重返中文读者的视域，已经大热起来。本来脚踩英、中两系选课的我，就像看见沉入洋底的阿特兰蒂斯，庄严地升出水面，仰慕有余，哪肯附和聂先生的评价。

过了几年，我从四川外语学院硕士毕业，重返母校任教。本来档案已经放给了英文系，又被聂先生劝导转给中文系——说起来，还是聂先生亲自找到当时的中文系书记，向他推销了我。从新疆调来武大之前，聂先生一直在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编辑了多少名著佳译我没有留心，只记得他和不少名家多有信函往来。当我继续上门蹭饭时，先生时不时地给我看看某人的真迹。可惜对于中国传统书法，我是完全的外行，没有欣赏的慧眼，只有八卦的好奇。比如，大书法家张听若是他同学，湖北政界要人，太太貌美，每年春节都会派人送来手书问候。聂先生夸耀同学字好念旧，我关心的却是他有什么拍案一惊的过往。聂先生的联大同学，有多少人藏起可说又不可说的故事呢？热血俊朗的名门公子，往往最会变成深潜的地下党员。张听若的父亲张仲鲁 1918 年赴美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毕业，算得上是创办河南大学的元老之一，与周恩来交往密切，策划国民政府河南省主席张轸起义，1949 年荣登天安门参加



开国大典。拥有这等家世，张昕若两兄弟由理科生转做革命家，逻辑得一如 20 世纪中国上半叶历史，不存在多项选择。

还记得聂先生送过我一本金发荣教授翻译的弥尔顿《失乐园》，颇有嘉许之词。金教授是他的近邻，应该在武大哲学系工作过——走笔至此，我特意上网查询金先生踪迹，发现他还译过威尔·杜兰特的《哲学的故事》，至于他的生平事迹，则完全隐于翻译之后了。

又过了几年，依然青椒却不再青葱的我忽然接到聂先生电招。先生病得厉害，不良于行有些时日，意欲告别学术，想把全部藏书送我！我当时脑袋一僵：先生一辈子颠沛流离流放，劫后余存的珍宝依然塞满小小的三室一厅，就连无法转身的厕所也堆着书刊和复印资料。我虽然贪书（尝言：读书人贪书，不算贪也，可豁免七宗罪之一），但也忍住贪心：这样拉走先生的藏书，是不是有乘人之危之嫌？于是稍稍推让了一番，先生似乎很伤心，觉得我是不是也有弃学下海之心——当时，南风劲吹，青年教师纷纷奔赴深圳海南淘金脱贫。几栋湖滨宿舍前的空地，似乎夜夜都有露天简趴（简易 party，啤酒花生而已），欢送一位壮士辞职南下。就连住我隔壁的某君，曾是刘校长钦定留校的计算机才俊，我所知道的绝顶聪明男生之一，也向我借了一百元路费，豪气干云地离开了。先生虽然不出来走动，但也察觉时势大变。一切皆有可能，我这个他曾有所学术期望的学生也会变的。他本来就有些脾气，一气之下，就把藏书全赠给学校。幸亏我当时啜啜着拿走了几本书，留着纪念。

说着说着，三十年过去了。面对我的学生，我却不会有聂先生的自豪，说我有一个燕卜逊那样的老师，一个王佐良那样的学长，一个许国璋那样的同学……产生他们的时代，造就他们的大学已经成为掌故、逸闻或学术研究对象，而聂先生颠沛的青春、沉郁的中年、寡欢的晚年湮于时间深处。

2011 年 4 月初，聂文杞先生去世。这时候，樱花正在灿然盛放，风起时，雪白淡红的花瓣漫天飞舞，整个武大都在下雪，“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我听见聂先生微微地低吟：



When April with his showers sweet with fruit
The drought of March has pierced unto the root
And bathed each vein with liquor that has power
To generate therein and sire the flower

我的英国文学教育始于聂先生，始于乔叟：“四月，甜蜜的阵雨飘落……”

作者系英文系 1980 级校友



樱花园的隐士

张天扬

在我大二那年，Perry 依然是英文系里唯一的外教。之前作为一年级的新生，是没有机会上外教课的，只是每每在宿舍水房里洗碗洗衣服的时候，听师姐们说“Perry Perry”，稍一打听，便知道那是他的名字，他是美国人。

在樱园的外语楼里，有时候会和他擦肩而过。60 多岁的一个普通外国老头儿，将近一米八的个子，大腹便便的。头发已然全是银色，向后梳理得一丝不乱，衬着脸颊白皮肤上那抹自然的粉红色，看得出来，它们原本应该是浅浅的金色。一双蓝灰色的眼眸流露出来的神情看起来颇有些严肃，不苟言笑的样子，有种不太好接近的气势。在楼里和他擦肩而过的时候，和许多同学一样，我总是拘谨地低下头或者装作望向远处，不敢开口跟他说声“Hi”，甚至不敢和他的视线有所交集。

大一的时候，我们这些新生，喜欢去鲲鹏广场周一晚上的英语角里扎堆凑热闹。面对外系同学，报上英文系的名号，底气似乎就多了几分，甚至沾染了些许小小的傲娇。自以为英文系的，发音要比外系的同学标准许多。在英语角里，常常能瞥见 Perry 的身影。有几个研究生模样的，总会主动走上前去和他交谈，然后有更多同学三三两两地围拢过去，形成一个小圈。路灯下的 Perry，眼睛里闪烁着热忱的光芒，比平日里遇到时看上去可亲了许多。只是那时候，口语是我的弱项，加上还从未跟老外打过交道，实在想不出来除了问候和自我介绍之外还可以跟他聊些什么。于是，只有借着广场上昏暗的光线，时不时地朝着他站立的方向，遥遥地望一望



而已。

等到大二下学期，我的课程表上终于出现了 Perry 的阅读课。在外语楼底层右手走廊边最尽头的那间小教室里，面对着我们班 26 张年轻的充满期待的脸，Perry 一开口便是立了道规矩：“我知道很多人叫我 Perry，这其实是不对的。Perry 只是我的姓，以我的姓称呼我是不合习惯的。我的名字是 David，David Perry。”大家顿时不好意思起来，左右对视互相挤挤眼睛，偷偷地笑了。确实，私底下都 Perry Perry 地叫惯了，哪知道那竟不是他的名。“你们可以称呼我 Mr. Perry，或者 Professor Perry，但是请不要称呼我 Dr. Perry，因为我是没有拥有博士学位的，我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文学硕士。叫我 David 也是正确的，不过对于你们来说却不太合适，毕竟我们之间还没有熟悉到可以直呼我 David 的地步。”老头儿一口气说完这些没有丝毫温度的话，让人觉得他脾气古怪，却又不由得对他肃然起敬了几分。若干年后，我到美国读书，才开始明白他的古怪，确切地说是直率。美国大学里对老师们的称呼泾渭分明，有没有博士学位，一目了然，没有丝毫的含糊。只不过当年的他用一是一、二是二的态度说了出来，让人感觉颇有些生硬。

在那间小教室里，我们开始跟着 Perry 读书。从莎士比亚和《圣经》的传奇故事，一直读到当代人的生活和困惑。Perry 是位好老师，他竭尽所能地为我们展示英美文学文化的精髓。在我们写的作业上圈圈点点地修改，一丝不苟。记得他曾邀请我们整个年级的同学去外教楼里看过好几次英文原版片，其中有当时新出品的哈里森·福特主演的《夺宝奇兵》，大家看完后还津津有味地议论了好几天。在没有网络的年代里，看原版片是很难得的。

那年 3 月，珞珈山的樱花开得格外繁盛。校园漂浮在如云如雾的花海中，到处弥漫着若有若无的清芳。我和室友天天去行政楼前流连赏樱。有一天，撞见了 Perry 也在那边驻足，看样子他是上完课回枫园的外教楼时路过的。他穿着白色的高领衫，外面罩一件淡蓝色的西服。他微微眯起了眼睛，似笑非笑地眺望着远处，一副被美景陶醉的模样。周围一张张年轻的东方面孔，衬得 Perry 整个人看上去有些虚幻和突兀，让我忽然想起“大隐隐于市”这句话来。



这个从波士顿来的美国老头儿，我猜想不出他的前半生有过什么样的故事，只知道他在暮年之际，孤身一人，万里迢迢地来到异国的樱花园里教书。远离了他熟悉的国度、熟悉的文化、熟悉的人群，一如钟南山的隐士，抛开了前尘往事，只选一处清静，安然地任时光缓缓流去。

想必，去国离乡的 Perry，也是孤独的吧。

我在珞珈山度过的时光，那是一个没有手机可以随意留影的年代，终究阴差阳错地、也没有特别执著地和盛放的樱花留下一张合影。那些年和樱花有关的故事，与青春交织的记忆，如今也只能年复一年地在心里回放又回放，在梦中重演又重演了。其中，就有关于 Perry 先生的支离片段，我心目中的樱花园的隐士。

每一位武大人，心中都有一座珞珈山。每一代武大人的记忆里，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青春芳华。

作者系外语学院英文系 1989 级校友



怀念恩师吴林伯先生

赵仙泉

武汉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吴林伯先生是我的恩师。我作为他的学生应该秉承“薪尽火传”的古训，理应通过语言文字将先生传递给我的精神之火发扬光大，给予今天的学子们某些启迪。虽然先生的名字不如演艺明星那么如雷贯耳，但在学术界他是颇具古风的学者；与日渐猖獗的“学术腐败”者、论文剽窃造假者、欺世盗名者相比，他无疑是十分珍稀的学术楷模，值得后人仿效与学习。这也是我写这篇纪念文章的初衷。

吴林伯先生与我的师生之情，始于我在本科学习阶段选修他的“《文心雕龙》研究”课程。他的那种严谨治学的风格对我打下学术根底有直接的影响。他主张认真阅读原著、旁征博引、举一反三，反对望文生义、根据第二手资料轻率地下结论。我的学习笔记获得先生好评，他开始有意栽培我这个新苗；我也时常到先生家里去讨教。除了学问，先生的一些做人观念也使我受益匪浅。他把物质利益看得很淡，教导我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坚定不移地执著于学术。1983年大学毕业前夕，我报考了他的研究生，开始走向学者之路。

可是，这次考研却使我遭遇了人生的一次挫折，我只好听从毕业分配到了长江边的沙市工作，担任市委党校的教师。临别武大，吴先生给我题写了留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我自认为被“流放”的日子里，吴先生与我保持着通信联系，不断给我打气。其中，他在1983年9月10日写给我的信中说：“上月二十七日信收读，知道你近来的心情。其实，在我这饱经风霜的人看，你目前的情况并不特别差，起码比我的处境好些吧！可是我照常读书、研



究、著述。关于治学和处世的话，我都给你讲了，临别时，为你写的那句名言，千万不要忘记。根据我的体验，一个人只要立志、努力、有恒，什么困难也能克服。暑假中，我去青岛开会，旅途很辛苦，但我在车船、旅舍，坚持重温《穀梁传》，不让时间白白浪费掉……”我那时已下定决心再考研究生。经过艰苦的努力，一年后我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仍然师从吴先生。

在读研期间，我们几个同学经常在吴先生家里上课，颇有“私塾”风范。他老人家字字句句教我们研究《文心雕龙》《论语》《孟子》《庄子》《周易》等典籍，当时的我们压根儿就没心思去追逐金钱，真正是远离世俗、只以学问为乐。

有一次我与先生单独相处时，他给我讲了他与因脑出血而早逝的夫人的故事，讲到动情的时候他流泪了，我感到先生是一个非常重情的人。在老年丧偶的日子里，他克服了许多生活上的困难，坚持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数十年如一日地治学，他留给后世的是丰硕的精神果实。他生前先后出版了《〈文心雕龙〉字义疏证》《论语发微》《老子新解》《庄子新解》等专著，还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1998年先生因鼻咽癌辞世，享年82岁。他留下了数百万字、近20余种专著的手稿，涉及先秦群经诸子、两汉辞赋、魏晋南北朝文论、骈文以及玄学、佛学。2002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将他100多万字的《〈文心雕龙〉义疏》列入“武汉大学学术丛书”，以精装本出版，流传后世。

我至今依然保留着吴先生当年写给我的八封书信，尽管我从一个城市搬家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工作单位跳槽到另一个工作单位，不知抛弃了多少家当，却始终把这些励志论学的信带在身边。它们是无价之宝，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已成为精神的活化石。

尊敬的吴先生，您在天堂还好吗？

作者系中文系1979级校友



一个寝室的四分之一世纪

周 畅

1993年9月，我考入武汉大学，报到后在桂园一舍的412安顿下来。每个寝室门口都有六个名字，我第一个抵达，俨然主人般等待小伙伴一一到来，心里有些惴惴不安。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天南海北的舍友陆续抵达，我们开始互相熟识。后来才知道寝室的住宿安排是学生会里高年级学长随机安排的，我们就这样被“凑”在一起了。

我们选择了珞珈，出版选择了我们。我们就读的出版发行专业远没有像现在这样威名远扬，班上大部分同学是被调剂过来的。我们像是误打误撞闯入书海的少年，登时被迷怔住了。不过幸运的是，我们最终都爱上了这个行业，并为之坚守。

20世纪90年代初的武大校园依然弥漫着自由包容宽松的氛围，出版发行专业进入第十个年头，课程设置和师资力量渐入佳境。紫初老师的激昂、凯卿老师的缜细、方卿老师的诙谐、吴平老师的严谨、先蓉老师的绵密、静雯老师的平易……让一个个课堂生动活泼丰满起来。女生总是最爱学习的，她们坐在教室的最前排，张开一双双求知的大眼睛。一些男生则蜷缩在教室后排，打打瞌睡、发发呆，偶尔也会发神经地举手提些让老师难以回答的问题。下课后男生们总是冲锋般窜进食堂，填饱嗷嗷待哺的肚子。女生不紧不慢地收拾书本，意犹未尽地围住老师交流。

专业的课业负担没有那么繁重，因此在自由的空气中，我们朝各个方向野蛮生长。

宿舍老大来自川中，是个诗人，他总是就着一盘花生米，喝着



一杯小酒，拿着手电筒苦熬一夜，一篇大作就出稿了。《诗神》《诗刊》《中国大学生》等雪片般的稿费单寄来，让我们艳羡不已。“谁的长发为我而留”这样的诗句让我至今难忘。

满子是社会活动家，燕赵人氏，骨子里流淌着燕赵壮士慷慨悲歌的血液，侃起大山两个小时不带重样的。他在学生会上书房行走，整个楼道都是他忙上忙下的身影。

光光是寝室长，默默奉献的老黄牛。蹩脚的湘乡普通话被我们经常嘲笑，备受打击的恋爱经历也是我们取笑的谈资。不过他越挫越勇，有一股湖南人的蛮劲，四年时间硬是从一个连运球都不会的球盲成长为院队主力替补前锋。

希增是个书迷，他平日里话语不多，是图书馆阅览室的常客。来自中原的他说话做事四平八稳，辩论起来却是高手，每天晚上他和下铺的光光基本上总有论战，这成了寝室的保留节目。

陈公子是班草，家境优渥，开学季从家里带来的腊鱼腊肉变成了我们打牙祭的美味；他亦是舞林高手，一到周末流连在各大高校舞会上，凭翩翩起舞引来大批迷妹，是赫赫有名的“图院三剑客”之一。



大一寝室合照



大二时我们从412搬到了321，一住就是三年。每个寝室都有各自鲜明的烙印和特点，我们都不是偏执孤僻的人，在一方小天地里其乐融融。

大三过后，时间总是轻飘飘的。老大从一首诗走入另一首诗；满子从一个寝室走入另一个寝室；光光从一段感情走入另一段感情；希增从一本书走入另一本书；陈公子从一个舞会走入另一个舞会；我读着他的诗，听着他的故事，看着他的书，传着他的绯闻，做着自己的事，日子倒也轻快。

转眼四年过去，我们也到了毕业季。选择出版发行专业成了我们每个人的小确幸，大四上学期基本上都找到了理想的单位，被“抢购一空”了。1997年的夏天，我们如蒲公英一样吹落到祖国的四面八方，像极了寝室名，三个去了北京，两人去了长沙，我来到广州。

初入社会，我们都经历过一段挣扎。每年年初我们都相聚在北京图书订货会，几盅热酒下肚，一腔苦楚道来：到底是书的质量重要还是业务员的酒量重要？我们究竟是卖书的还是卖笑的？图书滞销到底是编辑的责任还是发行的锅？这些都是伴随我们初涉出版界共同的苦恼和纠结。有些问题永远找不到答案，年轻的我们用放纵去抗争，不停顿地飞翔直至撞到南墙，豕突狼奔后又遍体鳞伤。

时间是最好的老师，我们用不同的速度成长。几年之后，诗人老大最先当上出版社发行部的领导，在酒酣耳热之际悄悄告诉我“拔苗助长”的含义；希增用自身经历告诉我在出版的路上我们还是小学生，要终身学习。我们就这样互相鼓励、互相守望着。

后来，老大辞职下海，当上了民营书商，策划的畅销书一时风头无两。希增厌倦了无休止的吃喝应酬，从发行转到印制出版。陈公子从军队出版社退伍转业，成为一名公务员。我则是浅尝了下海的滋味，被苦涩的海水呛到后连忙撤退到岸上，从北京回到广州，321又恢复了平衡。

再后来，我们结婚生子，从翩翩少年变成了油腻中年。我们聚少离多，看着孩子的成长细数头上的华发。我们有的成了出版企业的领导，有的成了大权在握的领导干部，有的成了重新创业的教育



家。每个人都用不同的方式回答命运的选择，急流勇退还是安贫乐道，华丽转身还是独立潮头，我们有幸一起用 25 年的时间体会到中国出版业的风雷激荡和潮起潮落，用自己的青春谱写着中国出版乐章里属于自己的音符。

没有听过凌波门外东湖的浩渺涛声，你无法领会珞珈出版人的孤傲风骨；没有见过樱园顶上漫山的迤逦花海，你无法体会珞珈出版人的浪漫情怀。我们是幸运的，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选择了对的专业，遇见对的人、从事对的行业。

一个寝室的四分之一一个世纪，6 个人的 25 年，从风华正茂到过尽千帆，只是当时的月亮还能照映在少年们青葱的脸庞上吗？

作者系出版发行专业 1993 级校友



“文法理工农医”之梦

周 荣

在民国期间国立武汉大学的历史上，有两个常被今人遗忘的纪念日：“国立武汉大学成立纪念日”和“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成立纪念日”。

国立武汉大学于1928年7月开始筹建，10月开始招生授课。1929年10月，校务会议议决以每年10月31日为国立武汉大学成立纪念日；1932年2月各学院全部迁往珞珈山新校址（仍设城区办事处于旧校舍内），校务会议议决以每年3月3日为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成立纪念日，是年3月新校舍正式开始上课。

—

在此之前，武汉大学的校址主要位于武昌城内的东厂口，当“武昌城外东湖附近珞珈山一带地基”被确定为新校址时，武昌宾阳门以东仅有一条低级碎石路，珞珈山一带是地道的郊外。1929年10月，学校与湖北省建设厅合修“自武昌宾阳门至珞珈山东湖湖滨”的马路，次年从街道口通往珞珈山校区的专用道路建成通车，时任校长王世杰将其命名为“大学路”。大学路建成后，校务会又作了两项重要决议：一是以“武大”二字为本校校徽；二是在大学路的起点处，建立一座校门牌坊。

1931年，一座四柱三间歇山式结构的木制牌坊竖立在街道口劝业场，正面书“国立武汉大学”六个大字，据称这座牌坊次年毁于龙卷风。两年后，又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冲天式牌坊在原地建



成，该牌坊以四根八棱圆柱为支撑，至今屹立于已是闹市的街道口，且被列为国家级文物。其正面“国立武汉大学”六个颜体大字和背面“文法理工农医”六个篆体大字，连同其柱头上云纹的意蕴一直是人们议论不休的话题。

校徽、牌坊、纪念日等虽只是一所大学的外在标志，但一所学校对这些元素的精心设计，常常体现出该校的教育、人才观和办学理念。

回顾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国立武汉大学筹建的这段历史，人们无不感叹蔡元培、李四光等教育家所坚持的“国立”和在珞珈山另择新校址建校这两项决策的英明和远虑。80 多年来，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上的四根八棱圆柱，每天都为珞珈山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莘莘学子，而“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大字则寄托着一代又一代教育家们对武汉大学学科建设的梦想。

了解和关心武汉大学学科发展的人们都知道：在武汉大学一百多年历程的大部分时间里，“文法理工农医”是一个梦想。对国立武汉大学的前辈武大人而言，它可能是一个短暂来不及惊喜的现实；而对今天的武大人而言，它是一个正在逐步实现的梦想。

二

“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傅斯年这段话恰当地揭示了 20 世纪之交中国学制转型时期的状况。

1893 年创立的湖北自强学堂率先冲破中国传统的教学格局，设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门，从而揭开了湖北乃至全国近代高等教育学科化的序幕。1904 年张之洞等人牵头制定的《癸卯学制》即以早年在湖北等地的办学经验为基础，该学制可谓中国近代第一部由国家颁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它将大学堂分为“八科”：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学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民国伊始教育部颁布了《大学令》，对大学分科作了调整，将“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次年又作了进



一步的补充，突出了学科教育规范化、知识化、理论化的追求。

总体而言，清末民初的教育体制体现出直接学习日本、间接借鉴西方的纲领，这一纲领也直接影响到武汉大学的办学特点。民国初年，武昌为北洋政府所设立的六大学区之一，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仿照日本教育模式，设立英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博物四部，后来又逐渐学习欧美，将四部改为八系，即教育哲学系、国文系、英语系、数学系、理化系、历史社会学系、生物系、地质系。

五四运动之后，留美学生返国者日趋增多，特别是受杜威来华讲学的影响，学习美国学制成为当时教育界的时尚，并最终促成1922年“壬戌学制”的诞生。“壬戌学制”一反清末民初依照日本学制的模式，而直接效法美国学制。从1923年起，武汉大学基本进入了参照美国学制全面推进学科化的时期。是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依新的学制改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次年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改名为国立武昌大学。1925年，国立武昌大学校长石瑛按照“文理并设”的原则，将学校机构调整为“二院一处”，即文哲院、理工学院和总务处。

北伐期间武汉成为革命中心，武汉大学也因此经历了一次大的分合，国立武昌大学与原武昌商科大学、医科大学、法科大学、文科大学及其他私立大学归并，成立一综合大学，即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又称第二中山大学），“分设三院于武昌、汉口两地”，设有大学部和文科、理科、法科、经科、医科5科，并设立预科。

国立武汉大学正是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创建的，创办初期由湖北教育厅长刘树杞暂行代理校长职务，大学分设社会科学、理工、文学三学院，皮宗石任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王星拱任理工学院首任院长，闻一多任文学院首任院长。社会科学院分法律、政治经济、商学三系；理学院分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四系；文学院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三系。1929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王世杰为校长，5月王世杰校长由南京来鄂正式就职。他曾多次提到对国立武汉大学的构想，说正在建设中的武汉大学“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成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他还说：武汉市处九省之中央，相当于美国的芝加哥大都市。应当办一所有六个



学院——文、法、理、工、农、医，规模宏大的大学。十年之后，学生可达万人。

这是武汉大学首次提出“文法理工农医”的理想，当时武汉大学规模，每年毕业生仅 100 人左右。王世杰校长坚信，只要有“宽广的校园”“先进的设备”“充足的经费”“优秀的教授”和“严明的纪律”，这一理想必定会实现。

王世杰敢于提出这样的宏大目标，一方面体现了他作为教育家的战略眼光，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他对国民政府教育政策和法规的把握，他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首任立法委员，曾主持制订过国民政府的众多法规，他到武汉大学任职时，正值中华民国《大学组织法》公布，该《大学组织法》规定：“国立大学由教育部审查全国各地情形设立之。……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大学。”

王世杰到任后，立即组织评议会修订国立武汉大学的《组织大纲》，增设副校长一员，聘王星拱兼任副校长。他维持王星拱主持校务期间作出的增设工学院的决议，同时改社会科学院为法学院，聘皮宗石为法学院院长，王星拱为理学院院长，闻一多为文学院院长，聘石瑛为工学院院长，共成文、法、理、工四学院。1930 年 11 月 5 日，修订完成的《国立武汉大学组织规程》经教育部核准正式公布，其中对各院系的设置作了详细的规定：

第三条 大本学分设下列各学院：

（甲）文学院。酌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哲学教育系、史学系及其他学系。

（乙）法学院。酌设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商学系及其他学系。

（丙）理学院。酌设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系及其他学系。

（丁）工学院。酌设土木工程学系、采矿冶金学系及其他学系。

以上各学院之学系得由校务会议议决归并或增减之。



第四条 本大学得设农学院、医学院或其他学院，其组织由校务会议议定之。

王世杰掌校期间，不仅明确提出了建成“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的目标，还特批经费租用一架飞机，将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且精通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国建筑师开尔斯接到武汉，请他统一设计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开尔斯设计的这批仿中国宫殿式的建筑如今已是武汉大学的靓丽风景。

三

1933年王世杰赴南京就任教育部部长，继任校长王星拱继续推行《国立武汉大学组织规程》设定的学科建设目标，积极筹建农学院，1935年8月收买东湖对岸荒山、荒地共五千亩以扩充农场，又以徐家棚棉场为校舍开设培训班。1936年农学院正式成立，叶雅各为首任院长，时仅设农艺系，李先闻为系主任。

农学院成立之初即与平汉铁路管理局签订技术合作协定，议定“所有该路沿线林场苗圃自本年度起概改由本校接收代管，并整理扩充”。抗战西迁之际，农学院被并入中央大学。1946年国立武汉大学从四川乐山东归武昌珞珈山复校，复校伊始农学院的恢复和医学院的重建便被提上议事日程，在当年校庆暨复校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上，代校长刘秉麟说：

可是我们的职责，不仅在此，必须更向前进。比如战前就计划了的学院组织，是文、法、理、工、农、医六院，这很显然的，在武珞公路本大学牌楼上，就明白标出，到今天依旧巍峨矗立可以看到。所以复校后，首先恢复农学院。虽然我们在同样地努力进行着，但农学院至今房屋尚未完工，有待我们今后的努力。其次医学院，这一方面是本校的原计划，同时也是华中的迫切需要，正好联总因有价值25亿元美金的医院设备，愿交与武大开办医学院及实习医院，经政府及社会各方面人士



竭力协助，现在正进行中。

1946年恢复的农学院仍聘叶雅各为院长，除农艺系外，又增设了森林学系，以后又陆续增加了园艺学系和农业化学系。1946年10月2日，教育部令国立武汉大学设立医学院，学校成立了以李宗恩为主任委员的医学院筹备委员会，拟定医学院的办学方针是：“与大学一般教育相配合，以发展医事科学，造成华中医学教育的中心，并养成服务社会之医事领袖人才”，为了落实这一办学方针，医学院在武昌东厂口老校舍设立了附属医院一所。1947年医学院开始招生，周金黄为首任院长。同年，附属医院开业，白施恩、范乐成先后任院长。

至此，王世杰校长履任校长之初提出的目标得以实现，国立武汉大学得以形成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办学规模和格局。据1948年出版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当时全国31所国立大学，除中央大学设有七大学院外，建成八大学院的仅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台湾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

四

在短暂而又艰难的二十年中，国立武汉大学不仅在校舍、设备、人才、学科等方面实现了跃升，在教学设计各个环节中，处处贯彻了民国初年《大学令》提出的“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例如：文学院确立的一项重要目标是在教学中“怎样造成专门的学者，同时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通人”，这一目标的提出是针对当时大学的一些流弊：“许多大学的目的完全在造成通达的人，它的流弊常常是太空泛；另有许多大学的目的是只在造成专家，它的毛病往往又是太闭塞。本院最大的希望，是要兼采此二种方针的长而避其短，想造成不空泛的通人，不闭塞的专家”。其他各学院“所设各学程除教授基本理论外，兼注意于其实际应用方面。对于各学系课程配置，特别注重于学生将来服务社会必要之实用科



目”。

尤其重要的是，各个学院都聚集了一批优秀教员，他们不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将学校确立的这些宗旨落实在教学课堂中，还利用其自身的学术素养和综合素质，促成学生高尚人格和气节的养成。文学院的袁昌英教授说：

大学是培养气节，植树高尚人格的绝好场所。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伟大使命，应当是由大学来负担。不过执行的时候，似乎不必采用固定的形式，而尽可以仿效古人所谓“潜移默化”或“不言而教”的暗示方法，以便那些十分讨厌直接训导的青年，能在一种不着痕迹的纯洁氛围里面，接受并继承我国数千年来藉以立国而又实为我国今日所最需要的道德文化。可是风气之养成，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必得有一部分大学教授，确确实实地承当得起“一代师表”的尊称，以尽毕生之精力以赴之，始克有济。

袁昌英的这番话或许可作为堪称“一代师表”的国立武汉大学教员群像的简笔画。本丛刊所收这些讲义，或许正是教员们“不着痕迹”教化艺术的一个缩影。

值此《民国时期武汉大学讲义汇编》出版之际，愿人们能借由这些讲义记住前辈教育家注重学科建设的功绩和“一代师表”的教员们百年树人的梦想。

此文为《民国时期武汉大学讲义汇编》引言。

作者系历史系 1986 级校友

珞珈文苑





追忆珞珈年华

梅 朵

珞珈山，是一座永恒的山，住在我心里，很多时候它在沉睡，和我的青春一起。但是一朵花、一缕月光、群鸟远去的身影或者突然飘进耳畔的歌，会让它苏醒，让往事从记忆的深处流淌出来。

那时候常常有蔚蓝的天，巨大的梧桐树覆盖了校园，银杏像黄金一样灿烂，不时有黑色的鸟从树丛里飞出。在连接各个园子的小路上，摆着两把凳子一条木板搭成的小书摊，卖的都是当时最新的人文和艺术书籍，像罗素、汤因比、韦伯、马斯洛的著作，像《赫索格》《荒原狼》《梵高传》《苏东坡》等小说和传记，还有里尔克、泰戈尔、惠特曼、弗罗斯特的诗集……卖书的大多是勤工俭学的同学。我这一辈子最好的书是在那些书摊上买的，最好的时光是在那些摊子前虚度的。抱着新书，踏着脆叶，钻进樱园的森林，找一个石凳坐下，在透进的斜斜的阳光里，在那些珍珠般的文字中度过逃学的时光，在伟人的一生里消磨整个下午，直到黄昏。

校园的晚上有各种讲座，关于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邓晓芒、赵林、易中天这些老师的演讲充满了思辨与激情，阶梯教室经常坐得水泄不通。校园的洗澡堂是陈旧的，邮局是窄小的，可是教室和图书馆却灯火辉煌，到处是如饥似渴的学生。我们新闻系的年轻老师在讲台上不拘一格，用新颖的思维和语言颠覆我们，展现思想的自由……

那时，珞珈山下各个园子的颜色都很清晰，樱园是白色和绿色的，桂园是金黄的，梅园是碧绿和淡黄的，枫园是红色的，湖滨是碧蓝的……



那时，我们的校长叫刘道玉；我们实行学分制，可以自由选修别系的专业课（记得一进校我班的黄斌同学就选修了哲学系的“康德研究”）；1986年到1988年之间武大拥有两千多个社团，其中由当时的校园诗人们组建的珞珈诗社让我向往了四年，但因自卑而始终没敢走进……

星期六晚上，我们会拿着小板凳挤在梅园操场的黑暗中，数不清的汽水瓶盖儿把地面满满地覆盖了一层，银幕里的光影把观众的脸映得色彩斑斓。有时还有月光，让你在看电影的缝隙会朝深蓝的天空看去一眼。《欢颜》《爱情故事》这些电影里的歌让我唱了一辈子。除了担当电影院的功能以外，梅园操场也是武大人接待重要客人和聚会众议之地。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的队员曾在这里讲述他们惊心动魄的漂流，他们脸色黯然地讲述着长江首漂的英雄尧茂书在激流中奋勇向前、直到牺牲了生命。梅园操场，有着它特殊的记忆，那些不能忘却的聚会和理想主义的呼声，沉浮着珞珈山激动人心的悲壮的英雄气息……

长满桂花树、一到秋天就花香四溢的桂园生活是令人难忘的。桂园六舍的男同学们常常向住着女同学的桂园五舍吹口哨、唱情歌，用镜子射来热烈的秋波，拿望远镜偷望女同学的情影。桂六历史系的许永龙师兄就被我们新闻系漂亮的张霞师姐迷住了，许师兄拿着吉他到霞姐的宿舍为她深情地演唱：“夏日里，夏日里，我们说再见”。桂五的女同学们肯定不会忘记桂一政教系的魏劲松同学，天天跑上桂五四楼，来找新闻系的一位大美女谈心，还邀请了樱园的霹雳舞王子何纵来弹吉他献歌，博美人一笑。新闻系85级的窦文涛师兄也常常到桂五四楼来关心87级的师妹们。他操着漂亮的普通话，非常认真地与师妹们促膝谈心，谈论许多高深的哲学问题。

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还没有被消费主义浸透，80年代的校园有着真正的幽默，我们为自己找到了与消费无关的众多乐趣。在桂园五舍的宿舍走廊上，女孩们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了粗粗的棒针毛线，在幽暗的灯光下编织毛衣（宿舍到点要熄灯）。编织的热情一个传一个，越来越多的女同学拿着小板凳从宿舍里走出来，把走廊坐满，五颜六色的飞针走线，几天工夫一件件原创毛衣就闪亮登场，虽然



针脚粗朴，但是男朋友们穿起来个个都英俊得像三浦友和。

桂园食堂地面滑滑的，最适合跳华尔兹舞，是那个年代武汉大学有名的“猪油舞厅”。在星期天晚上的音乐中，男同学彬彬有礼跃跃欲试，女同学或快乐或害羞地站在舞池边等待被邀下舞池。有的人转得又高又飘，一圈又一圈像风在池塘里吹拂，一会儿就涟漪四起地把舞池转了一周；有的人则紧张又笨拙，低着头生怕踩了对方的脚，偶尔抬起头来，害羞地对望一眼，脸也红去了半边。不少人就这样在“猪油舞厅”找到了人生的伴侣。滑滑的舞步中，有一个来自湖南的男同学一边举高我的手臂跳着编花的动作，一边问我愿不愿意当湖南的媳妇，我还记得他的眼镜片后面闪烁着笑意的眼睛。

桂园食堂让我不能忘记的当然还有它那“一丝不挂”的糖醋排骨，虽然只有骨头没有肉，但是那个糖醋黏稠亮丽，是不折不扣的美味。妈妈从贵阳来武大看我时，我带着她过了几天校园生活，至今还让她怀念的有两样东西：一是桂园食堂一清二白的糖醋红菜薹、大墩大墩的清炒豆腐；二是桂园周末晚上的阳台舞会，梧桐树掩映的阳台上点亮一盏台灯，录音机放起费翔齐秦的歌，或者荡起蓝色的多瑙河。我们的班长陆涛带着我妈跳圆舞曲，树叶婆婆飞舞，她跟着青春的脸庞飞旋，好像一瞬间也变成了一个大学生。

自然，那个年代珞珈山的浪漫不是闪亮的商品能造就出来的，它是吹过四季的风，带着每个时令的芬芳洋溢在我们的脸上，吹拂着青春的自由。在那些漫天飞樱的春夜去上晚自习可惜了，在桂香濡湿的秋天去上晚自习也可惜了，不如去看中国梧桐萧索的剪影如何矗立在新四楼的倒影中，不如去吃小贩的铁箱里正烘烤得香喷喷的红薯。珞珈山的四季染绘了我们青春的色彩，奠定了我们一生的美学修养：白色的樱花细雨落在了永远不愿走完的鹅卵石小路上；轻轻摇一摇桂花树，淡黄色的花瓣就带着它们无尽的香飘落，捡了晒干买白糖来腌起；夏天的东湖，灰色的暴风雨说来就来，低低地压着湖面，湖心大雨鞭打下来，我们划着木船狂奔，生命的陆地忽然间显得无限遥远。最后，天空闪开一丝空隙，死亡松开了手掌，准许我们在一场风雨的搏斗后重返生的湖岸。

20世纪80年代的校园生活跨越了许多界限：从性别的禁锢中



走出来，从懵懂的少男少女长成爱美的青年；从高中单一枯燥的教科书到遨游浩瀚的书海，知识的力量打开了封闭的生命；从尊父母命的求学路到社会责任被唤醒，从单纯的大学生努力成为拥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是的，在 80 年代末期我们真心努力过，我们真心地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绿皮火车连接着校园和家乡。从武昌到贵阳需要 28 个小时，到怀化前的 10 个小时里，我们是没有座位的，被夹在人群中甚至不能轻易动弹；座位下躺满了人，即使想上厕所也很难移动半分。我看到了那些为了能够坐在拥有坐席的男人腿上而成为他们临时情人的女性，见到了抱着孩子的母亲找不到座位的极端的疲惫和坚强，也见到了人群中的自己，怎样学习着经受和忍耐，一路上跌跌撞撞地走向目的地。

坐火车的记忆中只有一次人烟稀少，飞奔的列车里，车厢昏昏暗暗，我看着车窗映出的自己，感到震惊，这飞速的镜中人就是“我”吗？似乎很陌生，我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了解她。从这个夜晚开始，我看见了自己的样子，看见自己作为一个孤独的生命跟着地球在广袤浩瀚的宇宙里飞转。

冬天，梅园，匆匆往前的步伐突然停住，一阵幽香沁人心脾；转头寻找，看见点缀在褐色腊梅枝上淡黄色的花朵正在雪中沉睡，白雪像懒散的睫毛轻轻落在它们的眼皮上。我俯身久久地闻着，芬芳剧烈而柔软，钻进我的内心，一种安宁与神秘的气氛在寒冷的空气中弥漫。这仅仅是一种芬芳吗？那天，我感受到的似乎是灵魂的存在。园中清幽无人，白雪把平时不引人注目的东西都照得异常明亮。在万籁寂静中，我听到了梅花的语言，里面有我的心跳，依存在珞珈山的天空里。

30 年后，在大西洋的岸边我工作的校园，我又重新遇见了它淡淡的身影，接住了它凛冽独特的芬芳。有了梅花，追忆珞珈山的逝水年华，就有了可以依循的小径。

作者系新闻系 1986 级校友



2019 年珞珈春天纪事

巴 河

一

2019 年 3 月 18 日过武大樱园有感

淋漓发几枝，相思飞作雨。
天涯共此白，无处不丹心。

二

3 月 20 日早过樱园感记

昨夜花如影，今朝花似雪。
四海同一心，天涯何分别。

三

过樱园再感怀

飞若天上云，灿若碗中星。
我待花开日，静等未来人。



四

再观武大樱花有感

飞若弦上箭，苦待不能回。
犹记庭中月，曾照故人归。

五

忆同学感怀

我为池中月，君为天上星。
每日遥相看，唯恐泪沾巾。

六

见樱花盛开再感怀

一花开动惊全城，风光独与时不同。
欲行万里求相见，哪堪扮作眼前人。

作者系中文系 1994 级校友



七律·雨中赏樱

曹海钧

雾色蒙蒙细雨中，
寻芳幽径渐春融。
千枝嫩叶叶新绿，
一树繁花花正红。
朵上凝珠添媚态，
林间飞瓣舞香风。
眼前美景疑曾见，
不是去年人物同。

作者系数学系 1986 级校友



珞叶怀想

陈 勇

遗漏在当初的那缕桂香，来不及收藏
我还在想，剩下的台阶有多少
曾经倾慕在你通向樱顶的路上
有多少，沉积成乡愁萦怀的满仓

我为那些饥饿的石头洒满金黄
为那些等候收割的爱情，又一次羞红脸庞
我和这大地，只有一次飞翔的距离
我和你，隔着一缘不尽的苍茫

我以秋蝉的嘶鸣，追溯你当年的模样
任凭往日的记忆裸露山顶
湖边萤火流放，果盘溢满了月光
每支舞曲，都能轻巧地掀开一扇心窗

你啊，不该就这么消失在桂香奢靡的夜里
不该将我倒扣在背景残留的时光码头
我卷起秋风，只想为你吹奏这蓝天
只为你弯下膝盖，狼狈地拼凑缘分的碎片

看看这秋风吧，撕开你我的间距，淡雅而又铺张
让一场刻骨的邂逅，像夜幕一长再长



我宁肯用痴心的红叶，背负所有的秋色
去慢慢赎回，被你香腮扣留的那一记春光

作者系中文系 1985 级校友



真 想

范 江

真想，变成一朵花，
花蕊香香的，
花瓣艳艳的，
春天开在樱花丛中，
秋天香在桂花林间。
让来往的人们闻香叫好，
让进出的人们惊美赞叹。
可有一个前提哟，
那樱花必须开在珞珈山上，
那桂花永远香在珞珈山间。
因为，珞珈山是我们
美丽的母校——武大校园。

真想，变成一只鸟，
羽毛翠翠的，
歌声甜甜的，
早晨唱在梅园桂园里，
傍晚鸣在青楼樱顶间。
让年轻的人儿精神愉悦，
祝年迈的长者吉祥美满。
可有一个约定哟，
那梅园桂园一定是在东湖畔，



那青楼樱顶一定能望见东湖澜。
因为，东湖边是我们
可爱的母校——武大校园。

呵！我深知，
我变不成花，也成不了鸟，
我只能留在北国一隅。
可这没有什么，
我一样为你增光添美，
一样把你歌唱咏叹，
为你祝福，一天天，一天天。
因为，敬爱的母校，
我对您的爱，永远是——
那么深，那么长，
那么甜，那么远
.....

作者系中文系 1975 级校友



微澜中，珞珈之落叶

方书华

把自己交给雨露
不悲不喜，不紧不慢
秋之微澜，珞珈的第一片落叶
被南来北往的风吹瘦
吹成樊篱，也吹成脚印

散落的面孔，蚀刻在翅膀之上
哪一枚是你，哪一枚是我
只有秋雨洗一路风尘
被卷起的那一刹那
破碎，而相距遥远

你用微凉的手指
捡起的月色，林泉高致
我在山水清音之中
冬雪多了一个支点
珞珈落叶，是择水而居
还是写成梅花小篆

时光正为我们照亮路径
等樱花盛开，桂子飘香
许多不同的纹理



延展相似的脉动
一边化作泥土，一边获得新生

作者系中文系 1986 级校友



毕业五十年 深情怀母校

冯从善

母校长离五十年，情丝无刻不相牵。
常思岁月峥嵘日，每梦师生友爱篇。
成果频新登榜首，佳音叠报令心甜。
阳光沐浴终身益，学道珈山喜有缘。

作者系历史系 1965 级校友



永是珞珈一少年

何五元

有一座山
没有谁比它更高
有一湖水
没有谁比它更宽
有一弯怀抱
回到她
永远都是 17 岁的少年

珞珈山
东湖水
梦绕山之麓
魂牵水之澜
踏遍千山万水
走不出那琉璃色的思念

那里的天
写满青春自由梦幻
那里的地
永远流淌火热诗篇
多少年岁月荏苒
依旧是珞珈翩翩一少年

编者注：这是一首歌词，是《珞珈赋》作者何五元校友的近作；作者曾在



2003 年的《校友通讯》(p495)上发表过同题文章《永是珞珈一少年——珞珈赋者忆珞珈》。“永是珞珈一少年”现已成为武大校园金句，被各种场合引用和借用：2017 年 5 月雷军校友回珈，学校操场上打出了“永是珞珈一少年”的大型横幅；武汉大学 2017 届毕业典礼的主题是“永是珞珈一少年”，毕业主题曲歌名为《永是珞珈一少年》；2018 年 11 月，在第五届校友珞珈论坛上，雷军校友发表了“永是珞珈一少年”的精彩主题演讲。

作者系中文系 1984 级校友



母校的秋天有一个笔名

洪 烛

母校的春天有一个笔名：樱花
母校的秋天也有一个笔名：枫叶
我从樱园走到枫园，只用了几十分钟
却跨越两个季节
我的青年有一个笔名：春天
我的中年也有一个笔名：秋天
我从青年走到中年，用了三十年
却像是一瞬间
樱花把我叫做春天
其实，我是未来的秋天
枫叶把我叫做秋天
其实，我是老了的春天
我从樱园走向枫园，母校啊
为了多看你一眼，为了记住你的另一面

作者系中文系 1985 级校友



恩师韩德培先生驾鹤西游十年缅怀 二首

黄 进

一

九十九年春复秋，六十四载乐与忧。
但使杏坛杏林在，杏花常开水常流。

注：恩师韩德培先生自 1946 年在珞珈山教书育人六十四载，2009 年 5 月 29 日仙逝，享年九十九岁。

二

求学问道上珞珈，幸遇韩师度芳华。
承恩沐泽廿八年，著衣持钵传道法。

注：余在珞珈山追随恩师韩德培先生读书教书著书二十八个年头。

作者系法学院 1981 级硕士研究生、1984 级博士研究生校友



七律·怀念母校

焦根基

深情再返珞珈山，
放眼东湖岁月谈。
记否空腹修路苦？
犹忆满志报国甘？
五载同窗多乐事，
八旬共宴有诗坛。
师恩不忘心扉内，
梦里樱花已凋残。

注：60年前入学武汉大学化学系，老同学重聚美丽校园，有感而作。

作者系化学系 1959 级校友



心中的珞珈

李立屏

再回珞珈
桂花已开到荼靡
它把它的香，拼命往我身上塞
其实我带不走那么多
我还要装些鸟语，梧桐秋色

情人坡下，含笑看我很久
我一直没发现她已经长成了大姑娘
这么多年，琴棋书画
她应该也熏陶了不少，难怪身有气质
心有芳华

那些年时常在海外
每每想起，樱花大道上那一扇扇红色窗棂
温暖就会从东湖涌起
进长江，入海，到大洋彼岸
淹没我停泊的码头

此刻，阳光正突破云朵
银杏翻起层层金浪
琉璃瓦熠熠发光

作者系日语系 1983 级校友



珞珈山的秋色

李少君

珞珈山是一个自然美的立体博物馆
我认为，这个博物馆最值得收藏的
是珞珈山的秋色

枫红，菊黄，桂香，满地落叶
以及东湖边草丛的一泓深绿
珞珈山顶的一朵白云一片蔚蓝
都应该制作成一个个精致的样本
永久地存放于博物馆最醒目的位置

作者系新闻系 1985 级校友



珞珈离别感怀

李昀臻

负履武汉七年，将此当作第二故乡。山川形胜，地灵人杰，在学习之余，与志同道合的伙伴走遍了这片土地的山山水水，深受荆楚文化滋养，又备感珞珈山学风熏陶，与斯人斯地难解难分。因此愈到临别之际愈加感怀至深，谨以小诗一首为记：

黄鹤楼上吹玉笛，鹦鹉洲畔水流东。一桥横架通九省，龟蛇盘卧数英雄。屈子行吟九歌地，山鬼云游辛夷车。高山流水因君起，钟、期难遇野航中。吴王试剑斩石裂，创业维艰以武昌。云长驻军闻伏虎，宝刀卓地流清泉。西塞山横秋塞雄，铁索无用降石头。白兆长饮桃花水，太白酒隐醉十年。赤壁舟上迎素月，二赋堂里念东坡。岳王孤军驱鞑虏，万里河山不改色。法无古今惟时宜，太岳不谋身谋国。香涛苦心筑武库，汉水滩头兴洋务。十八星旗换龙旗，红楼辛亥首义处。将军护国卫共和，今仍有路号松坡。御侮捐躯赴慷慨，百万将士守城桓。大别山横纵千里，难挡刘邓飞度；扬子江翻浊浪涌，胜似闲庭信步。

故事浮沉远帆影，物换星移几度秋。感怀斯地多美人，负履仙境入黉宫。闻说山上樱开日，梦回夤夜赏花时。清风无力蒸溽暑，我自赏荷倚胡床。待到枫舍霜叶红，遥望桂斋香满楼。十八栋前梅映雪，半山庐中论英雄。园中四季皆好景，风流文章写春秋。四光选址牵毛驴，雅各艰辛寻宝地。一多对月讲《天问》，世杰授课胜太傅。文法理工农医科，文风昌盛膺



国立。山河破碎别故地，流亡八载续弦歌。名动哈佛张博士，崇台相随双子星。辅初耕耘承学脉，天妒英才悲小凯。当年豪情刻石者，挂冠弄潮“九二派”。历历贤达珞如石，耿耿珈人灿星河。莫道学问无涯，且如曾三颜四；长叹时不我与，当效禹寸陶分。

去国远，怀乡愁。无酒浇块垒，有意寄情柔。风吹东湖波底月，星照珞珈岚上风。今我依依将远去，灵狐戚戚亦呜咽。拭泪抬望眼，未尝一话别。却道别离复何恨，只恨此别太匆匆。

作者系经济管理学院 2019 届校友



樱

梁 冰

樱，
婀娜多姿玉婷婷。
老斋舍，
凭栏倚芳影。

樱，
桐茂枫红桂常青。
东湖畔，
涟漪泛诗听。

樱，
钟灵毓秀学府兴。
多少载，
不变珞珈情。

作者系化学系 1978 级校友



中文系 68 届同学毕业五十周年有感

马承五

(七古)

2018 年是我本科进校 55 周年、毕业 50 周年，又是我考上研究生入校 40 周年。几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整年同聚，令人感慨无端，即兴赋诗一首。

高考题名整行装，请业当为“武大郎”。
 拥抱珞珈怀夙愿，金粟迎新分外香。
 五年斗转光阴过，世事变幻意迷茫。
 惆怅一别凄然去，投身何处是吾乡。
 改革浪潮涌神州，学海扬帆再起航，
 攻硕读研返母校，又见樱花吐芬芳，
 馆室流连习文史，丛林徜徉诵诗章。
 东湖碧波送归客，桂子山头日月长。
 两进两出求知路，八载甘苦自思量。
 翠柳客舍重执手，同窗情谊自难忘。
 如今从心不逾矩，清风和煦度时光。

研究生进校四十周年感兴

(七言排律)

四十年前聚珞珈，胸怀壮志展风华。



研评诗赋星辰静，品鉴魏唐光影斜。
读史诵经勤自勉，探骊吟句喜相夸。
几番酸楚终无悔，三载囊萤何有嗟。
讲席消磨沧海梦，砚池濡染鬓丝花。
二兄辞世诚堪惋，众友添筹犹可嘉。
岁入古稀还待米，寿当仁者益期茶。
平生万事随缘过，回看长天映晚霞。

注：本专业共招收 8 位研究生：唐翼明、何念龙、傅生文、李中华、马承五、毛庆、易中天、陈书良，今何、傅二人已去世。

作者系中文系 1968 届校友



咏 秋

陶 然

秋来自古诗如潮，
秋兴万端凝紫毫。
秋风入词知冷暖，
秋雨随赋叹年韶。
秋露惊醒荷清梦，
秋霜染成菊雅骄。
秋蝉几声林树静，
秋雁一行云天遥。
秋水澄波千帆竞，
秋山红叶十里飘。
秋庭赏月笛声远，
秋榭抚琴桂影摇。
秋曲悠悠思缱绻，
秋歌缓缓唱寂寥。
秋晨岭上放眼望，
秋野流金自丰饶。

作者系中文系 1987 届研究生校友



教师节拜望张畹惠老师有感

陶嘉瑜

古稀学子拜恩师，教师节里添芬芳。
五载花落理学院，半世梦系珞珈堂。
当年弦歌学无机，今闻老师唱渔光。
桃李不言下成蹊，教化润物终难忘！

作者系化学系 1963 级校友



寿星明·寿导师彭斐章先生九十华诞

王新才

春到江南，水满东湖，草长珞珈。有山名狮子，樱开胜雪，斋称天地，居探无涯。

桃萼方红，桐香欲醉，一寸光阴一寸奢。今三月，渐藤牵薜荔，果挂枇杷。

东风过处晴佳，荡万木绵绵散万花。喜闻关莺滑，声尤清脆，青苍松挺，韵自风华。

望俨亲温，博文约礼，笔健欣犹漫走蛇。逢鲐背，要生徒酒满，饮了还加。

作者系图书馆学系 1981 级校友



珞珈樱花协奏曲

吴根友

校园盛开的樱花
与看樱花的青春身影
像一把把小提琴
演奏着珞珈春天
一曲轻妙的协奏曲

湖广中哲论坛
像一把大提琴
正在演奏着
经史子与中国哲学关系的思想畅想曲

我用这首拙劣的小诗
把今天珞珈的音乐会
轻轻地告诉你
明天，如果你来看樱花
也看到了那一幢幢古建筑
请把它们看做一把把大提琴
请你用心去听
每一株樱树
甚至每一瓣樱花
在珞珈演奏的春之协奏曲

作者系哲学系 1989 级博士研究生校友



武大 我见过你深情的模样

姚 勤

武大
我见过你深情的模样

三十二年前的初秋
在校园的梅园小操场
迎接新生的现场
漫天飞舞的彩旗
写着各学院各系名称
耳畔传来震天的锣鼓声
我有泪涌
只一刹那
我便爱上了武大

再一次
看见你深情的模样
是在军训结束
返回校园时
从梅操通往桂园的路上
突然听见住在樱园、桂园的学长们
敲打着脸盆、茶缸、搪瓷碗
欢呼着
为我们的凯旋



武大

我见过你深情的模样

不知不觉

即将迎来新年

在元旦的前夜

系里组织了迎新晚会

独在异乡的孤单

顷刻融化在欢歌笑语里

然后

到了来年的春天

三月的樱花

如云似霞

灿烂在天边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樱花

像云海一般漫无边际

洁白和淡粉色的花朵

倾倒无数学子

我也从樱花

看见了武大对学子

最深情的告白

转眼之间

就到了金秋时节

色彩斑斓的树叶

装点得校园五彩缤纷

珞珈金秋艺术节

渐渐拉开帷幕



师生同台献艺
展示绝招绝活

而我居住的桂园
桂花香一阵一阵
涌向每一个路人
每一间宿舍
校园里弥漫着
丰收的香气

武大
我见过你深情的模样

在两鬓染霜的教授
讲授的新诗里
在湖南音很重的老先生
讲解的诗经里
在青年才俊解读的
陶渊明的桃花源里
在崛起的诗人
舒婷、北岛的诗句里

带给我无比欢乐的
还有每个周末
梅操放映的电影
芙蓉镇、红高粱
魂断蓝桥和爱情故事
占据了我青春
寂寞的时光

武大



我见过你深情的模样
在我青春最美好的
那段年华

作者系中文系 1986 级校友



武汉胜景游

叶国源

风光旖旎龟蛇山，
东湖荡漾耀神州。
江滩园林添锦绣，
长江夜景臻善游。
樱花烂漫新武大，
八方游客沉醉留。
黄鹤楼顶瞰市容，
天仙靓女下凡球。

作者系中文系 1956 级校友



重上珞珈山

曾俊伟

当年国庆十周年，我们青衿奔上珞珈山，现正一甲子矣。今又逢国庆七十周年，我们耄耋相聚重上珞珈山，喜赋相庆。

昂然上珞珈，学海泛仙槎。

携手筑芳梦，并肩揽紫霞。

修行培友谊，绽放闯天涯。

云秩相登陟，耄耋尚奋骅。

作者系中文系 1959 级校友



《武大校友通讯》捐订名录

——(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陈树隆	100	岑土荣	400
蔡建章	300	曹广元	100
丁自强	500	邓广中	300
邓治贵	200	宫荆江	200
何书文	300	黄茂先	300
胡桃花	200	黄振球	300
孔令仁	700	李嘯群	300
凌开智	100	李承晓	300
祁志勋	200	余培柱	200
唐寿同	1000	唐崇彬	100
唐齐仁	1000	谭任杰	1000
谢光清	200	叶国源	200
张孝烈	200	周茂繁	200
曾广元	100		



征订征稿启事

《武大校友通讯》由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编辑，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校友之间、校友与母校之间沟通信息、联络感情的纽带和桥梁，是广大校友共同的精神家园。刊物宗旨：传播母校信息，展示校友风采，联络校友感情，弘扬珞珈精神。

《武大校友通讯》每年出版一辑，栏目分为：卷首语、特别报道、珞珈风采、珞珈记忆及校友文苑；每年会根据校友活动及来稿的特殊性增加相应栏目，2019 年的《武大校友通讯》增加了“1979 级校友入学 40 周年纪念专栏”。《武大校友通讯》以回忆文章和校史资料为主，偏重于校友对学校生活、昔日老师和同学的回忆，对学校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回忆。正因如此，《武大校友通讯》成为史料价值高、值得收藏的校友读物。

《武大校友通讯》是校友自己的出版物，办好它需要充足的经费。我们借鉴兄弟院校的经验，采取校友捐资订阅的办法。《武大校友通讯》每辑工本费人民币 48 元。捐订者可直接向校友总会办公室订阅，《武大校友通讯》将刊登订阅和捐赠校友的名字。捐订款请汇寄至武汉大学校友总会（邮政编码：430072，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 299 号）。

为办好《武大校友通讯》，欢迎海内外校友踊跃投稿。来稿形式不拘，以真实、原创、传播正能量为原则，内容要与母校、校友活动、校友生活相联系，由于篇幅所限，来稿一般不超过 5000 字，图片不超过两张；各地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校友事迹的文章，



也恳请积极推荐。

稿件请寄武汉大学校友总会《武大校友通讯》编辑部收。投稿电子邮箱：aaoff@whu.edu.cn。

《武大校友通讯》编辑部

2019年12月



关于进行校友信息系统认证的通知

亲爱的 WHUer:

您好! 武汉大学校友信息系统是武大人的掌上校友之“珈”, 欢迎广大校友注册认证。

校友信息系统现已具备校友多途径身份认证、智能匹配组织、校友卡校友活动、校友投票、校友问卷、个人信息管理、校友征稿、人工智能咨询、智能会务系统、珞珈直播等基本功能。更多功能正在升级中……

一旦通过校友身份认证, 即可自动加入与你同城、同行业、同年级、同院系的校友组织, 与同窗、校友、母校建立起终生联系, 还能畅享各类校友福利, 参与各类校友活动。

加入步骤:

1. 校友身份认证:

①关注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官方微信公众号, 点击下方菜单栏“四海为珈—校友认证”即可进入到认证页面。

②直接扫码认证:





2. 在手机上下载安装钉钉 APP。

3. 用身份认证时填写的手机号码注册登录钉钉，点击下方菜单栏第三个图标，即可进入武汉大学校友信息系统。

认证温馨提示：

1. 校友可通过三种途径进行认证，即证件认证、学籍认证、上传附件认证。如您证件认证不通过，有可能是您毕业时档案数据库未采集到您的身份证或护照信息，请您进行下一步学籍认证，学籍信息中五项填对四项即可认证成功；万一证件认证、学籍认证均失败，可能是档案库缺失您的数据，您也可以上传附件进行认证，管理员人工审核。

2. 如您是海外校友，认证界面中，勾选了国家，则填写手机号时无需填写国家代码，也无需加 0。

咨询邮箱：xyxxxt@whu.edu.cn。



袁昌英文集系列丛书编纂出版项目 组征集研究资料启事

袁昌英(1894—1973),女,字兰子、兰紫,湖南醴陵人。作家、学者、教育家、翻译家。笔名杨袁昌英、袁美、昌英等。1916年赴英留学,1921年在爱丁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当年回国后,相继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上海澄衷中学、中国公学,其间曾在巴黎大学学习。1929年任武汉大学教授。在武汉大学任教、生活长达四十年。1970年返乡直至辞世。著有《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法兰西文学》《山居散墨》《饮马长城窟》等,在创作、翻译和文学研究方面均有建树。

湖南省醴陵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与武汉大学达成协议,成立袁昌英文集系列丛书编纂出版项目组,该组负责人为昌切教授。现特向海内外征集研究资料。征集范围:袁昌英生平材料、佚文、书信、日记、未刊著述、回忆文章、中外研究文章。恳请社会各界人士拨冗提供线索、惠赐资料(原件或复印件)。联系方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汉大学文学院 叶李或昌切,邮编 430072;电子邮箱 zhangjie@whu.edu.cn,plumnigh@whu.edu.cn;手机 13995509650。